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铁血卫队——纳粹党在行动



引子 惨痛一页

人类自进入二十世纪就开始步入空前惨痛的历程。

据盟国军事法庭的审讯记录，揭示了过去为党卫队组织的帷幕所严密遮蔽着的情况。证人的陈述和提出指控的证据，使人们看到了一幅不可思议的种族狂的图景，勾划出党卫队作为民族生物学上患有变态心理病狂人的一部骇人听闻的历史。这种恐怖所造成的恶果是：四五百万犹太人被屠杀，二百五十万波兰人被消灭，五十二万吉卜赛人被杀害，四十六万三千名苏联战俘被处死，十万名痼疾难治的病人根据无苦致死术的计划被毒气结束了生命。

1946年9月30日，盟国法官宣判希姆莱的党卫队是一个罪行累累的组织，其理由为：“党卫队的所作所为都是服从于犯罪的目的，即它迫害和屠杀犹太人，在集中营里恣睢暴戾，杀人如麻，插手对占领区的统治，执行强迫劳动的计划，以及虐待和杀害战俘。”结论是：所有“被正式吸收加入过党卫队……曾经是或一直是该组织的成员，并且知道自己系被用于从事进行按[伦敦战争罪行条例]第六条所解释为犯罪”活动的人，俱属涉嫌犯罪之列。

希特勒，

从未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毁灭了那么多的人；

党卫队，

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死亡机器，成为迄今为止最臭名昭著的标志。

他们的存在使当时和今后的人们都对二十世纪中的那段日子充满了痛苦的回忆。

在欧洲大陆最黑暗残酷的日子，他们身穿黑色制服，使整个民族毛骨悚然。他们头戴佩有骷髅标志的帽子，向希特勒宣誓忠贞不贰，杀戮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整个民族的各个生命攸关的部门几乎都捏在他们的手里：他们指挥警察和秘密情报机构，他们警卫总理府，看守集中营，装备起一师师佩戴骷髅标志的队伍，开赴欧洲各地。他们占据农业、卫生、民政和科学领域的要害部门，他们渗入外交部门的传统据点，把持着政府各部门的关键岗位。

他们自称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党的卫队，简称 SS（党卫队）。正如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迪特尔·维斯利歇尼所说，他们感到自己“是一种新型的教派，有着独特的组织形式和习俗”。

党卫队这个秘密宗派，不让任何人了解它的组织内幕。它的神秘性，使国民有如面对神秘的那稣会一样，对它望而生畏和不可捉摸；党卫队名义上反对耶稣会，但事无巨细又都以它为楷模。黑色秘密集团的先生们有意保持其存在的恐怖效果。“国家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被蒙上一层叫人窃窃私语和悄悄谈论的政治侦探小说式的神秘色彩”，党卫队副总指挥、保安警察处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曾眉飞色舞地这样说过，这个集团的首领、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洋洋得意地宣称：“我知道，德国有些人看到这种黑色制服就感到不舒服，我们对此很理解，而且也不希望有大多的人喜欢我们。”

当时，德国人民觉察得到，这个令人谈虎色变的组织在全国撒下了一张网眼细密的罗网，但是他们却无法看到党卫队的这张罗网。德国人只听到黑色纵队在城市和乡村踏着石砌路面的行军脚步声，还有成千上万疯狂的吼叫声：

党卫队在前进，道路畅通无阻！
突击纵队整装待命！
要去消灭专制，
开拓自由之路。
像我们父辈一样！
时刻准备作最后冲击！
死神是我们的战侣！
我们就是黑色的队伍。

成千上万只眼睛似乎暗中注视着德国人的一举一动。警察的蛛网像长着许多触手的水母，让全国同胞喘不过气来；四万五千名秘密警察官员，在全国二十个局和三十九个分局以及另外三百个边防警察中心站和八百五十个分站的所谓触角点里，监视着敌视纳粹政府的一切活动。三十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率领着六万五千名保安警察和二百八十万名风纪警察，卫护着纳粹的安全。四万名看守人员在二十座集中营和附设的一百六十座劳动营里，恣意虐待几十万所谓的或事实上的反抗政府的人。武装党卫队有九十五万人，其中三十一万是东欧的德意志族人，二十万是外国人，他们同武装部队一起作战，并密切注视着军事对手的一举一动。由党卫队保安处（SD）十万名情报人员组成的影子部队，时刻监视着国民的思想。大学、工厂、企业、农村、机关的任何点滴情况都被收集起来，上报柏林总部。

但是，有关党卫队各机构的工作方法不得向外透露只言片语，海因里希·希姆莱等所考虑的事情绝对不得泄露一星半点。希姆莱经常三令五申，该组织的成员不得与外界人士来往过密。他禁止党卫队领袖们与民众发生民事纠纷，以免法院洞悉党卫队内幕。他还拒绝向中央经济部提供有关党卫队系统所属工厂企业的情况。他命令看守集中营的骷髅队人员：“第一，任何部队不得去自己的家乡，也就是说，波美拉尼亚人的突击队不得在波美拉尼亚执行任务；第二，所有部队均隔三个月换防一次；第三，部队人员不得单独在街头执勤。”即使第三帝国的领袖们也不了解这个黑衣教派的内情。赫尔曼·戈林在1945年供认说：“我不了解党卫队的内情，……局外人是无法知晓希姆莱组织的任何情况的。”

只是在褐色众神末日来临后，才撕破了这个黑衣集团王国的帷幕。那些多年来指挥党卫队的人物，出现在四个同盟战胜国主持的纽伦堡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被指控犯下了准备战争、和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滔天罪行。

黑色骷髅，当年使上百万的党卫队员引以为自豪的标记，已成了政治罪犯的印记。从此这种印记就和每一个曾经穿过这个黑色集团的制服的人相联在一起，当年的所谓精华荟萃之所的党卫队，变成了“被褫夺公民权利者的大军”。

这个黑色集团在战时所犯下的罪恶，在当时只是偶为世人所知，它的组织、它的罪恶手段在严密的控制下，外人几乎无法确知其内幕，它到底只是一种普通的社会组织，还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犯罪集团。在战后，昔日的党卫队员纷纷为自己辩解、开脱。即使是盟国也是存在严重缺陷，它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一百多万人竟会集体地、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了屠杀群众的刽子手；它没有解释，党卫队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力，将纳粹政权的种族狂变为骇人听

闻的行动。

前党卫队队员是不想而且也无法揭开这个谜的。他们声称什么也不了解，经常把责任推给那些已离开人世的同伙，尽量为自己开脱，不想追根究底。最初还有一些人，如党卫队三等突击队中队长埃里希·克恩迈尔，又姓克恩的人，像他在自己所著的《酩酊大醉》一书中所做的那样，壮着胆子向公众作一种羞羞答答的自我批评，但是，不久在联邦德国翻案思潮的庇护下，出现了一批前党卫队头目的辩白书。这些头目耽于一般经验，以为同时代的人可能是健忘者。武装党卫队的头头、总指挥豪塞尔，在纽伦堡的法庭上几乎记不起曾经见到“与军队格格不入的”希姆莱到部队里来过。党卫队二级突击大队长布里尔感到，普通党卫队“只是一个自愿参加的团体”，与武装党卫队毫无关系。而且，有些党卫队员一再强调：“从未进行过种族仇恨的教育。”

这时，从奥斯维辛和马伊达内克毒气室的死亡烟雾中，从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已被砸烂的刑场里，爬出来一批形容枯槁的精灵，这些黑色恐怖下的幸存者向整个世界揭开了党卫队之谜。

党卫队的真面目终于被揭露了出来，从各国稀稀落落劫后余生者的口中，更多的惨绝人寰的真相，使世人闻之色变的恶魔般的暴行被揭露了出来。昔日主宰了大欧洲千百万人生命的党卫队头子，在末日来临时，纷纷畏罪逃亡，直到今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胜利了几十年，追捕这些前党卫队员、纳粹战犯的工作在世界上仍没有停止。

1960年5月22日，星期天。一架阿根廷航空公司的“大不列颠”型飞机降落在以色列利达机场。闻名全球的以色列特种部队摩德萨的成员将前纳粹党卫队头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纳粹警察犹太处处长，“犹太移民局局长”（这些机构都是专门从事灭绝犹太人的）的卡尔·阿道夫·艾希曼从飞机上押了下来。以色列法庭判定：艾希曼犯有屠杀了数百万人并妄图把整个民族从地球上消灭掉的罪行，被判处死刑。

这个早在1946年就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断定，主持屠杀了五、六百万犹太人的党卫队头目，在逍遥法外十五年之后，方才受到了正义的严惩。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多年来，对纳粹战犯的追捕断断续续，很不尽人意。

西蒙·维森塔尔，奥地利人，1932年定居波兰，1941年被关进纳粹德国的集中营。他和妻子两个家族中有80名成员惨遭杀害。1945年德国投降后夫妻得到团圆，他开始献身于追捕在逃纳粹战犯的工作。奥斯威辛集中营杀人煤气室的创建者沃尔特·德贾科和弗列茨·埃泰尔的被捕，就是维森塔尔全力追踪的结果。可是，奥地利法院在经过持续9个月的审讯之后，却宣布无罪释放。

欧洲有一个调查战争罪行的组织，总部设在德国路德维希堡一所废弃了的监狱里。多年来，总部里20名法官，律师和侦探，详细审查战犯的罪证。1973年，苏联提供给该总部的材料堆积如山、都是战时从德国方面缴获的文件，其中详细记录纳粹德国在苏联和东欧所犯的屠杀暴行，罄竹难书。现在总部仍然不断收到大量来信，提供数以千计的纳粹杀人犯的罪证。据该总部宣称，多达15000名曾在波兰犯下残暴罪行的人，至今还在德国逍遥自在。此外，至少有30名被其他国家缺席判处了

死刑或徒刑的纳粹战犯，也仍然在德国过自由人的生活。

几年前，英国内政部独立的调查机构发表过一个报告说，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在英国有 4 名犯有战争暴行的人，据英国报纸透露，这 4 人里有一人已经死了，他们曾在拉脱维亚、立陶

宛和自俄罗斯，参与了德国占领军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报告还建议对 75 名嫌疑犯继续调查，并对 46 人进行追踪。

在近 10 年里，纳粹战犯被定罪的人数有所增加，多数是美国和加拿大引渡给以色列的。而 1987 年法国对“里昂屠夫”巴

比进行审判的决定，则显示了欧洲有些地方对纳粹战犯问题再次加以重视了。

从事追捕在逃纳粹战犯的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都曾把鲍曼列为第一名追捕对象。鲍曼臭名昭著，是纳粹德国副元首，在希特勒自杀后失踪了，但仍被纽伦堡军事法庭缺席审判，以战犯罪处死刑。当时人们不相信他能逃离柏林。1972 年，他的尸体在西柏林建筑工程中被挖出来。次年，西德正式宣布他早已死去，他的名字从追捕名单上被划掉。

名单上的第 2 名对象是约瑟夫·门格尔。他是一名医生，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挑选男人、妇女和孩子，进行残酷的死亡试验。现已证明此人在 2 年前死于南美洲。

“里昂屠夫”巴比在被捕前是排名第三号追捕对象。他曾使用克劳斯·阿尔特曼的假名，在玻利维亚取得身份证，并成为有身份的巨商。他被押到法国受审判，是克拉斯菲尔德夫妇多年不懈努力追捕的巨大收获。如今他被关在里昂监狱里，而就在这所监狱里，他曾经残暴地虐待过无数的受害者。

现在名单上的排名第三号对象是盖世太保（纳粹德国的秘密国家警察）头子海因列茨·马拉。许多像他这样的要犯仍然躲在拉丁美洲或中东的阿拉伯国家。

有一名纳粹女战犯，叫爱尔米奥尼·瑞安，在拉文斯布吕克和梅登内克的监狱里当看守人时，曾把 1700 多人押进煤气室处死。她被从美国引渡到以色列受审判。在供词中，她列出了现在仍然生活在美国的 50 名纳粹战犯的名单。

二次大战中纳粹德国驻在比利时卢万的党卫军头子勒纳图斯·范·埃文特脱，已经 2 次被比利时法庭缺席审判，宣判死刑。他现在仍活着，有人曾在西班牙看到过他。另一名要犯是特列布林卡党卫军首领弗兰茨·斯坦格尔，战时他被同僚称为“文雅人”，实际上是个恶魔，对待列布林卡集中营谋杀至少 70 万犹太人负有罪责。他曾命令部下把他的“接待室”改建成火车站的候车室模样，以致使那些被送进煤气室处死的人误认为是将彼转移到其他集中营去。战争快结束时，德国人在逃跑前把该集中营的建筑物夷为平地，并重新造了一幢看上去像农舍的房子。他们干得如此彻底，以致战后到该地去的调查者连一块破布条和一绺头发也找不到。斯坦格尔本人逃到奥地利，再· 9 · 经意大利和叙利亚到达巴西。1970 年他被引渡到西德，并于同年 12 月，在杜塞尔多夫法院受审。

联合国曾经宣布：对纳粹罪犯的搜索是无限期的。

原西德也曾对一些纳粹战犯提出诉讼，其中有汉堡的威立索维特斯基，他曾因集中营煤气室里的气体不足，而把塞满几卡车的匈牙利儿童直接转移到火化坑里去烧死。

在目前仍被迫捕的纳粹战犯中，前党卫队员占三分之二以上，可见这个组织当时所犯的罪恶之深、之广、之秘密。
黑色髑髅，发生在这个标志下的罪恶就像一台死的机器，残酷而无情。

铁血卫队——纳粹党在行动

第一章腥风初起

上尉很快发现希特勒的宣传才能
消灭“十一月共和国”
“我需要一支私人卫队”
希特勒得到了三个得力助手

第一节 政客从军队中滚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欧洲，种种混乱和矛盾集中的战败国德国，希特勒还没有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自由团和国防军将巴伐利亚红色工人士兵苏维埃镇压之后的那些日子里，慕尼黑历史学家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无意中充当了纳粹运动的助产士。他跟当时控制慕尼黑局势的年轻民族主义军官们过从密切。在一次军人报告会上，一个口才奇妙而扣人心弦的人引起了冯·米勒教授的注意。“我当时看见，”冯·米勒叙述说，“一张苍白瘦削的脸，额上耷拉着一绺非军人式的头发，修饰得短短的小胡子，和两只淡蓝色大眼睛充满狂势的激情，闪烁着寒光”。米勒推推坐在自己身旁的学友迈尔，问道：“你知道在你的教官中，有一个富有口才的天生男高音吗？”

陆军参谋本部上尉、国防军第四军（驻巴伐利亚）新闻和宣传部（政治第一处）处长卡尔·迈尔认出了这个人。迈尔说：“这是李斯特团的希特勒。喂，希特勒，你出来一下！”接着，这个被招呼的人——米勒记述道——“顺从地走出来了，动作不利索，看上去，我感到有些执拗的尴尬相”。这个场面象征着阿道夫·希特勒对巴伐利亚国防军军官的依附性，也象征着大德意志国家未来元首多年都未能克服的纡尊降贵。

负责政治工作的迈尔上尉很快就发现了下士希特勒的宣传才能。从1919年7月起，迈尔主管的政治第一处在慕尼黑舍恩菲尔德街巴伐利亚陆军部大楼里备有一份连队心腹人员的秘密名单，上面也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不论迈尔上尉什么时候看到意识形态战线上受到威胁，他的心腹人员希特勒都准备以其雄辩的口才为之赴汤蹈火。

迈尔上尉渐渐感到这个下士作用非凡，以致他在信中一变上司的粗暴口吻，彬彬有礼地称呼他：“最尊敬的希特勒先生”，希特勒很快就成为陆军部的座上客，并可以自称是那个负责宣传部门的上尉的政治工作同事。当勒希菲尔德遣散营士兵气势汹汹不服他们军官的管教时，希特勒就挺身而出。他重新整顿了秩序。“特别是希特勒先生，”1919年8月23日心腹人员洛伦茨·弗兰克报告说，“是一位具有天赋的通俗演说家，他以他的狂热激情和平易近人姿态出现在一次集会上，听众就不由自主地被他紧紧地吸引住了”。

迈尔决定对他的这名心腹委以更大的重任。他由于兼负督导巴伐利亚各个政党之责；因此于1919年9月派希特勒出席德国工人党（DAP）的集会。与会者是一批民族主义宗派分子。他们除仇视犹太人和共和国外，还醉心于一种小资产阶级的感情社会主义（“打破利息奴役制度”）。军方的这位特派员迅即成为德国工人党集会上的明星演说家，以其口若悬河的辩才驳得啤酒馆座上那些比较稳重的对手们哑口无言。1920年1月，这个六十四名成员的党推选希特勒负责抓宣传工作，通过了由他参与制定的党纲，并在后来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通常所称的“纳粹党”。

此时迈尔退休，一个塌鼻子、剃光头的五短身材的人接替了他的职位，这个人脸上疤痕斑斑，满面红光，神色中露出颇有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抱负：恩斯特·罗姆上尉看来是当年唯一使这时业已追伍的希特勒侧身德国政界一举成名的人。他是香霍斯特和巴伐利亚的煞有介事忙个不停之徒的罕见的混合物，在他的身上，燃烧着难以抑制的搞阴谋的欲火；不过在他的同

伙看来，这个同性恋爱者却是一名响当当的冲杀能手，性格粗暴，厌恶一切精神文明，同时具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罕见天性。

恩斯特·罗姆善于集某些相互对立的東西于一身。这个坚定的巴伐利亚保皇派、巴伐利亚第十兵团“国王团”（主子为国王路德维希三世）前连长，决心对1918年被推翻的皇帝“谨遵吾誓，直至皇上晏驾而后已”。但他认为巴伐利亚只是一个“制度的细胞”，这个细胞必须得到民族主义势力的大力培植，才能攻下这个革命的罪恶渊蔽的柏林。这位慕尼黑雇佣兵队长手下，纠集着——尽管以极端激进的面目出现——一代郁郁不得志的失意军官。战争的失败和皇朝的结束使这些军官沦落于平庸的生活底层。

他们往昔的社会声望已被剥夺，虚假的荣誉也丧失殆尽，寻求在前线经历中似已见端倪的新的共同生活形式，但一无所获。于是，军官们转而反对根基不稳、摇摆不定和谁也不喜欢的那种制度：民主政治、“十一月共和国”。它被视为一切灾难的根源。德国军人企图逐步夺回他们原有的社会地位，为祖国重建1918年被胜利者从帝国夺走的一支武装部队。

一个历史性的偶然机会帮了他们的忙：主要是在巴伐利亚进行的反对共产党人和斯巴达克派的斗争，它使政权一度落入军官们的手中，在工人士兵苏维埃共和国被推翻后的日子里，谁穿军服，谁就得势。这些军官遭到社会民主党人的部分反对和得到右派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的部分支持，在实施宪法状态恢复以前一直左右着巴伐利亚的政局。迈尔上尉控制所有政党，同伙罗特博士掌管司法，恩斯特·波纳中尉接管了慕尼黑警察局。当时才三十二岁的罗姆上尉，先任慕尼黑城防司令的参谋长，后负责里特·冯·埃普上校步兵旅旅部第一处（武器和装备），接受了一个德国军官在当时可以想象得出的最棘手的任务：在巴伐利亚建立和武装所谓的民团。

凡尔赛和约将德国国防军的兵力和武装严格限制为七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这样，在紧急情况下，事实上没有可以动用的后备兵力。军官们知道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问题：国家必须给自己搞一支第二武装，即一支“秘密的”国防军。罗姆设想用一种民兵，一支像编年史作者康拉德·海登所说的“枪支藏在衣柜里的国民军队”，作为后备部队。上尉发现，巴伐利亚人民党追随者、林务官埃舍里希富有独创精神，又和自己志同道合。他俩着手创办德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民军：巴伐利亚民团。

罗姆一个劲儿地搞武器，建立秘密军火库，在满腹狐疑的协约国面前不露任何声色。单是在慕尼黑一地，他就搜集了一百六十九门轻炮和十一门重炮、六百六十挺机枪、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一支步枪、马枪和手枪，三十万枚手榴弹和八百万发子弹——直到1935年。国防军在三十年代中期扩军所需的武器，其中三分之一还是由罗姆的秘密军火库提供的。

可是巴伐利亚民团在1921年夏天突然完蛋了。柏林中央政府取缔了（这曾向协约国许过诺言）慕尼黑的民团，夺走了罗姆最得力的志同道合者。上尉手里只剩下少数一些极右军事团体和自由团残余分子。他们过着不得温饱的生活，半公开地耍刀弄枪和从事政治暗杀。这些仇视民主的分子突然发觉，没有群众成不了气候，没有群众这些领袖都成了光杆司令；而只有群众才能使他们举足轻重。

罗姆知道有一个人能够吸引群众。他在慕尼黑一个名为“铁拳”的民族社会主义小组里，认识了纳粹党吹鼓手阿道夫·希特勒。罗姆发现，这个前国防军亲信是一名具有吸引力的鼓手，他能将上尉为建立自己的影子部队所

需要的人吸引过来。1921年7月希特勒刚刚攫取了纳粹党第一主席的职位，罗姆就决心跟希特勒一起夺取政权。

这位奥地利籍鼓动家开始活动了，从一家啤酒馆走到另一家啤酒馆，煽动小资产阶级群众和通货膨胀的受害者起来反对“十一月罪人”，与此同时罗姆拉起了第一批行动队，它们的任务是保护这位吹鼓手的宝贵生命。施特雷克上尉领导的第十九迫击炮连的士兵挥舞棍棒，击倒一个破坏纳粹党集会的人。由这些士兵组成了一支党的纠察队，接着纠察队变成体育运动部，最后又变成一个离开它纳粹运动就无法想象的组织——冲锋队（SA）。

首批队员是经罗姆挑选的，现在他又在极右派赫尔曼·埃尔哈特舰长第二海军旅的残部中，为冲锋队物色到了第一批领袖。这些人参加了由地方议会总监卡普发动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变（1920年3月），失败后散窜四方。在慕尼黑，埃尔哈特的“残兵败将”以“康苏尔组织”（OC）的名义潜伏下来。这位舰长爱发牢骚，性格怪僻，可想而知不是一个搞阴谋活动的人才。起初他拒绝和希特勒发生任何联系（“天哪，这个白痴又想干什么？”），但罗姆向他陈述这个旅确实需要培养军官干部，埃尔哈特同意了，把他最得力的军官借给冲锋队。康苏尔组织少尉约翰·乌尔里·克林茨赫负责训练并领导冲锋队，海军上尉霍夫曼担任参谋长，因参与谋杀埃尔兹伯格而遭到通缉的海军上尉曼弗雷德·冯·基林格男爵后来也参加进来，并将海军军歌凑合着作了改动——“埃尔哈特旅”就变成了“希特勒冲锋队”：

钢盔上字鲜明，
黑白红三色带，
我们的队伍叫，
希特勒冲锋队。

冲锋队于1921年8月3日成立。在成立宣言中，他们誓“作钢铁的组织”为纳粹党效力和“心甘情愿地追随领袖”。可是为时不久，希特勒就感到自己在冲锋队里是个局外人。决定行军步调的并不是他，而是罗姆和埃哈尔特的军官们在发号施令。

在希特勒的眼里，冲锋队主要是一个政治宣传工具，是一支张贴竞选标语、惯于在开会时戴上指节环进行格斗、通过列队游行吸引迷信权力的德国人的队伍。相反，冲锋队的头头们却要把他们的队伍搞成真正的军事部队。冲锋队在国防部的动员计划中确实扮演了名副其实的军队角色，巴伐利亚国防军第七工兵营和第十九步兵团负责对冲锋队进行军事训练，慕尼黑冲锋队团（1923年总人数为一千一百五十人）配备了炮兵百人连、骑兵排，设立了枪械长、炮长等职衔。

然而，在冲锋队一些职业军官的眼里，希特勒这种政客是不受欢迎的，他们在一些私下和公开的场合，都怒气冲冲地吼叫：“政客从军队中滚开！”这对希特勒的存在构成了威胁。

德国战时最高奖章获得者赫尔曼·戈林上尉，被希特勒请来担任冲锋队头子，借以平衡埃尔哈特的军官的势力。戈林于1921年年初按照师部建制建立起冲锋队司令部，配置步兵和炮兵指挥官各一名。希特勒本能地觉察到，党内形成了一股听命于陌生人指挥的力量。那个由退役陆军中校、纳粹党和其他极右派联合组成的“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的负责军事的头头克里贝尔粗暴地要求：“政客必须闭嘴。”冲锋队司令部第2期通讯中说：党的地方组织领袖可以给冲锋队领袖“提供最有力的支持”，如果他充当“鼓手”

的角色的话。希特勒从参谋长霍夫曼发布的一项指示中获悉，冲锋队是“民族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个特别组织，它理应受到党的地方组织和党的领导的另眼看待”。

从这里已可看出存在着冲突，这种冲突后来一再给运动带来损失，直到最后以罗姆的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冲锋队和政治领导人之间进行的激烈争吵。希特勒早已看到危险咄咄逼人，他给自己搞了一支近卫队，以便摆脱下听话的冲锋队军官们的压力。

1923年3月，出现了一个后来证明是党卫队的胚芽的组织：几名老战士宣誓用自己的生命保卫希特勒，使他不受任何岗位外敌人的伤害，他们自称“本部警卫”。第一次出现了后来的党卫队的黑色标志；卫士们给自己确定了有别于冲锋队的标记：他们身穿灰色军上衣和风雨前克，头戴饰有银鬃髻别针的黑色滑雪帽，臂套镶黑边的字袖章。

当然，这支私人卫队的寿命并不长久。两个月后，埃尔哈特舰长就跟希特勒闹翻了，并召回了冲锋队中的埃尔哈特旅的人员，这时希特勒另行组织起一支卫队，给它取为“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在身材矮小、模样近似侏儒的文具商、纳粹党第二司库约瑟夫·伯希托尔德和冲锋队员尤利乌斯·施雷克两个领导下，突击队员定期在慕尼黑依扎托尔门附近的“托尔勃劳”啤酒馆聚会。他们坐在烟雾腾腾的啤酒馆里，商量如何开展第一阶段的活动。突击队员们的成分属于党的另一个社会范畴，不同于埃尔哈特和罗姆两个羽翼。他们多数出身于慕尼黑的小资产阶级和工人，从事手工业，如说他们可以自称是军官的话，那么充其量只不过是后备役少尉而已。

希特勒第一个和最重要的私人卫士乌尔里希·格拉夫是个屠夫，并且在业余摔跤比赛中名噪一时。同希特勒称兄道弟的朋友艾米尔·莫里斯本是一名钟表匠，因侵吞一笔款项而被列入刑事犯名单。马夫出身的克里斯蒂安·韦伯原在慕尼黑“蓝山羊”酒馆当跑堂，收入微薄。但是这些人现在却纠集在一起，以保卫希特勒和其他纳粹领袖的生命安全作为他们的首要任务。

不论希特勒上哪儿去办事，他们都揣上“橡皮”和“打火机”（这是他们的切口，指橡皮棍和手枪）追随左右，保护他们的领袖不致被敌对者所伤害。1942年，希特勒还得意地谈起这些“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并知道有一天将要豁出命来干的人”。

希特勒有了初步的实力，他不待羽翼丰满，就想抓住机会进行冒险，他的冒险差一点使他失去了以后的“辉煌”。

第二节 政变帮凶

机会属于敢于冒险的人，希特勒深信这一点，他敏锐的眼光时刻注视着千疮百孔的德国瞬息万变的政局。

1923年11月，这一天来到了。巴伐利亚政府的政策发生了转变，希特勒企图利用这个时机实现自己的计划：巴伐利亚分离主义保皇派政府首脑、邦长官古斯塔夫·里特·冯·卡尔和驻巴伐利亚国防军司令奥托·赫尔曼·洛索少将，同柏林闹翻了，巴伐利亚随时都有可能脱离中央。巴伐利亚的军方准备决一死战。

里特·冯·卡尔定于11月8日晚假慕尼黑罗森海默大街“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召集各界人士开会，而他却决心迫使巴伐利亚的分离主义分子反守为攻：进军柏林，消灭“十一月共和国”。希特勒匆匆忙忙向自己的盟友发出战斗信号，这些盟友是他为了实现自己制定的突然袭击计划而争取到的。前第一陆军总监埃里希·鲁登道夫也接到了紧急通知，参加了政变，只不过抱怨自己受骗没当上主角。希特勒集合起手下的五十名突击队员，给他们鼓打气，一切准备妥当。于是他身披黑色大衣，别上一级铁十字勋章，乘车出发。晚上8时许，他站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的门口，等候他的部下到来。

三刻钟后，突击队长伯希托尔德拖来一挺机枪，架在啤酒馆门口。就在这当儿，希特勒率领私人卫士们一直闯进高朋满座的啤酒馆。他拔出手枪朝天天花板放了一枪，跳上一张桌子，叫喊道：“全国革命已经开始了。这个会场已经由六百名全副武装人员占领，任何人都不许离开。巴伐利亚政府和中央政府已被推翻，临时中央政府即将成立。”遭到突然袭击的巴伐利亚军人和政界人士听凭这个狂人摆布，表示愿意同希特勒合作。

可是到了第二天，卡尔和洛索少将就调动他们的部队向纳粹党领袖反扑过来，声明与希特勒断绝关系。这位政变战略家好象瘫软了似的，坐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等候捷报。捷报可没有盼到，只有一个消息还算不坏，并最终促使希特勒走上街头：罗姆率领由自己建立的武装团体“德国战旗”冲进了陆军部，正在与越来越多的军警部队相持不下。

11月9日中午时分，希特勒带领他的部属和盟友排成八路纵队，在狭窄的府邸街上行进，前去解救陷在陆军部里的罗姆。来到奥第昂广场，他们遇到一百名左右的邦警察，在菲尔德赫恩会堂的台阶上严阵以待，挡住队伍的去路。当政变者仍然企图前进时，又有一队邦警察赶来布防，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面色苍白地挪着步子。希特勒的卫士格拉夫几步跳到警察的枪口前，叫喊道：“别开枪！过来的是鲁登道夫阁下和希特勒！”话音刚落，警察队伍里就响起了一阵枪声。十六名纳粹分子——其中五名是突击队员——和三名警察当场饮弹毙命，几乎所有纳粹运动领袖都被逮捕。突击队队长伯希托尔德和身负重伤的冲锋队司令戈林漏网，逃往奥地利。

阿道夫·希特勒的轻举妄动召致了纳粹党的毁灭。党组织、冲锋队和突击队均被取缔。剩下来的是一群争吵不和的纳粹分子，他们先是躲到鲁登道夫的大旗下藏身，后来又不断分裂成新的派别和集团，只有坚持不懈的恩斯特·罗姆在被开除军籍并关押不久保释出来后，仍然打定主意继续干。希特勒在自己还被关在兰茨贝格要塞监狱里时，就封上尉为那个转入地下的冲锋队的领袖。

但罗姆很快就看出，巴伐利亚政府是不会撤销取缔冲锋队的命令的。这

时，在罗姆的者上级里特·冯·埃普的领导下，卡尔已把所有武装团体合并成一个“紧急分部”，统一控制起来。不久罗姆另行组织一个由冲锋队旧部组成的武装团体，名义上将其置于鲁登道夫将军的领导之下，并给这个团体取名“火线分部”。

有了“火线分部”，罗姆得以首次在巴伐利亚以外的地区为自己和那个勃劳瑙人争取纳粹分子。在十一月政变以前，希特勒的运动几乎从未越出慕尼黑市的范围，现在，老自由团的幸存者和群龙无首的北德纳粹分子，纷纷前来投奔“火线分部”。心狠手辣的极端民族主义亡命之徒，后来主张将粗鄙的作风奉为冲锋队生活方式的自由团军官，都站到了罗姆的军旗下：冯海德布雷克上尉和赫尔道夫伯爵来了，还有埃德蒙·海因斯中尉也来了，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流氓，正如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供述的那样，也与一贯有相公癖的罗姆“首次交往”。

在此之前，希特勒的冲锋队在其全盛时期也至多只有过两千名队员——现在，罗姆可以向蹲在兰茨贝格要塞监狱里的朋友报告，“火线分部”成员已达三万人。不过希特勒看到上尉的部队人数不断增加，心里却有些不舒服的感觉。罗姆并未停止和民族运动政治家们争夺武装团体的独立性，他在写给鲁登道夫的信中就说过：“政治运动和军事运动完全是两码事。”

第三节 佩戴骷髅标志

1924年12月，希特勒获释出狱，委托罗姆上尉重新建立冲锋队，这时两个伙伴发生了公开的争吵。希特勒再也不同意组织埃尔哈特式的独立的冲锋队，罗姆则坚持搞党务的人无权干预军人的行动，声称希特勒只有像过去一样仍然充当武装团体的鼓手。“党的政治不得进入‘火线分部’，也不得进入冲锋队”，罗姆在一份致这位前下士的备忘录中说。他还明确表示：“我断然不许冲锋队干预任何党务，我也同样断然不许冲锋队领袖听任党的领袖发号施令。”

罗姆哪里知道，希特勒早已打定了主意：在他确有把握不再受制于身穿冲锋队制服的异己分子之前，他是不会让成立冲锋队的，希特勒和罗姆分手了。这位冲锋队的真正创业者别无他法，只好于1925年4月30日致函希特勒，声称“忆及我们曾经共同度过的美好和艰难时刻，衷心感谢你的同志式的情谊，并请不要断绝你跟我的个人友谊”。不到一个月，希特勒通过自己的秘书处回了信：“希特勒先生无意再次从事武装运动。如果说他当年这样做了，那完全是出于后来那些把他弃置不顾的先生们的主张。今天他只需要一支维持会场秩序的纠察队，像1923年以前一样。”

党卫队(SS)诞生的时刻临近了。早先带有罗姆和埃尔哈特标记的冲锋队所不愿干的事，现在应由党卫队来完成：处处确保领袖在党内的权威，时刻准备无条件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我当时考虑”，希特勒后来谈到党卫队的成立经过时说，“我需要一支私人卫队，他们即使人数不多，但无条件地忠于我，甚至可以挺身而出对付自己的兄弟。宁可一个城市只挑选二十个人——条件是他们必须绝对可靠，也不要一群不可靠的乌合之众。”

当然，一般党员所知道的有关党卫队的成立却是另一种说法——后来在第三帝国的任何一种政治教科书上都可以读到：由于冲锋队一再遭到取缔，1925年2月新成立的党不得不建立一个自卫性组织，以对付敌人变本加厉的恐怖手段。绝口不提希特勒有意迟迟不肯重建冲锋队；取缔冲锋队的命令也并非在德国各邦都生效，相反，特别是北德和西德各地的冲锋队发展得很快，只是它们不听命于当时这位地位还颇不稳固的慕尼黑的党的领袖罢了。

希特勒想不失时机地建立一支私人卫队。1925年4月。他指令原突击队员、这时间或也给他开开汽车的尤利乌斯·施雷克新建一支本部卫队。几星期后，这支本部卫队改称“党卫队”。施雷克物色了首批党卫队员，他们的来源与本部警卫和突击队一模一样：慕尼黑伊扎托尔门附近托尔勃劳啤酒馆座上的常客。最初一共八个人，几乎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突击队的成员。他们仍旧穿突击队制服，只是取消了原来的灰衬衫，代之以这时已成为党的标志的褐衬衫，系黑领带。

党卫队领袖施雷克也着手在其他城市拉起队伍。1925年9月21日，他发出“第1号通知”，要求所有各纳粹党地方组织建立党卫队；规定它们应是小型、精干的精锐队伍，至多设一名队长和十名队员，只有柏林可以设两名队长、二十名队员。施雷克负责掌管，参加党卫队的人必须经过挑选，都应是纳粹分子中信奉武力的精萃人物。党卫队领导规定，发展对象年龄限于二十三岁至三十五岁，必须有两名介绍人；在一个地方需要正式居住满五年，还要“身体健康和体力强壮”。

党卫队的“方针”规定：“对好酒贪杯、多言饶舌和有其他毛病的人一

律不予考虑”，当施雷克 1925 年 11 月从《人民观察家报》上看到，慕尼黑一个纳粹党员道布搞起一支由十五名前冲锋队员组成的党卫队并自封为队长时，这位党卫队创始人提出抗议，他于 11 月 27 日写信给党的指导处说：“鉴于所谓的新建工作仅仅是将原来的冲锋队换成‘党卫队’的名字，因此党卫队高级指导处恳请党的指导处采取措施，通知这些先生们不得滥用党卫队的名称来称呼这些组织。不应当让一个创业维艰、基础健全的组织由于滥事摹仿而受到损害。”

施雷克极力主张“集中最优秀和最可靠的党员，以保卫运动和高度大公无私、孜孜不倦地为运动作好工作”。他还在一份通知中提出了党卫队的任务：“集会时维持会场秩序，为《人民观察家报》征求订户和广告，为党征集党员。”部门负责人、作为中央机构设立的党卫队高级指导处的真正创建者阿洛伊斯·罗森温克，则用地道的纳粹语言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在我们的黑色帽沿上佩戴骷髅标志，惜以警告我们的敌人并向我们的领袖表示我们随时准备用自己的生命去实现他的思想。”

党卫队成立后，首批捷报传到了慕尼黑：在德累斯顿，党卫队队员阻止了五十名共产党人试图冲击会场，保卫了纳粹党人的一次集会。在萨克森——罗森温克报告说，“自从德累斯顿、普劳恩、次维考和克姆尼茨等地的党卫队联合起来，在克姆尼茨大理石宫将共产党人不仅狠狠揍了一顿，而且将一部分人抛出窗外以后，再也没有马克思主义者胆敢破坏我们的集会了”。1925 年圣诞节，党卫队高级指导处有这样一段记录：“我们拥有一个近千名成员的组织上统一的保卫团体。”尽管真正的党卫队员人数不久又急剧下降到两百名，但党卫队作为纳粹党第一个全国性组织的地位仍然得到了巩固。

第四节希特勒授予党卫队“血旗”

1926年4月，逃亡奥地利的原突击队队长伯希托尔德归国，接替施雷克领导高级指导处。这个十一月政变分子回国后，希特勒公开把党卫队捧为自己的中坚组织。1926年7月4日，希特勒在魏玛举行的纳粹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授予党卫队“血旗”，即1923年11月9日给行进在府邪街上的八路纵队开道的那块布头。党卫队站稳了脚跟，并发展壮大。现在，希特勒可以大胆地再次同冲锋队打交道了。他心里非常清楚，他需要这根用来运转群众大军的皮带，只有这样一根皮带，才能在党的军队和政治行军纵队的德国将他一举推上台去。

可是，巴伐利亚以外的冲锋队领袖对这个奥地利人希特勒还心存疑窦。希特勒必须物色一个人，帮他分散各地的冲锋队组织建立联系。这个人他物色到了，就是北德自由团领袖、前上尉弗兰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蒙。1926年7月27日，约瑟夫·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12时在首脑那里，作了认真商讨。普菲费尔将任冲锋队全国领袖。”对希特勒来说，事情的确不是闹着玩儿的，因为北德纳粹领袖们至今尚不完全相信这个慕尼黑来的人，而现在竟让他们的亲信普菲费尔进入党的指导处——既是坐探，又是监军。

希特勒不得不给这个自由团分子以相当大的权力：普菲费尔从1926年11月1日起任“冲锋队最高领袖”（OSAF），领导德国所有冲锋队组织。他虽然原则上必须执行党的首脑希特勒的指示、但在建设冲锋队组织的工作中却可以便宜行事。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把自己同北德纳粹分子的结盟看成是一大胜利，以致他也不得不削减他的党卫队的权力。党卫队同样也归“冲锋队最高领袖”领导，它的头儿只是得到了一点小小的安慰：高级指导处负责人伯希托尔德从此可以自称党卫队全国领袖。

希特勒很快就不再感到得意了。他看到，自己的中坚队伍有可能完全听命于冲锋队和党的干部的危险。早在任命伯希托尔德时，问题即已存在：高级指导处的成员没有遴选前任施雷克，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个愚蠢的党卫队创始人只不过是后来任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成员的菲利普·布勒和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这类阴险的党阀的百依百顺的玩物。高级指导处成员恩斯特·瓦格纳致信希特勒说，大家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看到施雷克不具备领袖应有的才能和组织才能，也缺少确保党卫队成为运动的中坚队伍的名望”。

就这样，被任命的是较有魄力的伯希托尔德，不过他要对付那些党阀也不是很容易的。

他发出命令：“不论党的地方组织或党的区领导机关，均无权干预当地党卫队的内部组织任务。”在另一项命令中说：“党卫队在运动内部拥有完全的独立地位。”尽管如此，面对党的干部们，伯希托尔德还是无法贯彻自己的意图。党卫队的权贵和党阀们之间开始显露出潜在的矛盾。这种矛盾始终存在，一直延续到第三帝国的末日。1926年5月11日，党卫队成员瓦格纳在一次党内会议上叫嚷必须“驱除党阀”。党阀布勒和施瓦兹当即禁止他进入设在慕尼黑舍林街50号后楼的党卫队高级指导处。全国领袖伯希托尔德甚至不得不亲笔签署禁止瓦格纳同志进入高级指导处大门的命令。瓦格纳气愤地对希特勒说，“伯希托尔德同志告诉我，是布勒和施瓦兹先生逼得他这样做的。”

憋着这股怨气还不算，冲锋队的权力重又急剧上升，因此伯希托尔德一甩手丢下自己的职务不干了。1927年3月，他的副手埃哈德·海登出任党卫队新的全国领袖。面对人多势众的冲锋队，他也差点儿站不住脚，冲锋队最高领袖普菲费尔甚至禁止党卫队在冲锋队力量还不够强大的城市建立党卫队。

在每个地区，党卫队的人数只及冲锋队人数的十分之一，因此直到1928年，党卫队员总人数只增至区区二百八十名。党卫队的中坚分子还必须常常听任冲锋队领袖的指挥，干打杂的工作，完成日常事务，分发宣传材料和出售《人民观察家报》。

他们往往不得不满足于像1926年成绩汇报中所列举的这样一些事情：“由于各地党卫队的努力，10月份在全国共征集纳粹党新党员二百四十九名，《人民观察家报》新读者五十四人，《冲锋队员》新读者一百六十九人，《民族社会主义者》新读者八十二人，《西南德观察家报》新读者一百四十人，《西德观察家报》新读者四百七十五人，其他民族社会主义报刊新读者一百八十九人。此外还推销了观察家画报两千份。”这份成绩汇报的标题是：“我们就是这样工作的！”

仅仅是由于坚信自己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才促使这支“也许是高效率的、无论如何是趾高气扬的队伍”（康拉德·海登语）继续前进。这支队伍的内部口号是：“好汉有话不放在嘴上！”它默不出声地同褐色行进纵队举步相随——要求更高的入队条件和更为严格的执勤条例，使它时刻不忘党卫队的优越感。“党卫队不参加党员会议上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参加座谈晚会听报告过程中，党卫队员不得抽烟和离开会场——这有助于对大家进行教育”，1927年9月13日全国领袖埃哈德·海登发布的《第1号命令》中这样说。“党卫队员和队长不介入任何与己无关的领域（地方组织政治领导和冲锋队），不发表意见。”

命令规定，每次参加集会执勤时，各分队“应将队员排成两列横队”，检查服装和证件。党卫队员必须随身携带纳粹党党证、党卫队员证和党卫队歌本。特别要求绝对遵守有关禁止携带武器的第8号命令；希特勒决心用表面上合法的手段攫取政权，为此也就要作好充分的准备。在条件不成熟时，忍耐往往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法。

第五节 “风流杀手”希姆莱

希姆莱无疑是帮助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的重要人物之一，在希特勒建立党卫队，急需人手的时候，这个年方二十九岁的青年成为党卫队新主子。

希姆莱作为枢密院教育顾问格布哈德·希姆莱的次子，不同于想到自己早先在维也纳踟躅街头的流浪岁月就感到犹如恶梦一场的希特勒，不同于父亲是工头的约瑟夫·戈培尔，不同于出身波罗的海之滨的失意的流亡者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希姆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和自觉的中产阶级和公务人员阶层的儿子。

海因里希·希姆莱于1900年10月7日出生在慕尼黑希尔德加德街2号的三楼。当他呱呱坠地时，父亲满有把握地认为这个儿子会得到社会的重视。巴伐利亚王国的一个大人物向婴儿伸出了庇护之手，这就是枢密顾问希姆莱的王室学生、维特尔斯巴赫的海因里希亲王。教师的儿子就从亲王取名，海因里希亲王听到枢密顾问希姆莱向他最恭顺地报告说新出世的嫡子体重七磅又两百克，立即表示有意做孩子的教父。名字和教父约束着孩子从小就遵守忠于国王的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学生时代的海因里希·希姆莱对父母的权威，或者甚至对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制度从未发生过怀疑。父亲教导他懂得他的列祖列宗都是善良的人，并奠定了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的基础。在这样的浪漫主义中，日耳曼人的贵族和名媛淑女们遵循晚期追随瓦格纳（德国作曲家、文学家）的时代寻欢作乐，后来只要摇身一变就成为主宰民族的德意志北欧人，以适应纳粹政权的需要。这个男孩很早就学会了对自己所处环境表示应有的尊敬。甚至在他那干干净净的学生日记本上，也可看到一条处世谦恭的警句：毋忘用完整的头衔尊称日记中出现的人物。

但是，谁认一位亲王作教父，谁就必须当军官。这里有一点是了解希姆莱本性的关键：他一直梦想指挥百战百胜的军队，但却未能完全实现童年时的这一梦想。这个教书先生的儿子视力不好，最初想进帝国海军，可是舰队不收戴眼镜的人。于是他决定参加陆军。枢密顾问希姆莱在1917年6月26日这样登报道：“我的儿子海因里希迫切希望以步兵军官为终身职业。”这个年轻人迫不及待地要上前线打仗。当哥哥格布哈德1915年参加民军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在自己的笔记簿上歪歪斜斜地写道：“唉，我多么希望自己年龄也能合格，好上前线去。”他逐字逐句地将陆军最高司令部的战报抄下来，并咒骂兰次胡特人（全家已迁居兰次胡特）缺乏战争热情。

希姆莱嚷着就是要当兵，父亲只好央求自己在宫廷的朋友们，让儿子提前加入军队。朋友们帮了忙，而且几乎就在同时，希姆莱还得到了这时死去的亲王教父在另一方面的最后一次恩宠。宫廷事务管理部门通知“尊敬的格·希姆莱副校长先生”说：“兹指定本埠扎尔瓦托街18号J.N.奥伯恩德费尔银行奉上息金为百分之五的德国战时公债券一千马克整。请代令郎晒纳，此系令郎已故教父前海因里希亲王殿下之馈赠。”

希姆莱于1917年底加入巴伐利亚第十一步兵团“森林团”。可是行伍生涯还未开始，就已宣告结束。虽然这位全国领袖临死前不久告诉瑞典伯爵伯纳多特，说他和他的部下“上过战场”，在其他材料上甚至还谈到他参加过西线的一次战役，事实上候补军官希姆莱根本没见到前线是什么样子，他没有赶上打仗：在累根斯堡经过半年入伍基础训练后，步兵希姆莱于1918年6

月 15 日至 9 月 15 日在弗赖辛格修完候补军官训练班，紧接着又进了第十六机枪连在拜罗伊申举办的机枪训练班，到 1918 年 10 月 1 日结业。两个月后，他在第十一步兵团补充营四连奉命退役。

不过，战后的混乱局势，看来还是给这个退役候补军官开辟了另一条行伍发迹的道路。1919 年 2 月，巴伐利亚左翼社会民主党总理库特·艾斯纳被一名军官暗杀，随后共产党人及追随他们的革命派宣布成立红色工人士兵苏维埃共和国。巴伐利亚社会民主党人的合法政府逃往班堡，并不得不违背本意，拉起队伍，这支队伍主要由退役军人和自愿参加者组成，取名自由团。

由柏林派出的国防军和自由团于 1919 年 4 月准备就绪，进攻红色慕尼黑，候补军官希姆莱也报名加入一支人数不多的自由团。领导人为劳滕巴赫少尉。这一次他又来晚了，没投入战斗。希姆莱所在的部队没有开进慕尼黑，这个候补军官仍旧是一名仪仗队士兵。不过他并未气馁。1919 年 6 月 17 日，他写信给第十一步兵团后卫分遣队，请求发给他军人证明，“因为我将于日内转入国防军”。

进国防军的打算也未实现，原因是这时他父亲决定，考虑到王室的庇荫已不复存在，通货膨胀有增无已，现在应该让希姆莱在战后赶紧熟谙一门可靠的职业了，父亲看中了农业。这个功名未就的“陆军元帅”表示同意，他对农业素感兴趣，仅次于当兵。他在童年时就收集过许多植物标本，他那古怪的、对草药种植园的癖好，日后还将使集中营的囚徒受尽折磨。每个集中营都必须辟出一块尽可能种植草药的园子，希姆莱认为这些草药能治病，其疗效超过药剂。

农学家的生涯仍然是时运不济。希姆莱刚刚开始因戈尔施塔特的某农场学农，就被一场流行性伤寒弄得卧床不起。一个姓格林施塔特的医生决定：“停止工作一年，进行学习。”1919 年 10 月 18 日，希姆莱进了慕尼黑大学技术学院，注册为农科大学生。难道像传说的那样，他已经屡遭失败而心灰意懒，就成了一只“Lonely Wolf”只身处于社会边缘吗？根本没有。在慕尼黑，希姆莱开始了生平春风得意、轻松愉快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成为传记作家们的难解之谜。

这个彬彬有礼、乐于助人和显得有些无聊的大学生，在慕尼黑的化妆舞会上扮演阿卜杜尔·哈密德上土耳其苏丹的角色，不幸地堕入情网，爱上了一个名叫玛雅·洛里茨的女士，并讲究吃喝。谁也没有看出他日后会成为大规模屠杀的刽子手。

随后，希姆莱参加了一个取名叫“阿波输送”的大学生协会击剑组织，并从而和教会决裂，以至后来他权势显赫之时强迫九万名党卫队员退出教会并公然打算处死教皇。

同教会关系的破裂使希姆莱感到迷惘，但并未使他有所震动。他的兴致在于世俗方面：这个兰次胡特大学生更关心的，不是宗教和政治，而是慕尼黑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娱乐活动、同洛里茨太太共进午餐以及大学生的性问题。

安娜·洛里茨某音乐会歌唱演员的遗孀，和希姆莱家沾点亲，她住在慕尼黑耶格尔街 9 号，家里给别人搭伙包饭。洛里茨太太的女儿玛丽亚——叫玛雅使这个兰次胡特大学生着了迷，但结果证明，一名情敌，即后来的斯图加特皮革商汉斯·克尼普却博得了这位美女的青睐。有时希姆莱全家上洛里茨那儿去聚餐。“每当‘希姆莱一家子’——大家这样叫他们——五个人

接踵而来，洛里茨家里总是热闹非凡，”克尼普这样回忆说，“希姆莱一家人知道，到洛里茨这个好婶婶家里来，准能吃上些美味可口的饭菜。”

洛里茨母女一家的节日庆宴也对希姆莱具有诱惑力。“你也学跳舞吗？”还是在兰次胡特时和他在同一个团的战友罗伯特·基斯特勒曾这样写信问过他；希姆莱来到慕尼黑后，就立即选修了跳舞课，以期博得玛雅的欢心。1920年1月，他已经会跳波士顿华尔兹了。他和朋友路德维希——平常叫名“路”——是慕尼黑嘉年华会上的不知疲倦的客人。屁大的事情他也要在日记里记上一笔。他记述在洛里茨大大家的一次节日说：“房间布置成古代土耳其人家住女眷的内院，在壁角里火炉旁给我和路搭了一顶帐篷……洛里茨太太给我们弄了许多吃的东西，首先是喝可可，我把可可泼洒了一裤子。”

他忙于过节，以致这个故弄风雅的日记作者完全没有注意到这时在慕尼黑召开的纳粹党代表大会。

他的日记只有一点暴露出日后的希姆莱在政治上的侵略成性：他不甘心从此结束自己的行伍生涯。当他所热烈思慕的包午饭女主人的女儿拒绝了他笨拙的追求后，他感到战争和当兵是摆脱失恋痛苦的最好出路。他在1919年11月28日写道：“我现在但愿能身临险境，让我以生命孤注一掷，让我去战斗，这也许会使我得到解脱。”1921年11月22日，他——这里已经显示出希姆莱日后的锋芒——写道：“倘使东方战事再起，我将投身其间。东方对我们来说是最关紧要的，西方很快就要死亡。我们必须在东方战斗和开拓殖民地。”他一次比一次更热衷于战争和穷兵黩武。1922年2月19日：“但愿果真能再次战斗、战争和出征！”6月11日：“也许我会这样或那样地去参加，因为说到底我是一位军人，不过眼下我得参加考试。”

他禀告父母：“我自己感到至今考试成绩相当不错。”这时，恩斯特·罗姆上尉闯进了希姆莱的生活圈，决意要和希姆莱血腥地、戏剧性地结合在一起：他答应满足这个失恋者的入伍愿望。

这两个人究竟在何时相识，已无法查清。他们所走的道路已有多次交织在一起：1918年年底，罗姆在希姆莱家的住地兰次胡特第十二巴伐利亚步兵师师部供职，后来又在慕尼黑任第二十一步兵旅武器装备军官，1920年5月，后备役军人希姆莱就是在这个旅领到武器的。此外，罗姆还是那些半公开地偷偷进行活动的武装团体的秘密军火库主管人，这些武装团体被国防军看成是自己的民兵部队。1922年1月，这些团体在慕尼黑“阿茨贝格茨勒”啤酒馆举行会议，希姆莱和罗姆上尉在会上相遇，希姆莱回忆道：“罗姆上尉和安格雷尔少校（希姆莱过去所在连的连长）也在场，十分亲切。罗姆对布尔什维主义表示悲观。”

罗姆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竭力想适应环境的后补军官怎么也不会忘记在等级森严的军界中，对地位比自己高出几级，每次遇见上尉先生，总要两腿一并，啪的一声碰响皮靴后跟。这两个人，一个是胸前挂满勋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连长、有相公癖的中世纪式的雇佣兵，另一个是夙愿未偿的武士和严格注意风化的资产阶级子弟，结成了奇特的一时。尽管如此，罗姆还是善于使这个大学生对自己倾慕——希姆莱愿意为罗姆赴汤蹈火，在所不惜。

随后，他又认识了希特勒，在希特勒的影响下，希姆莱很快成为希特勒的心腹，而受到希特勒的重视。

1926年某天，他在巴特赖兴哈尔闯入一家旅馆的客厅避雨，他在一位女

士跟前猛地摘下湿漉漉的猎人帽，使这位女客人溅了一身雨水。希姆莱狼狈地抬头一看，只见面前站着一个人像他所幻想的日耳曼女神：金发碧眼，俨然是一尊女武神。她名叫玛加丽特·博登，是西普鲁士贡歇策沃一个德国地主的女儿。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护士，到柏林后结了婚，不久又离了婚，用父亲的钱在柏林开了一家小型私人诊所。

这个童男子的纳粹宣传家显然一见钟情，但父母对儿子找到的对象却并不怎么满意。玛尔加——她这样称自己——比海因里希大八岁，而且除了有种种令人讨厌之处外，还是一个新教徒和结过婚的女人。很长时间内，希姆莱都不敢带着玛尔加去见父母。希姆莱对哥哥格布哈德说：“我宁愿一个人去驱散有成千个共产党人的集会！”

父母没有固执己见，听任这对情侣去憧憬未来。海因里希和玛尔加在1928年7月3日结了婚，并考虑双双去共度移民生活。玛尔加变卖了私人诊所，夫妻把所得款项在慕尼黑附近的瓦尔德特鲁德林买下一块地皮，在那里盖了一座小木房：底层有两间住房，上面还有三间。希姆莱执意要亲手搭一座鸡棚，因为希姆莱一家曾计划办一个大型养鸡场。

“亲爱的，我老想着到我们将会有的那一小块土地上去，”早在婚前几个月，玛尔加就兴致勃勃，并以她初识希姆莱时惯用的戏谑口吻写道。“亲爱的，我相信狠心的男人必然要注意省吃俭用。因为你知道，狠心的妻子总是有多少钱花多少钱的。”夫妇俩养了五十只种鸡，但是移居和养鸡场的计划，由于筹款困难和希姆莱的党务生涯而没有实现。作为纳粹党工作人员，希姆莱的两百马克月薪是没法办好养鸡场的。1929年5月6日，玛尔加写信告诉丈夫：“情况非常不妙，这些母鸡每天只生两个蛋。我很苦恼，靠两个蛋我们怎么过日子，而且还要积极攒些钱过圣灵降临节，老是倒霉。我也注意积钱，但很快又花光了。”她不断地为钱发愁：“你信也不写，真狠心。如果明天上午以前不给我钱，你就别指望贝尔塔（女佣）给你去送鞋子。”

随着经济上的矛盾，夫妻之间出现了危机，来势之快出乎双方预料。这个瓦尔德特鲁德林的主妇冷酷无情，相当神经质，几乎从来没有高兴的脸色，很快就把这个感情过敏的丈夫气得越发经常不回家。在他们仅有的一个女儿古德龙出世后，这两口子就分居了。

玛尔加徒然地期望，有一天纳粹政治能使这位家主和丈夫重回身边。“等选举过后，至少能有几年安静……你，你会永远和我待在一起的，”她这样期待着。另一封信中写道：“你这个没良心的职业军人，你也该上这儿来走走呀。”还有一次写道：“哪怕你来住上两天也好，你来吧。”可是玛尔加渐渐看到，她的海因里希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有时想到自己老是呆在家里，我真伤心。今天我考虑了我们怎样庆祝你的生日。亲爱的，我们一道去参观一个展览会好吗？我们还从来没有去过呢，”她告诉他说。另外一次又说：“我近况不好。到底该怎么办呢？心里总是不由地惦念着……好人啊，你说叫我怎么办呢？”

希姆莱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早已被领袖的命令迷住心窍——领袖于1929年1月6日命令他担任党卫队头子。现在，这个领到第168号队员证的党卫队员，可以把向他向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瓦尔特·达里学到的本领，全部施展出来了。党卫队已经存在，希姆莱感到，它只是在等待有一个能手来将它扩建成为民族运动的集团，扩建成为民族社会主义的中坚。

当然，这位新上任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很快就知道，他的领袖要求的，并

不是世界观上清一色的纯正语言。希特勒不是要一个有信仰的神秘人物集团，而是要一支盲目服从的卫队，一个巩固他个人统治的工具。纳粹党正站在十字路口。二十年代末的经济危机，驱使着越来越多的怀有不满情绪的德国人进入纳粹阵营，加强了同时也危及到阿道夫·希特勒在党内的地位。这一地位必须不顾任何阻力得到新的巩固。德国政党史上最残酷的一章开始了。

“风流杀手”希姆莱的粉墨登场，使欧洲大陆更深地笼罩在黑色的乌云之中。

第六节 嗜杀好战

纳粹党员卢多尔夫·哈泽有一个梦想。他是纳粹党汉诺威南区地方组织领袖和民族运动“古代北欧吟唱集团”的领导成员，在其致慕尼黑党的全国指导处的信中，陈述了在他看来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

哈泽认为，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在1923年慕尼黑十一月政变后之所以分崩离析，是因为党缺少一个领袖团，而领袖团又缺少一个权力工具。重新建立的党所迫切需要的是“一个党内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一个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给领导充当卫士和助手的秘密集团。哈泽设计出一个使运动保持钢铁般团结一致的党内秘密集团。这个集团的成员“进行清洗组织，坚决彻底，如有必要，对友邻团体和机构也可采取行动”；同时，他们“通过监视等手段，掌握对手的计划、行动和关系等至关重要的情况”。哈泽要求未来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必须成为“溶化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中”的一个组织，“它应成为最高信徒必不可少的工具，使其能从根本上、富有成效地推行民族运动的强权政治”。

这样，党的地方组织领袖哈泽就具有预见地写下了党卫队的基本思想，它有朝一日将使其阴影投在党的身上。可是，慕尼黑党的指导处干部看到这封来自汉诺威南区的信件，不知道应该怎样办理。哈泽的名字也就湮没无闻，他的条陈归入了档案。

但是，1929年1月，有一个人进入了慕尼黑舍林街五十号后楼纳粹党指导处的机关，他同哈泽有类似的见解，而且后来在其档案材料中重新找到了这份未注明日期的条陈。新上任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确实力图把他的组织“溶化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中”。当然，眼下他的境遇和党内同志哈泽并无两样。对这个瓦尔德特鲁德林村的农学士和养鸡者的勃勃野心，党内大多数同志只报以同情的微笑。

许多人认为；希姆莱是个怪人，人们议论纷纷，说他是一个教派信徒，他把自己职业生活中有关养鸡的设想，同党的官方种族主义信条揉合成一种离奇古怪的中坚概念。此外，他那过于狂热的野心，也与他接管这么一个党的小小机构不相称地到了荒唐的地步。当时，党卫队只有二百八十名队员，隶属于对他们不大重视的“冲锋队最高领袖(OSAF)”弗兰茨·普菲费尔·冯·扎洛蒙麾下，并且艰辛地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普遍的偏见作斗争，这种偏见把党卫队看作是一支推销党的报刊的队伍。

但是，希姆莱不因这种嘲弄而陷入迷惘。他制定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扩张规划，要在短期内加速扩张党卫队的人数，并向外界突出党卫队的中坚性质。1929年4月，他向希特勒和冲锋队最高领袖普菲费尔呈报了一项实际上建立党卫队集团的规划草案。从这时起，只有符合极其严格选拔条件的人，才有可能被党卫队吸收，对于血统和土地神秘教义信仰者达里的门徒来说，除了着眼于挑选种族之外，别无其他可能，除了北欧勇士的虚有其表、富有浪漫色彩的形象外，再也没有其他理想的男子汉。

嗣后，希姆莱作了这样阐述：“我们犹如育种员一样，有责任对一种已经混杂和退化了的原有良种，重新纯化、培育。首先遍及田野进行所谓挑选粗壮的种苗，即第一步从外表上将我们认为不符合用来建立党卫队的人淘汰掉。”要真的采用如此崇高的原则，毫无疑问，希姆莱就得裁减党卫队中的一半人员，因为党卫队的成员大多数是小资产阶级，几乎都不像瓦尔特·达

里在实验室里用试管制造的日耳曼型人。希姆莱知道，必须避免这种自我破坏。他三令五申指示，新的条例不适用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兵的老党卫队员。对于精选方案的螺丝，他只能逐渐地拧紧。希姆莱说：“我首先提出，一定要达到规定的身高（一米七十）的要求。”他以行家具有的骄傲口吻作了补充，因为他知道，“身高超过规定标准的人，必定符合所要求的血统”。

“他叫人把每个发展对象的照片拿来，用小型放大镜长时间地——细细端详，最后由他作出决断，这个对象是否符合这位种族狂的粗壮种苗园艺家所说的“优秀血统”。希姆莱对军官们解释说：“我思量这人的脸上是否非常明显混有其他民族血统的痕迹，即人们通常说的颧骨特别高，面貌像蒙古人或斯拉夫人？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我要提醒你们注意这个经验体会，请你们回想一下1918和1919年担任士兵苏维埃成员的那些人的模样吧。”

这个解释一语道破了希姆莱的“优秀血统”为标准的生物学上的精选，并不仅仅出于种族主义观念所编造出来的谎言。这种精选也是考虑到当年参加世界大战的军官和自由团头头们必然会有想法，他们还未忘却经受过被扯下肩章的痛苦感受。对于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来说，士兵苏维埃是个人耻辱的一种象征；战争一结束，极左派的士兵扯下了军官们的肩章。创痛的另一面则是，这些同样的士兵苏维埃曾亲眼目睹，在发生革命的情况下，保护皇帝大元帅的军官们连手指也都没有动一动。见习士官希姆莱本人是否亲眼看到这些士兵苏维埃的情况，这是无关紧要的。“这是在红色叛乱分子面前可耻地放下武器”（罗姆语）。希姆莱懂得反复提醒当年的军官，不要忘记他们同士兵苏维埃的那些不愉快的遭遇：“你们当中每个当时当军官的人，都会从自己亲身经历中对这帮人有所认识。你们定能发现，一般说来，这些人在我们德国人眼中，看上去总是有点古怪，因为他们多少带点古怪的特点，他们已经掺进了异族的血液。”

这样的论证完全符合那个社会集团的内心世界，希姆莱把那个社会集团看作是党卫队首批生力军的储备源地。血统精华的观念，使军人身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大学毕业生，和失业者这一大群无人问津的人心驰神往，他们在经历了自由团和民族主义军人团体一段迷茫的旅程后，正在探索新的组织形式，希姆莱的种族精华观念给了他们一个栖身之所，答应把他们从资产阶级的根基已被摧毁和社会声誉丧失殆尽的混乱处境中拯救出来。

精华，过去一直是一个社会概念：谁有财产，受过教育和出身名门世家，谁就属于精华。对于失去希望的、上过前线的这一代人来说，通向精华的大门是关闭着的；不善于适应环境和职业军人的浪漫主义的性格，把他们驱入社会的中间地带。现在，希姆莱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精华取代了社会的精华：即种族精选，世界观的贵族。优秀血统的精华取代了社会传播精华：即种族精选，世界观的贵族。优秀血统的精华概念模糊不清，尺度颇宽，足以收容所有失去希望的人群，只要他们讨希姆莱欢心的话。他们很快就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

首先是业已完蛋的自由团成员站到了希姆莱的旗下，自由团的成员都是些崇尚武力和冒险的人，德国军事史上很少见到过比1919年和1920年的自由团更为冒险的、既打仗又搞政治活动的军人组成的乌合之众了。

经济危机掀起了第二批人入党卫队谋求出路的浪潮，这一批人曾经一度在资产阶级生活中勉强地站住了脚跟，但在日益残酷的竞争中，丧失了他

们在自由经济中的地位。破产促使他们穿上了党卫队的制服。上校的儿子、前吕佐夫自由团上尉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抛弃了自由商的社会地位。地方法院顾问的儿子、前黑森大公爵第一百一十五近卫团少尉卡尔·沃尔夫失去了他的广告事务所。医生的儿子、前参加西线作战的少尉卡尔-阿尔布雷特·奥伯格博士关闭了他的香蕉进口商行。

希姆莱允许如此众多滋事好斗的自由团成员加入进来，使党卫队人数不断增长。他风尘仆仆地周游德国各地，为他的精华集团大肆宣传。他蔑视党内反对他急切扩充的一切阻力。当他宣称，他在汉堡可以立即拉起一支五百人的党卫队时，纳粹党汉堡区领袖克雷布斯反驳他说，汉堡的党员几乎还不到五百人。希姆莱对此狂妄他说道：比例是没有意义的，关键在于人。

罗姆跟希特勒闹翻后，跑到玻利维亚去担任德国军事教官，1930年1月29日，希姆莱向他早先的引路人罗姆报告说：“党卫队在成长，至本季度末可望达到两千人。”希姆莱写信说：他的旗队长都是些“精明干练的汉子”。还告诉罗姆说：“将逐月加强业务活动和提高吸收条件。”党卫队成员人数不断逐步上升：1929年1月为二百八十名，1929年12月为一千名，1930年12月二千七百二十七名，党卫队如此迅速成长，促使希姆莱最终决定把他的精华集团这块磁铁，转而对准迄今还未对其开放的一个储备源地：冲锋队。

冲锋队那里还有着罗姆的前线派掌权时代的团成员，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于改换门庭转向党卫队，并非不感兴趣。但是冲锋队最高领袖普菲费尔非常警觉，提防他的任何下级头目投向希姆莱集团。早在1926年年底，普菲费尔就在一项命令中规定，党卫队只许在冲锋队领导最密切的配合下采取行动。从这时开始，党工队成员始终受当时冲锋队领导的指挥。普菲费尔首先紧紧控制党卫队招募人员。如果发生这种危险，即党卫队（普菲费尔说）“把所有具有领导才士的人全部吸引过去，从而违背意愿地窒息了冲锋队的成立”，那冲锋队最高领袖就非得过问不可。

可是，希姆莱并未被普菲费尔的命令所吓退。他开始暗地里在冲锋队中大肆宣扬党卫队集团，并拉走了大批冲锋队员。希姆莱取得的成就并没有长期瞒过冲锋队的领袖。“最危险事情是，新近在筹建中的党卫队组织使用卑鄙手段招募人员，并试图瓦解冲锋队，”东德地区冲锋队领袖施滕内斯满腹牢骚他说。在柏林，怒不可遏的冲锋队队员纷纷印发匿名传单，反对“以牺牲冲锋队来扩充我们平民阶级党魁的私人卫队党卫队”。

希特勒立即制止了党的两支部队之间的敌对状态，并帮助希姆莱首次取得一项巨大成就：1930年年底，他将冲锋队和党卫队各自分开。党卫队虽然在形式上还隶属于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但它已获准独立于冲锋队之外。希特勒说：“任何冲锋队领袖均无权对党卫队发布命令。”甚至在制服上也显示出党卫队的独立性，党卫队着黑色制服，以区别于冲锋队的褐色制服：党卫队员戴黑帽，结黑领带，穿黑裤子，佩戴镶黑边的字臂章。左袖口上有一条五公分宽的带阿拉伯数字的黑边，标明党卫队员所属突击队番号。

党卫队赢得了官的初步独立。甚至，希特勒还允许它建成为一个面目全新的组织，废除了原先的十人编制（任何一个地区不得超过十名队员和一名队长的编制），重新建立一种类似冲锋队的职衔和编制的组织结构。现在规定党卫队的最基层的单位为小队，一名小队长，八名队员。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设中队长一名，队员人数在二十至六十名之间，相当于军队中的排。三个中队编成一个突击队——党卫队最重要的基层单位——人数七十至一百

二十人，由一名突击队队长统率，相当于军队中的连。三个突击队组成一类似军队营编制的突击大队，人数二百五十名至六百名，由一名突击大队队长领导。三至四个突击大队编成一个旗队，人数一千至三千人，由旗队长率领，相当于军队中的团。若干旗队组成一个分队（后称区队），使人联想到军队中的旅，它的领导人称为区队长。后又规定若干分队或是若干区队组成一个支队或称地区总队，由一名地区总队队长统率，相当于军队中的师。

党卫队级别表（对照陆军）

党卫队员	（列兵）
突击队员	（二等兵）
组长	（一等兵）
三级小队副	（二级下士）
三级小队长	（一级下士）
二级小队长	（中士）
一级小队长	（上士）
三级突击队中队长	（少尉）
二级突击队中队长	（中尉）
一级突击队中队长	（上尉）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	（少校）
一级突击队大队长	（中校）
旗队长	（上校）
区队长	（上校）
旅队长	（少将）
地区总队长	（中将）
副总指挥	（上将）
总指挥	（大将）

当然，眼下建立新的党卫队部队还是一纸空文，希姆莱还缺乏人员来使这些设想付诸实现。但是希特勒为使党卫队实现这种抱负打开了方便之门。他指示，党卫队不要再在冲锋队内招募人员，相反，应由冲锋队来为党卫队输送人员，而且要提供各地区规划中的党卫队人数的一半。特别叫冲锋队感到不舒服的是，有一道命令规定，只许“挑选优秀的人员”输送给党卫队。此外，各地党卫队突击大队甚至有权拒绝接受不符合条件的冲锋队员。

冲锋队领袖自我解嘲地说，现在至少把党卫队干预冲锋队重要事务的一切门路都给堵住了。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代表奥古斯特·施奈德休勃期望：“冲锋队终于有权制止党卫队领袖和队员在我们的队伍中招募人员，哪怕是用非正式名义进行这种招募工作。”冲锋队领袖施奈德休勃给迷惑住了。显然，他读过1930年11月7日希特勒的命令，忽略了一句具有中心思想的话，正是这句话说明了希特勒为什么突然同意党卫队进行高度爆炸性的扩大。这句话的原文是：“党卫队的任务首先是在党内执行警察职责。”纳粹党地方组织领袖哈泽的梦想实现了，秘密集团终于在党内值勤守卫。

第七节戈培尔建议：把希特勒开除出党

阿道夫·希特勒有充分理由，正是在目前这个时刻召唤他的私人卫队充当他的帮手。党的基层组织骚动不宁，说明他的地位极为岌岌可危。民族社会主义运动日益蜕变成为了阴谋诡计、虚伪欺骗、暗杀行刺和玩弄政治的名利场。希特勒起用党卫队的目的就在于，使党保持钢铁般的团结，以及对一切不顺从党的领袖的行径挥舞大棒，实行镇压。在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存在着许多不顺从的情况，因为它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党。

它早先是一个民族运动—全德意志的小资产阶级协会，随后充实了苏台德地区产生的民族社会主义观念的货色，不久沦为巴伐利亚各武装团体的政治附庸、民族运动阵营相互攻击的政客们的迷宫，冲锋队——无产者的避难所，和反动的党派领袖及工业家的冒险园地——一个如此五花八门的党不可能有内部的统一，而只能是热衷于暴行、吵吵闹闹和唯恐天下不乱。只是对于进步和民主的仇恨、夺取国家权力的欲望，才把他们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信条，几乎没有一条不受到党员自己的非难，几乎没有一个党的大头目能得到另一个大头目的支持。

希特勒的卫士赫尔曼·埃塞侮辱北德民族运动的成员，说他们是崇信奥丁神的光明派教徒的团体。莱茵区人约瑟夫·戈培尔建议把“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清除出党，每一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总有人提出收回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拉塞的党员证的要求。戈培尔提出：“在国家内实行社会主义专政的思想是未来的事情”，结果不得不要受到责难，说这是《红旗报》的语言，而不能登在纳粹党的机关报上。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要求同苏联结盟，因为莫斯科在反对凡尔赛和约中是盟友，这种要求立即受到反苏十字军式的人物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反对，他主观臆断地认为党已经成为赤色世界敌人的战利品。就连狂暴的反犹运动也没有把所有的纳粹党员捏在一起，党内的反犹主义形形色色，并不一样。戈培尔认为：“犹太人问题，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复杂，大概资本主义的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犹太人不是一回事。”

党内争执如此激烈，以致不得不建立一个调查解决委员会，简称Uschla，在前少校和纽伦堡冲锋队领袖瓦尔特·布赫的领导下，消除党员中的小资产阶级龃龉不和，几乎忙得不可开交。

但是，希特勒懂得利用阴谋诡计来巩固他权力地位。希特勒是各种针锋相对思想的天才综合家，他能够把党内各个派系合成一体，同时突出自己的地位，他似乎日益成为党内的一把独一无二的钳子——他一有可能就要自煽动别人相互对立。别人相互争斗越剧烈，这个慕尼黑的党的教皇就必定越被人承认。“完全是存心这样干的，”罗森堡在纽伦堡的绞架阴影下招认道，“希特勒容许党内存在敌对的派系，从而得以使他自己扮演仲裁者和领袖的角色。”在党内矛盾的掩盖下，希特勒有目的地利用每次危机，每种意见分歧，苦心经营。在1925年2月建党后，希特勒的权力几乎还没有越出巴伐利亚的范围。

对于他来说，进入北德和西德民族运动和民族社会主义小组的道路，被一道由三个人把守着的防线封锁着：兰次胡特的药剂师、天才的组织家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他的弟弟、令人捉摸不定的、空洞的理论家奥托·施特拉塞博士，这三个人严格控制着北方的纳粹组织，在思想意蕴上也不同于小心

翼翼地在复旧和革命两者之间看风使舵的希特勒。他们相信一种民族运动社会主义，要求工业国有化和宣传无产阶级的德俄联盟。1926年2月，希特勒突破了施特拉塞的防线。他在班堡举行的一次领导人会议上（以希特勒党徒为主的会议），将针锋相对的社会革命纲领提付表决，结果取得了胜利。戈培尔终于倒向了希特勒这一边。但是，格利尔·施特拉塞也半心半意地和希特勒取得妥协，并进入慕尼黑党的领导机关，担任全国组织部门负责人。

希特勒这个“好汉”得到戈林、戈培尔、希姆莱三个得力帮手，他于是开始全面实施实现种种手段，以实现其政治野心和梦想。

第二章 恶魔君临

希特勒铺平了上台的道路
德国只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希特勒党
冲锋队妄想一举取代国防军的地位
天衣无缝的教义

第一节 德国向纳粹党屈服

希特勒时刻妄想夺权，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像一场大火席卷全世界，给希特勒送来了绝妙的好机会。

德国外长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在1929年10月3日去世。此后三个星期，10月24日那天，华尔街股票市场突然崩溃了。德国国内马上受到灾难深重的影响。德国的“繁荣”主要是靠从美国那里借来的外债和对外贸易来维持的，一旦贷款断绝，旧债到期，德国金融结构就无法承受这种负担，一旦在总萧条后世界贸易一蹶不振，德国就无法出口足够数量的东西来购买所必需的原料和粮食的进口。而没有出口，德国的工业就无法开工，它的产量从1929年到1932年几乎跌了一半，对外贸易减少了三分之二。德国有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业生产能力闲置不用，成千上万的小企业破了产。国民收入从1929年的七百六十亿马克下降到1932年的四百五十亿马克，国债高达一百四十亿马克，失业人数突破八百万大关。工人和职员收入，几乎下降了一半。

农业危机也很严重，农产品价格暴跌，大批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统治阶级把经济危机的后果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政府为了使垄断资本家和地主免于破产，向他们提供了一百多亿马克的补助金和贷款，与此同时，却把劳动人民的纳税提高了几十亿马克，并大量削减工资、救济金和养老金。繁重的税收，残酷的压榨，逼得被剥削被压迫的工人阶级的广大劳动人民奋起反抗。1930年至1932年，爆发了一千多次罢工，形成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的高潮。

经济危机给共和政府带来了严重的困难。德国最后一任社会民主党总理、支持魏玛共和国的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最后一届政府的首脑赫尔曼·缪勒，由于各党派在失业保险基金问题上发生的争吵，于1930年3月辞职。继任的是天主教中央党议会领袖海因里希·勃鲁宁。勃鲁宁在战时是一个机枪连的一名上尉，曾获得铁十字奖章，他在国会中表示的保守稳健的观点颇得陆军的好感。他希望在德国能够恢复稳定的议会制政府，把国家从越来越萧条的经济恐慌和政治混乱中拯救出来。他在这样努力的时候，不知不觉地却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掘了坟墓，从而无意中为阿道夫·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勃鲁宁无法争取到国会中多数议员批准他的财政计划中的某些措施。他因此请求兴登堡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根据这一条规定的紧急权力，由总统下令批准他的财政法案。议会反应是，通过了一项要求撤销总统命令的决议。于是，正当经济危机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时候，议会制政府却垮台了。为了找出一条摆脱困境的出路，勃鲁宁在1930年7月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于9月14日举行新的选举。勃鲁宁怎么会指望在新的选举后可以在国会中得到稳定多数，这个问题一直没有找到解答。可是希特勒却认识到，他自己的机会出乎意料地提早出现了。

希特勒保证，如果他上台，将使德国恢复强大，拒付赔款，撕毁凡尔赛和约，肃清贪污，迫使金融巨头就范（尤其是对待犹太人），一定要做到使每个德国人都有工作和面包。那些绝望、饥饿的人，不仅希望得到救济，而且也希望得到新的信仰和新的神抵，对于他们来说，这种保证不是没有效力

的。

希特勒抱的希望虽然已经够大的了，但是 1930 年 9 月 14 日晚上揭晓的选举结果，却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两年前，他的党得了八十一万张选票，十二个国会议席。这一次，他原来打算选票会增加三倍，议席搞到五十个。但是在这一天，纳粹党所得的选票增加到六百四十万九千六百张，可以取得国会中一百零七个席位。这样它就从国会中位居第九的小党而一跃为第二大党了。天主教中央党和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却大大下降了。从此以后，勃鲁宁，或其他任何人，要在国会中取得稳定多数比以前更加困难了。但是没有稳定多数，共和国怎么能够存在下去呢？

在动荡和混乱的德国政治生活中，共和国像一只风雨飘摇的小船，在大海航行中随时有沉没的危险。在勃鲁宁和巴本两届内阁相继垮台之后，现在又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人物，天意注定要由他，而不是别人，来挖掘共和国的坟墓。他要担任共和国最后一任为时不长的总理，而且也可以说是奇特的一生中最后一次意外转折。这个人就是库特·冯·施莱彻尔。1931 年的时候，他是陆军中的一名中将。他生于 1882 年，十八岁的时候加入军界，在兴登堡原来所属的第三步兵禁卫团里当尉官，成了这位元帅兼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好友。

然而，施莱彻尔也无能为力，在 1933 年 1 月 30 日这个冬天的早晨，魏玛共和国的悲剧，德国人十四年来徒劳无益地要实行民主制度的笨拙努力的悲剧，终于告终了。施莱彻尔结束了他五十七天的执政，向总统提出了程辞。而希特勒这个维也纳从前的流浪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弃儿，在德国军人和右派的支持下登上了这个国家总理的宝座。

开始，国家社会党在新的政府中居于少数地位，在内阁十一个职位中，他们只占了三个，除了希特勒担任总理一职外，费立克拉任内政部长，戈林担任主管部长，同时兼任普鲁士的内政部长。几个重要的部都给了保守分子。他们颇有把握地认为已经把希特勒笼络住，可以为他们的目的服务了。牛赖特继续任外交部长，勃洛姆堡任国防部长，休根堡任经济部长，巴本本人是联邦副总理兼普鲁士总理，而且兴登堡向巴本保证，除非由副总理陪同前来，否则他不会接见总理。巴本认为，这种独特的地位，使他能够对难以捉摸的纳粹党领袖增加一种牵制。而且这个内阁出自巴本的构思，是巴本的产物；他相信，在保守派同僚的坚决支持下，他又据有八比三的优势，他完全能够控制希特勒。

巴本和他所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认为，他们找到了一个能乖乖听话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目标的人，毁灭共和国只不过是第一步。他们所希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德国，这个德国在国内不再搞什么民主的“无聊玩意儿”，剥夺工会的权力，对外能废除 1918 年的判决，挣脱凡尔赛和约的枷锁，重建一支强大的陆军，以其军事力量恢复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这也是希特勒的目标。

但是，这个浮夸轻薄、姑息养好的政客并不了解希特勒，也不了解支持他的势力有多大的力量，更不了解既有的势力的强大的机构：陆军、教会、工会、政党，或者广大的非纳粹党的有产阶级，他难以解释的软弱已经到了近乎瘫痪的程度。正如后来巴本哀叹而说的，他们都会“不经一战就投降”。

希特勒清楚地知道，他是靠着总统、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上台的，而这三个方面却置身于纳粹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

任的。因此，希特勒当前的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能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他一上任，就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并且在六个月之后终于使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独裁者。

为了广举消灭共产党，铲除在德国实行纳粹主义的最大障碍，希特勒及其一伙精心策划了臭名昭著的国会纵火案。原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办公室的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曾在旅馆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2月27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派人放了几把火，顷刻之间雄伟壮观的国会大厦就化为灰烬了。事件发生后，戈林声嘶力竭地叫嚷：“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纳粹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都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这是希特勒精心策划的一个大阴谋。其目的是以“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对德国的革命力量进行残酷镇压。他们贼喊捉贼，把纵火的罪名加到共产党身上，诬蔑共产党这是发动武装暴乱的信号，可是还在27日中午，柏林的全部冲锋队员，就已进入戒备状态。起火后两小时，法西斯分子便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实行了大逮捕和大屠杀。仅仅27日晚上就逮捕了一万名反法西斯战士，在以后的三、四个月里，被捕人数达到六、七万人。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德共主席台尔曼受到非法逮捕。法国法西斯还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保加利亚工人阶级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进行了非法的审讯。季米特洛夫利用来比锡作讲台，与法西斯主义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

德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希特勒暴行，全国数百个大小城镇举行了闪电示威游行。在多特蒙德工人街上曾挂出了这样一块横幅，上面写着：“尼禄（罗马的暴君）焚烧罗马，嫁祸于基督教徒；希特勒焚烧国会，嫁祸于共产党！”

2月28日，希特勒又诱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所谓“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这项法令不仅暂停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取消了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而且还授权希特勒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所谓“严重扰乱治安的人”判处死刑。这样一来，希特勒就能够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数天内，就有大批的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遭到逮捕和惨遭杀害。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载冲锋队员的车辆，在备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走，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的报纸和政治集会遭到取缔，社会民族党的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的报刊也被勒令停刊，群众集会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

纳粹党人现在手头掌握了全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力量，财库里有着一大企业方面来的充分经费，因此他们在3月的竞选宣传是德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营电台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声音传送到全国每一个角落。装饰着字旗的街道上，冲锋队员列队而过的皮靴声不绝于耳，还有数不尽的群众大会和火炬游行。广告牌上尽是纳粹党的触目的招帖。入晚，山顶上燃起了篝火。对选民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国天堂来引诱，

一会儿又以街头的褐色恐怖来威胁，一会儿又以“揭露”共产党革命来恐吓，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个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家社会党的票，就要遭殃。就这样，在1933年3月5日，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民主选举的那天，纳粹党人赢得了一千七百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八十张票，占全部选票的百分之四十四。但距离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仍相差很远！

希特勒耍尽了鬼点子，他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八十一个共产党员“缺席”的办法得到部分解决，余下来的问题就可以不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入场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处理掉。这时希特勒的情绪很高，颇为自信。因为，根据他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诱使兴登堡签署的2月28日法令，他可以肆意逮捕任何数量的反对议员，以保证他那三分之二的多数。

经过和戈培尔密谋，希特勒决定新国会的开幕式要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举行。这个教堂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能够唤起对于帝国的光荣伟大的回忆，因为腓特烈大帝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霍亨索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现任总统兴登堡也于1866年来这里做过第一次朝圣，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禁卫军军官，刚刚参加了给德国带来第一次统一的奥普战争而凯旋归来。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选定3月21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俾斯麦在1871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当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和头戴髑髅骠骑兵头盔的海陆军将领们，在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腓特烈大帝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旧。兴登堡显然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指导向全国广播的戈培尔，在仪式进行中一度注意到老元帅热泪盈眶。总统身穿灰色军服，胸佩黑鹰绶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在穿着正式礼服显得有点拘谨的希特勒陪同下漫步进入会场，中途停下来向皇室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的新政府。

希特勒的答辞极其狡猾，旨在打动济济一堂的旧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骗取他们的信任。他说：“无论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战争。只是由于国家的崩溃才迫使一个备受凌辱的民族违反它的极其神圣的信念，承担了这次战争的罪过。”说到这里，他转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远的兴登堡说：“由于过去几星期中发生了一个独特的变化，我国民族荣誉得以恢复，而且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象征和新的力量的象征联合起来了。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的新的力量能由您领导。”

希特勒为了表示他对总统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开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当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保证以后，国会于3月23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讨论通过所谓授权法。它的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一共只有五节，把立法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四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响国会的地位”，这肯定是最残酷的嘲弄了。

第二节合法政党“政治自杀”

从1933年3月23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不受任何约束的独裁者。德国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国历史上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邦政府首先被解散，重新组织由希特勒一手控制的纳粹政权。在3月9日晚上，也就是通过授权法以前两个星期，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3月21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它们按照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共产党议席则予以虚悬。不过这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星期。性急如火的希特勒，在4月7日又颁布了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长，他们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新制定的总政策”。

在希特勒强力推行纳粹独裁的白色恐怖之下，德国资产阶级政党卑鄙地屈从于法西斯。1933年5月3日，胡根伯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改称为“德意志民族阵线”。在此以前，“铜盔团”的领导人弗朗茨·塞尔特将该团合并于国社党。但是，胡根伯格即使取消了“党”的名称也无济于事。1933年6月27日，在他被迫退出政府的同时，他不得不签署解散“德意志民族阵线”的法令。一天以后，国家党就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1933年7月4日，德意志人民党自行解散。该党领导人丁格尔戴向法西斯分子写了一封献媚信，保证人民党的党员将在纳粹国家中守法效劳。同一天，巴伐利亚人民党也同样宣告政治上自杀。

拥有四百三十万选票和七十一个国会议席的最大的资产阶级政党中央党，也同样可悲地自行解散。1933年7月5日发表的自行解散的声明没有对希特勒不断食言提出任何抗议，而只是卑躬屈膝地请求不要没收该党的财产，释放被逮捕的党员。而且还向它过去的党员与选民发出如下的政治指示：“在今天大家一起重新建设国家，并为人民团结作出真诚努力的时刻，中央党的成员绝不甘居落后，也绝不会落后于他人。”

3月选举以后，德共早已不能进行任何合法活动，只能在地下进行斗争，此后社会民主党也于6月22日被禁。7月14日，希特勒凭借《授权法》宣布：在德国唯一的政党就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一天起，其他政党在组织上的结合或任何建立新的党的活动，都将受到苦役徒刑的惩罚。这样，在德国只留下了一个“合法”的希特勒党，一个实行最残酷的恐怖的党，一个最卑鄙的法西斯党。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到三个月，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在1934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总理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法律前言称，

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决通过的”。这话并不错，因为到了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所在政党、团体都已经被消灭殆尽了。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四个月内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

受到历史嘲型的巴本，尽管狡诈多谋，这时已完全无能为力了。他自己就被轰出了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而由戈林来接替。他虽在全国政府中仍旧担任副总理一职，但是正如他悻然承认的那样，“这个职位是徒有虚名”。企业和金融界的辩护士休根堡已经辞职，他的党已经解散纳粹党的第三号人物戈培尔已在3月13日参加内阁，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希特勒已经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和权力的移交，不少保守的政治家悲叹自己上当受骗。但到那个时候，有谁要在希特勒面前力挽狂澜，为时已经晚了。

虽说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德国，党卫队，以及与希特勒裂痕日深的冲锋队，部力希特勒登上权力顶峰立下了汗马功劳。

第三节疑神疑鬼

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纳粹党的势力一统全国，然而在希姆莱心中，却无法满足。作为希特勒的重要助手，戈林已担任普鲁士总理，戈培尔进入内阁，唯有他希姆莱和党卫队的地位还是不明确的。雄心勃勃的罗姆和他的冲锋队妄想一举取代国防军的地位，这当然和希特勒的政策相违背。希姆莱的眼光在德国政府各部门间游移不定。希望能找到一个部门，把他的党卫队塞进去，以实现他自己的权力野心。

希姆莱只好耐心地等待，窥测时机，只好继续做他一直在做的工作：保护他心目中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安全，确保希特勒在全党的统治地位。他以常有的勤勉来履行他自行选定的义务。由于他在“运动的首都”担任警察局长，希姆莱时有机会向他的领袖表明，希特勒在分割国家政权这块肥肉时，对勇武超群的人竟如此冷淡是多么不公平。在慕尼黑，这个博得公众好感的党卫队头子，懂得如何利用某些凶讯来大叫大喊，以引起人们对自己的瞩目。

3月中旬，警察局长希姆莱下令将他当大学生时曾经企图从监狱里救出来的那个人……行刺艾斯纳的凶手阿尔科·凡雷伯爵——加以监护拘留。据希姆莱解释，拘留他的原因是：伯爵“自己声称准备行刺阿道夫·希特勒总理”。两个星期后，希姆莱的警惕性再次显露锋芒，这一次他“破获了一起预谋用手榴弹谋害总理的案件”。据说有三名苏联间谍“在阿道夫·希特勒的汽车必经之途的里查德·瓦格勒纪念碑旁安放了三颗手榴弹”。耳目遍布各处的警察局长提醒领袖和人民提防新的重大危险。希姆莱通知：“据来自瑞士的报告，我们多天来获悉，共产党正策划行刺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和现有国家领导人的阴谋。”

希姆来危言耸听的行刺报警，触及了总理府新任主于最易敏感的一点。至少从荷兰人马瑞纳期·范·德·卢勃（他被污陷为国会纵火案的主犯）在1933年2月27日采取国会纵火的绝望行动以来，希特勒就一直提心吊胆，生怕遇上刺客和炸药，经常变换汽车行驶路线，行动诡秘，防备刺客。

在内阁会议上，这位总理兼领袖几乎没有一次不挥动拳头，同向他逼近的影子进行搏斗。“一次成功的行刺将对公众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他在3月7日内阁会议上故弄玄虚地说。八天后的内阁会议记录写道：“总理指出必须勒令限期交出炸药。近年来失窃炸药近一千五百公斤，而找回来的只有一百五十公斤。”他怎么也对个人安全的万无一失放心不下。他疑神疑鬼，好象到处都有暗藏的刺客。

“有朝一日，”他描绘想象中的危险说，“定有那么一个丝毫看不出有危险性的人，在威廉街的某个地方租一间阁楼住下来。人们只当他是退休的高年级教师，一个诚实的同胞，戴一副单边眼镜，不好好刮脸，胡子拉碴。他不让任何人进入自己的简陋房间。他可以在房间里从容不迫地架起一挺机枪，以巨大的耐心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地用观测器瞄准总理府前的阳台。然后到了某一天，他一勾扳机！”

希特勒就连呆在自己房间里也会感到不安全。在内阁中间，他和另外三个人（戈林、戈培尔、费立克）面对人数超过他们的资产阶级部长，而负责警卫总理府的是一支国防军卫队，国防军的将军们是决不会放弃有朝一日反叛这位纳粹救世主的。除了如此忠心耿耿地为他的领袖生命安全关心的希姆

莱以外，还有谁能充当比他更好的助手呢？希特勒指令党卫队领导建立一支负责保卫他大部警卫（党卫队历史上的第三支本部警卫）。希特勒和希姆莱挑选了一个矮胖粗壮的巴伐利亚人、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担任私人卫队长。

狄特里希纠集了一百二十名党卫队队员，其中多数人早在褐色大厦里就曾干过类似的差使。私人卫队在希特勒周围布置起一道由三层岗哨组成的警戒线，任何来访者必须通过这层岗哨才能见到总理。1933年9月间，希特勒在纽伦堡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给这个卫队授名为“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

警卫旗队”。这样，无意之中希特勒就为第二支国防军打下了基础，即后来的武装党卫队。

警卫旗队的先例使希姆莱获得启迪，进一步建立起类似性质的“党卫队特遣队”，后来又改称为“政治预备队”。某些邦

建立了旨在保卫德国新贵和迫害政敌的挂羊头卖狗肉的警察部队。希姆莱的部队首次出现于1933年夏。埃尔旺根和罗伊特林根两地的党卫队组成了政治预备队（1934年人数为八百名），奉符腾堡政治警察之命搜捕民主人士。德累斯顿成立了由黑森党卫队自愿参加者组成的第三特遣队，慕尼黑和阿罗尔森也组织了党卫队的部队，恣意荼毒生灵。

希姆莱一举成功地插手了巴伐利亚以外的警察活动。由于他掌握着党纪严格的部队，一些邦的新上任的警察头子地位还不稳固，纷纷向他讨教求援。慕尼黑邦警察总监康拉德·希姆莱的孙子知道，警察是他的希望——只有通过警察机器这条曲折的道路，他才有可能参与民族社会主义特权阶层的角逐。

第四节 倾轧

这时，希姆莱在巴伐利亚的工作也取得了进展。4月1日，巴伐利亚的所有政治警察都划归他的领导；他现在自称为政治警察司令，并领导巴伐利亚内政部的一个特别司。希姆莱显现出他对民族社会主义警察工作具有的设想。他指令搜捕政敌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手续办，制止地方冲锋队头目对没有武装的竞争者恣意采用暴行，并规走逮捕天主教神职人员应由他亲自批准。但同时他也有计划地进行政治迫害活动。希姆莱在达豪附近一个火药厂的旧址上，以几间石砌的平房为中心，建立了一所集中营，把关押被捕的共产党员和社会民主党人集中到这里。“集中营”这个新字眼使得德国人谈虎色变，变成了海因里希·希姆莱警察统治的标志。

几乎谁也没有理睬希姆莱的样板集中营这一创造发明，新德国的警察头目只是发愣地看着希姆莱机器的官僚主义的办事效率和完善组织。人们开始感到希姆莱是德国未来的警察头子，他已经拟定了建立一支全国统一的警察的计划。

希姆莱决心废除民主国家行之有效的那种警察。他说：“我终于决定将这十六支不同的邦警察建成一支真正的全国性警察，因为全国性警察是一个国家所能掌握的最强有力的钳子之

可是希姆莱建立全国警察的野心，碰到了一堵几乎无法逾越的墙，使他难于在一半以上的德国地区插手。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毫不踌躇地将自己的警察百人团摆开阵势，同这个慕尼黑的来犯者对垒。戈林和希姆莱的野心不相上下：两人都想掌握第三帝国的警察机器。但是尚未加冕的普鲁士国王比对手多一个有利条件，他手中已经掌握了普鲁士警察，而这是构成任何一种德国警察体制不可或缺的权力工具。

戈林在普鲁士上台后着手把警察抓在自己手里，他给自己搞了一支私人卫队，取名“特别警察部队”，由民族社会主义警官联合会主席韦克警察少校指挥，并将反对现政权的分子共一千四百五十七人清除出警察局。戈林选定柏林警察总局第一处（IA）这个不引人注目的部门，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核心机构。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个处就不顾在全国范围内取缔秘密警察活动的正式命令，起着德国政治警察的情报中心作用。令人心惊胆战的普鲁士政治警察就要在这里诞生了。

身穿褐衫的普鲁士总理物色了一个狡猾异常的警官，即普鲁士内政部警察部队高级政务参议鲁道夫·狄尔斯博士，此人是个花花公子，略懂艺术，经常变换手法，以满足戈林附庸风雅而收藏文艺复兴时代艺术品的渴望。狄尔斯不是纳粹党员，后来跟主子攀了亲，答应给戈林拼凑一个普鲁士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权力工具。狄尔斯当上了第一处处长，并把愈来愈多的刑事警官拉进新建立的政治警察队伍。原来只有六十人的单位，很快就扩大成二百五十名官员的机构。戈林提供必要的法律根据，使狄尔斯的警察逐步摆脱国家的领导。他给普鲁士建立一个中枢政治情报机关，赐予它以独立的执行权，并使这个作为后来秘密国家警察前身的新机构不受普鲁士警察管理法第十四条的约束，因为这条规定：警察只能“在有效的法律范围内”采取措施——换言之，即必须维护基本权利和人权。

政治刑事警官们也不跟一般警察一起办公。他们迁出设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旁边的警察署，另立机构：这个新立的“反布尔什维主义特别部门”占

用了前共产党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而狄尔斯机构的主要人手则待在艾伯莱特亲王大街8号一所宽敞的工艺学校，靠近莱比锡街的戈林官邸。4月底戈林通过一项法令，将狄尔斯的机构取名为“秘密国家警察处”，列为只受一个头目即赫尔曼·戈林控制的邦警察部门。一位不著名的设计邮戳图样的邮局职员，给这个新机构定了一个缩写名称：Gestapa。即后来人们习惯称呼的“盖世太保”。这一令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压在德国人的心头达十二年之久。

戈林起初想把冲锋队牢牢抓在手中，可是，当穿褐衫的冲锋队员开始向幻想中的国家敌人战斗时，这位大言不惭的戈林却被这些应召而来的人的暴行吓坏了。那些同冲锋队最低级的本能和社会怨愤汇集在一起的东西，蛊惑人心的演说和宣传家多年来灌输给冲锋队各营的东西，现在自辟蹊径了：普鲁士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地狱。

冲锋队的行动队横行城市街头；柏林冲锋队的打手们尤其残暴凶狂。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地区总队第一区队把所谓的反对国家的政敌送进防空掩体、地下室的偏僻的地方，对被捕者滥施殴打，百般折磨。仅柏林一地，冲锋队就设了五十个“野蛮”集中营。在帕佩将军街、康德街、黑德曼街、菲斯滕费尔德街——各处防空掩体中，都有冲锋队员在毒打被他们抓到的人。不仅柏林如此，柏林以外的地区也出现了疯狂的恐怖活动：佐内堡、博尔尼姆、克尼希斯武特豪森、克姆纳等地，都发出了恐怖的信号。戈林意识到冲锋队已不受他的控制。他眼见自己已陷入了冲锋队的包围：普鲁士各地很大一批警察局长穿上了冲锋队的制服，而且在各地方政府领导人的身边也都坐着所谓的冲锋队的顾问。毫无疑问，戈林在德国最大的一个邦的统治地位已岌岌可危了。

秘密警察头子狄尔斯向主子晋言，挑动主子公开同冲锋队对着干。戈林犹豫不决，迟迟拿不定主意，而狄尔斯已抢先行动了。根据柏林的德意志俱乐部的情报，狄尔斯掌握了冲锋队打手们的线索。随后，他的同行、刑事参议黑勒向他报告说，冲锋队在黑德曼街10号纳粹党柏林区党部四楼私设刑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即从韦克营调来一批警察，在刑房四周架起机枪。经过长时间谈判，狄尔斯终于促使冲锋队交出了他们所抓的人。“我们见到的受害者”，他写道，“已经饿得奄奄一息。他们被关在狭窄的柜子里，成天站着，逼迫他们‘招供’，所谓‘审讯’就是不停地拷打，十来个家伙分成几批，每隔几小时轮番上阵，给受害者饱尝铁条、橡皮棍和皮鞭的酷刑。我们走进刑房时，只见这批活着的僵尸一排排躺在烂草堆上，满身是化脓的伤口。”

秘密警察头子终于斗红了眼。他派出手下的秘密警察，开始一处一处地对冲锋队盘踞的防空掩体进行清剿。在戈林半心半意的支持下，狄尔斯死死盯住冲锋队打手不放，经常冒着会被这些凶神恶煞痛打的危险。到5月底，普鲁士境内的冲锋队“野蛮”集中营几乎已经绝迹。但狄尔斯并不就此收兵，他和普鲁士司法部一个勇敢的小组联合作战，这个小组在检查官维尔纳·冯·哈克和约埃尔博士领导下追捕冲锋队暴徒。把他们扭送法庭处置。

反冲锋队的斗争愈演愈烈，但秘密警察头子有时暗自感到这样作战考虑过于欠周，因为同冲锋队的矛盾愈是尖锐，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徒也愈加悄悄地渗入到普鲁士的戈林地盘。狄尔斯预感到，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独裁统治的更大危险来自黑色集团。狄尔斯说：“党卫队行将进行的出击，比

明火执杖的冲锋队更为居心叵测和考虑周密。”他不会不明白这一点，他已经一再给党卫队制造了障碍。

冲锋队施滕内斯感到身受党卫队的威胁，他斗争的矛头也是针对着希姆莱的党卫队，1931年10月10日，接近施滕内斯的《每周实况》战报报道：“戈林主动声明，从现在起他将全力促使这一混乱局面的结束。他还断言……他也无惧于把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拉下马。”后来戈林也被反对派冲锋队员誉之为希姆莱的敌人，因为在施滕内斯暴动后，《每周实况》还报道说：“戈林是力不从心，未能说到做到。”现在，这位普鲁士总理一心想弥补自己在1931年未能做到的事情。他指示狄尔斯保护施滕内斯，以防党卫队对施滕内斯下手，1933年秋，在施滕内斯妻子和在当时的中国军队中工作的某德国军训教官的帮助下，狄尔斯让这个前党卫队的阶下囚从荷兰边界越境潜逃。瓦尔特·施滕内斯后来晋升为当时的中国国家首脑蒋介石的卫队长。

不过，在同党卫队较量中取得这样的胜利是罕见的。多数情况下狄尔斯都一无所获。他始终未能砸开柏林党卫队刑房所在地的哥伦比亚大楼；他指挥的反殴打运动的另一个目标，即帕彭堡党卫队秘密集中营，也是在希特勒听了狄尔斯的报告后命令陆军部队炮兵“毫不留情地摧毁”这个营地及其全部坚持顽抗的党卫队时，才算被攻了下来。

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深感不安，即党卫队员既有戈林阵营的人，也有希姆莱阵营的人。这些人还能有几天忠于戈林的普鲁士呢？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昌格，尽管有其个人原因没有参加希姆莱阵营，但他背后也有戈林派来的人监视。狄尔斯首先是怀疑脸色淡黄的刑事参议阿图尔·奈比和身材细长的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前者是秘密警察中为数不多的纳粹党员之一，后者专好向奈比打小报告。

奈比的野心在同行中是无人不晓的。他有朝一日会变成大人物，要不就被绞死”，刑事警官利贝曼·冯·字南贝格曾对他作出这样的预言。奈比身为秘密警察的行政负责人，爱听这样的传闻，即据说是他创造一句名言：“没有信念，只有权变。”“不过奈比先生，这句话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这是巴尔扎克作品中那个狱中囚犯伏脱冷说的呀”，一个熟谙文学的听众这样反问道。奈比的回答是：“您一定很清楚，他（狱中囚犯伏脱冷）后来当上了巴黎刑事警察局长。”可是通向这个职务的道路被鲁道夫·狄尔斯堵死了。德意志民族党的逃兵吉斯维乌斯鼓励他的朋友奈比反对顶头上司狄尔斯，因为他具有刚够中学毕业生水平的奈比所缺少的一切，学识、大资产阶级出身、牢固的社会地位和一股毫不在乎的劲儿，对此连戈林也有时为之感到愕然。有一次戈林大声对他说：“狄尔斯，我警告您，您是想同时脚踏两条船！”狄尔斯听了只是莞尔一笑，答道：“秘密警察头儿必须同时脚踏所有的船，总理先生。”

奈比认为恰恰是这种“无原则性”，狄尔斯有可能实际上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他的朋友吉斯维乌斯又给这种怪诞的想法添油加酱，“对狄尔斯这个反复无常、轻率行事的家伙……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斗”，吉斯维乌斯写道。这两个朋友收集了控告狄尔斯的材料，并劝说头脑简单的达吕格相信红色狄尔斯的幽灵在徘徊。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的眼睛偶尔也还算是明亮的，他对奈比和吉斯维乌斯说：“你们还想前门驱狼后门引虎吗？”但他不知道，奈比——估计还有吉斯维乌斯——早已和虎挂上钩。希姆莱对于对手戈林的

每一着棋都一清二楚。10月初，他认为戈林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他可以开始冲击普鲁士要塞了。

就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和党卫队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老搭档赫伯特

·帕克布施带领党卫队队员冲进了秘密警察头子的住宅。狄尔斯太太被关在卧室里，接着帕克布施撬开了党卫队对手的书桌。但狄尔斯的妻子还是设法及时打电话找到丈夫。几分钟后，鲁道夫·狄尔斯领着动物园警察局的一队警察，匆匆忙忙赶回波茨坦街自己的住宅。帕克布施抬头一看，仿佛是撞见了一个幽灵。他还没有握好解下的执勤手枪，就被警察抓住，并被带走

但是秘密警察头子的胜利没有保持多久，库特·达吕格就出场了，他向戈林说明帕克布施“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阴谋反对柏林党卫队，嫌疑重大。戈林感到对自己手下的警察头子看错了人，这个人叫他太猜不透了。他释放了帕克布施。狄尔斯吃一堑长一智，明白戈林并不想同党卫队拼到底，当秘密警察头子两星期后获悉，警察和党卫队奉戈林之命包围了他的机关，他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到国外，在彼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观望等待。

这时，戈林挨过了党卫队的攻击这一关，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得到了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他可以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老朋友赫尔紧·贝伦茨博士搬到了柏林艾兴林荫大道。贝伦茨是基尔一家旅店老板的儿子，海军中尉海德里希早先曾常常在他那里下榻，暂欠房钱。贝伦茨建立了东部大区保安处，而海德里希的另一名心腹、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海因茨·约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派驻秘密警察处的代表。

希姆莱打进戈林帝国的突破口并不很深。戈林告知回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决不会到柏林来。”希姆莱甚至不得不同戈林握手言欢，同时并对党卫队敌手狄尔斯抚慰了一番。1933年11月9日这天使鲁道夫·狄尔斯博士荣幸地穿上了党卫队旗队长的制服。但是，党卫队头目们在这个最奇怪的党卫队队员的人事表上记下了他们的看法：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发动的第二次冲击失败了。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普鲁士总督的盟友主动提出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出力：这个盟友就是威廉·弗立克博士的中央内政部。1933年11月12日国会大选后，国家改革派弗立克决定，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内政部当权的中央集权派、前地方政府领导人尼古拉和部务主任梅迪库斯，设计了一套国家的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应有权对各邦政府发布指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过去的警察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至多不过通过国家对各邦警察的财政资助能施加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博士手下的中央集权派，现在在他们的计划中写进了关键性的条款，规定各邦的主权即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都划归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内政部要求自己掌握德国所有的警察部队。从现在起，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发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免干部（少校以上）。国家改革派想要实现希姆莱也曾向贝斯特博士谈到过的纲领：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指挥权。但是有一个区的头目拒

绝内政部侵夺这份权力。

虽然除了中央内政部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尼古拉·梅迪库斯计划，但普鲁士总理戈林赶在中央集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他在1933年11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给秘密警察处，隶属普鲁士总理领导。他任命一个督察员，代表戈林监督秘密警察处并自行确定一名秘密警察头子。国家改革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德国最大的一个邦逃脱了威廉·弗立克对警察的操纵。

但是，内政部长无力迫使戈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无支配的权柄，也未博得希特勒的欢心，因为他过去曾经向格利戈尔

·施特拉塞的旗帜宣誓效忠，有如被魔法所迷惑，中央内政部的中央集权派都将目光投向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权。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就是救星！党卫队全国领袖手中有权：他掌握着党内警察；在德国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期以来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

弗立克的僚属，当然是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开始进攻。在中央内政部暗中配合下，希姆莱攫取了一个邦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1933年11月，希姆莱被任命为汉堡、卢卑克和梅克伦堡·什未林政治警察司令；1933年12月，任安哈尔特、巴登、不来梅、黑森、图林根和符腾堡政治警察司令；1934年1月，任奥耳登堡和萨克森政治警察司令；等到弗立克于1934年1月将他的“国家重建法”提交给唯唯诺诺的国会时，希姆莱已经掌握了除普鲁士的绍姆堡·利琅以外所有德国各邦的政治警察。当然戈林始终并未屈服，相反他收了收拳头，准备再次打出去。

1934年2月19日，弗立克向各邦邦长发布一项决定，“德国各邦警察的直接指挥权”由他统一掌握。3月9日，戈林针锋相对地发布决定：他已接管普鲁士邦警察最高领导权，并将普鲁士内政部主管一切邦警察事务的警察处头子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戈林再次敲掉了对方手里的武器。

然而，吗啡狂戈林靠毒品兴奋了一阵子后，刹那间又陷入失望和颓丧的情绪之中。这位普鲁士总理逐渐发觉，他坚持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他自信已经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大祸临头的狼烟，其来势之凶，对他权力的危害之大，超过了弗立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1933年春刚刚冒头的恐怖行动，现已蔓延全国。不计其数的纵队在行进，嚓嚓的脚步声越来越震耳欲聋；褐色营擂起了隆隆战鼓，四百万冲锋队吹响了嘹亮的号角，发出了战斗的信号，他们找不到职业，政治野心勃勃，渴望革命的来到。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同弗立克和希姆莱缔和了。3月底，他开始与中央内政部举行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之后自以为得了大利，才答应将普鲁士各部纳入中央管理。除邦总理府外只保留了普鲁士财政部，其他内政职权悉归中央内政部。警察头子达吕格上调弗立克主管的部里，指挥全国所有穿制服的警察。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无疑作了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员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海德里希当上了秘密警察处处长，奈比接管了邦刑事警察处。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仕途生涯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不过几乎还没有时间来欢呼庆祝，历史并不认为希姆莱和戈林之

间缔结了协定就万事大吉了。继强迫订婚之后，随之到来的却是流血婚礼。1934年4月10日戈林刚刚将新的主人引进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号，并把自己的心腹狄尔斯安置到科隆行政区政府头头的位子上，秘密警察处就接到报告，报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在它短暂的历史上已面临深重的危机。

所有报告反映，冲锋队内犹如开了锅的沸水，一片怨声。它那成员复杂的领袖团偏偏在一个问题上得出一致的看法，即深信“阿道夫”1933年1月30日以来奉行的整个方针根本不符合领袖团的意愿。

第五节党卫队“精英”荟萃

对黑色集团的首领来说，始终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党卫队这个帝国的组织愈来愈庞大和领袖团人手不足，不断要求增加人员，可是发展工作已经变得困难起来，它迫使希姆莱部分录用根本不符合党卫队北欧种血统理想要求的人。

但党卫队的发展工作是要陷入绝境的。这就是说，党卫队有一个唯一不同于它的周围世界和党的特点：独特的生活作风。真正的党卫队员并非决定于希姆莱的怪诞命令中所说的信仰坚定与民族社会主义狂热，而是决定于“一种义务，这种义务不像党那样着眼于政治目的，而是着眼于不屈不挠的性格”——前中央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这样说。

由此可以再次看出，党卫队同前自由团的心理状态一脉相承。自由团首屈一指的作家恩斯特·约恩格曾经写道：“主要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而斗争，而是我们怎样进行斗争。”他的一个弟子，后来任秘密警察法官兼党卫队副总指挥的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从约恩格这种亡命之徒的哲学中，阐明了一种决定党卫队领袖的精神概貌的思想，即“英雄现实主义”的思想。贝斯特在1930年指出：“斗争是绝对的、永恒的，斗争的目标则是由时间决定，并可以改变的。因此斗争的成果也可以不是决定性的东西……所以说检验道德的标准不是内容，不是一种什么东西，而是一种怎样的东西，而是形式。”

这样一种不择手段的伦理学，给极度集中于提高效率开了方便之门，而它也就构成了党卫队心里状态的核心，并被希姆莱绝妙地表达为：“‘不可能’这个词永远不许在我们队伍中出现。”依历史学家汉斯·布赫海姆之见，“崇拜为效率而效率”也迷惑了那些原来对希姆莱集团的英雄侈谈抱有反感的非纳粹分子。但效率和事业心的号召，不断地要求全力以赴和作出成绩，促使集团成员投入一场原始人式的角逐竞争，这种竞争使他们将一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准则置诸脑后。

党卫队外表上的每一英寸面积，都用以显示它是一个精华荟萃的组织，一支身系监视国家安危的严格的清教徒近卫军，体现出“毫不犹豫、无条件地执行领袖第一项命令”（希姆莱语）的顺从性。

全国领袖敞开他的党卫队的大门，让国内有心趋炎附势的上层阶级人士参加进来，希姆莱的组织，首先是保安处特别部队，骷髅队和特别机动部队，迫切需要经费和领导人员，而这些又只能来源于一向居统治地位的旧有中坚力量：贵族、资产阶级和财界。希姆莱不遗余力地紧张工作，要使党卫队成为一个替崛起的帝国的各部门网罗人材的机构，以致一时几乎没有注意他的工作是何等自相矛盾：民族社会主义党的近卫军年复一年地将种族主义优生学奉为自身生存规律的圭臬，而现在党卫队却向一些居民阶层频送秋波，这些阶层拥有任何一部褐色种族主义哲学词典所没有收进的那些词汇的东西：声望、金钱和一种世代相传的统治本能。新的阶层涌入党卫队，迅速改变了党卫队的社会成员面貌。截至1933年止，决定党卫队的成份有三种人：前自由团成员，由于经济危机致使职业训练中断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老党员。1933年以前的这个党卫队，只有一个人数很少的领导集团，但它一直霸踞着党卫队年的重要职位，直到第三帝国的末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百分之九十的老党卫队员均已退休养老。

老队员中仅有百分之十的人经历了大批新人涌入希姆莱组织的阶段，这

一阶段开始于1933年3月,因此心存有疑忌的党卫队老战士称这些新人为“香堇菜”。率先加入的是贵族。早在取得政权之前不久,已经有知名人士参加了党卫队,例如冯·梅·克伦堡大公爵,楚·瓦尔舍克,翁德·皮尔蒙特亲王、克里斯托夫·冯·黑森亲王和威廉·冯·黑森亲王、巴塞维茨·贝尔伯爵和冯·普法伊尔—布格豪斯伯爵、德国直属帝国男爵冯·廷根,以及男爵冯·盖世、冯·赖岑施泰因和冯·马尔森—波尼考。

1933年春,党卫队的血管里进一步注入了贵族血液。西格马林根王室的冯·霍亨佐伦—埃姆登亲王和冯·舒伦堡伯爵参加了党卫队。过不多久,党卫队的花名册上也相应地从哥达充实了人员。普鲁士—德意志军史上的显赫姓名几乎无一遗漏;贵族冯·丹尼尔斯、冯·勒德恩伯爵、施特拉赫维茨伯爵、冯·德·戈尔茨男爵、贵族冯·德·普拉尼茨、冯·科伊德尔、冯·阿尔文斯勒本、冯·波德比尔斯基、冯·特洛伊恩费尔德、冯·纳图西乌斯等等,全部上了花名册。穿上黑制服的贵族在党卫队领导中担任了一些高级职位。1938年贵族任高级职位的比例为:在党卫队副总指挥一级中占百分之十八点七,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九点八,在党卫队旅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十四点三,在党卫队区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八点八,在党卫队旗队长一级中占百分之八点四。

继贵族之后是中等资产阶级子弟。同贵族相反,他们是党卫队中的二十世纪人物,其中多半为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多数是法律)和几乎全部在德国青年运动的感情和思想中成长的知识分子,他们差不多都进了保安处,在那里促使形成一种法学—理智主义的典型,它同党卫队老战士的战壕社会主义或斗争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族社会主义都格格不入。瓦尔特·施伦堡和赖因哈德·赫恩、弗朗兹·西克斯和奥托·奥伦道夫,全都是读过大学的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他们创造了不凭感情用事的党卫队技术政治家、所谓“aocinlcngincer”的样板,给领袖专政提供了各种需要的、形式上几乎不考虑任何意识形态,但又灭绝人性和不承认人们一致公认的准则。

跟保安处知识分子性质相同的一批资产阶级,是参加党卫队厂矿企业管理机构的青年经济学者。他们这些人同今天西德各厂矿企业管理人员办事处的工艺学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对党卫队本身的世界观,比保安处的伙伴更加不感兴趣,将希姆莱的经济企业完全看成是一条特别保险的成名发迹的道路。旗队长瓦尔特·扎尔佩特博士是黑集团经济王国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明星,党卫队高级领袖们在他的档案中写道:他想试图“用民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装饰”他的功名心。这项评语基本上适合这些人当中的大多数的情况。

“香堇菜”的另一股人来自国防军的资产阶级军官团,他们使本已很不一致的党卫队成分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军官们加入1934年起建立的特别机动部队(VT),而且为时不久,就凌驾于具有塞普·狄特里希那种粗暴性格的初期党卫队军人之上。当然,新的职业军官几乎算不上是一派。前国防军中将、铜盔团领袖保罗·豪塞尔是典型的保皇派军官,他作为后备队督察员给这支武装党卫队前身带来了一种罕见的保守主义特征;而东普鲁士少校菲立克斯·施但因纳和空军少尉威廉·比特里希一类的改革派,则把特别机动部队视为一种实验性质的军队。

农民也是党卫队的人员之源。比较年轻,大多是感到前途无出路的农民,纷纷当了看守集中营的鬻骸队。受过教育的农家子弟则相反,拼命挤入巴特特尔茨和不伦瑞克的党卫队士官学校,谋求发迹,这种士官学校有时迫于需

要，甚至可以提供国防军不可能提供的机会：无需经过基本训练就能进入军官生涯。

似乎希姆莱还嫌党卫队成员的类别不够五花八门，他又搞了一种党卫队的新标本：名誉领袖。希姆莱授予有影响的公职人员、党的干部、科学家和外交人员以领袖头衔，并让他们有权穿相应的党卫队制服；党卫队名誉领袖多半直接由全国领袖本部领导，不需值勤，也无权发号施令。希姆莱显然希望，利用这种名誉头衔扩大党卫队的社会基础，并以党卫队的思想影响名誉领袖——这种荒诞想法，除了希姆莱以外，只有1945年以后负责整肃纳粹人员和一些历史学家才会相信。

头脑简单的历史学家看到，持不同政见的外交官员、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威兹萨克男爵获得党卫队旅队长头衔，或者希姆莱的死对头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副总指挥，就误认为所有身穿黑制服的都是希姆莱打入国家和党内的第五纵队的一名狡猾成员。实际上，名誉领袖并不是党卫队头子的游击队员，如同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的妻子一样，希姆莱也曾授予她党卫队名誉队员的称号。

然而希姆莱并未停止继续为自己的帝国招兵买马，扩充势力。

他甚至暂时在党卫队内系统地建立各种组织，只要它们有助于他接触现实社会。他已经开辟了一条联系农业协会的渠道：农村骑术协会。

希姆莱抓住这个德意志民族保守主义的节目活动：一部分地区的骑术协会虽已投向冲锋队，但实力最雄厚的部分却紧紧依附党卫队——在东普鲁士、荷尔斯泰因、奥尔登堡、汉诺威和威特伐利亚这些主要养马地区，所有骑术协会都披上了党卫队的服饰，党卫队骑师们确保希姆莱在社会上获得了某些光采。1935年在克莱因—弗洛特贝特举行第十六届德意志春委赛马大会，党卫队三级小队副骑师京特·特梅乘“埃格利”坐骑赢得了全胜，成为德国赛马史上的创举；1937年赛马会上，党卫队骑师们更囊括了德国国内所有各个项目的冠军。

当然，为了取得这些成就希姆莱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他答应农村骑术协会，不问其政治态度如何，可吸收它们的所有会员，加入党卫队。从此党卫队内的老战士们嘀嘀咕咕，说这些骑师尽管身穿黑制服可仍然是反动德意志民族党人、党卫队机关刊物《黑色团》义正词严地警告骑师们：“他们必须培养民族社会主义精神，亦即党卫队在其建立以来的漫长岁月中培养并奉为行动准则的全部道德品质，效忠领袖、服从纪律。”多数骑师们俯首贴耳，但有些骑师却另有其作为骑师心目中的道德观。1933年有十一名骑师拒绝参加党卫队宣誓，被送进了集中营。东普鲁士党卫队骑师队长安东·冯·霍贝格·得·布赫瓦尔德男爵，于1934年7月2日被党卫队员枪决，原因是这个老铜盔团员向国防军透露了党卫队的内幕。十年之后，希姆莱以煽动反对希特勒的罪名，下令处死他的马匹补充处长、骑师兼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汉斯—维克托·冯·扎尔菲阿蒂伯爵。

跟骑师们缔结的协定给希姆莱提供了接触农业协会成员的机会，和半保皇性质的“基夫豪塞”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领导的结盟，使他有获得老战士的兵源。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的中央领导成员和地方分会领袖均集体加入了党卫队。老战士对他们的全国领袖再也无法理解了，因为参加党卫队的德国军官联合会领袖中，为首的就是忠于皇帝的步兵将军威廉·赖因哈德，此人

系反动军人的同僚。《黑色团》对此在 1935 年还曾指责，在之些军人中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将工人排斥于人民集体之外；还必将唤起社会感并被视为第三等级。”

讽刺几乎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黑色团》咒骂极端保守的吕狄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在卡普暴动中并肩作战、志同道合的赖因哈德，却被党卫队机关刊物誉为党卫队副总指挥和民族社会主义者。直到 1941 年，老党卫队员、纳粹党司库弗朗兹·沙维埃·施瓦兹还对披上黑制服的保皇派赖因哈德看不顺眼，施瓦兹说：“我只是遗憾，这么一个人当上了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穿上了这种漂亮的制服，而骨子里却依然如故。”

希姆莱也把赫尔曼·埃尔哈特队长海军旅的残存人员拉进党卫队，党卫队的老战士们对此亦具有同样感触。有些老战士对 1931 年 10 月 10 日党卫队第 53 号命令还记忆犹新，希姆莱在命令中提出，要注意队长居心叵测地阴谋将其党羽打进党的机构，“企图搞垮纳粹党”。而现在，希姆莱却有意集体接纳埃尔哈特旅的人员加入党卫队，具体办法业已谈妥，只是由于固执的队长发表的一通怪里怪气的讲话，出乎党卫队候补队员们的意料之外，才使计划告吹。

“本旅官兵们，”埃尔哈特当着亲临该旅最后一次动员人们加入党卫队的纳粹头面人物，大声向集合在场地上的部属说，“你们知道，我们是经过了长时间多次斗争之后，直到最近才愿意加入新国家的一个组织的，对此我表示敬意！因为只有斗争中才能了解敌手，重视或藐视敌手！而且今后我们也要坚持这样做。”纳粹党领袖们气得暴跳如雷，最后希姆莱决定放弃埃尔哈特旅。只有个别成员参加了党卫队，其中包括埃尔哈特的前副官哈特穆特·普拉斯，他当上了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1944 年以 7 月 20 日政变的帮凶在集中营中结束了生命。

但是希姆莱并不是光顾着给党卫队争取新的成员，他也同样需要钱，以维持越来越浩繁的党卫队组织的开支。德国的工厂主和经济学家欣然站在全国领袖一边。他们在一个号称“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俱乐部里进行活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出于某些原因谋求接近海因里希·希姆莱。像伊·格·法本公司董事海因里希·比特菲施博士之流的机会主义者、像宣传部国务秘书维尔纳·瑙曼博士的坚定的纳粹分子、像弗里德里希·弗利克的小心谨慎的康采恩老板，和像罗伯特·博施公司经理汉斯·瓦尔茨的冒牌的反纳粹主义者，他们凑成一伙，以捐款资助党卫队。

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的前身，是希特勒的经济顾问威廉·凯普勒在 1932 年夏天组织的“经济问题研究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旨在从业务上支持未来的德国主子们，它的成员是著名的经济和财界人士，其中有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联合钢铁公司老板艾伯特·伏格勒，和科隆银行家库特·冯·施罗德男爵。希特勒召开经济座谈会并未谈出什么名堂，倒是凯普勒的年轻助手、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蒋·然拉内富斯善于出谋献策，他劝说希姆莱关心这个俱乐部，从 1934 年年中起，这个俱乐部就受到党卫队头子的保护。

沙赫特和伏格勒退了回去，相反许多厂商都纷纷加入“党卫队全国领袖之友社”。几乎没有一家大型厂矿企业不希望通过派出一名理事和出钱资助党卫队，借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得受到党的加害。希姆莱之友社的会员名单，读起来宛如一本重要厂商注册登记簿：银行业有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

银行、商业私营银行、国家银行和 J.H.施泰因银行，航运业有北德劳合轮船公司和汉堡美洲航运公司，油商有德美石油公司和大陆油业公司，奥古斯特·厄特克尔博士营养食品厂和伊·格·法本工业大卡特尔，中德钢铁厂，西门子—舒克尔特工厂，波特兰水泥厂，莱因博尔西希金属工厂和“赫尔曼·戈林”国家工

希姆莱之友社书记克拉内富斯定期召开会员大会，经常有党卫队高级领袖参加，起初每年集会两次，一次是趁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纽伦堡召开，另一次是趁特别机动部队举行宣誓时在慕尼黑召开；后来会员每月都在柏林“飞行员之家”集会。从 1936 年起，希姆莱还要求这些先生们定期捐献。他告诉该社银行家冯·施罗德，希望大家捐款给“党卫队用于文化、社会和慈善事业的开支”。这个银行家忙不迭地满足了大恩主的意愿。

厂商会员也表示愿效力，事隔不久，捐款就源源流入施罗德担任董事的 J.H.施泰因银行的 S 字号储款帐户；每年捐款总额达一百万马克，悉数解交德累斯顿银行党卫队的 R 字特别帐户，由希姆莱的首席副官卡尔·活尔夫开支票提取。党卫队头子深表感激，给希姆莱之友社的成员封官晋爵，纷纷给予党卫队头衔；在三十二名未参加党卫队的成员中，有十五人被任命为党卫队名誉领袖，他们只是间或穿穿党卫队制服而已。

当然，对于那些不敢身穿佩戴骷髅标记的制服的人，党卫队也提供了一种较为隐蔽而且花钱不多的合作方式。希特勒特许这样一支作为独特的党组织而经常急需经费的党卫队有权自行筹款，发展赞助队员（FM）。所谓赞助队员就是同情者，他们虽然资助党卫队，但并不参加党卫队组织。他们无需向希特勒宣誓，也不受党卫队内部命令的约束。

每个党卫队旗队均附有一个赞助队员机构，它责成每个党卫队员至少发展一名赞助队员。“赞助队员机构，”党卫队领袖库特·维特耶在 1933 年 3 月 1 日解释说，“是党卫队唯一可靠的财源，它定将进一步成为建设党卫队的经济保证。”取得政权以后，党卫队加强宣传赞助队员的工作，因为掌握了许多德国人宁愿当一名匿名的赞助队员而不愿参加另一党组织的心理。赞助队员这个身分足可免除纳粹找到头上来的麻烦，而且无需参加党，捐献数字可以由自己确定，每年至少应捐献一个马克。

除了这种吸引力外，希姆莱还搞了一种独出心裁的诱饵。他叫人设计了一种不在市场上公开发售的银质赞助队员徽章，徽章，为椭圆形，中间镌有字，SS 和 FM 字母；还办了一份《赞助队员杂志》（战争爆发时发行量为三十六万五千份），并给每个关心赞助队员的同胞送一幅宣传标语，挂在家里，上面写着：

党卫队员真光荣，
赞助队员也光荣；
我们党卫队员和你们赞助队员，
人人继续履行各自的义务，
坚守自己的岗位，
德国必会重新强大。

大规模的宣传带米了预期的效果。为时不久，希姆莱的赞助队员影子部

队在人数上就超过了正式党卫队，马克源源流进党卫队的金库：1932年有赞助队员一万三千二百一十六名，纳款一万七千马克；1933年十六万七千二百七十二名，纳款三十五万七千马克；1934年三十四万二千四百九十二名，纳款五十八万一千马克。

但是，一个成员如此复杂的党卫队必然内部缺少团结。党卫队老战士们突然看到，那些显然连民族社会主义的起码知识也不懂的人，都纷纷穿上了党卫队制服。党卫队变成了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纳粹党司库施瓦兹再也不想穿党卫队制服了，因为——据地区总队长伯格记录道——“穿这种制眼的人太多了，特别是许多党卫队领袖无论从思想上和外表上来说都不配穿它”。党卫队的肩章、领章和制服很难说明一个队员的实际思想情况。后来担任秘密警察头子的海因里希·缪勒，在自己的党卫队制服上戴了一个老战士臂章，虽然纳粹党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领导机关1937年1月14日证明，说这个追求名誉和逐猎官位的缪勒“不是党卫员”，“从来不曾党内积极工作”，因而“对民族的振兴毫无任何贡献”。

德国中央保安局人事处对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海因里希·比特菲施博士写了这样的评语：此人原系共济会员，“完全受制于康采恩”，具有“一种事事着眼于国际合作的心理状态，因而理所当然地认为康采恩是拥有其固有生存法则和生存权利的国中之国”。关于区队长冯·施罗德男爵，1937年8月一份党卫队内部简报的作者写道：这个银行家过去是莱茵分离主义者的同伙和康拉德·阿登纳的朋友，因此“无疑不会是党卫队所需要的那种积极分子”。

连希姆莱自己也逐渐看到威胁着党卫队内部统一的危险。他在1937年承认，“数字的危险、量的危险”曾经咄咄逼人，因为党卫队里“（进来了）一大批心地不纯洁和不完全具有理想的人”。希姆莱以为危险已得到克服——事实上，只要党卫队还存在，这种危险就永远存在。

无论如何，他在1933年年中已下令暂停发展党卫队队员。希姆莱说：“我说过，不再吸收任何人。随后，从1933年年底至1935年年底，我们又将新队员中所有不起作用的人通通清除出队。”两年内共清除六万名党卫队队员。希姆莱清洗中的牺牲品是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者、酒鬼、有相公癖者、无法确证其为亚利安种的人，也有老战士，他们在斗争时期曾经挥舞棍棒对付政敌，表现良好，而眼下已不再符合希特勒卫队的标准。希姆莱甚至对不乐意就业的失业者也不能再容忍了：“凡无真实可信的理由而调换工作满三次的人，我们就将他撵出去，我们用不着游手好闲的人。”

他十分执拗地指示追查有相公癖的人，因为他把违反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看成是给他自己脸上抹黑。在他看来，搞鸡奸活动是犯死罪，没有一个搞鸡奸的党卫队员能逃脱他的惩罚——连党的老战士，也未能幸免。1935年3月22日《黑色团》报道，维特耶“因病”解职，希姆莱在一次讲话中说，他“遗憾地”并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让维特耶离职，但希望维特耶“能在不久的将来重新全力投入工作”。那些冲锋队领袖对党卫队抨击罗姆搞鸡奸的议论记忆犹新，他们清楚维特那真正害了什么病。冲锋队头子卢策挖苦他说，“不知道拖了多长时间才在各方压力下把维特耶调走。”

希姆莱在1937年提出，必须将所有搞鸡奸的人清除出党卫队并交付法庭；在狱中服刑期满后“将根据我的命令送往集中营，作为试图逃跑将其枪决”。不过希姆莱也在党卫队系统中发起揭发非亚利安种血统的人。从1935

年6月1日起，所有突击队中队长以上的党卫队领导必须提出本人的和妻子双方的祖先均无犹太人的证明；同年10月1日起，又将这条规定扩大到二级小队长和一级小队长，随后，没有多久进而再扩大到所有党卫队员。

党卫队员，包括希姆莱的白发苍苍的老战友，纷纷出动了，花了很长时间翻遍教堂受洗人登记册和大部头的陈古册籍，仔细寻出现在非有不可的东西：“亚利安”家谱。一般队员必须上溯查到1800年，领袖或候补领袖查到1750年。希姆莱一发现自己队员家谱中有世界敌人犹太人的线索，那就毫不手软，特别对于级别比较低的。谁要是发现自己有犹太人血统，趁早向上级打报告退队，否则党卫队法庭就要对其干预和进行裁决，驱逐出队。

不过迫害犹太人的希姆莱对官衔较高的人较为宽恕。一个同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女子结婚、在党卫队档案中以M作为代号的某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在表示妻子不再生育和儿子不参加党卫队的情况下，获准留在党卫队里。在往后的年头里，全国领袖对级别越高的罪人就越发宽容。地区总队长瓦尔特·克吕格尔得到了二级突击队中队长M不曾得到的宽大待遇。战争期间，克吕格尔准备把女儿许配嫁给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克林根贝格，这时突然披露了希姆莱记下的这个党卫队女儿的谱系，发现她的“母系亲属中1711年有一个完全犹太血统的祖先”。克林根贝格不得跟克吕格尔的女儿结婚，但克吕格尔的儿子却获准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

只是把六万名党卫队员清洗出去，还不足以保证党卫队得到必要的内部一致。希姆莱知道，党卫队缺少一种使大家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缺少精干的组织、严格的入队条件和一部使队员人人感到有义务遵守的尊严的法典。时至今日，党卫队不能再是一个组织，它现在应该成为一个集团了。

海因里希·希姆莱已经找到一个历史样板：耶稣会，他要效法这个样板制定出他的集团计划。已故冲锋队领袖卡尔·恩斯特生前多次嘲笑他是“黑色耶稣会士”，并非偶然；希特勒也将这个党卫队头子称为“我的依纳爵·罗耀拉”。这是因为希姆莱从耶稣找到了他认为是构成任何一种集团心理状态的核心因素：服从主义、崇拜组织。保安处领袖施伦堡证实，党卫队组织是希姆莱“按照耶稣教团的原则建立”起来的。

事实上，这两种势力有其惊人相似之处：它们同样是拥有最大特权的集团不受任何世俗法治的约束，有严格的入会条件给予保护，通过宣誓绝对地盲目地服从统治者：一个统治者名为教皇，另一个统治者称为领袖。这两个组织部有着某些相同的历史偶然现象：耶稣会士十六世纪在巴拉圭的印第安人中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国家，摆脱世俗的无上权威——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的党卫队梦想建立一个独立于大德意志国家之外的党卫队之国，搞一个党卫队的勃良第邦，拥有自治政府、军队、行政机构和派驻柏林的公使。甚至它们各自的危机也很酷似。耶稣会士在天主教会中一再树敌，同样党卫队也在党内产生敌对者。耶稣教团内部以自己是反宗教改革之剑还是修道院的虔敬工具而争论不休，党卫队内也对党卫队是发展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的动力还是政权的当差警察这一问题悬而未决。

还有，党卫队集团的最高领导机构也使人想起是效法教团的样板。耶稣会创建人依纳爵·罗耀拉（1491—1556）给他的教团历史注定的依据，借以证明所有党卫队员都是日耳曼贵族连绵不断的链条上新铸就的环节。希姆莱的“党卫队核心论”提出，党卫队的前进目标是“成为具有北欧人种血统的

人的民族社会主义集团及其血族精诚团结不容改变的法则”。希姆莱说：“我们不想只是做善于战斗的后裔，而是更要做使德意志日耳曼民族亿万年永恒不混所需的后辈的先人”。

崇拜先人和崇拜日耳曼，显然是希姆莱灌输给党卫队，用以代替它本身所缺少的思想团结的东西。尽管这伙秘密帮派故作姿态地仿效教团的神秘教义，也无法掩饰党卫队缺少一个集团有别于其周围环境的一点：天衣无缝的教义。

就世界观的根本信条而言，党卫队除了重复其他纳粹组织的主张以外，再也提不出新内容：五体投地地信仰希特勒、过分膨胀的民族主义，加上种族主义的狂热思想。党卫队并无不同于纳粹党其他组织的任何信条。希姆莱和达里这两个阿塔曼分子虽然给党卫队注入了一些独特的农民移民政策思想，但这些由种族和移民局作为目标列入计划的信条（直到1940年）只不过是点级品。农民移民的主张早已证明是反动的江湖医生的空想，这些人都是现代工业现实社会中的匆匆过客——即使在第三帝国，自由农民的地位也是一年不如一年。

不，党卫队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独特思想意识。种族和移民局负责抓训练的的头头们一再抱怨特别机动部队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普通党卫队看到种族和移民局的人员也不搭理。在党卫队里的集体活动中，学习会属于参加人数最少的一种。据地区总队长策希报告，党卫队领袖也常常把出席国防军啤酒晚会，看得比参加党卫队学习班更为重要。党卫队训练办公室主任旗队长凯撒博士在1939年1月叫苦说，党卫队员几乎再也不把种族政治课放在心上了。凯撒说：“队员中渐渐地公开表示对这些课题厌倦，因此增加了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基础的学习内容。”然而，这个方法也“未达到要求。”

此后，种族和移民局的训练工作划归中央技术管理局负责，从此意识形态方面一直处于低调，取代世界观的是“越来越侧重于历史方面的题材”（凯撒语）。意识形态化的、枯燥无味的历史伪造，成了意识形态的代用品，填补了党卫队无法用自己的思想弥补的空白。

空想家希姆莱来借助历史，编排出一种古怪的、伪造的日耳曼民族习俗，这也是他企图用来增强党卫队团结精神的东西。党卫队必须以一种彻底的新型的非基督教教义，使自己得以独树一帜。这个身穿全国领袖制服的学究决心干预党卫队员最普通的个人事情：爱情、家庭和宗教都要首先经过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审查，因为对他来说，党卫队不是一个帮派集团，而是一个“日耳曼血族集团”。

他的1936年的一份记录中就提到，“要求党卫队员尽可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岁时结婚和建立家庭”。每个党卫队员必须宣誓遵守1931年全国领袖发布的婚姻令，这项命令使希姆莱能够用否决权对不受欢迎的党卫队员的未婚妻子予以否定。

党卫队员必须和未婚妻填写一份种族和移民局的调查表，经一名党卫队大夫检查身体完全健康，提出亚利安种的谱系证明，并缴纳本人及未婚妻身穿浴衣的照片；然后由种族和移民局决定申请结婚的双方是否有资格列入党卫队的“血族簿”。如系党卫队领袖则由希姆莱亲自决定。

婚礼也被蒙上党卫队标记的阴影。教堂婚礼被严格取缔，代之以男女双方亲属小范围内的“结婚仪式”；这种仪式在办好结婚登记手续后举行，由当地党卫队队长主持，新郎新娘当场交换戒指，接受党卫队送给的面包和盐，

希姆莱加给夫妇的一切规定，都是旨在促使集团成员脱离基督教会。党卫队队员要想当头头，就必须脱离教会和承认“相信神”，这样，牧师神父也不参加洗礼和葬礼。

地方党卫队领袖代替了牧师神父。洗礼改为由全国领袖馈赠礼物，礼物等级分得很细，都是慕尼黑附近阿拉赫党工队专用磁器厂车间的产品：生第一个孩子送一只银杯、一把银汤匙和一方蓝绸巾，生第四个孩子送一具银烛台，上面镌有这一字句：“你是永恒血族链上的一环。”

只有在德国人最高兴的圣诞节临近时刻，日耳曼人领袖希姆莱便陷入了理论上的困难境地。1936年，他大骂道：“我们要采取措施……防止已经多次成为危及德国人民生存的欢乐钻进我们的队伍。”但党卫队队员的妻子在圣诞节临近时，渴望着基督教的节日气氛。希姆莱提出要以古代日耳曼人的中冬节取代圣诞节。每年阿拉赫磁器厂生产出大批“中冬节烛台”和“中冬节盘子”，供应党卫队队员家庭，希姆莱异想天开他说：“这些太太们由于失去了教会的神话，正需要有点别的什么东西来满足自己和孩子们的要求，才能高兴起来。”

为了圣诞节在世界观上花尽力气，绞尽脑汁，这说明即使在党卫队内，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也多么难于做到一致。希姆莱的非基督教新生活习惯，实际上大半只是纸上谈兵。单就宣誓遵守的婚姻令来说就大成问题，有些党卫队队员对此不加理睬。1937年，有三百零七名党卫队成员因违反希姆莱这项指令而被开除出队。党卫队不满情绪年复一年地增长，迫使希姆莱一再放宽违反婚姻令的处分条例。最初，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1935年7月3日的一项命令规定，凡蓄意无视婚姻令者均予开除党卫队。但从1937年6月23日起改为：党卫队队员可以不作为违反命令而开除出队，如果查明该队员及其妻子符合有关种族条例规定的话。1940年11月1日希姆莱又指示，所有因违反婚姻令被开除或驱逐出队的党工队队员均可重新参加集团，只要他们符合种族条例。

希姆莱敌视教会的纲领也始终未能贯彻执行。普通党卫队中三分之二的人仍然是教徒；百分之五十四点二信仰新教，百分之二十二点七信仰天主教。只有武装党卫队单位暂时还是希姆莱的信徒占多数：特别机动部队中的比例为百分之五十三点六，骷髅队中的比例为百分之六十九。但战争也迫使武装党卫队中的希姆莱信徒退居守势。党卫队部队中出现了零星活动的天主教随军教士，允许日耳曼族信徒自愿进教堂，例如在副总指挥比特里希所属的一些单位，甚至允许教会来办公室劝说人们参加礼拜和祈祷活动。

血统神秘论者希姆莱尤其失望的是，党卫队队员的妻子对生儿育女缺乏兴趣。党卫队队员家庭跟周围的普通人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同希姆莱宣布的一家有四个孩子的制度相反，1939年12月31日统计数字说明，十一万五千六百五十名已婚党卫队队员平均每对夫妇生孩子一点一个，其中党卫队领袖每对夫妇平均生孩子一点四一个。希姆莱在1936年创办了一个幼稚协会，取名“生命之源”，附设有不对外公开和费用便宜的妇产科医院，但也未能提高党卫队队员的生育率。虽然所有三千五百名中央主管处局的党卫队领袖规定必须入会，并缴纳他们的薪金的一部分（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生命之源协会在1939年仍只有八千名党卫队会员——总共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九名普通党卫队成员中只有八千人。

第三章

血暴火并

强盗突击队

暗杀冲锋队参谋长

“阿道夫背叛了我们”

罗姆非死不可

第一节 致命危险

冲锋队的扩张，增强了冲锋队部队的自负心。冲锋队领袖们显得日益不愿接受政治干部的指挥。冲锋队进一步从事摆脱政治组织的独立活动。希特勒满腹狐疑。来自柏林的报告说，他在那里玩弄的保持均势把戏已发发可危，这时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疑虑。在施普雷河畔，以社会灾难和日益抨击所谓已经不再革命的希特勒政权为标志，奥托·施特拉塞的知识分子派和冲锋队领袖相互靠拢接近了，甚至希特勒派出的监视人戈培尔也开始动摇。

但是，在两个集团尚未形成结盟之前，希特勒就踩灭了闪烁着的火花。1930年5月21日，他突然出现在柏林，同施特拉塞展开一场世界观的辩论，并以达到蓄意的翻脸目的而告终：希特勒将奥托·施特拉塞带走，授意戈培尔将其追随者清除出党，并胜利地接到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效忠电报。希特勒认为，柏林的反对派已缄默不语。此外，还有党卫队在负责监视柏林的党内政敌。希特勒日益依赖具有警犬本性的库特·达吕格，达吕格这时已离开了冲锋队，于1929年春天招升为柏林党卫队领袖。

柏林党卫队领袖取得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慕尼黑党卫队全国领袖制约的地位。在一般情况下，他只跟希特勒和冲锋队全国领袖保持联系。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只有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部意见分歧，才能将他推到关键性角色的地位。如同达吕格的一位工作人员所描绘的那样，在柏林体育宫附近的冲锋队活动中心，达吕格建立了“一个特别可靠的和将要成为这样的党卫队同志的中心。只有少数几个柏林人知道这个党卫队的队本部，对其真正目的也讳莫如深，其目的早就不是局限于领导柏林的党卫队了。”

达吕格的情报员中，有一个他的老朋友名叫赫伯特·帕克布施的人，呆在柏林冲锋队的总部里。从自由团的时代起，这个木匠的儿子帕克布施就像狗忠于主人那样追随达吕格。他是柏林冲锋队第二十一突击队队长。他将一切值得注意的事情都记录下来，可是丝毫没有侦察到什么情况。帕克布施没有发觉，在柏林的冲锋队全国领袖副手施滕内斯的周围，形成了一股由冲锋队领袖组成的逆党，他们在大力密谋策划夺取慕尼黑党的领袖的权力。奥托·施特拉塞的垮台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的社会革命口号造成了柏林冲锋队的思想混乱。

社会灾难也驱使冲锋队领袖参加反对政治组织这一竞争者和希特勒的阵线。失业者受激进的理论 and 冲锋队的厨房所诱惑，大批涌进冲锋队，逐渐耗尽了冲锋队金库里的最后一文钱。“在柏林的有些旗队，其中百分之六十六的队员是失业者，在布雷斯劳竟无法拉出一支冲锋队进行检阅——确实面临严寒和大雪——因为他们缺乏鞋袜，”施滕内斯向慕尼黑报告道。德国的失业人数（1930年）已高达三百万之多。

犯罪分子也随失业者一起涌进了冲锋队，这些人给冲锋队和红色战线之间多年来进行的基层斗争具有了芝加哥式的流氓殴斗特点。从旅馆到旅馆，从啤酒店到啤酒店，进行着疯狂的殴斗。单从绰号也可窥其一斑，谁在这儿

横行霸道：新克尔纳的突击队名叫“拉皮条突击队”，韦丁区附近的一个突击队名叫“强盗突击队”，冲锋队领袖“橡皮腿”在“啤酒杯国王”、“左轮枪口”、“枪手米勒”的前呼后拥下横行街头。冲锋队的头目们大叫大喊要有更多的经费，因为他们不愿再次失去这些新手，因为纳粹和公社之间的壕沟相距只有一公分。但是财力比较雄厚的纳粹党区领导机关却紧紧关闭金库大门。政治组织的人员不愿再拨出公款去助长冲锋队发展权势的欲望。

他们这种吝啬的态度使冲锋队惴惴不安，怀疑党的领导存心要限制冲锋队的规模，更其糟糕的是，热衷于追求权力和威望的党的领袖把冲锋队视作他的障碍。一个愤怒的口号出现了：“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无产者！”站在反对立场的冲锋队员印发了反对自己领袖的匿名传单：“我们这些运动的无产阶级分子实在太满意了！我们心甘情愿忍饥挨饿，好让我们心爱的‘领袖们’以其每月二千至五千马克的收入过着十分优裕的生活。我们也极其喜悦地听到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汽车展览会上购买了价值四万马克的一辆崭新的大型梅塞德斯轿车……”

柏林已经谣传希特勒为了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进行联合铺平道路，打算逐步解散冲锋队。东德的冲锋队最高领袖施滕内斯立即采取了一次闪电行动。他仗着可以获得其他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副手们的支持，致信慕尼黑提出强硬要求：允许冲锋队领袖担任国会议员、限制纳粹党区领袖的影响、对党召开大会时光荣担任会场保卫工作的冲锋队支付报酬。施滕内斯选择了恰当的行动时间：1930年9月将进行新的国会选举——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将首次获得机会，可以充分利用失业者和破产者的埋怨情绪而有利于字旗。在竞选中，冲锋队占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地位。

柏林冲锋队派了一个全权代表团前往慕尼黑，向党的领袖陈述自己的要求。但是希特勒拒绝接见。此后不久，参加国会选举的纳粹党新的候选人名单表明，施滕内斯和柏林冲锋队第二号人物又一次被排斥在名单之外时，群情激愤，公开决裂。8月底，柏林冲锋队领袖纷纷离职，并授意他们的冲锋队不参加选举。冲锋队拒绝给戈培尔计划安排在体育宫举行的选举大会担任保卫工作。冲锋队会场保卫人员在大会进行中途撤走，丢下纳粹党的演说者，让他们去听任敌对者的凌辱。冲锋队员齐声嘲笑道：

哪怕国会大人物们召唤，
我也不听从。
什么样的灯光，
就得配什么样的墙纸。
我坐在我自己的车上，
绞尽脑汁，
研究这张教授名单，
是字还是蠢货。

柏林冲锋队员开到维滕贝格广场，举行了一次反戈培尔的集会。《慕尼黑邮报》报道说：“暴风雨般的呼喊声震耳欲聋：‘戈培尔博士出来讲清楚！’另一些冲锋队员扬言要开向体育宫，以武力彻底驱散‘戈培尔的喧嚣’”，戈培尔火速向柏林党卫队求援。达吕格的部下接替了体育宫会场的保卫工作，并为黑德曼大街10号纳粹党柏林区领导机关配置了警卫岗哨，因为戈培

尔时刻担心冲锋队的袭击。8月30日凌晨，袭击开始了：“施滕内斯的人员”袭击了区领导机关的党卫队岗哨，用棍棒击倒达吕格的人员，砸烂了家具。纳粹党区领袖不得不灰心丧气地请求过去经常被他辱骂的共和国警察出来干预，一队警察逮捕了二十五名冲锋队员，并将他们带走。戈培尔钻进火车，到慕尼黑去向他的领袖报告这次灾难。这位党的首脑也气得神经几乎失常，但随后又强行振作起来。

次日，希特勒站在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副手施滕内斯面前，声嘶力竭地向他发誓，绝不离开党。这位党的领袖走遍一家家酒店，逼着冲锋队继续对他表示信任。1930年9月1日晚，他们在柏林军人联合会之家言归好。希特勒答应，将满足党员施滕内斯提出的一些最主要的要求。对手们和和气气地离开了。

但是，党卫队为自己的领袖对冲锋队进行了第一次打击。从这时开始，希特勒下定决心，放手让党卫队充当党内的警察。一名未来的党卫队领袖也提醒希特勒，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东部地区副手随时都有重新出击的可能。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东部地区的主任医生莱奥纳多·康蒂博士，从施滕内斯总部自愿表示效忠、充当心腹，后来他当了党卫队副总指挥和德国卫生部的头目。1930年9月8日，间谍康蒂报告说：“冲锋队将在他（施滕内斯）的领导下，变成一支同运动及其意识形态毫无任何内在联系的部队。因此，它随时都可能被它的领导人纵容寻衅闹事。这个领导人本身对于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就格格不入，并有意识地拒绝深入研究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

希特勒早已认识到威胁自己地位的致命危险。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普菲费尔本来就打算辞职。希特勒接替了他的职务，宣布自任冲锋队最高领袖，并想起了一个老朋友对他讲过的话：“你只要叫人转告我一声就行了：在某一天早上6点钟率领连队到凯旋门！——到时候我也会在那里。”希特勒召回了待在玻利维亚的恩斯特·罗姆中校。

可是在罗姆还未接到担任冲锋队参谋长召唤之前，希特勒就采取了一次令人瞩目的行动，这一行动多少预示了未来的事情。阿道夫·希特勒在自己党内树立了崇拜领袖的偶像标志：每个冲锋队员必须宣誓永远地、无条件地忠于他，他要求他自己成为党和领导融于一体的化身。1930年9月3日，冲锋队代理参谋长瓦格纳通知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所有副手，要他们“向党和冲锋队最高领袖阿道夫·希特勒个人进行一次无条件的宣誓效忠”。每个冲锋队成员必须宣誓：“不畏艰难，认真执行所有命令，因为我知道，我的领袖不要求我干任何违法乱纪的事情。”——据官方正式说明，这些领袖们都是由希特勒亲自任命的。

阿道夫·希特勒开始在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内实行独裁统治，他一手掌握了在自己党内充当警察的党卫队。需要党卫队的急迫程度超过党卫队自己的预料，因为党内还存在未被领袖崇拜所蒙住眼睛的纳粹党员。

未来的党卫队员康蒂的预言应验了：瓦尔特·施滕内斯内摆好略微后退以便再度扑打过来的架势。由希特勒和新上任的冲锋队参谋长罗姆推行的强化冲锋队中央集权方针，遭到了施滕内斯一帮人的反抗。这一次，达吕格的朋友帕克布施探听到了情况。达吕格表示，只靠了帕克布施的帮助，“我才不断地掌握了施滕内斯的部署情况”。不论在冲锋队东部地区势力范围内进行什么策划，达吕格都能采取对策，间谍帕克布施探悉，施滕内斯正在策划反对慕尼黑领袖的一次大规模反叛，他们只是在等待时机，1931年4月1

日凌晨，时机成熟了。

凌晨，党卫队达吕格就向罗姆报告：“我刚于4月1日凌晨4点半钟收到了一个旗队长副官的电话通知，夜里12点至3点，在东部地区总队长雅恩的主持下，举行了一次绝密的柏林区冲锋队领袖会议。”秘密会议的主要内容是：“由……雅恩传达，4月1日中午起在魏玛的一次会议上，东部地区地区总队长施滕内斯将被我们的领袖阿道夫·希特勒撤职。毫无疑问，希特勒的命令将被拒绝执行，与会的领袖们在会上表示支持施滕内斯，反对希特勒！”

冲锋队员又一次与党卫队员干起来了，党卫队员再次不得不在人数众多的对手面前退缩。施滕内斯的党徒占领了纳粹党区领导机关办公处和纳粹党机关报《进攻报》的编辑部。这场内部暴动迅即蔓延到北德和东德地区。几小时后，易北河彼岸的希特勒冲锋队帝国已趋于土崩瓦解：勃兰登堡、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和梅克伦堡等地直到突击中队长一级的冲锋队领袖，大多数都加入了反希特勒的斗争。韦策尔、费尔蒂恩斯、雅恩、普斯特较、卢斯蒂希、克雷姆泽尔——几乎所有的冲锋队知名人物，无一不在反希特勒派的名单上。只有施滕内斯的亲密朋友曼弗雷德·冯·基林格不在内。德国其他地区的区队长也与施滕内斯保持着距离。

一时，那些给希特勒竞选成功所压倒的民主分子，为一名纳粹领袖向其他纳粹领袖们宣布倒台而拍子称快。施滕内斯撤销了戈培尔的职务，戈培尔解除冲锋队员对于施滕内斯的效忠义务；东德冲锋队“接管了”党，党将冲锋队的叛逆者清除出去。但是，施滕内斯暴动的势头很快就逐渐减弱，一俟冲锋队的金库空虚，这次叛乱也就一蹶不振。希特勒就让人来收拾残局。一个前地下国防军时代惯于私设刑堂的人物和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追随者、斯德丁人退役中尉保罗·舒尔茨担任了重建东部地区冲锋队集团的任务。赫尔曼·戈林清洗了冲锋队施滕内斯的党羽。

但是，希特勒在全党面前明白表示，他把战胜施滕内斯只是归功于他的党卫队的机警。一个党卫队新人、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擢升为冲锋队东部地区地区总队长，希特勒给达吕格的一句题词（经过修改），直到党卫队最后完蛋，都被铸在他们武装带的搭扣上：“党卫队员，忠诚是你的荣誉！”党卫队的地位巩固了。不论希特勒的威信在哪里受到损害，也不论哪里有褐色不顺从分子图谋反对领袖崇拜，党卫队就会出现哪里。希姆莱在一次党卫队领导人会议上趾高气扬他说，“我们不是到处都讨人喜欢，说不定我们干了什么以后，人们会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不可能指望得到别人的感激。但我们的领袖知道党卫队对他的重要性。我们是他最宠爱和最器重的组织，因为我们还从未使他失望过。”

希姆莱发布新的命令，旨在确保党卫队能够迅捷地、悄悄地按照党的首脑委托进行出击。每个地方的党卫队基层单位，均按一条大街或市区某一地段分成若干组，每组有三至五名党卫队员。在值勤前半小时内按组集合，由组长检查，所有组员是否都已到齐，并派人把缺席的人叫来值勤。无故缺席当受到严厉处分，党卫队的值勤守则规定：“一次无故缺席由党卫队领袖给予书面申斥，第二次无故缺席，由队部给予开除出队的书面警告，并责令在集合的全队的面前作自我检查，第三次无故缺席绝对给予开除出队的处分。”一个单位的头头必须经常注意，使他的队员时刻处于戒备和机动的状态。他必须坚持不懈地增加本单位的摩托车和自行车的数量，举行长距离行驶，对

信使进行三十至五十公里距离的传递训练。

但党卫队也同时拉起了一道严密的帷幕，遮掩它的活动。任何人，连党内同志和冲锋队员都不可以了解党卫队的活动。希姆莱的集团开始神秘地将自己隐蔽起来。达吕格命令：“我最严格地禁止党卫队员和领袖们同冲锋队员和领袖们以及普通党员同志们交谈任何有关必要性的目的等等，即使遇到不符合事实的攻击……如果在较小范围的集会上受到攻击，党卫队员可以扼要他说明党卫队纯系执行阿道夫·希特勒的命令。然后保持缄默，立即离开会场。”

在此之前，冲锋队代理参谋长瓦格纳就向党说明，为什么党卫队要按照自己的活动规律行事。瓦格纳说：“党卫队是一种保卫组织，它的任务是，一方面执行运动内部的警察任务，另一方面负责纠察勤务，不使运动的成员违反国家的任何条例和法令。”由此他得出结论说：“党卫队要履行它的义务，就必须完全独立，也就是说，不仅不属于政治领导而且也不受冲锋队领导的制约。”在这种解释的庇护下，党卫队从它建立伊始，就倾其全力以加强一种活动：侦察反希特勒分子和反党人物。

第二节 疯狂与理智

希姆莱在原海军中尉、几个月前刚刚参加党和党卫队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所谓 Ic 部门，后来由这个部门发展成为纳粹最庞大的情报机构：党卫队保安处，缩写是 SD。

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海德里希的表现，说明他是一个搜集情报的杰出能手，使得党卫队日益成为党的最重要的情报组织。连希特勒也认为，只有依靠党卫队才能确保他个人的安全。1932年1月25日，他任命希姆莱为褐色大厦——坐落在慕尼黑布里恩纳街45号那所经过翻修的巴洛夫宫——党中央机关的保安处处长。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的114/32a号命令指出：“党的整个办公机关褐色大厦和附属建筑物的保安工作，由党卫队全国领袖负责领导，冲锋队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队的区队长和党卫队慕尼黑第一旗队的旗队长，向党卫队全国领袖报送经过挑选的冲锋队员和党卫队员的名单。”冲锋队全国领袖的命令指示希姆莱立即采取措施，“防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者的侵犯和制止警察的袭击”。希姆莱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一桩阴谋行刺事件就震动了褐色大厦，无疑，这桩行刺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不是坐在敌党的司令部中，而是坐在这座褐色大厦的办公室里。这次事件的发生，说明了希特勒在党内的专断地位还远未达到无可争辩的程度。施滕内斯的乱子提出了一个问题，希特勒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置冲锋队领袖们的观点于不顾，新的闹剧提出了问题，希特勒是否敢于无视党的最后一点道义上的考虑。因为新事件究其原因是，阿道夫·希特勒容忍了一个人，这个人纠集一帮呶玩男宠的家伙统治着冲锋队，将民族社会主义的革命队伍堕落成为伤风败俗的名利场。这个人就是冲锋队的新任参谋长恩斯特·罗姆。

罗姆从来就不掩盖自己的倾向。他说：“我事先说清楚，我不是个善良的人，也不指望跟善良的人为伍。”他反对国家试图“通过法律以调节人类的本能，或将其引向其他轨道”，并针锋相对地提出里查德·瓦格纳的话：“狂想、狂想，到处都是狂想！”他还傲慢地对一位知名的民族社会主义人士的抨击进行反驳。他私下跟柏林医生海姆佐特博士说：“我跟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先生这个愚蠢的道学运动家势不两立。他的文章首先是指向我的，因为我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由此你可以看出，‘人们’和我在一起就非得习惯

于民（族）社（会主义）圈圈的这种罪恶特性不可。”

自从罗姆告发一个名叫赫尔曼·西格斯蒙德的柏林舞男偷窃一只箱子后，他那伤风败俗的本性就在法院里无人不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25年1月13日晚，罗姆在柏林马里恩俱乐部邀西格斯蒙德喝啤酒，接着就按惯例干那种见面叙谈之后少不了要干的勾当。西格斯蒙德的供词说：“在我们还穿着衣服坐在旅馆房间里的时候，罗姆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香烟盒，我发觉有一张纸条掉在地上，就把它拾了起来。约莫半小时后，我离开旅馆的房间，因为罗姆先生要求跟我进行一次令人恶心的性交被我拒绝了。到了街上，我才看清楚，我在房内检到的纸条是罗姆先生的一张行李票。”西格斯蒙德领取了这只箱子，发觉里面装着一包令人讨厌的信件。

希特勒也不是不了解罗姆的本性，但他执拗地认为，这纯属个人私事。罗姆刚就任冲锋队参谋长职位，冲锋队全国最高领袖希特勒就在一项命令中通知党：冲锋队“不是培育名媛淑女的伦理学院，而是一支强悍战士的队伍”，他认为控告“纯属私人范围”的人所难免的习性，是“要求过于苛刻，而予以彻底、严厉驳回”。

罗姆寻欢作乐决不仅限于“私人范围”。冲锋队不仅满足了他的政治野心，而且满足了他的色欲。冲锋队里的心腹队员为他们的参谋长四处寻觅合适的对象，并且只要罗姆的一个宠儿流露出不忠实的迹象，冲锋队的行动队就棍棒交加地把他活活揍死。商店职员彼得·格兰宁格从1928年起就是罗姆的男宠，并为他奔走物色对象，被安插在冲锋队情报处里用以掩人耳目。他每月领取两百马克的报酬，以专门为罗姆物色新的对象，他在慕尼黑吉泽拉高级理科中学前面安下据点，猎取和挑选牺牲品。随后把他们介绍给罗姆，先后总共介绍过十一名学生和学徒。同时，罗姆的另一些臭名昭著的朋友，也混到了由于施滕内斯叛乱而空缺的冲锋队高级职位上。罗姆在慕尼黑“格勒克尔熏香肠铺”有经常光顾的固定餐桌，是格兰宁格一帮人和具有相公癖的冲锋队领袖们聚会的中心。

像“格勒克尔熏香肠铺”店主卡尔·策恩特在格兰宁格家里（天文台大街24号二楼，靠近托布勒）侍候格兰宁格一样，新上任的柏林冲锋队领袖埃德蒙·海因斯也是罗姆固定餐桌上的老伙伴。他在1927年曾因搞鸡奸而被希特勒开除出冲锋队。而柏林冲锋队新上任的参谋长卡尔·恩斯特，则又是原火线分部上尉勒尔拜因的老相好，勒尔拜因本人又跟罗姆在柏林“克莱斯特俱乐部”和“侧面黑影像”等搞鸡奸的饭店的固定餐桌上碰头。但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驱散这一帮性变态的冲锋队领袖。希特勒在对待人们责问罗姆的所作所为时，就以参谋长的鸡奸行为查无实据为遁词，并表示倘使有人向他提出确凿证据，他将作出结论。

这方面的证据一般都被罗姆及其所纵容的一支密探队毁掉了。虽然如此，罗姆的信件还是于1932年3月起开始被披露于众。首先是社会民主党的《慕尼黑邮报》公布了罗姆有关鸡奸的信件。罗姆的一帮朋友为此惊恐万状。每个稍微规矩点的冲锋队领袖，都被怀疑打字复制了信件，并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前国会议员赫尔穆特·克洛茨博士等民族社会主义的反希特勒派。罗姆被弄得晕头转向，竟派他的密友、冒险家、新闻记者格奥尔格·贝尔去执行一项对一个民族社会主义分子来说极其罕见的使命。贝尔也为社会民主党人提供纳粹党的情报，每月获得三百马克的进项，他不得不去找前少校卡尔·迈尔。1919年，迈尔曾和罗姆一起发现了希特勒这个政客，但后来又转向了民

主派。

迈尔现在属于忠于共和的国旗队领袖，国旗队在最后一分钟还想阻止纳粹势力的增长。贝尔跑进马格德堡国旗队办事处去找迈尔，叫少校保证社民党报纸不再披露有关罗姆的信件。贝尔后来说：“迈尔对所有情况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罗姆也“告诉我，肯定那些混蛋想把我们置于死地”。可是不管将罗姆的信件投寄给报馆的“混蛋”是谁，——罗姆的褐色敌对者还是想按他们的方式解决问题。当希特勒再次拒绝开除他的朋友时，党内同志就自己动手采取措施了：党内最高法官、民族社会主义的鼓吹者布赫亲自拟定计划，暗杀冲锋队参谋长及其四名最重要的同事。

前少校布赫小心翼翼地着手工作，他想起了党了早期时代的一个老朋友，轮箍厂老板和原冲锋队旗队长埃米尔·特劳戈特·丹蔡森。他过去和丹蔡森在巴登建立了纳粹党组织。布赫告诉他，传说党内出现叛逆情况；冲锋队旗队长乌尔将冲锋队整个秘密工作人员联络网向警方告了密，在罗姆的心腹杜·穆林—埃卡特和施普雷蒂两个冲锋队伯爵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打算攫取所有权力，同时由于他们的鸡奸丑行玷污了党的声誉。

丹蔡森领会了少校的暗示，并想到了自己的几个嗜杀成性的伙计。他组成了一个暗杀小组，委派一个遭到排挤的建筑师卡尔·霍恩当组长。丹蔡森为取得事件发生时本人不在场的辩解理由，已赴奥地利。1932年3月16日，霍恩获得丹蔡森以“维兰德第二”为化名发出的有关采取行动的详细书面指示。霍恩谈到：“行动要点：50号房间办公的杜·M·伯爵系175。此人对其上级R.影响极大，由来已久，两人将由一个贝尔先生挟持，希姆湖畔格罗滕米尔，应以相同方式处置在同屋的参谋部头目乌尔。”由冲锋队军乐手格林施带八名队员伺机用铁锤将贝尔击毙，并把他吊起来，标上一个字。接着就轮到罗姆。丹蔡森告诉格林施：“伙计们，要尽你们的职责，可别忘了参谋长！祝伙计们好运道。w.l。”

但是，现在希姆莱插手干预了。褐色大厦的保安处处长试图保护罗姆，使他免遭布赫的游击队的伤害。1932年3月24日，希姆莱——如霍恩所记——“逮捕了布赫少校，进行讯问，从而使事情收场了结”。可是罗姆并不相信希姆莱的这套安抚术。他和贝尔逃往柏林，去跟政敌商量对策，4月1日，罗姆和他过去的战友迈尔会晤，向他索取控告冲锋队改组者保罗·舒尔茨的材料。罗姆错误地判断舒尔茨系谋杀的幕后策划人。八天后，贝尔跑到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编辑部，又一次讲述了谋杀经过的始末。《前进报》主编弗里德里希·施坦普费尔记下了贝尔的故事：“他们的旅行是出逃，因为他们……将会被他们的自己人杀害。贝尔，他是接受委托将计划告诉我们的，如果计划真的实现的话，好让全世界知道这些罪人。”

希姆莱的影子又一次出现了，这一次是在罗姆逃到柏林的住所里出现的。党卫队头子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已无法使其具体地见诸于文字。但是希姆莱显然懂得如何劝说冲锋队参谋长返回慕尼黑。当然，保安处处长希姆莱也不可能阻止党内的丑行公之于众。冲锋队的两位伯爵杜·穆林和施普雷蒂神经错乱，跑到警察局，控告他们的党内法官布赫及其助手。埃米尔·丹蔡森于1932年10月以主谋暗杀罪被判六个月徒刑。布赫和霍恩的卫队免于处分。

丹蔡森案件和随后不久的一起党指控《慕尼黑邮报》犯有侮辱罪的诉讼，

使一个空前污浊的沼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其讽刺性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臭名昭著的冲锋队领袖们求救于迈尔少校周围的维护民主的卫道士，以对付自己营垒里搞暗杀的党内法官。“这可真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布赫的女婿、心腹马丁·鲍曼怒不可遏地叫喊道：“党内最有名望的领导人之一，在一位具有同样名望的最厉害的敌对者领导人面前进行咒骂，并且……将同样是领导人的自己党内同志骂作混蛋。”但是从褐色沼泽里腾起的霉烂气味越是刺鼻难闻，党员同志的目光就越是贪婪地投向海因里希·希姆莱集团。1932年10月5日，鲍曼对希特勒的秘书鲁道夫·赫斯说：“您看看党卫队吧，您真是了解希姆莱，您就知道希姆莱的才能。”

党外人士也开始预感到，为数达五万人的党卫队是一支冷酷无情的清教徒部队，它已作好准备，向一群粗野的、堕落的、搞鸡奸的冲锋队领袖的乌合之众进行挑战。那么，1931年6月13日，希姆莱向他的党卫队领袖们是怎么说的呢？希姆莱说：“也许还要过几个月，也许只要过几天，就要作出决断了。我们将站在我们领袖给我们指定的岗位上。”党卫队在等待他们断然出击的时刻，这日子不会大长了。1933年1月30日已经临近。德国未来的地平线上升起了刀光剑影的黑色夜幕。不过还不清楚，黑夜将属于谁：属于冲锋队，还是党卫队。

第三节 冲锋队领袖扬言要除掉希特勒

当希特勒的独裁政权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纳粹党头上乌云密布，一时又呈现紧张状态，究其原因，是由于三个互相关连的问题没有解决所造成的。这就是党和冲锋队“激进派”领袖继续叫嚷“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冲锋队和陆军之间的冲突问题；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问题。随着春天的到来，兴登堡的身体愈来愈坏，总统生命的垂危，更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矛盾。

冲锋队现在已经扩大到二百五十万人，它的参谋长罗姆并没有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内阁阁员或“元首”在元旦给他友好的亲笔信而就此罢休。他在2月间，正式向内阁建议，以冲锋队为一支新的人民军的基础，而将军队、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其含意很清楚，这个国防部要由他来担任部长。在军官团看来，再也不想象不出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主张了，军官团的高级成员们不但一致反对这个建议，而且要求兴登堡支持他们。如果罗姆和他的褐衫队员控制了陆军，军官团的整个传统就要毁掉了。此外，这些将军们听到关于这个冲锋队头子周围一批人腐化堕落的传说，更是大为震惊。他们坚决主张，不能允许盗用公款者、酗酒闹事者和乱搞同性恋者参与重整军备的大事。

当时，希特勒还不能得罪陆军，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2月21日，还密告来柏林讨论裁军僵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他愿意把冲锋队裁减三分之二，同意实行视察制度以保证留下来的人不受军事练习，也不武装。这个建议泄露以后，更加促进了罗姆和冲锋队的怨恨，随着1934年夏天的来临，冲锋队参谋长和陆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内阁中，罗姆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常常发生激烈争吵。3月间，这位国防部长向希特勒抗议说，冲锋队正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勃洛姆堡将军指出，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由于它做得过分公开，也威胁到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

而在冲锋队集会的酒店里，也充斥着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怨言。如同1931年施滕内斯暴动前一样，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口号：“阿道夫背叛了我们！”

所有冲锋队领袖都感到，受到多方赞扬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军冲锋队，已变成了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给冲锋队鼓动干劲，叫它为夺取政权这一天作好准备；可是当这一天和平地、表面上也完全符合宪法地来到时，党就不清楚该如何对待冲锋队了。人们终于给它提出一项令人放心的任务：负责“训练”青年，并和国防军配合组成一支强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军队。

从冲锋队成立时起，参谋长罗姆就把它视为一支新型德国军队的胚芽。“我是新型军队的香霍斯特，”他常常这样自我吹嘘，但这句话的后面掩盖着他的苦恼是，那些旧军官傲慢地不愿与他同伍。兴登堡总统拒绝跟他握手，这位陆军大元帅认为他既是一个有相公癖者，又是一个军人的叛逆，总而言之，是个靠不住的人。罗姆连长亲身经历过西线战场上的持久阵地战，体会到旧普鲁士军纪规章已不适应于现代战争。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必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一种新的纪律，一种新的组织原则。将军们都是些老傻瓜，他们想不出任何新的主意。”他自以为有了新的主意，即组织民军，人民军思想。他的冲锋队就是新型的人民军。这支军队只需战斗力强，只需进行现代化的革命战争训练——之后，这一时刻就来到了：冲锋队接管国防军，并将他这个改革家恩斯特·罗姆一举送上统率新德国的新型国防军的权力高峰。

新型的人民军干部早就存在。罗姆指挥着一支五十万人的大军，单从数量上说就五倍于国防军。党的这支军队分成五个冲锋队副总指挥大区（军区）和十八个地区总队（集团军）。罗姆领导着一个参谋部，由过去的军官担任其中的要职。事无巨细，罗姆都仿效军队的那一套。“巡视军官”负责检查冲锋队各突击队的执勤，冲锋队执勤条例模仿军队中的规章制度，冲锋队各旗队均沿袭前皇家军队的团一级番号。

冲锋队领袖们愈是自信地发号施令，指挥这支褐色大军，国防军也就愈是眼红地注视着罗姆的军事表演。职业军人们发觉，一旦国防军摆脱了几尔赛强加于它的军备限制的束缚和恢复义务兵役制，冲锋队将是理想的预备兵源。希特勒指令这两支力量结合起来。但是罗姆碰上了一个对手，这个人可不是他所想象的“老傻瓜”，而是国防军中具有最现代化思想和最果断的军官之一。

这个对手名叫瓦尔特·冯·莱希瑙少将，他是运动爱好者和炮术专家，又是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尽管他右眼夹着单片眼镜，但却嘲笑普鲁士德意志军事传统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许多保守派的同事都认为他是一个功名心切的野心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是纳粹党员，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前国防军第一号高级军官、现任国防部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陆军大将，早在1933年以前就受到希特勒的信任。虽然冯·莱希瑙将军一开始就胸有成竹：必须将冲锋队有用的军事力量纳入国防军，必须遏制罗姆危害军队的野心；但为了使罗姆上钩，除了迁就冲锋队外别无他法。

莱希瑙提议，冲锋队首先着手进行的重要任务，是负责抓民军以扩大国防力量的工作。特别是作为东部屏障的国防军的兵力奇缺，因此需要建立起一支对付波兰的所谓东部边防部队，它事实上是作为一种民军形式列入计划的——据莱希瑙解释，东部是冲锋队大军的用武之地。此外，由冲锋队在国防军帮助下，对一切非武装部队团体进行入伍前的军事训练。

1933年5月中旬，冲锋队和国防军缔结了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冲锋队、

党卫队以及德意志民族党的前线战士团“钢盔团”，均隶属国防部领导。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被擢升为冲锋队训练处（AW）处长，并奉命领导一个由国防军教官组成的班子，每年训练二十五万名冲锋队员，作为日后国防军的后备力量。同时，由罗姆负责将各右派政党的军事团体，特别是纪律性强和人数众多的钢盔团并入冲锋队。不过莱希瑙对钢盔团却有自己的打算的。

将军怂恿钢盔团领袖西奥多·杜施特堡把尽可能多的钢盔团成员塞进冲锋队。莱希瑙的作战计划是：让一百万名钢盔团成员集体加入冲锋队，这样就能通过人多势众来控制罗姆的冲锋队；如果再加上委派国防军军官担任训练处和边防部队里的要职，罗姆也就会被制服了。莱希瑙的盘算看来一开始进行得不错。克吕格尔的训练处和东部边防部队中的要职都被旧军官或现役军官占去了。但钢盔团未能顺利地打入冲锋队，罗姆对接纳工作考虑得很周到，他把冲锋队分为三部分，作用各不相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谓现役冲锋队——他安排了五十万名冲锋队员，而只吸收了三十一万四千名钢盔团成员。

现在罗姆可以号称拥有一支四百五十万人的浩浩荡荡的队伍了；他随即转守为攻。他要求扩大势力和掌握东部边防部队中的有职有权的领导位子。尤其是他还要求控制国防军认为最不能让别人碰的东西——德国东部地区的军人库。罗姆的要求触犯了德国将军们的铁的信念：除国防军外，决不允许国家还有任何其他武器持有者。国防部决定，发誓不再跟罗姆的民军思想挑逗调情。从1933年12月起原则上国防军只承认一种国防组织形式，即普遍义务兵役制。

但是罗姆继续走自己的路子。他于12月1日被任命为不管部长，立即指示冲锋队各副总指挥大区建立本部武装警卫，甚至拉拢外国参与其事：由于法国首先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同意德国加强民军部队，罗姆自作主张地同法国驻柏林大使馆武官商炎。1934年2月初，他还把自己的要求书面通知国防军。他的备忘录措词强硬，致使勃洛姆堡在一次司令官会议上不得不作出这样的结论：罗姆要求以全部国防领域作为“冲锋队的地盘”，叫国防军只是抓训练工作。

冯·勃洛姆堡大将随即提请希特勒裁决，逼使希特勒作出过去一直回避的抉择。从感情上说总理是倾向于罗姆的方案，不过他也知道，要是没有军事专家，他就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对外扩张计划。然而对希特勒来说，再没有比冲着他的朋友罗姆讲“不行”这两个字，更难于启齿的了，他试图调解：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将国防军和冲锋队双方的领袖请到国防部大理石会议厅，向他们作了一次“激动人心的”（勃洛姆堡语）讲话，要他们保持和好。在他的督促下，勃洛姆堡和罗姆不得不达成一项协议，确认国防军是第三帝国唯一的武器持有者，并同意由冲锋队负责抓入伍前和退伍后的军事训练。在施坦达尔腾街罗姆的柏林总部举行的一次香槟酒早宴上，冲锋队和国防军双方的头目戏剧性地握手言欢。

但是，军官们刚刚离席，罗姆就骂开了：“可笑的下士宣布的那一套，同我们不相干。”他越来越气急败坏地咆哮道：“我才不会按协议办事呢，希特勒言而无信，少说也得去休假。”还更凶狠他说道：“要是希特勒不愿一起干，我们就撇开他来干。”在场的一位冲锋队副总指挥，听了罗姆酒后大放厥词，反对亲爱的领袖，吓得目瞪口呆。退役中尉兼汉诺威冲锋队副总

指挥维克多·卢策嗅出了大逆不道的气味。

第四节 希姆莱觉得非杀不可了

1934年3月初，卢策找到了“领袖副手”鲁道夫·赫斯，并悄悄地向他报告了罗姆骇人听闻地发表反对领袖的言词（“阿道夫胡说八道”）。但赫斯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卢策并未就此罢休。他专程去伯希特斯加登向希特勒作了报告。他还揭发冲锋队中存在的对第三帝国领导的所有不满情绪。但希特勒也只是含糊其词地劝慰说：“我们还得让事情成熟了再说。”由于希特勒对自己的朋友罗姆不采取任何措施，卢策便又托付一个第三者，将一封信送给当时正在布劳恩费尔斯进行野营训练的冯莱希瑙少将，卢策在信中提醒参谋长警惕一次新的反国防军运动。莱希瑙感谢副总指挥给予这样宝贵的指示，等送信的冲锋队员走远了以后，嘲笑他说“卢策这家伙并不危险，好当参谋长。”

抨击罗姆的卢策并不知道，冯·莱希瑙将军连日来正跟一名党卫队旅队长合计着，这个旅队长对一举解决罗姆问题已有周密设想。秘密警察处长兼党卫队保安处（SD）处长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决心消灭以罗姆为中心的整个领导集团。他好久就争取海因里希·希姆莱支持他的斩草除根的计划。党卫队全国领袖犹豫不决，这种踌躇却说明了心里存在阴郁的预感：消灭罗姆就是打开了一个潘朵拉魔盒，其恶果将使党卫队和冲锋队再无安宁之日。

希姆莱仿佛对即将到来的事变已有预感，他跟罗姆的对手敬而远之。这个早先的后补军官，对他同罗姆在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难以忘怀。即使在民族社会主义年代的最初几个月里，希姆莱也不能设想不再和罗姆紧密来往，他们一道发表夸夸其谈的演说，一道在罗姆的柏林住所欢宴。他们一道策划过罪恶勾当：海德里希同冲锋队旗队长乌尔合作，武装起一支行动队，于1933年4月3日潜入奥地利，在杜希霍尔岑附近一家旅馆里，杀害了失宠于罗姆的参谋长心腹格奥尔格·贝尔。去年罗姆过生日（1933年11月23日），希姆莱“以军人和朋友”的身分祝愿他“事事将得到忠实的部属的支持。能够一直作为你最忠实的朋友，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无上的骄傲”。他们两个还是海德里希第一个孩子的教父，即使1934年2月28日罗姆在柏林施坦达尔腾街发表反希特勒的长篇言论引起震惊之后，希姆莱还试图使冲锋队头子对希特勒和国防军持重相处，避免任何轻率行动。

但是，希姆莱对罗姆一再表白的忠诚，在1934年春出于机会主义的考虑而动摇了：他感到，与戈林新缔结的同盟，其重要性超过和老上司的关系。因为这个同盟是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攫取普鲁士秘密警察的基础。从这里出发，一条道路直接通向海德里希的歼灭计划：没有戈林就无法掌握秘密警察，不疏远罗姆就不能同戈林合作。而普鲁士总理赫尔曼·戈林，是民族社会主义所有显要人物中最害怕罗姆冲锋队的一个人。罗姆以其各地任警察局长的冲锋队成员和各级地方政府首脑身边的顾问的冲锋队成员威胁着戈林在普鲁士的内部权力，同时阻梗着戈林充当国防军统帅的长远目标。

希姆莱改变初衷。这个谨小慎微的人所以能轻易地反戈一击，是由于轻率的罗姆同政权的几乎所有实力集团都闹翻了，各个集团都巴望罗姆集团的覆灭，从摧毁冲锋队中捞到好处：国防军和戈林摆脱了一个讨厌的竞争对手，党阀们和卫道士们除掉了一个声名狼藉。作恶多端的捣乱分子，党卫队则可以最终使自己挣脱冲锋队的约束。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置人死地的演出开始了，因为希姆莱非杀人不可

了。纳粹党产生于自由团和暗杀时期，本身就是以从事犯罪活动作为政治手段；像这样的政党，对于无法解决的党内分歧，除了求助于暴力以外，再也找不到别的更好办法。“暗中干掉一个人，我们并不认为是什么悲剧。这种做法本身就是我们组织的一部分工作，”格奥尔格·贝尔有一次谈到过这样的哲理，当时冲锋队凶手们还没有亲身体会证实他的论点的正确性。“我们说这是自卫，你们则说是——谋杀。如果出于道义的原因，为了党的利益而干掉一个人，我认为没有什么不正常。”

联系罗姆的情况来看，这就意味着：只有处死一个参谋长，才能确保执政者高枕无忧，再也不用对冲锋队担心。罗姆这个人希特勒最早的和唯一的朋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了解纳粹内幕。如果按正常的办法将罗姆撤职，或是对这个在国内带头搞同性恋的家伙进行公开审判，那是不可能使掌权的领袖们放心的。罗姆非死不可！

显然，希特勒知道，兴登堡总统本人和陆军以及德国其他保守势力，都赞成在总统去世后立即让霍亨佐伦王室复辟，而他自己却另有打算。早在4月间，当希特勒获悉总统命在旦夕时，他就意识到必须采取大胆的行动，要在友谊和野心之间作出抉择。为了确保这一行动的成功，他需要军官团的支持，而为了取得这一支持，他准备作出几乎任何让步。

同陆军进行秘密商谈的机会不久就自动出现了。4月11日，希特勒在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陆军总司令弗立契将军和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上将的陪同下，乘巡洋舰“德意志”号从基尔出发，前往柯尼斯堡参加在东普鲁士举行的春季演习。希特勒把兴登堡病危的消息告诉了陆海军司令后，直率地提出，要在国防军的支持下，由他来继任兴登堡为总统。为了报答军方的支持，他答应压制罗姆的野心，大大裁减冲锋队人数，保证陆海军继续做第三帝国唯一拥有武器的组织。据说，希特勒还向弗立契和雷德尔指出了陆海军大事扩充的前景。对于一味讨好奉承的雷德尔来说，他愿意支持希特勒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弗立契是个比较难办的人，他先要征求一下他的高级将领们的意见。

这次意见征求会是5月16日在瑙海姆浴场举行的。在把“德意志号协议”告诉他们以后，德国陆军高级军官们一致赞成希特勒为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这个政治决定使希特勒的独裁统治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顽固的老元帅去世以后，在霍亨佐伦王室复辟的可能性被消除了以后，一旦他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时，他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爱怎么于就怎么干了。他为了取得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付的代价不过是牺牲冲锋队而已。现在他育了一切权力，他就不再需要冲锋队了。冲锋队是一群乱哄哄的乌合之众，它的存在只会令他感到难堪。

但是，夏天来临后，希特勒的困难还远远没有克服。柏林笼罩在一种不祥的紧张气氛中。“第二次革命”叫得更响了，不仅罗姆和冲锋队的领袖们，甚至戈培尔本人，在演讲中和他所控制的报纸中，也发出这种叫喊。而保守的右派、巴本和兴登堡周围的容克地主和大工业家们，则要求停止革命，要求停止任意捕人、迫害犹太人、攻击教会，要求限制冲锋队的专横行为，要求消除纳粹党所制造的普遍恐怖。

秘密警察兼党卫队保安处头子海德里希于1934年4月底着手进行工作。希姆莱出发巡视各地党卫队旗队，布置党卫队作好准备向冲锋队出击；海德里希安装起扼杀罗姆手下爪牙们的绞索。首先，他需要取得对冲锋队领导采

取行动的充分理由。整个5月，海德里希都在搜集材料，好叫希特勒和国防军相信所谓的罗姆叛国计划。

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弗里德里希—威廉·克吕格尔当时身穿冲锋队副总指挥制服，作为训练处长，在冲锋队各副总指挥大区 and 地区总队派有“动员代表”。海德里希就通过他的情报机构收集罪行材料。任何反冲锋队的材料，任何反罗姆的帮手，都受到欢迎。党卫队一个有名望的朋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将军、冲锋队名誉领袖弗里德里希·冯·德·舒伦堡伯爵也参与了阴谋活动。就连反对纳粹的威廉·亚当中将（施莱彻尔派军官，当时任驻慕尼黑第七师司令，给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毛切尔提供有关冲锋队的情报）的帮助，海德里希也不加拒绝。

可是，搞到的材料相当单薄。除了冲锋队在柏林、慕尼黑和西里西亚等地军火库的一些情况外，为海德里希收集材料的人，只揭发了几个冲锋队领袖声称要以血腥手段进行革命的胡言乱语，这些还不足以构成叛国罪的论据。有些间接证据甚至倒说明冲锋队不可能反叛希特勒。布雷斯劳城防司令冯·拉本瑙上5月初判断说，冲锋队发难一说是难以置信的；西里西亚冲锋队长海因斯听到戈林说国防军无意（海因斯担心这一点）进攻冲锋队，他当即让他本部警卫的一半人员去度假。

相反，罗姆倒认为，他的职责是激励警察和国防军对付政权的敌人。他派冲锋队旅队长于特纳去国防部，告诫人们当心前总理库特·冯·施莱彻尔将军对现政权搞反叛活动——就是后来一些所谓罗姆暴动野史的作者将其升格为参谋长共谋犯的那个施莱彻尔！“我活着是为了我的领袖，”独臂冲锋队领袖汉斯·彼得·冯·海德布雷克冲着作家恩斯特·冯·扎洛蒙大喊大叫，因为冯·扎洛蒙讽刺了希特勒。海德布雷克说：“想到他（希特勒），这是使我活着的唯一力量。如果我不再相信我的领袖，那我情愿一死。”几天后，当他心目中的偶像将他依军法处决时，这个冲锋队员在行刑者的枪声中发狂地吼叫：“领袖万岁！希特勒万岁！”

罗姆没有看到，即使最善良的德国人也对他的这些搞法感到畏惧：冲锋队大军在准备夺取德国政权了。军人也必须把罗姆看成死敌——他们对参与海德里希的勾当不无兴趣。国防部谍报局长海军上校康拉德·帕齐希感到“简直令人毛骨悚然”，“那些作恶多端、不务正业的坏家伙”竟想把国防军从它传统的席位上挤走。这种思想是不难理解的：必须干掉冲锋队。多数军官和布雷斯劳城防司令抱有同感，他曾坦率他说，即使没有查出冲锋队举行暴动的计划，清除褐衫队这个“奥吉亚斯牛圈”也是当务之急。

同样，国防部首席政治战略家冯·莱希瑙将军的话也一点不含糊，他把海德里希视为情投意合的伙伴，是经常出入秘密警察处的常客，给党卫队保安处长提供营房、武器和运输工具，来进行这次重大作战行动。他在1932年向菲立克斯·施坦因纳上尉（后来是武装党卫队将军）作过怎样的预言呢？莱希瑙评论冲锋队说：“告诉您，他们总有一天会对我们低声下气的。”海德里希的行刑队业已组成，准备实现将军的预言。

第五节 制定死亡名单

6月初，希特勒同罗姆摊了牌。据希特勒后来在国会所作的报告，这次摊牌持续了五个小时，“一直拖到午夜”。希特勒说，这是他想要同他的运动中最亲密的友人达成谅解的“最后一次尝试”。

也在6月初，达豪集中营长官、党卫队区队长西奥多·艾克的部队，经

过精心策划的演习，准备打击罗姆的冲锋队。当时艾克就带领自己的部队排练了6月30日的演出：出其不意地对慕尼黑、勒希菲尔德和维西浴场发动进攻。几乎在同一时候，慕尼黑党卫队各部队准备行动。党卫队第三摩托突击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马克斯·米勒，奉命组织好队员，检修车辆，待命迅速投入行动；米勒的突击队的任务是，在调日这一天到距慕尼黑巴伐利亚政治警察处不远的土耳其兵营集中。同样，在利奥波德街10号党卫队南德大区保安处办公室里，也发出了准备信号。

从南到北，自西向东，海德里希调动起他的部队，他估计有四个大规模冲突的重点地区：巴伐利亚、柏林、西里西亚和萨克森。包围圈越来越紧缩，冲锋队却还蒙在鼓里，毫无觉察。保安处头子紧张活动，进入准备工作的最后阶段。应该给谁以致命打击呢？海德里希派出心腹四处追踪罗姆的密友，指示心腹们制定杀害对象名单。

还在4月底，艾克就提出了一份所谓全国“不受欢迎的人”的名单，作为定于X日的消灭对象。显然，列入这份名单的人几乎全是冲锋队领袖。可是海德里希随即就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既然动了手，那就索性乘此机会把最危险的政敌也一起干掉！周复一周，海德里希的处死对象名单越来越长，几乎所有各大区保安处都制定了枪杀名单，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提出的对象一增再增。保安处机关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伊尔格斯是一份处死名单的制走者，他问一个熟人说：“您知道什么叫嗜血成性吗？我现在感到，可以在血洗中为所欲为了。”

制定处死名单变成了局内人角逐死人的游戏。各人都有一张：戈林提了一张，纳粹党巴伐利亚区领袖瓦格纳提了一张，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争相挑选处死对象。很快它们就对这个或那个是否真正需要予以消灭争执不休。巴伐利亚保安处头子瓦尔纳·贝斯特想勾掉“正派和忠实”的冲锋队副总指挥施奈德休勃的名字，而海德里希则认为这个冲锋队队员“像其他冲锋队队员一样危险”。戈林相反删去了他过去的秘密警察头子狄尔斯的名字，而狄尔斯自己却提出了另一份名单。

这时秘密警察处接到一个报告，打乱了海德里希精心安排的时间表。希特勒和罗姆出人意外地一致同意延期解决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问题，6月4日，他们俩举行了一次长达几小时的会谈，同意从7月1日起给冲锋队员休假一个月。此外，1934年6月8日《人民观察家报》登载了冲锋队总部新闻处一份引人注目的公报，公报中说，参谋长接受医生的劝告因病需要休假（去维西浴场碘疗）多周。接着还有这么一句奇怪的话：“为了一开始就防止因此而可能产生的种种误解，参谋长授权声明，他在恢复健康后将继续全权担任他的职务。”

罗姆同时又发出一个强硬的警告说：“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在必要的方式下，他们会得到答复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脉。”

国防军松了一口气，它的将军们感到似乎罗姆吃了一次败仗。罗姆在“斗争时期”的老伙伴、陆军大学的赫尔曼·赫夫勒上尉把“陆军决策机关内存在的看法”告诉了他：“新闻公报的头一点内容（关于罗姆的病情）最清楚他说明参谋长的地位已经动摇，对此，即使后来作出如下……声明，也不会有任何改变。”

陆军稍感宽慰，但是海德里希却惴惴不安，新的情况发展使他没有很多时间了，因为诬告正在休假中的冲锋队搞政变，那可不好办。柏林冲锋队领袖恩斯特已考虑好乘船去加那利群岛旅行，冲锋队总部政治处头目、地区总队长格奥尔格·冯·德滕准备去巴特维尔东根旅行度假——哪有什么风暴将临的暴动呢？海德坐希要想在为时还不太晚的当口上演出这场冲锋队好戏，就得迅速行动，计划已经拟就，凶杀队已经组织好了，但存在着一个把握不定的因素：希特勒的反应，他刚刚还同罗姆达成了协议，看法尚不一致。

6月17日，希特勒的副总理、中央党的叛徒弗朗兹·冯·巴本，爬上马尔堡大学马克西蒙大教室的讲台，痛斥“一切假德国革命之名，行营私利己、寡廉鲜耻、弄虚作假、庸俗卑劣和专横跋扈之实”的行为。在大学生们的掌声中，巴本高声发表不同政见，提出警告说：“残暴混淆了活力……任何一国人民都经受不住无休止的自下而上的暴动……用恐怖手段代替法治……德国人的新国家将以基督教立国还是沦为宗派主义或半宗教性质的唯物主义，现在是应该作出抉择的时候了。”

举国一片“赞同的吼声”（巴本语）使当权者们看到，在保守的资产阶级中，还盘踞着一群没有被一体化的压路机所碾平的反对派。巴本演说引起的反响已经够清楚的了，虽然宣传部立即禁止报纸刊登这篇演说。希特勒起了很大的疑惧：如果冲锋队里的不满分子跟资产阶级中的不满分子勾结起来，这怎么得了？秘密警察暗探已经看到闪现在两个营垒之间刚搭上的线路。

这个威胁显然使希特勒感到担心，因为他听说总统对目前局势感到很不高兴，正在考虑宣布戒严令而把权力移交给陆军。为了要估量一下这个危及纳粹政权继续存在的危险和严重程度，希特勒第二天即6月21日飞到了纽舍克去见兴登堡。他所受到的接待只有使他更加担心。接见他的是冯·勃洛姆堡将军，他立刻看出，他的这位国防部长平常对他的卑躬屈膝的态度已经突然变了。相反，勃洛姆堡现在成了个严厉的普鲁士将军，他硬梆梆地告诉希特勒，他奉老元帅之命告诉希特勒，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态迅速过去，总统将宣布戒严令而把国家的控制权交给陆军。当希特勒获准在勃洛姆堡陪同下见到了兴登堡，老总统在短短的几分钟里也证实了勃洛姆堡传达的最后通牒。

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不利的转折。不仅他继任总统的计划受到了威胁，而且如果陆军接管国家的话，他个人和纳粹党政府也将完蛋。他在当天飞返柏林时，暗自考虑，如果要生存，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履行对陆军的诺言，镇压冲锋队，停止冲锋队队长们所要求的“继续革命”。显然，有着兴登堡总统的支持，将军是不肯接受比这个还低的让步的。

次日，维克多·卢策在汉诺威接到一个电话；电话是希特勒打来的，他命令这个罗姆的告密者立即来总理府。卢策记述道：到达总理府后“领袖立即接见我，将我带进他的办公室，握着我的手要我郑重宣誓，在整个事情未解决以前保持缄默”。接着希特勒向这个冲锋队队员介绍了“整个事情”：罗姆必须撤职，因为冲锋队内部多次举行了领导人会谈，罗姆亲自在场，决定武装冲锋队并命令它向国防军攻击，以便将所谓成了国防军俘虏的他这位领袖从军方手中解救出来。“领袖说，他一开始就知道我没有介入这件事情，”卢策在日记中写道，“叫我从现在起不再执行慕尼黑的命令，只执行他本人的命令。”

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至迟在6月25日也已获悉，希特勒打算使穿灰色制服的军队摆脱褐衫队的梦魇。希特勒告诉他，他准备召集所有冲锋队领导人到罗姆的休养地维西浴场开一会议，他将在那里亲自逮捕冲锋队领袖，向他们“进行清算”。两天后，领袖警卫旗队长塞普·狄特里希来到国防部，请陆军组织处处长给他为执行一项“领袖委托的保密的和十分重要的任务”准备武器，这是什么秘密任务，勃洛姆堡在6月25日就知道了。

塞普·狄特里希奉命在所谓罗姆暴动这一天担任主攻任务。他奉命率领警卫旗队的两个连向南已伐利亚进军，同达豪集中营长官艾克的队伍会合，奔赴罗姆的休养地维西浴场，对参谋长的最重要的部属进行突然袭击。可是警卫旗队缺少交通工具，也几乎没有武器。于是狄特里希同陆军商定，由国防军的一支车队在勒希河畔兰德斯堡附近一个小火车站，将乘火车南下的警卫旗队接运到维西浴场，此外这两个连均由国防军的兵营补充武器。

莱希瑙、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也商讨了围剿的最后细节。国防军和党卫队同意采取共同行动对付罗姆，一切很快部署就绪。6月22日，希姆莱告诉奉命去柏林的党卫队中德大区副总指挥冯·埃贝施泰因男爵：罗姆计划搞政变，叫他同军区司令取得联系，将其党卫队所部作好“悄悄的战斗准备”，听到警报就到营房集中。6月23日，陆军处长弗洛姆上校通知他的军官们：罗姆准备暴动，党卫队站在国防军一边，如果党卫队提出要求，可以发给武器。6月24日，陆军总司令男爵瓦尔纳·冯·弗立契将军指示各军区司令，针对日益逼近的冲锋队暴动采取防范措施和不引人注目地将部队集中起来。6月27日，希姆莱召集各大区保安处领袖给他们分配任务，监视冲锋队领袖，一经发现冲锋队的任何可疑行动，应立即报告保安处领导机关。

然而在这场所谓的暴动前夕，军人们却是另一种想法。当时陆军处的科长戈特哈德·海因里希上校，在1958年还回忆得起，在罗姆闹剧前两三天，他的同事中谁也不曾担心真会有一场暴动，他本人不曾听到任何有关冲锋队准备进行暴动的报告。“当有人”，海因里希记述道，“把一支枪搁在我的办公桌旁，叫我必要时（对付冲锋队暴动分子）用来自卫时，我说：孩子们，你们别这样让人家笑话了。”他也记得他的领导弗洛姆上校当时简单地表示的看法：“冲锋队没有这么大的胆量。”

西里西亚军区司令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将军认为所谓的冲锋队暴动计划实在难以置信，擅自冒失行事，险些坏了莱希瑙和海德里希的大事。当克莱施特被一连串冲锋队企因暴动的消息弄得晕头转向时，他约见西里西亚冲锋队头子海因斯，开门见山地责问对方为何阴谋反对军队。海因斯向他郑重宣誓，冲锋队做梦也没有想到采取行动反国防军。将军顿起疑窦：“我们国防军和冲锋队被第三者——我是指希姆莱——挑拨离间了。”他上柏林向冯·弗立契将军谈了自己的看法。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叫人把冯·莱希瑙找来，少将神态安详，透过单片眼镜打量着两位先生说：“可能是这么回事，不过现在已为时太晚了。”

这时海德里希对海因里希和冯·克莱施特这些怀疑论者施加巨大的压力，用接二连三的谣言、假情报和伪造文件来消除一切疑虑。必须使每一个国防军军官相信暴动确有其事。塞普·狄特里希给国防部看一份所谓冲锋队领导制定的处决各单；名单说明，罗姆计划消灭贝克和冯·弗立契将军以下的所有国防军高级军官，而其他党卫队特派员则向各军区和城防司令报送冲锋队拟定的名单，说明已经决定要从内体上消灭所有资格较老的军官

一个自称冲锋队副总指挥的人找第六军区（明斯特）参谋长弗朗兹·哈尔德上校，提出要接管哈尔德的职务，现由据说是冲锋队领导将接管国防军。哈尔德上校没有答应，并问国防部探问；他感到事有蹊跷，这个冲锋队来访者连自己的姓名也不说就又很快离去，以后也没有再来。哈尔德估计，这个所谓的副总指挥根本就不是什么冲锋队队员，而是寻衅集团派来探听风声的人。

海德里希耍的另一花招，是四处散发所谓罗姆的命令，国防军大半对此置信不疑。但当某个某个冲锋队领袖查出假消息的来源时，党卫队也会反咬一口，说冲锋队的辟谣是欲盖弥彰。

柏林勃兰登堡冲锋队领袖卡尔·恩斯特有一天私下告诉原是冲锋队的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首都到处流传着毫无根据的冲锋队即将暴动的谣言；他请达吕格设法安排他和内政部长弗立克谈一次话，好让他驳斥对冲锋队的诬蔑。当时任内政部部务主任的达吕格紧紧把住弗立克的房门，怎么也不肯让恩斯特进去，相反他跑到国防部去报告谍报局副局长：刚刚有个冲锋队领袖向他透露参加了一次冲锋队讨论准备暴动的秘密会议，但自己有顾虑，因此想提醒国防军注意即将到来的危险。

直到6月28日，第六军区（巴伐利亚）的军官们还未就希特勒究竟是支持国防军抑或支持冲锋队取得一致看法。要是他们知道希特勒同冲锋队副总司令兼罗姆的副手坦克特·冯·克劳塞尔的谈话，他们还会更加把握不定。克劳塞尔在被处决前几小时，将自己在6月29日同希特勒进行的一次谈话，告诉了和他一起被捕的冲锋队地区总队长卡尔·施赖尔。施赖尔在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向他（克劳塞尔）保证，准备借冲锋队领袖在维西浴场开会的机会，向各地区总队长详细阐明自己的意见。消除一切分歧和误会。他承认并表示自己对冲锋队老队员关心太少，过意不去。希特勒对还在职的忠实战友恩斯特·罗姆也抱有很大希望和缓的心情。”

一桩偶然事件帮了密谋分子的忙：6月28日清晨，希特勒在戈林陪同下，乘飞机去威斯特代利亚，参加纳粹党区领袖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民族社会主义通讯》后来写道，希特勒的西部德国之行“旨在对外给人以风平浪静的印象和不使叛变者们有所警觉”。历史学家们实际上接受了这种看法，他们认定：希特勒外出旅行，是为了让罗姆的对手们可以更好地悄悄动手。

第六节 血流

希特勒刚于6月28日午后不久到达埃森，出现在特波文的婚礼盛会上，就被叫去听紧急电话；电话是希姆莱从柏林打给他的。这些角色安排得真不错：留在柏林的希姆莱将愈来愈令人忧虑的冲锋队阴谋活动的报告读给希特勒听，而站在希特勒身边的、忠实的戈林随时准备就希姆莱的报告加以解释和发挥。

这时，希特勒从坐椅上站了起来，大声说：“我受够了。我要杀一做百。”作出了最后的、果断的决定，希特勒命令戈林和克尔纳回柏林，在柏林等接到希特勒的暗号后就开始出击，对象既包括冲锋队，也包括资产阶级政敌。戈林分秒必争，于6月29日晨赶回柏林，命令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和“戈林将军”邦警察部队作好准备。

戈林执笔写了一封信，密封送给海德里希。海德里希将其转给保安处领导机关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恩斯特·米勒，指示他将信件呈交东南大区党卫队队副总指挥。戈林的这封密信内容是：德国总理已宣布全国处于紧急

状态，并委托普鲁士总理戈林全权负责普鲁士地区；因此他（戈林）将西里西亚省的执行全权授予党卫队东南大区领袖、党卫队地区总队长乌多·冯·沃伊尔施。随后戈林命令冯·沃伊尔施逮捕列入名单的冲锋队领袖和解除所有冲锋队本部警卫的武装，占领布雷斯劳警察局并跟邦警察司令取得联系。

同时，柏林利希特菲尔德前士官总校的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在夜 12 点到 1 点之间，接到国防部紧急电话。值班队长把二百二十名队员，随后赶下木床，随后两连人乘上汽车出发赶火车去考费林。狄特里希业已驱车向考费林进发，希特勒警卫旗队派出的队伍也已经集合好了。就在这个时候，希特勒接到两个报告，使他跳了起来，并改变了计划。

一个报告来自柏林：希姆莱报告，柏林冲锋队暴动已准备就绪，定于明天即 6 月 30 日动手——冲锋队已下令午后 4 点紧急集合（希特勒后来在国会中是这样说的），“5 点钟”计划“采取行动，先是进行突击，占领政府各部”。希特勒在巴特戈德斯堡并不知道，柏林的广大冲锋队队员这时早已休假了。他竟然直到 7 月 13 日还认为，柏林冲锋队头子卡尔·恩斯特拒命前往维西浴场，“留在柏林亲自指挥行动”——实际上恩斯特于 6 月 29 日就离开了柏林，去不来梅携同妻子乘船赴特纳里夫岛旅行。

另一个报告也并不符合事实，这个报告是希特勒在巴特戈德斯堡听纳粹党巴伐利亚区领袖兼内政部长阿道夫·瓦格纳本人说的：慕尼黑的冲锋队已经上了街，大叫大嚷反对领袖和国防军。

对冲锋队的一场血腥清洗就这样开始了，6 月 30 日清晨。天刚蒙蒙亮，希特勒在戈培尔及其随行的陪同下，乘一长列汽车由慕尼黑抵达维西。当他们来到冲锋队下榻的汉斯尔包尔旅馆时，罗姆和他的部下们还在高枕酣睡。他们粗暴地弄醒这一伙，将正在床上鬼混的海因斯队长及其男宠拉下床来，押到旅馆外面，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就地枪决。随后，希特勒单独走进罗姆的房间，把他痛骂一顿，下令把他带到慕尼黑，关在施塔德尔海姆监狱。这个冲锋队头子，在 1923 年参加希特勒的啤酒馆政变失败后，曾在这里服过刑，这两个朋友对于第三帝国的建立，对于第三帝国的恐怖和堕落，比任何其他人起的作用都大，他们虽然经常意见相左，但在发生危机、遭到失败、感到失望的时刻却总是在一起的。在历经十四年的艰辛患难之后，他们现在终于分手了。为希特勒和纳粹主义效劳的这个满脸伤疤、性格暴躁的打手，就这样结束了他惹事生非的一生。

希特勒吩咐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他的“老同志”的桌上，他显然认为这个最后的举动是够朋友的。但是罗姆不愿用这支手枪。他说：“如果要杀死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据二十三年后，1957 年 5 月在慕尼黑战后审判中一个警官的目击证词说，两个党卫队军官进了牢房，对准罗姆开了枪。这个证人说：“罗姆当时想说话，但是党卫队军官禁止他开口。于是罗姆就站得笔直，他上身给脱光了，露出满脸轻蔑的神色。”他就这样死去了，死况之暴烈不下于他生前的作为。对于他曾经大力帮助合上任何其他德国人所未攀登的至高无上地位的那个朋友，他只有轻蔑而已。而且几乎可以肯定说，像那一天横遭杀戮的好几百个人一样，他一点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不清楚，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唯一清楚的是，这是一桩背叛朋友的行为。但是，他万万想不到居然是阿道夫·希特勒干的，虽然他的一生一直是生活在这种行为之中，而且自己也经常干这种勾当。

与此同时，在柏林，戈林和希姆莱也忙得够呛。他们一共搜捕了一百五

十名左右冲锋队队长，排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一道墙前。由希姆莱党卫队和戈林特别警察所组成的行刑队枪决。

在这个血腥的夏天周末，横遭非命的不仅是冲锋队人员。在6月30日早晨，在柏林郊外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别墅门口，有一小队穿便衣的党卫队人员在按门铃。当将军闻声前来开门时，就当场被击毙，他身后的新婚只有十八个月的妻子也当场被杀。施莱彻尔的好友库特·冯·布莱多夫将军那天晚上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是星期六中午在他的柏林寓所被捕的，几小时后根据戈林的命令在艾伯莱特亲王大街秘密警察狱中被杀。

巴本比较幸运，他侥幸躲过了一死，但是，他的办公室被党卫队搜查，他的秘书包斯在办公桌旁被击毙，他的秘密合作者埃德加·荣格几天前已被秘密警察逮捕并被杀死在狱中，另一个合作者天主教行动组织领袖埃里·劳克斯纳在交通部办公室被杀，已本的其余工作人员都被投入集中营，巴本本人也被软禁在别墅，割断电话线。在重兵把守下示止同外界有任何联系。这真是辱上加辱，但是这位德国副总理居然厚着脸皮受了下来，因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他竟再次屈尊，从杀死他的朋友的纳粹党人手中，接受了德国驻维也纳公使的新职。当时纳粹党人刚刚在那里杀了总理陶尔斐斯。

在这次清洗中，到底有多少人被杀，真实的数字一直没有公布过。希特勒7月13日在国会讲话时，宣布枪决了六十一人，其中包括十九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十三人因“拒捕”被杀，三人“自杀”，总共七十七人。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书》中说，有四百零一人被杀，但它只举出了其中一百一十六人的姓名。1957年在慕尼黑审判时，提出的数字是一千多人。在这些人中，除了被镇压的冲锋队头目外，有许多人是由于过去反对过希特勒因受报复而被害的，还有的人则显然是因为知道内幕情况大多而被杀人灭口的，另有少数人则因为被弄错而冤枉死去的。

到7月1日星期日下午，人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在前一天晚上从慕尼黑飞返柏林，这时在总理府花园中举行茶会。星期一，兴登堡总统对希特勒“及时扑灭叛国案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他并对戈林在镇压“叛国案”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星期二，冯·勃洛姆堡将军代表内阁向总理表示祝贺，使这次杀戮“合法化”，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勃洛姆堡并向全军发出命令，表示陆军总司令部对于时局趋向感到满意，并且保证建立与纳粹党的融洽关系。

国防军营房里发出一片欢呼声，军官食堂中香槟酒献筹交错。“Allcaiche”（一网打尽）——当最后一批被捕的冲锋队领袖枪毙完毕时，冯·莱希瑞将军用蹩脚的英语给谍报局长帕齐希打了这样一份电报。“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参加，”冯·维茨勒本少将兴致勃勃他说。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颂扬“领袖亲自出马打击粉碎卖国贼和叛逆分子，前总理府国务秘书、退役骑兵上尉埃尔曼·普朗克警告冯·弗立契男爵将军说：“您如果袖手旁观，迟早也会遇到同样的命运的。”

后来的事实应验了他的预言：冯·弗立契像罗姆一伴，在类似的阴谋中栽了跟头，冯·维茨勒本被吊死在人民法庭的一个肉钩子上，而申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中尉也必须在1944年7月20日为自己年轻时所犯的过失而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也说过：6月30日只不过是“挤掉了一个脓疱”，连勃洛姆堡也很快就对自己部属为6月30日鼓掌喝采感到不快。据海因里希上校

记述，勃洛姆堡向国防军各部门领导人作的一次讲话中有如下要点：“部队没有保持人们所期望的态度。对死去的仍感到高兴并在食堂里纷纷谈论，这是不适当的。”

这位部长已经看出，6月30日的胜利者并不是国防军。获得全胜的是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党卫队，因为党卫队摆脱了冲锋队的所有约束，加强了它在党内的势力。6月9日，党的领导机关就宣布了党卫队保安处是纳粹党的唯一政治情报机构，7月20日希特勒规定：“鉴于党卫队特别是在1934年6月30日事件中作出的巨大功绩，我将其升格为纳粹党内的一个独立组织。”希特勒还批准党卫队建立武装部队，这样，他就破坏了国防军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计划，因为它是国家武器的唯一持有者，而它正是为此而向冲锋队宣战的。

1934年6月30日给第二帝国的历史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刀痕。血洗冲锋队加速了希特勒的独裁和恐怖统治的进程，建立了戈林——希姆莱轴心（这个轴心直到战争爆发时在纳粹特权阶层的权力斗争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预示着对于未来的一个凶讯：党卫队业已证明，它决心执行，而且是不折不扣地执行阿道夫·希特勒的一切命令。当然，在党的权力大厦内部也同时绽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即党卫队和冲锋队彼此已成为死敌。

成千上万的冲锋队队员再也不会忘记他们忍受过的那些欺凌和屈辱的日子。在这些日子里，冲锋队事实上已沦为党卫队的囚徒。最富有象征性的事实莫过于：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卢策必须委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负责整个东德地区冲锋队的清洗和改组工作。冲锋队领导的重要政治机构（政治处和部长办公室）被撤销。卢策还不得不下令：“兹委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吕格负责清理包括接收所有属于冲锋队总部的物资（办公家具、办公用品、车辆等）。”

直到8月初，冲锋队才重新成为自己大楼里的主人，并可自行清洗组织。冲锋队地区总队长伯肯豪尔成立了一个冲锋队特别法庭，下设派驻各个有揭发所谓罗姆同伙及审查“一切事件”的地方的调查委员会；据1934年8月9日一项希特勒命令规定，“凡冲锋队领袖由于品行不端、道德败坏、猎取名位、享乐至上、鲸吞中饱、酗酒放纵、骄横挥霍等等而不符合作为领袖军队的冲锋队标准”的一切事件，均属审查之列。这些机构刚刚开始工作，就把调查的主要内容翻转过来，它们不去追查罗姆的同伙，而是收集党卫队在6月30日及其以后的表现的报

冲锋队的一份份报告吐露出他们的愤怒，表达了褐衫队队员们的气愤、仇恨和惊骇。“我一向，”1925年参加冲锋队的突击中队长赫尔曼·贝克控诉说，“为廉洁和正义而斗争，可现在竟有人扬言要逮捕我。我们这些为团体和德国国旗拼杀了多年的老冲锋队员，竟受人欺侮，被警察剥光自己的衣服，被他们敲掉饭碗，难道现在已不配称为中坚分子了么？难道我们现在再次沦为任人宰割的地步了么？”第一百六十八冲锋队旗队长在7月28日报告道：“我反复告诫我的部下一定要听从党卫队的指挥……但由于部分年轻党卫队队员对冲锋队老同志所持的态度，使所有老冲锋队队员心灵上都受到莫大的打击。”

奥芬已赫的费尔滕小队队长气愤地报告：“同志们……纷纷向我诉说经常负责巡逻凯撒大街的党卫队巡逻队的态度……半夜1时许，一名党卫队候补队员骑着自行车从我身边擦过，向我吼道：‘怎么不敬礼——你准是睡糊涂

了！’我叫他下车，他头也不回地飞快蹬着车跑了。他要是下车，我只需稍微动动手就管叫这小子懂得，他对一位阿道夫·希特勒的战士、一个入党多年同志和佩戴冲锋队勋章的冲锋队队员犯了什么罪。”

党卫队成了冲锋队永远痛恨的对象。这两支民族社会主义党的军队再也不会言归于好了。从此以后，冲锋队和党卫队相互尖锐对立——开始进行着一场默默的、看不见的战争。

第四章 残冷谍战

“谢天谢地，现在这只畜生死死了”

天生的情报人材

荒谬的信条

第一节金发野兽

有些历史学家过去和现在都以一种奇特的顽固性，揪住犹太人的课题死死不放，甚至直到今天仍是如此。这反映了一种要求，即要揭露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在北欧主宰民族假面具下掩盖得很巧妙的一秘密，一种畸形心理状态，一个无法消灭的缺，它以宛如催眠术般的作用确凿地证明，希姆莱最重要的伙伴和保安警察头子是纳粹国家学说的最残暴的维护者，是如同英国人吉拉德·莱特林格所说的“一切种族主义者中最终狂热的分子”。

无论如何，在这个必会引起人们议论纷纷的人物身上，在这个“历史上罪恶滔天的人物”（米夏埃尔·弗罗因德语）身上，定然存在着一种内心的分裂。而看来尤为可信的是，作为判断分裂之处就在于那个所谓出身缺点上，对于一个纳粹分子来说，这种缺点是自杀性的，无异于罪该万死。因而历史学家莱特林格也迅即认为，海德里希是受一种“病态的、犹太人自己憎恨

自己血统的仇恨”所支配的，他感到这种仇恨给他提供了了解所谓狂热分子海德里希的钥匙；而特莱西恩施塔特编年史作者H·G·阿德勒也推断道，第三帝国给“海德里希（提供了）无限制的权力，通过屠杀一切得以屠杀的犹太人……来消除自己身上可恨的犹太病菌”。

即使希姆莱也在自己所信赖的人物圈子里散布，海德里希本来是“一个可怜的人，内心世界完全分裂，像混血儿中常见的情况一样”。国际联盟专员卡尔·J·布克哈特也有同感；他惊奇地发现，海德里希的脸庞是由偶然相异的两个半边面孔拼起来的：“我心里想，同时有两个人在打量着我。”

布克也记下了党卫队员们向他谈到的关于海德里希的情况。有一天，保安处头子喝醉了酒，踉踉跄跄地踏进他那灯光照得如同白昼的浴室，对着一面大壁镜里自己的影像走去。他霍地从枪套里拔出枪，向影像砰砰开了两枪，并叫道：“我叫你完蛋，流氓！”这位瑞士人评论道：“他枪击的是另一个人，他这个两面人，击中了他另外半边面孔的那个人，但只是在碎裂的玻璃镜子里，他并没有因此而摆脱他，并注定要最后和他同归于尽。”

可是，尽管传记作家们不厌其详、一点一点地拼凑这头“金发野兽”——党卫队中有时也这样叫海德里希——的完整形象，最后却往往仍然逃不了先哲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的一句话：你可以和一个人频繁交往，但到头来还是不

了解这个人。因为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不是民族社会主义革命的圣茹斯特，他并不是种族主义狂热分子，在他的身上也找不到像历史学家弗罗因德所臆想的“魔鬼式的思想罪犯”的影子。

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1904年3月7日生于萨勒河畔的哈雷，他的开端也象共和制的战后德国许多市

民子弟的经历一样。他的父亲是歌剧院的歌唱家，母亲是演员。他就读于哈雷的革新文科中学，在经济困难时期离开受到战争和通货膨胀打击的家庭，十岁就参加了梅克尔将军的自由团。当重返故乡时，他只知要当军官。他给自己选择了海军生涯，这也是中学时代的希姆莱的第一志愿；在受到裁减军备限制的德国，只有海军给海德里希提供了一个满足炫耀自己和冒险欲望的机会。

1922年海德里希在基尔入伍，穿上了海军士官生制服，学习期间，他于1923年7月登上“柏林号”教练舰，和最初发现“这头聪明绝顶的野兽”的

才华的人之一呆在一起，即旧式三桅战舰舰长、当时“柏林号”上的一等军官威廉·卡纳里斯。这位个子矮小、注重仪容的舰长，对这个身材颀长、长着一双罕见的蒙古人眼睛的士官生总是感到厌恶，但尽管如此，还是赞赏海德里希的航海数学才能。

卡纳里斯太太埃里卡则不同，她是普福尔茨海姆工厂主卡尔·弗里和协里希·瓦格的女儿，熟谙艺术，她倒欣赏歌剧演员儿子的小提琴技艺。“海德里希拉得柔和圆润，表现了作为提琴手的第一流手法和高度灵活。”以色列的海德里希传记作家阿伦森作了这样记述。在演奏时，海德里希可以“长时间哭泣。这是他的性格的另一面，它能把残忍性和玩世不恭同多愁善感和软弱性同时”结合在一起。

卡纳里斯于1924年上调柏林海军领导机关，候补军官海德里希则并无特殊成绩，但也逐渐沿着海军生涯的狭窄舷梯往上爬：1926年初，他任上等见习军官，1926年末，晋升为海军少尉。就读于海军通讯学校，成为舰队旗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的通讯军官，任波罗的海海军驻地各通讯部门的军官。1928年，海德里希晋升为中尉，并且还通过了一次俄语考试，他可算是个天资聪颖的海军军官，但在同伴中间却并不怎么受欢迎，而且由于他的嗓门特尖而被嘲笑为“山羊”，加上一副横蛮的上级派头，在全体舰队人员中成了最令人厌恶的军官。

虽然如此，他还是深信干海军前途未可限量。突然，一次艳遇毁掉了他的前程。事情发生在1930年夏来某天的傍晚。开始时，海德里希和后来任县长的莫尔在基尔附近泛舟于水上。当小船随着平静的潮水徐徐滑行时，他们突然看见，另一只坐着两个姑娘的小船翻了。海德里希和莫尔跳进水中，把两个姑娘救了起来，其中的一个长着金发，是某中学的校花，十九岁的莉娜·玛蒂尔德·冯·奥斯滕，波罗的海费尔马恩岛乡村教师的女儿。海德里希和莉娜由相识后逐渐发展到相互钟情，他们不顾不乐意的父亲冯·奥斯滕的反对，于1930年12月9日订婚。

可是，莉娜仅仅是病态嗜色的海德里希猎获物中的一个。不久就有另一位女士找上门来，提出他们相识在先的种种应有权利。海德里希对登门交涉的女士不予理睬。但这位女士是伦茨堡海外殖民学校的大学生，法本工业公司某经理的女儿，她颇有来头，上告到了海军领导机关首脑埃里希·雷德尔海军上将跟前。上司们指令海德里希放弃莉娜·冯·奥斯滕；当他拒不同意时，雷德尔开动了军法机器。

1931年年初，一个由四名海军军官组成的荣誉公断委员会开会，花了几个星期时间审查中尉海德里希的问题，委员会主席为波罗的海海军驻地负责人汉森海军上将，委员会首席——因而也是最重要的——委员，是前海军上校古斯塔夫·克莱坎普，海德里希过去就读海军通讯学校的教官，如他所说，他不得不“特别详细地同海德里希就由其申述的理由进行辩论”。但莉娜·冯·奥斯滕的未婚夫十分傲慢地回答，给予过去的老师一阵抢白，致使荣誉公断委员会不许海德里希出言伤人。

不过，荣誉公断委员会对海德里希特别生气的是，这个无线电通讯军官显然试图反咬出身名门的海外殖民学校女大学生一口，诬赖她撒谎，声称自己毫无过错，这可是违反崇高的海军荣誉法典的行为。“除了海德里希不可原谅的态度外，”海军中将克莱坎普后来回忆说，“特别是他在解释事实经过时明显表现出的不老实态度，促使荣誉公断委员会最后裁决时相应报请上

级决定一个问题：是否还应让这么一名军官继续留在德国海军里。”

海军情教徒雷德尔对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答复，将海德里希逐出舰队。1931年4月底，海军中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接到了判决书。判决书上写道：“由于有失荣誉着即退役。”当然，后来有谣传说，海德里希对他搞大了肚皮的女大学生拒绝结合，理由是他不能同一个已经失身于他的姑娘结婚。

雷德尔的训令把海德里希从最保守的海军颠峰上拉了下来，扔进了当时重重包围着德国各地劳动局的千百万失业大军

的行列。海德里希对咎由自取的命运非常恼恨。他看到自己的机会有限：他可以像许多退役海军军官一样去当个帆航教员，也有希望在游艇学校里找个工。但是要想穿海军制服，即使是干商船队，也是永远不可能了。受了伤害的虚荣心驱使他只好找一套别的制服来弥补，聊以自慰——海德里希参加了海军冲锋队。不过这并不是表现有志于政治，莉娜·海德里希说：“他只不过是职业军官，他和他的海军生涯结了缘。其他兴趣在于体育活动，对政治他根本不懂，也从来没有多大兴趣。”

但是莉娜却精于政治之道，她被赫特尔评价为“典型的埃达故事中那种凶狠的、渴慕荣华的女人”；莉娜敬慕希特勒，认为自己未来的丈夫也必须向希特勒求取前程。另一个女人，即海德里希的姐姐伊丽莎白，实现了莉娜的心中宿愿。她想起莱因哈德有个教母，其儿子是慕尼黑的冲锋队高级领袖，并且不久即将成为党卫队的要员。“小卡尔”，即年青的朋友弗里德里希·卡尔·冯·埃贝施泰因男爵，必定会帮“赖尼”的忙——果然他对此出了力。

多亏男爵分清无线电军官的区别，海德里希找到了进入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木头房的门径，希姆莱正在物色一名谍报人员做他的保安工作。1931年6月14日，海德里希踏进了希姆莱的房间和生活圈。希姆莱给他二十分钟时间，叫他在一张纸上描绘出党卫队未来的谍报工作组织，这实际上是党卫队保安处诞生的真正时刻。党卫队头子对海德里希所作的草图表示满意，就在1931年10月5日，纳粹党汉堡区领导机关从慕尼黑接到通知：“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同志（汉堡，党员证第544916号）以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总部成员于今年10月1日起参加全国指导处工作，作为单独活动的党员。”海德里希被授予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衔，并开始工作。

还在1931年年初，希姆莱已接受希特勒委托组织一个保安处，负责纳粹领袖的保卫工作。他立即仿效旧德国陆军参谋本部的模式，在党卫队高级指导处建立了一个叫做LC的部门——陆军参谋本部主管敌情侦察的部门。党卫队头子在任命海德里希后仍亲自任LC的领导，但把实际工作完全委托给了这个前海军人员负责。

海德里希的上帝就是为取得权力的权力，在他的身上体现了最赤裸裸的政治手腕工艺学，体现了海德里希以此获得“怀疑一切”的绰号的那种统治者的多疑。可是他没有将一个圣茹斯特和那些死在其断头台上的人联在一起的仇恨；海德里希并不厌恶犹太人，对于他，犹太人只不过是有关计划的技术行动的对象，只不过是一种由国家领导决定的、惨无人道的“清洗行动”中的毫无灵魂的众生。

海德里希所知道的仇恨只是在于表达个人的怨愤。海军元帅埃里希·雷德尔指示将他逐出海军，他对雷德尔一心图谋报复，拒绝他当年同一条军舰上的伙伴们进行任何调解的努力。另一方面，海德里希并不知道有意识形态

上的仇视，对于各种世界观，包括褐色世界观，他有的只是嗤之以鼻。海德里希是体育运动迷，他是击剑手、骑师、飞行员、滑雪运动员和现代五项全能运动选手，除此以外，还是党工队全国领袖的体育运动总监。有时他甚至庇护犹太体育运动员：他帮助德国击剑冠军保罗·佐默尔去美国，并给波兰奥运会选手康托尔提供旅费和证件。

他显然也不是毫无批判地信仰希特勒，信仰希特勒是他的全国领袖的延寿剂，它使小资产阶级希姆莱仿佛变成了超人的庞然大物；相反海德里希可以设想一个没有希特勒的、但是不能没有海德里希的德国。他的那些亲近的同事直到今天还坚信，海德里希要是不早死的话，在1944年7月20日很可能是站在叛乱分子阵营的一边。有两名击剑运动员还记得他1941年在巴特克罗伊茨纳赫讲过的话：他将是第一个除掉希特勒这个祸害的人，如果“老家伙瞎胡干的话”。

他一直到死始终是权术家和功利主义信徒：1942年5月27日，捷克空降人员用手榴弹置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长官于死地，他们的手榴弹不是投向一个残暴的封建领主，而是投向一个狡猾的党卫队理性主义者，他所玩弄的介乎甜面包和皮鞭之间的弹性政策，使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感到危险异常，除了干掉海德坦克希外别无选择。

但是，使这个功利主义的权术家最为恼火的，莫过于观念论者希姆莱那滔滔不绝的连篇大话了。海德里希经常在妻子莉娜跟前，发泄对全国领袖的气愤，希姆莱的种族主义狂热幻想干扰着党卫队这部机器的正常运转。海德里希微带醉意地扯开嗓门叫道：“你看看他的面孔和他的鼻子吧，典型的犹太人，一个标准的犹太乡巴佬！”莉娜·海德里希跟着咒骂，因为她打心底里讨厌希姆莱这一家，特别讨厌“全国领袖的婆娘”。莉娜在战后嘲笑玛尔加·希姆莱说：“五十公分的女式短衬裤，不然她穿不下。”还有：“这个粗俗、毫无幽默感和患了广场恐怖症的金发女人，统治着她的男人，至少一直统治至1936年，对他各方面都具有影响。”

莉娜·海德里希亲身强烈感受过这种影响：希姆莱受妻子的怂恿，提出保安处氏海德里希必须尽快同令人难以忍受和放荡不羁的莉娜离婚，但莉娜·海德里希比希姆莱好脾气的老婆还要棋高一手，有一次，赫尔曼·戈林家举行游园会时，她进行了反击。出于偶然，希姆莱被安排为陪伴海德里希妻子入席的男宾。莉娜·海德里希记述说：“那是令人难堪而又可笑的时刻。我装成满肚子不高兴的样子，一动不动地坐着。突然希姆莱问：‘难道您这么好静？’我回答：‘您感到奇怪吗？，接着我们跳舞。希姆莱跳得很糟。一会儿他说：‘唉，海德里希太太，一切事情都会过去的。’您瞧，这又是希姆莱典型性格的地方。是他亲口命令离婚，可是一看到我，他又没有胆量了。以后再也没有提过这件事。”

但是，当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意识到，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个事事管的集团神秘主义者的时候，他更加注意在肚皮里下功夫。尽管才智胜过这个党卫队头子，但海德里希一分钟也不忘记“像一名普鲁士少尉对一位者将军那样”对待全国领袖——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这样说。在希姆莱跟前，海德里希说话的腔调几乎是低三下四的，甚至使用在党卫队内严禁使用的称呼“全国领袖先生”。他奴颜卑膝地围着头儿转：“是，全国领袖先生，要是全是领袖先生这样认为，我可以马上采取必要措施，并向全国领袖先生汇报，是，是！”可在莉娜面前，他却大发雷霆：“希姆莱

光是指手划脚，见风使舵，想不承担任何责任。”

反过来说，每当这位最亲近的僚属前来汇报的时候，希姆莱往往心里着慌。克尔斯滕写道：“有时我感到，希姆莱在听完汇报后仿佛像挨过一顿揍似的。”克尔斯滕说，海德里希是“擅长于汇报艺术的名手：简明扼要地叙述有关人物或事实情况，接着提出自己的分析和看法，这样就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然后进而打出他的决定性的王牌，其中包括往往使希姆莱难于回避的建议……希姆莱简直跟着转还来不及”。

害怕听海德里希汇报的全国领袖有时勇敢地固执己见，但这只是在海德里希离开了以后。这时希姆莱打电话告诉海德里希说，对于刚才商量好的措施他还得报告希特勒。过后不久，希姆莱发出一条改变了提法的指示，在这位同僚面前诡称是所谓的领袖命令。有一次希姆莱恼火得当面发生顶撞，他冲着海德里希结结巴巴地大声喊叫道：“您，您……和您的逻辑。您老是给我讲您的逻辑。不论我提什么意见，您都以您的逻辑来否定。您和您那没完没了的冷冰冰的批评劲，我受够了。”海德里希立即退缩回来，赶快让步。希姆莱又重新和颜悦色。

希姆莱始终满腹狐疑地注意警惕一切潜在的竞争者，但却无意把他的保安处头子列为足以构成对他危险的人物。因为全国领袖掌握了海德里希的特性，这些特性无疑适合子当一名契卡人员，不过更主要的是，它们可以防止广泛存在于纳粹国家本身中的政治野心。在异常敏感、一心指望青云直上的实权人物周围，气氛是冷冰冰的，不可能产生任何友谊，甚至也不可能有忠诚。海德里希不倦的工作，他的机灵的、尽管是颇为肤浅的才智，他那事事要求比别人懂得多的欲望，他在保安处、击剑场或妓院里到处都想胜过别人的那种贪婪，都不能掩盖他内心的空虚。在这种空虚中，无论是意识形态和人，都会像石沉大海，不起任何作用。

像他避免公开树敌一样，他也不知友谊为何物；即使对妻子莉娜，他也只是在于发泄自己贪得无厌的性欲而已。他在哪里出现，那里的人就远远地避开。甚至连敬佩击剑能手海德里希剑法高超的运动员，见到他来也赶快避而远之。

希姆莱身后至少留下了一批当年的同事，他们直到今天还不能不称道他们的全国领袖主前对人体贴，和蔼可亲。而被希特勒称之为“铁石心肠的人”的海德里希，死后从未有人说过他的好话。警卫旗队司令塞普·狄特里希道出了许多党卫队员对他的看法；狄特里希在听到海德里希死去时大声嚷道：“谢天谢地，现在这只畜生死死了。”

连操皮肉生涯、靠吃四方买卖营生的女人，也不乐意主动开门接待他进房间。他一向带上一名副官寻花问柳，这位首长经常气恼，因为姑娘们宁愿对副官献殷勤，而不喜欢这个长着两只凶恶毕露的狼眼睛的人。只有少数人看出，在党卫队保安处长高做的神态后面，隐藏着一种敏感性，它揉合了功名未就的海军军官的低能变态心理，和继承父母作为演员那种具有对批评的敏锐感觉。残暴至少不是他的生活需要。他对访问他的布克哈特压低嗓门说：“国外有人把我们当成嗜杀成性的人，难道不是吗？对个别人来说差不多是过分生硬了一点，但是我们必须象花岗石一样坚硬。”

一个内心如此不稳、一直处在进攻和渴望成名之间的人物，仿佛生来就是希姆莱的年轻伙计，决不会危及全国领袖的统治地位，两人都清楚，谁也不能离开谁——都是为了保存自己。希姆莱是纳粹特权阶级中地位牢固的党

卫队头子，没有他，功名心切的海德里希就不可能有往上爬的途径；而没有海德里希那种神速的敏感和活力，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希姆莱就无法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者的蜘蛛网中贯彻自己的意愿。

第二节希姆莱的得力干将

海德里希带着希姆莱交给的几本卷宗，搬进了褐色大厦的一间房间，从事除了他以外再也没有第二个纳粹分子适合于的事业，契卡分子的生涯，极权主义秘密警察的主业，8月底，他已在褐色大厦召开的一次慕尼黑党卫队领袖大会上，以未来的情报头子身分露面的，并描绘了一个被混进无数反对党派和警察机器的密探的党恐怖幻影。结论是：纳粹党必须无情地清除一切间谍和破坏分子。此后不久，所有党卫队单位接到：“各区立即着手建立LC科，负责抓区内所有的情报工作。随后，各党卫队旗队亦规定设立LC科。”

海德里希在备党卫队单位几乎拉不到第一批办事人员，因为他深居褐色大厦，不接触这些单位，而居住在褐色大厦里的人又都显得过分地好奇。于是他带上三名僚属，搬到慕尼黑土耳其街23号维多利亚恩德里希附近的一所两间房间的屋子里，开始进行一种奇特的、显然仿效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中描写的那种专业工作。海德里希要求他的助手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参加两个人以上的商谈，也就是说，除了本人以外谈话的对方只能有一个人。1932年初，他已将他的僚属机构扩大，可以向新岸扩展了。他已不再满足于跟几个密探和情报员保持松散的接触了。

4月里，他启程作一次全国性旅行，以了解用哪一种形式把各地争取到的部属组织起来。就在这时，共和国的保卫者们迫使他采用一种起保护色作用的名称。中央政府取缔冲锋队和党卫队；Ic随即改名为PID（“新闻和情报处”）。尽管如此，海德里希在周游德国过程中仍得到了莫大的鼓舞，于是建立起大型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取名为党卫队保安处（SD）。

海德里希把党卫队各单位的谍报人员和密探抽调出来，置于自己领导之下。由此产生了第一个党卫队特别机构，新机构仍是党卫队的一个单位，尽管是个特别机构，仿佛党卫队中的党卫队。海德里希建立起自己的主权组织，它们好象影子一样紧附在党卫队各大区和各区。区保安处和大区保安处人员的任务是，侦查纳粹党内部的反党分子。以及监视敌对党派的活动。每一点具体情况、每一次监视活动、每一个人履历，都详细记入海德里希的专门卡片——保存在慕尼黑楚卡里街4号保安处新总部。

然而，海德里希的野心还不止于此，他不满足于监视党的敌对者——这一行，党和冲锋队的其他谍报组织也在于。他想超出这一范围：保安处应该出色地工作，以排除党内的竞争者，确保保安处在全党的唯一情报机构的垄断地位。即使这样，党卫队也还不过瘾：正当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执政的时刻，海德里希有心使保安处从隐蔽的状况中走出来，建立新德国的新警察。

小资产阶级分子希姆莱惊奇地、几乎目瞪口呆地对他的情报头子那种强劲灵活的事业心赞叹不已。显然，在这个被逐出海策的军官身上表现过的那种自我折磨的忧郁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海德里希以新近皈依改宗转向者的激情，督促下属加紧工作，专断、急躁、说起话来神经质的尖嗓门高得出奇。希姆莱忙不迭地酬以应有的头衔。海德里希真是一帆风顺，青云直上：1931年8月10日任突击队中队长，1931年12月1日任一级突击队中队长，1932年7月19日正式当上了保安处长，1932年7月29日任旗队长，1933年3月21日任区队长。

党卫队头子本能地感到，像他私下告诉克尔斯滕那样，偶然地把这样一

个“天生的情报人材”送到了他的身边；他是“一部活的记录器，一个了解所有线路并使它们始终连接畅通的有头脑的人物”“海德里希带来了这个谍报部门头目所具有的理想武器：严格，不凭感情用事，不停地搜集情报和令人发指的玩世不恭的态度。

在所有体育运动项目中，他特别喜爱击剑，这并不是偶然的，满腹狐疑地观察和提防敌方企图，对预先估计不到的情况作出闪电般的迅速反应，成了海德里希的第二天性。他的助手施伦堡感到他仿佛是一头猛兽，“始终保持警觉，始终预感危险，怀疑一切”。他像幽灵一样，似乎具有第六感官，能猜测细微末节的来龙去脉。在全国领袖存档的记载别人言论的笔记中，海德里希常用刚劲的字体批道：“我不相信”，或者写道：“无稽之谈”；当希姆莱问他对情况是否进行过核实时，海德里希回答说，他的感觉不会欺骗他——而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对的。

对此，希姆莱说：“他对人有着可靠的嗅觉。他具有令人惊异的敏锐目光，能事先看清敌友的动向。他的同事不敢对他讲假话。”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仿佛是生来就适合当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情报机关头子的人。保安处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特尔认为。海德里希是第一个能“提醒”希姆莱“利用党卫队全国领袖这个地位干什么事业”的人；把党卫队进一步变成第三帝国的警察权力也是他的主意。

海德里希设计了一个缜密的监视系统蓝图，用以监视国民生活中的每一个领域，并确保纳粹党的绝对统治，进行监视工作的只有党卫队全国领袖的保安处一家，进行指挥的只有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一人。一支政治警察的草图出现了，它和它以前的所有警察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以往的警察对国家政敌只满足于现场抓获，只有当客观危险临头，它才插手干预；而海德里希的警察则要在还没有产生反对思想更不用说策划敌对行动之前，就侦破对手。

换句话说，海德里希所要的一支警察，它拥有无限权力，只受“德国警察的总任务”（贝斯特语）制约，而这个总任务是：不择手段地保护阿道夫·希特勒的领袖专政，既然如此，能把这种不受限制的任务赋予一支在魏玛共和国一再受到新生法律和宪法的教育的警察吗？绝对不能！无疑，这两个党卫队一警察很快就感到巴伐利亚这块试验田太狭窄了；他们把手伸向全国，当时德国其他十六个邦的警察还没有主子，至少还没有被一个人统一操纵。不过时间紧迫，赫尔曼·戈林在普鲁士已经在秘密警察内组织一支政治警察，其结构同希姆莱—海德里希的机器相类似：从行政机关划出来，由一人统辖，独立于国家和党之外。

民族社会主义统治者们相互间的权力争斗使希姆莱及其助手较快地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目标，速度之快出乎两人预料之外。在弱的国家改革派威廉·弗立克在同戈林的普鲁士分离主义进行争夺中，除了向党卫队头子求助外别无他法，因为弗

立克和希姆莱在一点上看法一致：两人都希望一支由中央领导的全国警察，弗立克让巴伐利亚警察司令将各邦警察逐一攫为己有。普鲁士这个要塞则落入两个秘密帮派人物的手中，这正好是在恩斯特·罗姆跟赫尔曼·戈林斗争激烈的时刻，戈林跟希姆莱实现和解，把秘密警察交给他，以此换取党卫队支持对冲锋队头子进行血腥的清算。4月底，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控制了普鲁士的警察。希姆莱成了秘密国家警察（秘密警察）——亦即巴伐利亚

政治警察的普鲁士变种——副头子兼督察员，海德里希作为副头子的代表负责领导秘密警察处 (Gestapo)。他们同时还扩大了在党内的权力基础。党的领导确认，党卫队保安处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领袖代表于 1934 年 6 月 9 日规定，即日起“除党卫队全国

领袖保安处外，不许再出现党的任何情报或谍报机构，也不许搞名为国内情报组织实则插手外交的机构”。

第三节 “铲共”老手

似乎保安处的胜利未免来得过早了，再加海德里希对自己的创新多少失去信心，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的经验，打破了他那利用保安处可以建立一支新警察的经验，打破了他那利用保安处可以建立一支新警察的幻想，旧学校出身的警官们对这个保安处的青年暴发户来说表现了充分的明智。这一点海德里希必是早有觉察，因为他正好就在民族社会主义取得政权的前几天，离开了保安处。1933年1月27日，他辞去保安处长职务，进入党卫队全国领袖本部，任特别（任务）旗队长。保安处这具机器在离开海德里希领导的情况下，运转了达三月之久。

这个原任和未来的保安处头子十分现实地看到，他的组织就人数而言，还搭不起一支新警察队伍的架子。1933年秋，保安处有一百名工作人员，其中例如西南大区（斯图加特）保安处只有整整五个人。何况海德里希对保安处作为一个独立组织的前途也抱怀疑态度。莉娜·海德里希告诉以色列历史学家阿伦森说，她丈夫当年说过：“现在我们再也不需要党了。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作用和开拓了取得政权的道路。现在应该是党卫队打入警察，并和警察建立一个新组织。”

这正是他的目标，当时他受希姆莱的委托，着手在秘密警察处的最高层将德国各邦警察合并，贴上党卫队的标记。他计划把富有经验的警察干部改造成为忠于政权、只是薄施一层褐色油彩以资点缀的实权人物，供领袖专政的种种任务支配。对实用主义者海德里希来说，不在乎信仰坚定，而是首先强调业务能力。为此他找到了一批慕尼黑的刑事警官，这些人毫不掩饰他们对新保安处的强烈反感。

刑事高级警官赖因哈德·弗勒施及其同事，其中包括海因里希·缪勒、弗兰茨·约瑟夫·胡贝尔和约瑟夫·迈辛格，坐在巴伐利亚政治警察第二处和第四处，等待被保安处的新贵赶出机关。“海尼”·缪勒自己给自己鼓气说：“让他们来好了。我们会给他们明话直说的！”其实，这些职业者手担心会被这些新主子们撵走，因为他们中间除迈辛格外，在1933年以前一直都是站在另一边的。只有迈辛格是老战士，在1923年11月9日就参加了从慕尼黑菲尔德赫恩会堂前面走过的那支队伍；除了他，弗勒施小组的成员都是民主党派，多半属于巴伐利亚人民

党（BVP）。

身材矮胖、颈项粗短的刑警探长缪勒的情况也是如此，他

的脸显出他是农家子弟。海因里希·缪勒生于1900年，前西线

飞行员和军士，从1919年年底起在慕尼黑警察局任职，在巴伐利亚刑事警察中，享有最凶狠的铲共老手的称号——在巴伐利亚工人士兵苏维埃时期枪杀红色分子人质，办公室助理员缪勒的第一次大失败促使他狂热地反对共产主义。在警察局政治科里，早在魏玛时代他就分管（打击）共产主义方面的工作，连

不喜欢缪勒这个野心家的纳粹党慕尼黑—上巴伐利亚区领导机关，也知道“不能不赞扬”他对共产主义“进行极其严厉的、有时甚至置法律条文和规定于不顾的打击”。

但是，纳粹党区领导机关也证实道：“不过同样清楚的是，缪勒对右的方面也会这样子的，只要给他布置任务的话。以他的十分严重的名利思想……

他在这里也总是会得到他任何上一级体系的赞扬。”因此纳粹党慕尼黑领导怀疑，这个能够得到任何“体系”赞扬的警察和伪装虔诚去教堂作礼拜的缪勒，今后是否能在新德国找到饭碗，因为每年纳粹冬赈募捐他一向只捐款四十分尼，而且除了种种令人厌恶之处外，他还是巴伐利亚人民党出版商迪施纳（“蠹鱼塔尔博特”）的女婿，这可不是纳粹分子们所设想的那种警察官员。

1937年1月4日，纳粹党慕尼黑区领导机关这样刻划缪勒的形象：“他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抡起胳膊横冲直闯，时刻善于表现自己的才干，但对掠人之美却毫不知耻。”纳粹党慕尼黑一帕辛格基层组织领袖声称：“我们称他是我们党内的同志感到羞耻。”可是保安处头子海德里希颇有胆识，不动声色地偏偏把这个职业者手吸收进自己的机关，包括他和弗勒施小组的其他成员。连在党内受到人们憎恨的、对纳粹分子盯梢的警察局密探、刑事警察书记官胡贝尔，也被海德里希吸收录用。

海德里希打发人把胡贝尔找来，出示一份裁减对象名单，不吭一声，在令人压抑的寂静气氛中，伸出手指一行行数将下去。他突然把头一抬问道：“您到底是哪一个胡贝尔？”胡贝作了回答。接着简单地交谈了几句。当刑事警官走出这位审查者的房间时，海德里希知道，弗兰茨·约瑟夫·胡贝尔会像慕尼黑警察同所有其他有妻室儿女的好汉们一样，从现在起，更加毫无顾虑地，更加勤奋地为现政权工作，而过去他们都曾反对过这个政权的崛起。

纳粹党慕尼黑区领导机关负责人无法理解（他在1937年3月9日写道）这样一个“令人痛恨的反对运动的人”。

据此，法治不是一种状态，即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公民不受国家万能的侵犯；依照贝斯特的看法，法治只是一种权力斗争的手段，一块划分“刚刚过去的斗争的结果的标志：一方赢得了权力，另一方丧失了权力”。贝斯特写道：“国家对内的任何一种权力，其目的都是在于统治别人，同时每一种权力……总是使自己同‘国家’一致。统治的完善是德国的趋势：统治愈完善，国家也就愈完善。”

他并不限于纸上谈兵。当共产主义革命的火苗在魏玛德国四处出现时，纳粹分子贝斯特于1931年年中，在沃尔姆斯附近的租佃庄园“博克斯海姆庄园”，用言语和文字向该地的几个党员阐述了纳粹主义的制止革命思想，它很快就以“博克斯海姆文件”而臭名远扬。在“废除了迄今为止最高的国家机关和战胜了地方自治团体”以后，贝斯特要求冲锋队和各邦军队夺取“已经孤立的国家权力”，并毫不容情地建立“居民中最严格的纪律”；私藏武器者应“不加审讯就地”处决。

一个变节的党员将贝斯特的计划向警察告了密，警察立即着手干预；黑森司法部门解除了这位法官的职务，但莱比锡德国最高法院于1932年10月以“查无实据”为由，停止对他进一步追究。而纳粹的上台也使这个警察国家理论家本身同警察融合在一起。贝斯特的朋友海因里希·缪勒博士被任命为驻黑森中央专员；缪勒请贝斯特负责领导警察，这位朋友应允了这个请求。

但是这位新任邦警察局长不久就同纳粹党黑森区领袖施普伦格发生了冲突，后者不喜欢贝斯特博士对党的要求客观地、批判性地保持距离，1933年秋，贝斯特不得不离开。此后，瓦尔纳·贝斯特（他已于1932年加入党卫队，在被撵出黑森后领导着南部和西南大区保安处）的名字列入了海德里希的人员名册。这时保安处头子正在着手扩大秘密警察，他于1934年年底召见

了这个黑森人。起初，他不知道他给自己招来了一个最大的“制动装置”（海德里希语）。因为贝斯特尽管理论上处处主张民族主义的强权国家，但内心深处仍保留着坚持最后一点规范化的法学家思想。他的公务人员作风也过分严重，思考问题过于刻板，无法同不讲原则的通权达变竞争，而瓦尔特·施伦堡一类正在成长中的法学功能主义的保安处一代人，正是以这种通权达变而著称的。

海德里希依靠他的新僚属巩固未来统治机器的核心，也就是那个偶一提及就使千百万德国人毛骨悚然的工具即秘密警察，在那个时候，民族社会主义警察干部中存在的上述分歧，还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海德里希有意识地扩大秘密警察那种威风凛凛的名声。因为只有无所不知和毫不留情出击的声名，才能使秘密警察印上领袖专政最强大的威慑性武器的标记，并遏制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对政权的行动。海德里希后来说过，秘密警察是作为“一种慑服和恐怖的混和物”而考虑建立起来的，这句话道破了一个已经达到同的的人的沾沾自喜。

海德里希的手一年比一年伸得更长，有一次他给达吕格写信说，必须把“所有政治方面的事情划为保安警察的管理范围”。布拉赫特从中作梗。根据记录，他说过这样的话：“那样一来，警察将……最终变成替其他当权部门跑腿的差役，本身只有不具备任何价值的指挥权而靠边站了，他只能一味执行别人的命令。”布拉赫特和海德里希很快就陷进了一场堑壕战，为争夺每一点管辖权斗得难解难分。尽管风纪警察和保安警察在1936年明确地分了家——风纪警察仍有几个前哨位耸立在对对手的地盘内。达吕格的总处负责各地方警察的行政管理组织问题；刑事警察的预算以及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的机关房屋问题也由达吕格的总处说了算。

保安警察和风纪警察这两个总处的斗争，集中反映到警察总局。保安警察处处长要求警察总局的权力也必须进行分配。海德里希写信给达吕格说：“警察总局一分为二意味着彻底实行中央领导权的一分为二。警察总局是你的机关，也是我的机关。”但风纪警察处处长根本不听这一套；战略家布拉赫特暗中给所有同保安警察作对的警察局长撑腰。

海德里希挥戈反击。在跟希姆莱商定后，他任命了保安警察督察员（LDS），他们在各防区的任务是，强使刑事警察和秘密警察在中下层也联合起来。保安警察督察员，就成了受风纪警察控制的警察局长的危险对手；刑事警察机构突然间有了两个主子，哪个主子强就倒向哪一边——多半是倒向保安警察督察员。“自从设置督察员以来……我这个当警察局长的，活动受到了干预，部分地损害了我的权威，”德累斯顿警察局长、党卫队旅队长卡尔·普夫洛姆埋怨说，并写道，他“无法再负责下去了，如果我的职权逐渐被吞掉的话”。

无怪秘密警察领导成员不得不既嫉妒又疑虑地注视着他们的同行刑事警察的事业了。海因里希·缪勒的巴伐利亚小队，是唯海德里希马首是瞻的、充满改宗转向的盲目狂热主义的公务人员班子，这些人记下了刑事警察的每一个错误和失职行为。这个班子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痛苦地感到自己的活动令人厌恶。1937年的一份秘密警察内部调查报告，透露了缪勒、胡贝尔和迈辛格的怨愤。这份材料的未署名的作者，将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的任务作了比较。秘密警察：“这一行业在公众中很少会引起好感，相反，它会遇到公众多方面的直接敌视。”刑事警察则不同：“在公众舆论中得到充分理解和

肯定。”

秘密警察纓勒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责难他的“朋友阿图尔”无能。这两个中央刑事部门的头儿拼命制造内江，而且奈比还知道，如果纓勒向海德里希建议，刑事警察在打击犯罪活动时必须采用秘密警察的做法，后者是会乐于采纳的。

第四节党卫队史上最荒唐的闹剧

力求监视工作完美无缺的海德里希，只能好歹依靠秘密警察，但秘密警察人手太少，远远不可能记下八千万人民中每一点可疑的迹象。秘密警察贝斯特在战后声称，监视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是“根本无法靠为数有限又完全忙于日常事务的公务人员所能做到的”。巴伐利亚发生的一桩巨骗案，表明了海德里希的控制网漏洞百出。该地的高级机关，被一帮政治骗子、酒徒和患心理变态症者蒙骗了长达三年之久。

这个帮派的头子是慕尼黑前工厂主埃米尔·特劳戈特·丹蔡森，他是一个政治上好出风头的人，早在1932年就参加过由党的大法官布赫所精心策划暗害冲锋队头子罗姆的阴谋。这个罗姆的宿敌感到自己被党的领导出卖了，在冲锋队头子伏诛后，他的指望终于参得到应有的犒赏。当奖章和头衔都未能捞到后，丹蔡森决定暗中伺机报复。

他跟一批出于种种原因同样对纳粹党怀恨的老战士纠集一起，其中也有因触犯刑法和失宠于纳粹党的血旗勋章获得者，包括1923年希特勒政变中的旗手、多次吃过官司——最近一次是侵吞慕尼黑拳击俱乐部一万六千马克公款的阿尔贝特·阿姆普勒策尔以及慕尼黑纳粹党全国指导处的职员埃里希·格鲁尔，据秘密警察一份报告说，他是“严重心理变态病患者，完全靠服用麻醉剂过日子”。

这帮怪诞不经的人物在1934年末搞了一个组织，其任务是将它的成员安插到有利可图的职位上，同时建立一个使纳粹党心惊胆寒的情报组织。发起人丹蔡森想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从现在起打出“党卫队保安处”的旗号，他满有把握地认为，对于保安处的人，新德国的任何机关都不会拒之门外。

这位“保安处的丹蔡森”很快变成了巴伐利亚首府的有势力的人。谁也不愿失去替这个诡秘的保安处效力的机会。短时间内丹蔡森就拥有六十九名工作人员，他们的联络线从党卫队南德地区总队本部通到慕尼黑警察局政治部，一直通到褐色大厦。一批公务人员和警察局的警官热心为他们提供有关单位和重要人物的情况，在巴伐利亚邦劳动局和普法尔基兴、德根胸多夫、魏森堡、施魏因富特以及班堡等地的劳动局里，丹蔡森的心腹们也安下了眼线。

邦劳动局的灰衣主教、前冲锋队区队长汉斯·卡伦巴赫是丹蔡森最亲密的合作者。秘密警察后来证实：“他是局里一致公认拥有各种关系，可以直通领袖的人。凡是有所企求的人，都跟着卡伦巴赫的屁股转。”依靠卡伦巴赫找到工作的巴伐利亚老纳粹分子，甘心争当创建的心腹，据说卡伦巴赫专给老战士介绍工作。连邦劳动局副局长也相信，卡伦巴赫是受党的委托给全国的纳粹分子安排工作的。

直到丹蔡森开始用搞到的内部材料，向包括慕尼黑警察局长在内的纳粹高级干部进行讹诈，秘密警察才警觉起来。1937年春，秘密警察揭穿了那个冒牌党卫队保安处的蜘蛛网。但丹蔡森在警察局里的朋友这时还不肯放弃自己的想法，即他们确实是为真正的保安处效力的。

海德里希非常现实地看到，在自己的监视和控制系统中有漏洞。单靠秘密警察，他是无能为力的，现在必须开辟第二条战线，现在是启用另一个同样由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担任第一把手的组织的时候了。这个组织就是党卫队保安处（SD）。

党卫队保安处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崭露头角。对于民族社会主义上台，保安处实际上没有起到什么值得一提的臂助作用，为数可怜的一百名处级机关的和一百名名誉领袖的保安处人员（1933 年秋），只是扮演了无足轻重的跑龙套角色，希姆莱也不用保安处的有力配合，就攫取了各邦警察机器，长期以来保安处默默无闻，连党卫队队员们也不大清楚“党卫队全国领袖保安处”是为什么使命服务的。

达豪特别机动部队党卫队三级小队队长阿道夫·艾希曼以为，保安处是希姆莱的卫队，他怀着“可以到处转悠，有汽车代步，只要留神不出事情就行了”的想法向保安处报到，结果很快就“大失所望”，保安处门徒奥托·奥仑道夫原以为保安处是个情报机关。奥仑道夫说：“首先令人失望的是，在 1936 年还根本不存在一个作为情报组织而设立的保安处机器。”

党阀们显然并不怎么把保安处的人放在眼里。1933 年秋天，纳粹党区领袖施普伦格将保安处领袖贝斯特博士从黑森警察局长的位子上挤走；更丢脸的是不伦瑞克纳粹邦政府总理迪特里希·克拉格斯对保安处的打击。1933 年夏，保安处阴谋反对克拉格斯和两个同希姆莱竞争的党卫队领袖——邦司法部长阿尔佩斯和警察头子那克尔恩，并企图推翻克拉格斯集团，那时邦总理向纳粹党的最高法庭控告了保安处。保安处主子希姆莱赶快扯起了白旗，不伦瑞克保安处长被逐出党卫队，并送进了集中营，他的重要心腹被解除职务，保安处办事班子负责人被押送法庭。同时希姆莱还不得不把高级党卫队头衔送给保安处的冤家对头，党卫队队员阿尔佩斯晋升为旗队长，本来不是党卫队队员的克拉格斯一下子当上了地区总队民。

保安处一时威信扫地，纳粹党不得不在精神上给保安处以新的支持。1932 年年底，马丁·鲍曼起草了一个致纳粹党的各区领袖的通知，驳斥保安处行将解散的谣言，这估计是应希姆莱的要求而写的，可是在千载帝国崩溃之后，人们看到历史学家笔下所叙述的却与此不相同。在这些历史学家看来，保安处成立伊始就是一种恐怖组织，一个渗透到所有地方的秘密敌对派，像欧恨·科贡所写的“即使在党内也四处作祟的”恐怖之神。

第五节党卫队没有职业间谍

人们相约加入保安处。政治学家赫恩向推荐自己门生奥仑道夫进入保安处的同事那森频送秋波，但那森谢绝入伙；相反赫恩拉来了另一位同行政治学家弗朗兹·西克斯博士，后者又将自己的学生、本来有志于当文学教授的赫尔穆特·克诺亨博士吹捧一番，使他进了柏林威廉街。对保安处感兴趣的分子纵队的第一号殿军，是一个功名心切的年轻萨尔布鲁根人，名叫瓦尔特·施伦堡，1910年生，法律和政治学家，他早在波恩上大学时就给保安处做过情报工作。善于识别人才的海德里希看出，他是一个可以培养成符合自己要求的人。

一支由机敏的知识分子拼凑成的保安处骨干力量，使海德里希摆脱了威胁他的警察国家统治机器活动的危险处境。在此之间，他的系统内的要津全被秘密警察占据，因此保安警察头子不得不担心会过分受制于秘密警察及其公务人员精神。因为即使是秘密警察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忠诚也掩盖不了以下这一点，虽然它的方法都是新的，但是在它内部仍旧活生生地存在着音鲁士德意志行政传统的残余。连秘密警察法官贝斯特也早就露出了维护旧公务人员体制的本来面目，妨碍着海德里希用他所谓革命的动力来取代一个专业公务人员体制的企图。

海德里希和贝斯特之间已发生过最初的分歧，因为这位法官过于以不凭公务人员个人感情的客观态度来对待保安警察头子。一条本身无可非难的墙上座右铭揭示了他俩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缝。公务人员将贝斯特博士自己拟的一条座右铭写在一块牌子上，挂在他的办公室里：“实事求是地工作终将无敌于天下。”当海德里希某次夹访，看到这条座右铭时，感到不是滋味。海德里希说：“这个也许能使到这里来同您谈判的部务参议们看了会感到喜欢，但在现实中，这句官僚主义的信条却是荒谬的！”

在任命秘密警察各级入选时也发生了摩擦。海德里希要派听话的、不拘泥于任何条文规定的非法学家担任主管，而贝斯特却提出只能考虑法学家，海德里希对法学家的看法跟他的领袖希特勒相似，因为领袖说过：“在德国人没有都懂得当法学家可耻之前，我是不会安心的。”

海德里希利用这一着棋，使自己摆脱了固执的秘密警察官员们的压力。保安处的贝斯特和只是为了表面光采以保安处的职衔装饰门面的纓勒及胡贝尔之流，被作为党的机构的保安处成员从真正的保安处分出去了——这是解释保安处领袖贝斯特和纓勒后来为何千方百计抵制保安处打入秘密警察这一奇怪现象的唯一原因。不过现在，海德里希给情报机关的保安处开辟了一个几乎不受任何限制的活动领域，遵循保安处头子提出的

口号：保安处的使命是成为大德意志国家的情报局。

保安处原有监视机器的范围扩大并改善了，由党卫队旗队长西格弗里德·陶贝特以处本部负责人身份代表头目海德里希（他在附近的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办公）坐镇在威廉街的保安总处，增设了新的部门和指挥所。

单看这一机器的组织机构，即已证实了海德里希传记作者什洛莫·阿伦森的看法：保安处的年轻人“迷恋于能够从事神秘的谍报活动和情报工作的想法”，陷入了一种詹姆斯一邦德式的踌躇满志。他们的楷模确实很少取自民族社会主义修身养性的课本，更多地却是取自大力渲染英国情报工作的那些侦探和冒险小说。例如侦探小说迷海德里希不知从哪本书中看到，英国谍

报局头子用简单而神秘的代号“C”（chief = chef）；他就摹仿这位者大哥的作法，从此“C”象幽灵似地出现在保安处的一切行动和公文案卷中，如“C命令”或“C亲自决定”。甚至连公章也要炫耀这个几乎从不公开露面的头子的魔力：“C审阅”。

以从事情报工作而表现的天真乐趣也反映在数字神秘学上，所有各处、中央和主管部门、科组的名称，均以数字代替。保安总处的三个处用罗马数字表示：Ⅰ = 组织处，Ⅱ = 镇反处，

Ⅲ = 同外处。反之各处的下属机构则相应地用阿拉伯数字表示，例如：为中央“组织和督察”科，为“组织任务”主管科，Ⅰ，为“人事任免”科，Ⅰ，为相应的组。

这个情报总部的线通向保安处的七个大区（OA）的本部，大区管辖的地区不是（像普通党卫队大区那样）和军区一致，而是和行政区一致。各大区的情报网又划分为二至三个分区（UA），分区情报网再各自伸展到一个县或一个大城市的保安处外勤站。外勤站是保安处情报机构最重要的细胞。

在这支保安处情报人员大军中，只有少数人是党员和党卫队员。保安处领袖海因茨·赫普纳在战后估计，总处一级的保安处成员中，有百分之十来自普通党卫队。有时连证据确凿的政敌也被保安处拉来，向他们了解对纳粹党的批评意见。

情报像水母那样，将它的触手伸向德国所有社会领域。同保安处合作的不光是低微的告密者和密探，同样威廉街也利用知名的法官、企业主、艺术家和科学家为它工作。像在中央一级工作的各种专业青年学者一样，各外勤站也有一批知识分子骨干作为“报告员”参与工作。科布伦次区保安处1938年有二十四名左右名誉合作者，其中四名得过博士学位。该区十一个特别知名的情报员中，四个是普通行政机关的公务人员、四个是警官、一个医生、一个教师和一个兽医。

尽管如此，情报机关的知识分子对“密探”这个词还是羞羞答答地不表好感。“如果纳粹德国竟然……求助于密探和间谍，这也许是有失它的体面，”亲保安处的警察理论家施利尔巴赫这样写道。甚至在一份不对外发表的保安警察文件中，也出现了这样一句话：“不允许进行职业性间谍工作！！！”在保安总处里，人们对密探敬而远之，几乎是授受不亲。阿道夫·文希曼回忆道：“我们不认识任何情报员，也从未有任何情报员进过总处的大门。”直到后来那些秃顶的先生们久已释怀之后，后来的保安处长瓦尔特·施伦堡才使情报员制度走向正规化。从这时起，中央机关才认识自己的情报员了。

保安处的监视岗一年比一年细密，它的魔掌越来越紧地控制着全国。1937年保安处情报机构已拥有三千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一支五万名看不见的情报机构已拥有三千名总处一级工作人员，一支五万名看不见的情报员大军随时准备待命行动。

可是谁是行动的对象呢？保安处要监视什么，要调查研究什么呢？这是一个主要问题。在斗争时期，保安处的任务只限于清除纳粹党队伍内部的敌人，了解和敌人方面的动向，这种任务一直是令人置信的，因为当时甚至连警察权力机器也掌握在敌人的手里。但是1933年1月30日以后，纳粹党已经接管了警察机器；对敌人，不论什么样的敌人，现在都可以运用警察手段予以打击。

因此保安处开始时只限于扮演一种辅助警察的角色。希姆莱在1934年7

月4日宣布，保安处是“秘密警察的唯一政治谍报机构”。半年后，这位党卫队头子又发布指令：“党卫队保安处负责调查抵制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敌人，并推动国家警察部门开展打击工作和谍报工作。”但它不得行使任何执行权，可是保安处为了充当秘密警察眼线的角色过于自豪了，它为自己想出了一项新的使命：保安处应成为一种精神警察，成为民族社会主义进行思想控制的工具。

希姆莱解释说：“党卫队保安处是党的、说到底也是国家的大型世界观情报组织……保安处关心的是世界观的大问题。”保安处以意识形态纯洁性的保卫者自居，把新的工作领域牢牢抓在自己手里，按照希姆莱的说法即是针对“共产主义、犹太民族、共济会、极端拥护教皇思想、政治化教会和复旧活动”。但实际上这只是原有斗争任务的新提法而已，保安处的人统称之为“镇压反对者”。

保安处的密探们到处探索人民群众思想意识上的一切棱角，不放过任何机会捕捉同胞心房里的杂音。威廉街大楼里不停地发出命令、电报和电话，使特遣队疲于奔命。

德国人不论走到哪个公众场合，都会有保安处的影子跟随。1938年1月26日，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格里伦贝格尔报告随“精力来自欢乐”的游船“德意志人号”所作的意大利之行说：“度假者弗里茨·施瓦内贝克，1901年3月30日生，住术肯贝格的费罗居民区，他在唱国歌时态度吊儿郎当，故作不感兴趣的样子，使人看了反感……度假者共六十名……进港太晚。旅行结束的会上对此进行了严厉申斥……违反外汇管制条例……”

每当骗人的选举临近之际，保安处就得准备倾巢出动。如同1938年4月4日埃尔富特外勤站的一份指令所说，它在选举之前即已开始将“地区内所有可以肯定在行将到来的选举中准备投‘反对’票的人”上报给保安处，不顺从者的名单一经上报，给嫌疑分子用的选票也随即准备好了。选票上用不带色的打字机打上号码，同时在选民登记表相应的姓名后面分别注明这些号码。这样——1938年5月7日科布伦次区保安处报告说——就能“查出投废票或反对票的人……涂上脱脂牛奶即可显现出来。”

保安总处的案卷、资料和分析报告年复一年地增多，堆积如山，上面记载着被怀疑的公民的一举一动。处112科收集了至今还时而表现出不顺从的《法兰克福日报》主编鲁道夫·基歇尔在魏玛时代写的文章，一份资料中说“这些文章”很能说明基歇尔的真实政治态度”。纳粹明星记者施瓦茨·范·贝克尔不走运，倒了霉，他在一篇巴勒斯坦报道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犹太人也将为他们自己的事业战斗捐躯。保安处教授西克斯的亲信兼抓刀人、二级小队长哈根咒骂说：“一个记者，尤其还在一份纳粹主义的报纸上公然承认，对巴勒斯坦犹太人内部的某些情况出于宣传的原因而只字不提，我认为这是不可想象的。”

第六节 蛛网密布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感到，作为他的统治机器而考虑建立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党卫队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它们的力量将有相互抵消的危险。双方都在扩大自己的地盘，双方都力图控制国家——而阿道夫·希特勒的大德意志国家太小了，容纳不了它们这两家。

1935年改组保安处时，忽略了给它明确划定一个不同于秘密警察职权范围的工作领域，现在却产生了恶果，秘密警察和保安处在同一领域内进行侦查缉捕，相互牵制。保安处在进行监视活动中，经常遇到秘密警察竞争者的盯梢。

为了制止两个监视者竞相角逐，海德里希于1937年7月1日发布一项职能划分指示。当务之急是“既不开展竞争也不考虑谁领导谁，而是相互配合，避免重复工作”，海德里希这样告诫道，并作了分工。分配给秘密警察的业务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叛国犯和流亡者；分配给保安处的则是：科学、民族和民族学、艺术、教育、党和国家、宪法和行政、国外、共济会和社团。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摩擦面，因为“教会、教派、其他宗教和世界观团体、和平主义、犹太教、右派运动、其他敌视国家的社团（如黑色战线、联合青年等）、经济、新闻”，都属于共同活动的范围。对此也作了重新划分；保安处负责“所有带普遍性和原则性的问题”，秘密警察抓“所有需要考虑由国家警察出面采取执行措施的具体案件”。

保安处分得了几乎一口气还念不完的这么多的任务，并不能掩盖它陷于被秘密警察挤入单抓世界观各领域的危险。对此保安处的人员奋起反抗。在保安总处本部办公室里，提出了具有充分理由的专门报告，尖锐地指出应由保安处掌握领导权；秘密警察只不过是出于国家在司法和行政上需要的产物，而第三帝国却需要“一个更加强有力的国家安全的屏障，它的起源和存在因素在于一种政治运动的意志”。这座屏障就是党卫队保安处。

这句话引自一份未披露作者姓名的备忘录，它有一个纲领性的标题：“保安处的独立性”。作者提出，秘密警察的任务是打击“敌视国家的现象”，保安处的任务是打击“危害人民的现象”。“敌视国家是一种涉及法律的现象，凡一个人及其行为经查明违犯了保卫国家的特点，在于往往根本无法看出它触犯刑法，但它对人民从而也对国家有时却具有远比直接敌视国家的现象严重得多的危险”。

但是，这种书面的自我欣赏，并不能遏制保安处开拓新领域的迫切心情。威廉街的人发现了两个至今尚未触及的、当然隐藏着新的冲突和勾心斗角的活动领域：国外谍报和生活问题的研究。

谍报工作一开始就使年轻的情报人员处于神经紧张的状态。不过保安处开展国外秘密情报工作主要是出于偶然事故，源于保安处追捕越过德国国境外的政权敌人。其中之一是“黑色战线”领袖奥托·施特拉塞，他在布拉格指挥一场鲁莽的十字军战役，反对他原来的党的首脑希特勒。

保安处领袖们感到施特拉塞的黑色电台特别危险，它向这个极权主义思想控制的国家播送反希特勒的口号。保安处得悉，这个电台是由前斯图加特广播电台技术领导人鲁道夫·福米斯工程师办的。海德里希下定决心要搞掉这个福米斯。1935年1月10日，海德里希召见了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兼保安处长的全能助手、前机械师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指令他：“您把

福米斯弄到柏林来！”瑞约克斯想出了一个作战计划。

保安处业已查明，福米斯办的施特拉塞电台肯定设在布拉格东南二、三十公里的某处。璠约克斯办好护照，化名商人汉斯·米勒，带着女友柏林体操教员埃迪特·克斯巴赫，乘一辆车号为IP48259的梅塞德斯轿车穿越国境。他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黑色电台设在多布里斯，确切他说：设在多布里斯“察霍里”饭店的一间房间里，保安处密探璠约克斯随即和女伴下榻在该饭店的第4号房间，跟福米斯的房间保持着一定距离。璠约克斯设法将福米斯的房门钥匙印了个蜡模，给保安总处发电报说：“找到了”，然后等待下一步指示。过了几天，他准备行动了。

1月23日，璠约克斯看了看表：夜晚9点30分。他拿了一盏灯在窗口晃了几圈。几分钟后，保安处派来配合璠约克斯行动的维尔纳·格奇，用一根绳子顺着墙头爬上来，跳进房间。他们俩以为福米斯不在房间里，便沿着走廊悄悄走到这个陌生人的门前停下。可是当他们把私自配的钥匙插进锁孔时，发觉对象在里面。瑞约克斯当机立断，敲了敲房门，里面传出一声：“有什么事呀？”璠约克斯嘟囔着说，对不起，忘了给福米斯先生房间摆肥皂了。

福米斯就去开门，正在这时，两个保安处分子一齐冲进房间，对工程师来了个突然袭击。福米斯正想拔出手枪，闯进来的两人中一个开了枪。鲁道夫·福米斯当场饮弹毙命。璠约克斯和格奇给电台设备撒上磷粉，一把火烧着了，然后在急促赶来的饭店职工们的眼皮底下逃之夭夭。

可是，在柏林保安总处的海德里希对法约克斯之流的保安处人员采用这种近乎强盗影片中所表现的笨拙手法搞情报工作却大发雷霆。此后几年中，保安处也仍是些很不高明的半路出家的干将聚集之所，他们叫任何一个情报老手看了都要摇头叹气。尽管如此，保安处还是在德国情报工作的莽莽丛林中逐步扩大了地盘。靠近边界地区的保安处外勤站系统地收集国外情报，一些保安处领袖则通过在外国居住的知名人士安设情报网。

主管谍报工作的是没有经验的党卫队区队长海因茨，约斯特及其中央处2科（反谍情报），不过总处的其他部门也感到有必要抓谍报工作。例如，保安处犹太事务科就在近东地区设了自己的一个情报机构，收集有关巴勒斯坦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冲突的材料。这个近东地区机构的主要联络人是德通社（DNB）驻特拉维夫通讯员赖歇特博士，他在巴勒斯坦相互冲突的双方营垒里都有耳目：阿拉伯人一方是《防卫报》发行人、民族主义领袖易卜拉欣·香蒂，犹太人一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领袖、犹太秘密军“哈加纳”司令官之一的法韦尔·波尔克斯。

保安总处一份存档的记录写道，“赖歇特博士允诺，在相应配合执行困难任务时只同保安处合作，所有重要情报材料均用‘H’记号标明，通过冯·里特根先主（DNB）或按二级小队长哈根通知的地址寄送。”保安处赖歇特的情报机构不是没有成绩的：1937年，它搞到了英国前首相斯但莱·鲍德温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一项英国和土耳其的秘密协定；意大利情报机关曾出十五万英镑收买这项协定的文本。

但是保安处愈是在情报活动的灌木林里努力扩大地盘，它就愈是遭到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军事谍报局的阻扰，在此以前，这位善于交际的卡纳里斯一直跟他过去的海军学校士官生海德里希保持审慎的良好关系，但这种关系终于被保安处的扩张所破坏。

第五章同壕挥戈

大丑闻

卑鄙的谎言

“总理”巧舌如的口才

第一节 叛逆

保安处独揽情报工作的垄断地位是以一个条件为前提的：它任何时候不得干预党内的事务。按照规定的框框，保安处是对敌的情报机构，这就是说，它的任务是侦查党内的敌对分子，但不得过问党的内部问题。

那么保安处的另一新开辟的活动领域就引起了一种势力的猜疑，对保安处来说，这种势力远比国防军危险：党的猜疑。正如国外保安处破坏了卡纳里斯——贝斯特协议条文的规定一样，国内保安处的新工作也向未形成条文的协议精神挑战，因为这条协议从党的总管鲁道夫·赫斯宣布保安处是纳粹党唯一的情报和谍报机构之时起，就使保安处受到党的约束。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也发出严格指示，禁止一切保安处成员参加党内任何形式的讨论，不许报告任何有关党的事情。下面自发送来的消息和报告，必须原封不动地立即上交党的秘书处。党，特别是党的区领袖们，疑虑重重地注意不让保安处发展成一个反对纳粹的密深组织。

但是自从保安处改组后，威廉街就有两个偏偏主张对党进行监视的纳粹分子在工作，因为保安总处中央 处 2 科科长赖因哈德·赫恩教授及其工作班子负责人奥托·奥仑道夫认为，保安处就是纠正纳粹独裁工具、发出批评呼声这样一类的机构。

早在 1936 年他俩初次见面时，赫恩就告诉新同事奥仑道夫：由于再也听不到公开的批评意见，保安处今后的任务是“把民族社会主义的发展情况报告给党和国家领导部门，而且要着重谈发展中的错误倾向、弊端等等”。教授们的主张得到了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奥仑道夫这个忠实的内行的响应，就在希尔德斯海姆设法为防上他所认为的民族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灾难性错误倾向而工作。

奥仑道夫这个人，可以说得上文质彬彬，许多人把他看作是患有神经官能症、时常表现郁闷而自负的知识分子，他预感到民族社会主义的内脏存在着致命的危险。他断定民族社会主义内部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方面的集体主义思潮，以及立宪政策上的国家绝对主义倾向。对于前一种逆流，使用了含混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这一词，并指出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国劳工阵线头子罗伯特·莱伊和德国农民理论家、党卫队副总指挥 R·瓦尔特·达里；后一种反对力量他称为“法西斯主义”，并把所有像法学教授卡乐·施密特那样贴上民族社会主义标签而不受规范和制度约束的独裁政治的人列为法西斯主义信徒。

“他（奥仑道夫）不懂得同全国领袖打交道的诀窍，”希姆莱的秘书鲁道夫·勃兰特感叹他说。“他应该问或带上一块刻有日耳曼民族古文的石刻去见全国领袖，针对他的日耳曼民族思想，投其所好地提出意见，不要用全国领袖显然不大懂的方面冷冰冰地去找他，也不要带着一副死板严肃的神情提出消极的顶见。”

希特姆甚至采取了平常特别小心避免的做法：不通过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直接把固执的奥仑道夫叫到跟前，当面撤了他的职务。奥仑道夫遭到训斥，保安处抓生活领域是非法的，党决不会容许；保安处只能合法地进行以敌对分子为目标的情报工作，其他一切做法都有损党卫队的利益。海德里希也紧跟着这样做。奥仑道夫被撤去 处 2 科的领导职务，仍干他原来仅限于经济方面的那份工作。 1937 年 9 月 4 日，海德里希发出指示：“各生活领

域的形势报告的任务只能报道民族社会主义世界观在各个生活领域内的贯彻执行情况和遇到的阻力，以及（有条件时）说明施加阻力的人，只有从这一角度出发，才可以报告文化、物质生活情况或公共生活有关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奥仑道夫感到继续留在保安处已索然无味了。他呈请海德里希允许他离开保安总处。海德里希不予批准；他不愿丢掉奥仑道夫这个行家，因他是今后扩大势力时可能有用的工具。希姆莱尽管害怕党的批评，但也舍不得失掉奥仑道夫。

直到 1938 年春天，这个郁郁不乐的生活领域探索者才至少卸去了保安总处的领导职务。伺民经济学家奥仑道夫只保留了保安处名誉旗队长的头衔，获准到纳粹党经济部门的一个强制性机构，即德国贸易组提任经理，不过他的命运仍继续和保安处联在一起；每天附带在威廉街大楼里待上几个钟头，象过去一样领导他原来的主管科。

奥托·奥仑道夫的情况并不是孤立的。威廉街接到了各地区保安处网为自己的存在忧心忡忡的告急报告：奥仑道夫危机再次清楚地反映了一个叫人更加弄不明白的问题，即一心想探索试验的保安处的前景究意如何。海德里希的助手施伦堡记述道：“从前线传来心理影响巨大、正在对保安处今后命运疑虑重重的报告纷至沓来。同时还应指出，正在开始一股脱离总处的强大趋势。”

第二节党卫队发誓打掉陆军总司令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眼见有必要就保安处的地位问题最终作一次彻底的澄清，原因是，还在奥仑道夫引退以前就发生过一场大丑闻，暴露了他们的统治机器极不稳固。这场丑闻咎在秘密警察；它几乎断送了海德里希的权力和这两个党卫队头子之间的合作关系。

这件事情的渊源要追溯到 1936 年 5 月，导因于警察总局里的柏林一审法院推事。该院推事恩斯特经手审讯一名惯犯，他是柏林法院和监狱的常客：工人奥托·施密特。因斯特从积犯登记表上看到：奥托·施密特，二十九岁，1921 年至 1922 年因三次行窃分别处监禁商星期、三星期和三十天，1924 年因行窃监禁四个月，1927 年以侵吞财物罪监禁一个月，1928 年因讹诈同年又因强行讹诈监察六个月，1929 年因诈骗监禁两周。

1935 年，施密特再次因涉嫌讹诈被刑事警察抓住。在负责初审的刑事助理员尤斯图斯面前，这个骗子手供认了几件鸡毛蒜皮的讹诈勾当，不承认犯有更大罪行，于是施密特最后被带到法院推事办公室。但推事恩斯特成功地撬开了施密特的嘴巴。这个诈骗犯突然滔滔不绝地、不加掩饰地往下招供说，他曾经企图对许多人、对“几百个”其中包括不少知名人士进行讹诈；他们多半都是搞鸡奸被他当场抓住的。接着他就交代一个个姓名，例如波罗的海自由团领袖的儿子、律师吕狄格·冯·戈尔茨伯爵，波茨坦警察局局长、党卫队旗队长冯·韦德尔伯爵，中央经济部长丰克，还有一个“弗立契将军”。恩斯特的耳朵立即竖了起来，问：哪个弗立契？施密特不肯回答。

从这一桩普通的讹诈勾当案，顿时引出一件重大的政治鸡奸案。这种案件属于“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的受理范围，它设在秘密警察处里，负责人是刑事参议瑟夫·迈辛格，施密特的案卷送到了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专家辛格看了案卷，弗立契这个名字同样使他心里一怔。这是那个陆军总司令瓦尔纳·冯·弗立契男爵大将吗？就是德国保守党反对派的暗中希望、党卫队千方百计想利用特别机动部队打掉国防军对武器拥有垄断权的那个公开的敌人吗？迈辛格命令把犯人施密特带来，交由治安警察霍伊塞雷尔上尉进行审讯。

1936 年 7 月 8（或 9）日，霍伊塞雷尔拿出由迈辛格准备好的一本照片册，放在施密特面前，让指望一举闻名的施密特像灵雀似地、一伸嘴把那张拥有显赫头衔人物的照片啄出来。向来主张刑事侦查要采取大刀阔斧方法的刑事参议迈辛格，在被复制的像片下注了姓名和职称。施密特读到：“陆军总司令大将冯·弗立契男爵”，眼睛眨了一下，施密特说：“就是他”。接着人们记录了他的供同：

1933 年 11 月某天晚上，他在柏林万湖火车站前厅，盯住了一个身穿带有褐色皮领的深色大衣、头戴深色礼帽、围白围巾、夹单片眼镜的人，这个人和绰号“巴伐利亚约普”的出卖色相的小伙子马丁·魏因格特纳一起，离开火车站大厅，进入一条供铁路局专用的黑胡同。他尾随在后面，看到两人在那里发生了鸡奸关系。施密特继续说：过了一会，这位先生走出来了，步行到附近波茨坦广场的环形车站；在这里，他拦住那位先生，把看到的情况的一五一十对他讲了一遍，并伪称是“刑事警官克勒格尔”。先生自称系冯·弗立契将军，并出示了身份证，身份证的上方清清楚楚注明姓名“冯·弗立契”。

接着就讹诈金额进行了谈判。先生告诉他无意叫他发市不利，并表示不

在乎几千马克，不过自己身边只有一百马克，他们双双乘车去利希特菲尔德，下车后先生走进了费迪南德街 21 号。过了十分钟，先生出来，往他手里塞了五百马克，并答应第二天再给他一千马克。这笔钱他也收到了，并且答应他以后再给一千马克。1934 年 1 月中旬，他在利希特菲尔德东首高速铁路车站二等车候车室里拿到了这一千马克。这一次是由他的朋友，绰号“野马”的工人海特尔陪同去的，他向被讹作者介绍海特尔是他的上司。他分了五百马克给海特尔。

以上就是奥托·施密特 1936 年 7 月初的供词。迈辛格胜利了。偶然的机机会使他掌握了一件置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于死地的武器；他约瑟夫·迈辛格可以利用这件武器，为党卫队主子们除掉一个最危险的敌人。迈辛格抓紧办案。8 月间，经过刑事书记官勒夫纳复审，施密特给自己的追述反复补充了其他细节；8 月 20 日，同犯海特尔也供认了施密特所谈情节属实。对此，迈辛格再也不存在疑团了：施密特供出的冯·弗立契正是仇人冯·弗立契大将！

迈辛格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个引为欣幸的发现，党卫队头子希姆莱很快亲自出马向希特勒报告这一发现，可是，在总理府等待着他的却是一片扫兴。阿道夫·希特勒匆匆看了看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指令烧掉“这种无聊的东西”。希特勒曾经对这个军事技术专家冯·弗立契说过“喜欢”他的话，所以他对于扩军狂希特勒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希特勒是不会因为这么一桩微不足道的事情而放弃一个军事技术专家的。

希姆莱时运不济，他给这位独裁者送呈弗立契案卷不是时候，他以为，由于希特勒对自己的陆军总司令“持恭恭敬敬的审慎态度，大概会让他便直行事，借以避免自己出面直接抨击陆军领导”，希特勒的军事副官，前上校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也这样说过。党卫队头子活该忍气吞声给碰了一鼻子灰，在当时，任何一个胆敢批评国防军、特别是批评国防军将领的人，没有不给希特勒顶回去的。“说不定，”希特勒有一次对包姆海军上将谈到，“有哪个党内的人跑来告诉我：‘我的领袖啊，样样事情都好，只不过某个某个将军在讲反对您的话，在做反对您的事！’那我就说：‘我不相信有这种事！’如果对方再说：‘我可以拿书面证据给您看，我的领袖！’那我就撕掉那些废纸，因为我对国防军的信任是不可动摇的。”

希特勒和海德里希同样只好把他们的“废纸”撕掉，海德里希指示销毁弗立契案卷，不过在销毁之前他设法复制了其中的一部分。看来他是指望有朝一日还能把这个案子重新抛出来的，这一天来得比他希望的要快，因为这时候，总理府发生了民族社会主义政权史上决定性转折点之一的一场争吵：1937 年 11 月 5 日下午，希特勒已经意识到，冯·弗立契和国防部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元帅，只会犹豫不绝地、碍手碍脚地勉强跟着他走日益铤而走险的冒险政策道路了。

希特勒向六个最接近自己的人（除冯·弗立契、冯·勃洛姆堡、戈林和霍斯巴赫外，还有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和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披露了他认为非常重要的要求——据霍斯巴赫记录——“当成政治圣经”来看待的未来计划。核心问题是：德国至迟必须在 1943 年用武力扩大它的生存空间，必须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占为德国所有。军人冯·勃洛姆堡和冯·弗立契的士兵们有顾虑，当然仅仅是军事技术上的顾虑：捷克斯洛伐克边境上的工事异常难于攻克；即使在法、意两国交战的情况下，也必须估计到法国在德

国西部边境保持一支强大的陆军，只有在英国和法国确保中立时才能进行战争。“讨论的形式有时非常激烈，特别是以勃洛姆堡、弗立契为一方和以戈林为另一方发生争执，而希特勒只顾坐在一旁听着。”霍斯巴赫记述道。

希特勒听够以后就说出自己的看法。依靠这些军人，要向纳粹外交政策的战争冒险地带发起进攻，只能一开始就导致失败。希特勒对他的军事领导人突然表现得冷淡起来。

迈辛格的弗立契案卷一下子又具有现实意义了。是希特勒将它重新抛出来的吗？这确是不大可能的。但另外有一个人兴

致勃勃地急于怂恿秘密警察暗探们加害于陆军总司令。他就是
在总理府那场争吵中被冯·弗立契骂为不学无术的那个人，就是形式上一直还在担任普鲁士秘密警察头子的那个人，就是自封为陆军大将但始终感到被职业军人们嘲笑的那个人：赫尔曼·戈林。1941年秋，秘密警察迈辛格对希特勒过去的政治副官弗里茨·维德曼说，是戈林命令他重新整理弗立契案卷的。无法查证的只是具体时间。

秘密警察对弗立契案件的兴致，必定是紧接着弗立契和戈林在总理府争吵之后重新引起来的，因为陆军总司令在1937年

11月10日开始的埃及之行期间，即已受到两名秘密警察官员的监视，他们的任务是侦查大将是否出入鸡好活动场所的酒馆。1938年1月中旬，迈辛格又派出他的刑事密探四处活动，并再次审阅了讹诈犯施密特的交代。迈辛格最亲密的同僚、刑警探

长费林甚至基本查明真相，1月15日他查出，在施密特的讹诈对象当年进去过的费迪南德街21号的邻宅，住有一个退役骑师冯·弗立契，紧张的侦查再次中断。

1月24日夜里，戈林一定给刑事参议迈辛格下达了重新整理冯·弗立契案卷的命令。戈林在1月24日晚到总理府时，显然还没有把案卷带去，但次日上午，案卷却已摆在希特勒的办公桌上了，由此可见，它是在24日夜里才搞出来的。事实上，秘密警察官员们也一再声称案卷是“集中力量开夜车”重新整理出来的。希特勒的副官夏勃打的一个电话也符合这种说法——夏勃的电话在1月25日清晨2点15分左右叫醒了霍斯巴赫，通知他立即去总理府。看来正是因为迈辛格报来了弗立契的案卷。

相隔短短几个钟头以唐，霍斯巴赫副官所见到的希特勒几乎判若两人。毫无疑问，勃洛姆堡和弗立契两案给了这位独裁者以沉重的打击，也许动摇了他终生对普鲁士德意志军人的轻信。据维德曼副官记述，希特勒“这样垂头丧气，是我在他身边工作整整四年从未见到过的。他低着头，背着双手，在自己房间里踱来踱去，喃喃自语地说，如果一个德国陆军元帅做出这种事情，那么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了”。格德·冯·伦斯德将军发现希特勒“处于一种我从未见到过的盛怒之中。好象在他内心里有什么东西破灭了，他对人的信任也丧失殆尽”。

所有这些难道是表演吗？开始时肯定不是的，但很快希特勒的豺狼本性就预感到这是一个机会，可以一举解除国防军领导阶层的权力，从而使自己登上军队的首脑地位。任何军人再也无法阻止他敢冒外交风险的征途了。

第三节致命隐私

当正直的霍斯巴赫一再断言大将冯·弗立契无罪时，希特勒委派他最信得过的亲信去核实施密特的供词。戈林两次亲临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让人核实他和希特勒所要了解的情况：人证施密特坚持他的口供。这时，霍斯巴赫自己采取了行动，他不顾希特勒的明确禁令，在1月25日深夜至26日凌晨前去见大将冯·弗立契，通知他正在酝酿反对陆军总司令的事情。冯·弗立契呆若木鸡，只说了一句评语：“卑鄙的谎言”，再也没有讲别的话。

这一刹那间已经清楚地暴露，国防军的最大危机在于一种唯有以服从和领袖崇拜练成的军人性格，对此，法国元帅麦克马洪概括成了一句名言：“将军们是全世界最缺少勇气采取行动的人。”这句名言特别切中这个当时被打成阴谋反对希特勒的人。冯·弗立契大将压恨儿就不是这样一个人，也许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将军都更受到阿道夫·希特勒的蛊惑；直到最后他也不知道他的领袖究竟对他搞了些什么鬼，他没有看到自己可能会掉入深渊，如果不是同事们拉他一把的话。他极其不幸地、怀着愚昧盲目的忠心服从命运，服从他个人的命运、德国的命运。后来他这样描写希特勒道：“这个人是德国人的劫数，不论是好还是坏，这个劫数将走到它的道路尽头；如果它走进深渊，他将拉着我们大家与他同归于尽——没有任何办法可想。”

不过，也有些军官并不甘心把自己交给这种厄运来摆布。霍斯巴赫再次站出来为他的上将讲话。他久久地劝说希特勒，直到希特勒终于同意接见冯·弗立契。1月26日晚，大将被召到总理府。冯·弗立契急忙去见自己的领袖，想要亲眼看看“这只猪猡”，他和同时被传来的施密特相遇。施密特说：“就是这个人！”冯·弗立契以军人的荣誉起誓说：“我不认识这位先生！”霍斯巴赫这时等候在总理府的小饭厅里，他记述道：“独自等了好一会，突然我听到图书室和小饭厅之间响起噔噔的脚步声，小饭厅的门猛一下被推开，戈林冲进我正在等候的房间，举着双子，大声嚷着，一屁股坐进沙发里，连连吼叫道：‘就是他，就是他！’”

希特勒声言，即使大将以军人的荣誉宣誓也不能使他满意。现在戈林看出自己的对机来了，他把希特勒的副官维德曼拉到一旁：“听我说，您满可以找领袖谈谈。您告诉他不妨把陆军交给我，我已准备交出四年计划。”他已不满足于当一名居间人了。1月27日，他获悉凯特尔将军接到通知午后1点钟去见希特勒，这时他打电话把凯特尔找来。戈林想知道，谁将接替冯·勃洛姆堡。凯特尔道，“不用说只有您才有可能，因为换了另一个陆军将领，您（作为空军总司令）大概是不会屈居其下的。”尽管对方如此敏感，戈林还是使劲点头赞同。显然戈林还控制了一个第三者，即勃洛姆堡。这个栽了跟头的战争部长却认为，由戈林来接替他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可是，希特勒不想把自己的计划毁在戈林手里，总理使出他那巧舌如簧的口才，三次拒绝戈林当选。他对维德曼副官说：“根本不会考虑。戈林连视察空军的规矩都不懂。我还比他懂得多呢。”凯特尔听到的说法是：“这是根本不会考虑的，他交给了他（戈林）四年计划，空军必须由他来抓，比他更好的人找不到了，而且他必须作为他的既定接班人熟悉政务。”而对勃洛姆堡，希特勒则说了“几句对戈林不客气的话：他太轻闲——也许甚至可以说是懒惰，无论如何他不在考虑之列”，这位陆军元帅后来这样回忆说。

就在这个时刻，1938年1月27日下午4点钟左右，这位蒙受屈辱的战争部长开始对这帮军人怀恨在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喜欢过希特勒的宠儿瓦尔纳·冯·勃洛姆堡，他们死抱住自己的荣誉观，没有略微向这个倒台的陆军元帅表示一点人情的安慰。冯·勃洛姆堡决意报复，对于这种凌辱，军人们注定会再一次感到痛悔的。这位部长果真报复了：在离职前拜会希特勒时，他提议还是由领袖兼总理亲自担任战争部长一职，希特勒暗自欣喜。正在此时，战争部“国防处”处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却在日记中写道：“人们感到，德国人民正处在一个命运攸关的时刻里。一个女人对一国人民，从而也对世界的命运会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这她自己并未料到。”

希特勒已经作出了自己的决定。一天后凯特尔获悉，希特勒将亲自领导战争部（改名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OKW），“挽留我当他的参谋长，说我不可以也不会在这种情况下置他于不顾”。1928年2月4日，全国听说，希特勒冒险政策的怀疑论者已被清除：冯·勃洛姆堡和冯·弗立契下台；外交部长冯·牛赖特男爵由外交门外汉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接替；十六名将军被强令退休养老，另外四十四人被调职；战争部被取消，改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宣传部对这一场德国式的国哈切夫斯基事件发出了这样的口号：“集中力量。”走向灾难的道路已畅通无阻，阿道夫·希特勒变成了德国的绝对独裁者。

不过冯·弗立契这起刑事案件还得了结。希特勒在逼这位大将退职的前几天，就想好了一个狡猾的计划：示意冯·弗立契在双方不声张的情况下提出辞呈，可以不作处理。但遭到陆军总司令的拒绝，希特勒又想了一个主意：那么就由特别法庭对案件作出裁决，这时军人和法学家纷纷干预，发动一场证明陆军大将无罪的攻势。1月27日，战争部国防军军法处处长、部务主任海因里希·罗森贝格尔博士向凯特尔将军指出，对弗立契是根本不能考虑使用特别法庭的，对一个军官只能使用军事法庭，而且根据军事刑事法庭规程第十一条规定，对中将以上的军官需由领袖指定法官和法庭。凯特尔吓坏了，他想到在希特勒面前提这种要求就害怕。凯特尔犹豫不决：“您必须考虑，这些人都是革命起家，有着和我们不同的标准尺度。”

罗森贝格尔毕竟还是坚持实现了他的主张，何况他也得到中央司法部长的支持。弗朗兹·古特纳看出一个机会，终于能使希姆莱—海德里希机器日益增长的势力得到限制。他要利用弗立契案件表明，如果只由警察来对人定罪，德国将会滑到多少严重的司法专断的境地。希特勒亲自召见古特纳，请他作出判断。司法部长调阅了二十二份法院卷宗、七个秘密警察卷宗和其他审讯记录。然后他作出了决定，用的当然是纳粹官场的谨慎小心的语言。古特纳给希特勒写道：“有无罪过的决定不应当也不能由我作出；不管当事人的声望、级别或地位。这是应由法律裁决的事情。”

独裁者别无他法，只好同意组织军事法庭。希特勒任命成立国防军最高司令法庭，由陆、海、空三总司令和德国军事法庭的两庭庭长组成；他责成德国军事法庭法官比龙和卡尔·沙克博士进行预审。同时希特勒也在法庭机器里安上了制动装置：戈林被任命为法庭主席，而秘密警察也奉命配合进行调查。穿黑衫的和着灰色军服的双方之间的角逐开始了。

最初看来似乎秘密警察占了上风。审判长沙克还未开始工作，冯·弗立契就突然自动跑到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去听凭秘密警察审讯者摆布。冯·弗立契的朋友们为之惊讶不已。多年来，连刚入伍的陆军士兵都反复受到教诲：

秘密警察无权逮捕军人，哪怕只是传讯也不可以；多年以来国防军最重要的守则之一就是，它的地盘对任何一个秘密警察官员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论其职位多么高——而现在，神经失常的陆军总司令竟打破自己的规定，自动坐到秘密警察的面前去受审。

他不只去一次，而是接连去了两次。1月27日审讯他的是党卫队区队长瓦尔纳·贝斯特博士，陪审员有刑事参议弗兰茨·约瑟夫·胡贝尔。1月28日，贝斯特叫来主要证人施密特和他对质。审讯弗立契可算是秘密警察史上历时最长的一次，但秘密警察法官贝斯特内心感到一种少有的不安。无可置疑，大将给人的印象是慌慌张张，显然神经紧张，在试图解释为什么会引起旁人怀疑他犯有鸡奸的说理中语无伦次，在陈述他有一次在自己家里接待过两名所谓民族社会主义青年联盟的小伙子住宿时也是矛盾百出。冯·弗立契与犯人施密特无休止的争辩，也使贝斯特感到讨厌。

尽管如此，区队长贝斯特还是无法设想施密特的供述确有其事。在此期间，骗子手交代的某些情况，例如冯·德·戈尔茨伯爵的作案，不是已经证明纯属子虚么？审讯者贝斯特无法消除自己的疑团。他向希姆莱作了报告。全国领袖驳斥这个怀疑者的看法。希姆莱说：“骗子手也有所谓骗子手的脸皮。”换句话说，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骗子手决不会撒谎的。虽然如此，还是对施密特的供词再次进行了核实，这时秘密警察伙计们不得不看到，他们是受骗上当了。

奈比的知交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在1月30日晚上就听刑事警察处长说，“在所谓的弗立契‘案件’中，张冠李戴，搞错了人。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也知道这一点，但采取一切可能把事情包起来”。施伦堡也证实：“当海德里希有所顾虑时，案卷已摆到了希特勒的办公桌上了。”

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拉起了一道讳莫如深的铁幕。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不得使另一方看出正确解决弗立契案件的办法。秘密警察开始玩弄无耻的掩人耳目的手法。它装成始终坚信大将将有罪的架势，海德里希派出一群使者闯进营房，审讯所有曾经在冯·弗立契身边当过清洁工的军人。将军过去的副官也一一遭到审讯。甚至连冯·弗立契提供过食宿的两个小青年的母亲，也未能免于秘密警察的摆布，迈辛格这个粗声大气的莽汉，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指使主要的假人证施密特三番五次地站着背诵他编造的老口供。

尽管这样，警察老爷们毕竟还是神色慌张，这连局外人也看得一清二楚。希姆莱已不再信任自己的精明强干的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头子了；海德里希连连叫苦，说他的脑袋也许保不住了。约德尔将军记述道：“希姆莱肯定担心自己要被国防军高级军官们骂得狗血喷头。”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天天收到报告，从这些报告中，海德里希和希姆莱不得不看到的只有一个内容：陆军军官们纷纷聚集起来，都想砸掉保安处的权力。海德里希相信这些报告是真的，但是他知道，现在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报导跑到他的死对头那一边去了。

有一天，施伦堡接到自己头儿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海德里希命令施伦堡立即带上手枪和子弹会见他。施伦堡看到“C”心神不定；他们俩走进秘密警察处的机关食堂。一小时一小时过去，海德里希神经越来越紧张。突然海德里希看了看表说：“要是波茨坦的人一小时内不出动，危险就可算是过去了。”直到这时施伦堡才明白，海德里希如临大敌，是认真估计了波茨坦卫戍部队会对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采取行动。

第四节德国军人报复党卫队

德国将军们临阵退缩，只限于口头上表示一番愤慨。总参谋长贝克长时间冥思苦想弗立契事件究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新任陆军总司令瓦尔特·冯·勃劳希契大将抗议秘密警察冲击营房，而受辱的冯·弗立契大将则向希姆莱提出要求决斗，负责下挑战书的人冯·伦斯德将军始终没有去做，而是把挑战书藏在家里当作纪念品。只有霍斯巴赫上校和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毫不妥协地跟黑衫队员斗。他们最亲密的盟友是弗立契的辩护人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和中央军事法庭法官沙克，他们派出的侦察人员逐渐接触到了秘密警察的隐私。

沙克和冯·德·戈尔茨试图推翻施密特的供词。他们可以证明，冯·弗立契大将从来没有施密特所说的那种身分证，从来没有在贫迪南德街附近住过；将军也不（像施密特所说的那样）抽烟，没有带皮领的便服大衣，不过冯·弗立契的辩护者们也很快明白过来，施密特所说的情况一定确有其事，因为施密特对作案地点的描述显然符合实际。

这时冯·德·戈尔茨伯爵灵机一动。他查阅居民姓名地址册，寻找姓弗立契的或其他读音相似的姓氏的人。他的眼睛一亮，看到有：“冯·弗立契骑兵上尉”。这个人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费迪南德街21号！首席侦缉员沙克带领部下赶到骑兵上尉家里，揭穿了这个谜底。所有情节一概相符：骑兵上尉冯·弗立契承认在万溯车站作过案，他穿的大衣就是所说的那件皮领大衣，他抽烟很凶，他最后还支出了支付讹诈金的提款单据，是从德累斯顿银行第四十九分行他的10220号帐户提的款。

冯·德·戈尔茨伯爵去见自己的委托人，也顾不上问候，脑子只想着这一消息，一见面就冲他喊道：“大将先生，您可以鸣炮祝捷了，真正的弗立契已经找到，案情全部弄清了。”但前陆军总司令表示怀疑：“即使这样也会叫领袖满意的。他不大相信真会有这种事情。”

冯·弗立契的宿命论几乎不幸而言中，秘密警察抓走了鸡奸犯骑兵上尉，准备杀人灭口，因为弗立契掌握了秘密警察的致命隐私：他知道并且也告诉了沙克，秘密警察探长费林1938年1月15日已经去找过他，也看到了他的银行提款单据，不过冯·弗立契大将的朋友们已有所警惕。沙克出面干预，迫使秘密警察又交出了骑兵上尉。

3月10日，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在柏林“普鲁士大厦”开庭，正式审讯瓦纳·冯·弗立契男爵。对秘密警察来说，它变成了古代希腊用贝壳投票放逐犯罪者的民众法庭。开始时，不用说被告很少有获胜的希望。几个钟头后审讯即告中断；希特勒将坐在法官席上的三军总司令们叫到总理府去了。有人私下告诉冯·弗立契是什么原因：阿道夫·希特勒发布了进军奥地利的命令。过了七天，审讯继续进行。秘密警察的证人施密特还想一口咬定自己的供词属实，这时，原来和秘密警察站在一边、挑起弗立契案件的那个人，把审讯权抓在手里。主席戈林用强有力的讯问，一连严词追问，迫使讹诈犯施密特招架不住，终于招认一切。

1938年3月18日宣判：“武装部队最高司令法庭就控告退役大将瓦纳·冯·弗立契男爵一案，根据正式审讯结果……裁决：正式审讯证实退役大将冯·弗立契男爵在所有各点上均无罪。”

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转入防守。现在国防军一定要大举进攻了，现在轮到

穿灰色制服的打出王牌了。然而国防军默不作声。只有霍斯巴赫和卡纳里斯拟了一份“建议要求”，由陆军呈报希特勒。卡纳里斯口授道：“一、郑重明确地公开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恢复名誉，因为……冯·弗立契男爵大将退职的原因已广为传开。二、调动秘密警察主要领导人的职务。首先应考虑调动的是希姆莱、海德里希、约斯特（党卫队保安处）、贝斯特、迈辛格、弗林和其他人。”

可是将军们又一次临阵退却。贝克仔细看了看卡纳里斯和霍斯巴赫的文件，将其归档了事。经过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国防军领导政治上挺不起腰来。外加希特勒对军人又进一步迁就，他把一批将军召集拢来，宣布给冯·弗立契恢复名誉，当然没有官复原职；只任命他当了第十二炮兵团团长——像宿命论者瓦尔纳·冯·弗立契自己说的，他在炮兵团里成了“众矢之的”，1939年9月22日在转攻华沙时死去。反之，希姆莱下令枪毙了讹诈犯施密特，将刑警探长弗林交纪律法庭，调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岗位上。弗立契案件经办人之一、刑事警官埃贝哈德·席勒被强令离开秘密警察处，迈辛格也丢掉了他的全国打击鸡奸罪行中心负责人的职位，在1939年被希姆莱放逐到了波兰的德占区。

希姆莱需要一段时间，用来忘掉弗立契事件所受的打击。最使党卫队头子受不了的是国防军谴责他煽动反陆军将领。当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施特雷肯赫赫调查一名受到国防军指责的党卫队领袖的案件时，希姆莱告诫说：“你要全面调查，不要有任何遗漏的地方，免得人家背后再说我对国防军不公正。”即使对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希姆莱也认为有必要否认有过丝毫参与冯·弗立契事件的行为。在一次对特别机动部队领袖的讲话中，希姆莱声言他是庸碌无能的官员们的受害者，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豪塞尔说：“我们相信他的这种说法。”

全国领袖几乎时刻提心吊胆，当心不让警察和党卫队对武装部队进行任何较为尖锐的批评。希姆莱甚至不允许在党卫队领袖的秘密讨论会上攻击陆军。1939年1月，党卫队旅队长莱奥·佩特里请他看一份为在柏林召开的一次地区总队长大会起草的报告，其中指桑骂槐地提到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希姆莱拿起绿铅笔狠狠几笔将其删去，并加上批语：“不能用这种提法。”佩特里起草：武装部队对党卫队“变得有所让步和顺从”。希姆莱改为：“……变得有所谅解”。佩特里起草：武装部队曾试图将特别机动部队“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摧毁或迫使它接受武装部队控制”。希姆莱改为：武装部队曾试图使特别机动部队“失去作用或置于武装部队指挥之下”。

保安警察头子海德里希也不免感到力不从心。莉娜·海德里希谈到，她的丈夫当时处在沉重的精神负担之下。希姆莱最亲密的合作者知道被多数历史学家所忽视的一点：经过勃洛姆堡—弗立契事件后，警察机器的实力不是增强了。诚然，这一事件毕竟最终导致阿道夫·希特勒的极权统治，但警察机器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任何变化，穿灰色制服的新领导人依然对党卫队权力抱抵制和敌对态度。

冲突反而变得更加尖锐化了，海德里希的对手卡纳里斯，特别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中央国外科科长汉斯·奥斯特中校，越来越让军事情报工作打入明令禁止由它插手的政治情报领域，并变本加厉地同秘密警察和保安处争夺政权敌人。连那个对希特勒唯唯诺诺的将军、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也把防止党卫队警察机器干预军事领域看成是他最迫切的任务

之一。贝克将军在弗立契危机后不久即下台，由哈尔德继任总参谋长，当哈尔德有一次责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说他对希特勒一味让步时，凯特尔的眼睛里噙着泪水，凯特尔推心置腹地写道：“哈尔德，我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你，你应该了解我。”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清楚地了解，他的权力并没有无条件地得到承认。他必须进一步集中使用他的统治手段，消灭自己上国里所有引起摩擦的因素。1938年春，秘密警察的声誉扫地以及保安处的信任危机，促使海德里希考虑成熟了一项计划，他要利用这个计划把他的监视系统的两部分融为一个整体：海德里希筹划将保安处和秘密警察合并成德国中央保安局。

第六章 暴虐酷杀

蓄谋已久的血腥屠杀

一项重要的惩戒措施

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真正的一片焦土，一片废墟

第一节肉体上消灭

海因里希·希姆莱领导的党卫军，不只因盖世太保和保安情报处分子在阴森可怕的集中营和灭绝营的累累罪行和党卫军武装部队的作战骁勇而遐迩闻名，它还是负责清洗所有在思想上与纳粹政治为敌的人的德国各保安机构和情报机构在东方进行大规模屠杀的工具。

党卫军杀害的人有 150 万至 200 万之多，其中有斯拉夫人、茨冈人（不包括犹太人）。这场屠杀不是偶然的，它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对反对德国武装部队的恐怖活动的镇压行动或对游击队活动的遏制行动。这场血腥屠杀是蓄谋已久的。早在 1936 年—1937 年，即在德国人燃起战火之前，这一屠杀计划就已确定了。

在希特勒看来，犹太人是劣等民族，他们根本无权活在世界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给德国主子作奴隶，耕耕地，开开矿，也许还有点用处。东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而且苏联人、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文化也必须毁灭干净，也不许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他们的发达工业的设施力求要加以拆除，运到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许从事农业，以便生产粮食供应德国，而给他们自己留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纳粹头目们认为，欧洲必须成为“无犹太人”的欧洲。

1937 年 1 月 15 日至 23 日在柏林召开的确定党卫军和警察的性质和使命的一系列会议上，海因里希·希姆莱明确提出了希特勒在以后数年内推行的第三帝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他首先强调了布尔什维克给帝国带来的威胁（1941 年 6 月 22 日之后，他经常这样说），并指出共产主义势力的危害性不只是在军事方面，更为严重的还是表现在思想方面。他说：

最令我们担忧的是国内安全。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说的敌人不只是指军事意义上的敌人，而且还指思想上的敌人，每当我谈到“敌人”一同时，我是想借这个词指我们的天然敌人——其大本营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犹太共济会。这并不是说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威胁只会来自俄国。受犹太—布尔什维克集团控制或影响的国家和民族永远是我们的敌人，是对我们的永久性的威胁。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布尔什维克是一种下等人组织，它完全受犹太人控制，代表着一种与雅利安人所热爱推崇的事业迥然相反的思潮。这是向最低贱的人灌输的邪说，它正在成为他们的宗教。再过 20 年，布尔什维克主义就会成为一种邪恶的破坏性的宗教。它扎根于亚洲，并将危及全世界。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结束这次关于应采取的安全措施（如需要，甚至可以发动预防性战争）问题的讲演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夸大其词地阐述在后来 10 年内鼓动德国人作战的神秘方案：消灭那些正在联合起来与人类文明的唯一占有者和白色人种的领袖民族——日耳曼人为敌的全世界下等人，他又说道：

我要求你们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几十年内，我们要做的不应是讨论德国应不应该奉行某种对外政策，而是要为消灭那些正在联合起来与北欧人和日耳曼人的中心人类文明的占有者——德国为敌的所有下等人而战斗。未来的几十年将意味着我们作为其领袖的白色人种的存在或不存在，我们确信，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时代（这种时代每隔 2 千年才会出现一次），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时代。

目标是明确的，可怕的，那就是消灭全世界的下等人。换言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种族屠杀。

1937年1月将永远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种族大屠杀的头就产生于这个时候。然而，这次行动并不单是针对犹太人，至少不单是针对德国的犹太人的。

1939年8月22日，也即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翌日，希特勒向簇拥在他周围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对波兰的觊觎之心。他向他们说：“波兰将从世界地图上消失。”希特勒向希姆莱发出更明确的指令：“绝不可使波兰复活，为此，必须消灭波兰的贵族，消灭从小学教师至专家学者的波兰知识分子，这样，波兰人就会沦为奴隶，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希特勒还表示，他现在还不想灭犹太，犹太人现在甚至还应受到相对的优待，他进一步说：“应采取紧急的但并非最终的措施，反对波兰的犹太人，即反对作为波兰犹太民族的300万波兰人，”

希姆莱由此得出结论：“东方属于党卫军”。党卫军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东方将是“日耳曼狼”的猎区，它们将在那里散布死亡，使之充满难闻的尸体腐臭气味。

希姆莱立即委托海德里希着手组建特种部队，以控制被德军占领并已划归第三帝国版图的重要地区。事实上，这些特种部队的雏形已经存在。第一队建于1938年。当时正值奥地利合并到德国，他们在奥地利大肆抢劫，无恶不作，其行为令人发指。由特洛勃·伯格将军指挥的另一队在次年进驻苏台德地区，使其所作所为略有收敛。

对于波兰，海德里希决定成立五个特别行动队，给参与“白色方案”的每个进攻性部队配备一队，每一特别行动队包括五个特遣队，每个特遣队约150人。这样，每个特别行动队的人数就是750人。特别行动队负有双重的使命：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秘密抵抗运动或游击地带的形成；二是负责组织情报活动，以配合希特勒提出的“将波兰从世界地图上抹去”的计划。

特别行动队自9月1日起开始“扫荡”。他们的行动规模很大，以致遭到武装部队长官们的反对，一位陆军上将在写给参谋部的报告中这样说：

繁重的重建工作因党卫军各部队的干预而变得愈加困难。他们负有特殊使命，不受地方军政长官的管束和制的；他们到处插手，妄图搞独立王国……他们几乎在所有大城市大肆进行

杀戮。受害者是他们随意抓来的。他们的作法令人憎恶，不可理解。在好几个地方，他们的反犹措施引起了极严重的后果。

1939年9月8日，国防军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曾因党卫军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莱扬言要每天杀死200个波兰人一事向国防军军需总监冯·施图尔纳格将军表示过愤懑。4天之后，卡纳里斯在希特勒的专列里与凯特尔交谈时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全世界舆论会要求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无耻的行为承担责任。”

党卫军保安情报处所属的各特遣队立即大干起来。随着德军在波兰的推进，海德里希命令下属开始抓人。他们抓走大批教师、大学教授、官员、商人、医生、修道士、地主等。例如，赫尔模—佩尔普林教区的690个修士中有518人被抓，其中214人被杀。该地区的政治犯被集中到索尔答沃的一个集中营

里，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他们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处死。盖世大保对这些犯人通常施以“特别处治”，对外则说“他们在越狱时被击毙”。600余名波兰知识分子就这样在索尔答沃死于非命。

“

1939年9月27日，海德里希在谈到党卫军保安情报处在波兰的行动时提到：“在我们占领的地区，波兰的杰出人物已只剩下3%了。”

制造此类凶杀惨案者，不只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还有一些民团部队。这些民团部队是由在波兰和西普鲁士的德国人中的极端分子组成的。驻但泽的一支由纳粹大区书记福斯特指挥；西普鲁士的民团部队由党卫军准将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指挥。

然而所有这些似乎并未使希姆莱满意。在他看来，被清洗的波兰人太少了。于是，这位帝国党卫军总监便在1939年11月中旬向波兰派遣了一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的增援特遣队，由党卫军上将乌东·冯·沃伊尔施指挥。该特遣队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海德里希告诉德军驻波兰参谋长爱德华·瓦格纳说，党卫军在波兰的政策将因沃伊尔施特遣队的进驻而进入一个新阶段。

10月中旬，希特勒亲自向凯特尔谈了哈尔德后来称之为“有关波兰的罪恶性方案”。希特勒说：“要毫不留情地降低波兰人的生活水平，只要他们不致于饿死就行了。这样作是和我们主张的原则相矛盾，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不过……”

1939年12月初，波兰陷于一片混乱。海德里希驱使波兰的犹太人向“犹太人区”迁移，同时又强迫大批的波兰人由西往东迁往设在总督辖区（由华沙的纳粹分子建立的波兰傀儡政府）的集中营。希姆莱则在这时，强迫波兰境内的所有日耳曼族居民（包括当时居住在和德国人达成协议被苏联人占领的地区的居民）往西迁到德国在波兰领土上设立的但泽——韦斯特普罗森、瓦尔泰兰德、奥伯施莱辛三省。

希特勒最早的伙伴之一汉斯·弗朗克，被任命为驻华沙总督，他不得不向柏林要求增加4万名官员替他维护总督辖区的秩序，黑衫队到处行凶作恶，以致引起了国防军的不满。上将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在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危害社会治安，败坏风纪，必须立即制止这种随意杀人的现象……”

著名的冯·莱西瑙将军尽管一向对希特勒忠诚不贰，也对黑衫队提出抗议。汉斯·弗朗克也参与其间，他向鲍曼告状，为的是让鲍曼向希特勒转述。他写道：“这是荒谬的。假如每有七个波兰人被杀我就要贴一张告示，则罄波兰之森林恐亦不足以为布告造纸！”

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推波助澜。德军占领区军事长官格德·冯·伦斯德甚至向波兰人保证：“德军不把波兰平民视作敌人。德军此来是为保护居民的财产，保护居民享有的公民权利。”暴徒的罪行愈演愈烈，军人们的不满情绪也随之与日俱增。柏林的局势日见紧张。在卡纳里斯和奥斯特上校的鼓动下，德军参谋部的军官们要求“立即解散黑衫队，解除党卫军领导人的职务，以便尽快结束这种败坏德国人声誉的糟糕局面”。

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通知陆军的将军们说，黑衫队将继续存在下去，

甚至还要加强对波兰人的镇压：“我们不能因种种合法和非法的道德说教而影响我们的战斗……在波兰问题上，我们的手段是应该和我们的原则相背离的……绝不能让一个波兰知识分子进入政权，要把大帝国的犹太人和波兰渣滓清除干净……”

1940年9月7日，希姆莱在梅斯向“阿道夫·希特勒警卫队”作报告时，承认了他们在波兰进行种族大屠杀的罪行：

“这没有什么神奇的……但当人们具有某种至上的信念时，当一个党卫军队员心中燃起圣火时，当人们专心于他们的事业时……我的党卫军队员们，我向你们保证这一点。我们都是这个组织的一分子，我首先是一名党卫军成员，然后才是帝国党卫军总监。对于身着黑色或绿色制服的人，不管他是萨克森某

小城的党卫军成员还是盖世太保成员或警官，你们都要支持他。

但在我们之间情况就不同了。我们可以展开批评……当我们的人离开波兰时，波兰人并没有怀念我们，我这是说的实情话。自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可以这样说。在某些地方，有时出现过翼正的游击队活动，这比我们通常进行的战斗更难对付。因此，我们需要士兵，需要经过思想训练的部队和人员，以巩固我们占领的地区，就如在捷克斯洛伐克所作的那样……我向你们讲一件事。在波兰，‘迁移’工作是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进行的，我们得把数十万波兰人赶走；我们的作法想必是残酷的，

但我们不得不如此。你们可以了解一下这些事实，但要立即将其忘掉。我们曾无情地枪毙了数千名有身份的波兰头面人物；我们不得不如此残酷……我要对你们再说一次，甚而对你们大声宣告：在许多情况下，带领一连人冲锋作战比较容易，而要制服那些没有教养的对我们怀有敌意的老百姓，把那些歇斯底里

哭号的妇女从家里撵出来并把他们处决或流放，让德国老百姓越过俄国边界并保护他们，则要难得多……你们应该想到，安全部门或保安警察的行动，是我们总体行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就如你们行军时必须携带武器一样。你们被人羡慕，是因为你们作出了成绩；一支部队如赢得荣誉，人们就会以敬佩之情谈到它，它也由此而扬名内外。这在其它情况下是颇不容易作到的。自然，我并不想低估你们行动的价值，但在我看来，这种不被人理解、不事声张的行动，作起来是极困难的。”

第二节德国军人们患了罕见的精神分裂症

保安部门马上就要在东方，在这次“无声行动”中大显黑手了。而这一次。犹太人将一批一批地被杀掉。巴巴罗沙行动，即向苏联的进攻正在准备着。为适应这一新局面，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着手扩编和改组特别行刑队。他组建了四个支队，其简要情况是：

A 支队：先是由党卫军少将施塔勒克指挥，后归党卫军少将海因茨·约斯特指挥，其任务是越过波罗的海沿岸诸国，向列宁格勒方向行动。它的总部设在加特斯契纳，在鲁萨和雷瓦各驻有一个特遣队，在里加和考纳斯各有一支突击队。一党卫军队长和警察长官坐镇里加，与陆军元帅冯·李勃的北方集团军保持联系。

B 支队：首任队长是党卫军少将阿图尔·奈比，继任是党卫军少将埃里希·瑙曼。其任务是在 A 支队以南的莫斯科方向行动。它的总部设在斯摩棱斯克，在维亚茨玛和莫吉廖夫各有一个突击队驻防，在土拉和里埃沃各有一个特遣队驻防。一党卫军队长和警察长官坐镇明斯克，与陆军元帅冯·贝克领导的中央集团军相配合。最后，针对莫斯科的一特遣队驻于马洛杰罗斯拉沃茨。

C 支队：先由党卫军少将奥托·拉施指挥，后由党卫军少将托马斯指挥，驻守乌克兰。其总部将设在基辅。在基辅、哈尔科夫、波尔塔瓦、斯大林诺各驻有一个突击队。在基辅，有一党卫军——警察长官坐镇，与陆军元帅冯·伦斯德的南方集团军保持联系，并统管 C、D、两个支队。

D 支队：前任指挥是党卫军上校奥托·奥仑道夫，继任是党卫军准将布赖察普。其任务是在 C 支队以南，在乌克兰南部克里米亚半岛和高加索一带行动。它的总部设在辛菲罗波尔，在塔甘罗格—罗斯托夫、雅尔塔、斯卡多沃斯克、斯大林诺和敖德萨各驻有一个突击队。

这四个支队全都是在 1941 年冬末组建的，直属海德里希领导，1941 年至 1945 年间，总人数不超过 3,500 人。

这些支队的骨干来自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情报处和刑事警察各部门。部队的绝大多数成员是武装党卫军和治安警察的士兵。将武装党卫军各战斗部队的人员编入突击队被视作是一项“重要的惩戒措施”。他们被说成是“自愿”的。事实上，党卫军分子成了“重要惩戒措施”的目标，他要么充当行刑队人员，要么充当灭绝部队人员，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在这四个特别支队存在期间，调进了近 1,500 名党卫军武装部队队员，老武装党卫军队员占每个支队总人数的近 1/3。然而，在纽伦堡军事法庭的审判官看来，这些假自愿者虽人数不多，但足以证实，武装党卫军对蓄谋杀害数十万名公民负有不可逃脱的责任。

那么，是否可以说陆军就这样同意了特别行动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呢？绝非如此。种种情况说明；军人们对希特勒命令最后解决犹太人一无所知。瓦格纳在提到特别行动队的任务时也只说：“在军队进驻的后方，查封作战行动开始前确定的项目（敌视德国或敌视国家的组织、协会、集团等的材料、档案和卡片），以及特别是防止重要人物（首要的流亡者，破坏分子、恐怖分子等）逃匿”和“在陆军的后方，清查和打击属于敌方作战部队以外的敌视国家和敌视德国的活动，以及向陆军后方的司令官报告一般政治情况”。

这份文件本身即已证明军人们患了罕见的精神分裂症，给特别行动队开

了方便之门：将军们把海德里希的突击部队看成打击后方敌人的正常保卫机构，而同时他们至少知道，特别行动队在东方是执行政治性“特别任务”，不论其具体内容如何，军方总是非常乐意让海德里希的人去担负这种“特别任务”。

连特别行动队的成员开始时也怀有另一种类似的矛盾心理，因为海德里希将屠杀令零敲碎打的方式告诉他的刽子手。他在1941年4月召见德国中央保安局各部门负责人时，也只是谈到执行一项“艰巨的任务”。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解释说，这次任务是运用保安警察和保安处的手段，来“巩固和绥靖”俄国地区。海德里希说：“我需要精力充沛的人，并希望各部门领导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任务。”

刑事警察处长阿图尔·奈比向前跨了一步，敲响鞋后跟说：“地区总队长，您可以把任务交给我。”海德里希点点头：一支特别行动队的第一个队长报名请战了，而这时候特别行动队还不曾拉起来呢，后来，抵抗运动成员的密友奈比的劫后余生的朋友们，煞费苦心地向刑事警察头子为什么会自动报名。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在其《奈比在哪里？》一书中，谈了一个颇为详细的故事，企图用来证明，奈比只是在顾虑重重的心情下和完全听从贝克—戈勒勒抵抗小组的建议，才担任指挥职务的。

作者吉斯维乌斯甚至美化他的朋友奈比说，“只是在他（从俄国）回来之后，那里才掀起难以想象的恐怖行动”。不管怎么说，奈比的特别行动队屠杀了四万五千名犹太人。吉斯维乌斯的论点，使人想起了另一个奈比之友的辩护词，在纽伦堡审讯战犯时，美国检察官罗伯特·肯普纳问这个人道：“那么，抵抗运动领袖先生，照您的看法，访问究竟屠杀多少犹太人才算是违反人道呢？”实际情况很简单：党卫队旅队长奈比以为，坚决报名参加东方任务可以捞到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博得海德里希的常有的令人捉摸不定的好感，而这次“东方任务”竟会与历史上最大的集体屠杀等同起来，却是出乎奈比开始时的意料之外。

不论怎样，阿图尔·奈比是唯一自愿争当特别行动队长的人。在这些特别行动队长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是出于自愿的，每个人各有各的理由才听从海德里希的命令。国内保安处长奥托·奥仑道夫由于爱发牢骚，被认为是脾气乖戾的“民族社会主义圣杯派骑士”，不讨主子希姆莱的喜欢，曾两次不肯去东方执行任务，这一次只是为了不致再被骂成胆小鬼，才服从海德里希的命令。党卫队旅队长瓦尔特·施塔勒克是海德里希的对头，已改调外交部工作，他指望当上特别行动队队长能重返德国中央保安局。党卫队旅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拖，也是由于在东普鲁士保安处栽了跟头，感到有个机会通过积极去东方工作，从而在柏林中央部门捞个领导职位。

但是，讽刺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只有奈比和奥仑道夫这两个唯独反党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处长，在东方真正干了屠杀犹太人的勾当，他们的同事们都懂得多少有所收敛：弗朗兹·西克斯处长（莫斯科先遣队）和海因茨·约斯特处长（特别行动队A）在东方干了几周后就离开了自己的部队；其他几个处长——海因里希·缪勒、布鲁诺·施特雷肯巴赫、瓦尔特·施伦堡和诺克曼博士——对党卫队所期望的英勇精神压根就不想沾边。

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一级突击队大队长是特别行动队的中层领导，他们几乎也不比处长们更出自衷心。海德里希把他们从党卫队——警察机器的各个部门挑选出来，集中在一起，他们多数原来干知识分子行当。一支古怪的

灭绝犹太人的队伍形成了，其中有两个博士学衔的大学毕业生、部务官员、律师、还有一名新教牧师和一名歌剧演员，后来有几个人抓住机会，离开了杀人机器。如同西克斯和约斯特经过或未经海德里希批准离开岗位一样，像特遣队长埃尔温·舒尔茨或卡尔·耶格尔这些人也洗脱了徒然成为最凶狠的种族狂的下场，甚至官阶不高的人也摆脱屠杀命令的约束。党卫队二级小队队长马赛厄斯·格拉夫拒绝在俄国当小队队长，结果被捕押送回国，保安处西克斯教授作证说：“人们至少可以设法使自己调离特别行动队，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由于这样做而被枪毙的。”

一般队员也对海德里希提出的东方任务表示很少一点的热情，以致德国中央保安局长不得不对秘密警察、刑事警察和保安处所属各单位反复施加压力，抽调必要的人手。海德里希甚至被迫向风纪警察和武装党卫队借调人员，解散了一营柏林警察，将其人员分配到各个特别行动队。

1941年5月，在普雷奇和杜本召开的几次极端秘密的会议上，海德里希和他的人事处氏布鲁诺·斯特雷肯已赫向各支队和各特遣队的头子们传达了著名的“元首命令”：

为保证被征服国家的政治安全，在德军占领地区及其后方作战的各特仲部队要无情地镇压针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切反抗，不管这种反抗是以前、现在、还是将要发生的。

在一份秘密文件中，希姆莱指示：“对这2亿人，我们要在战场上一个一个地将其全部消灭。”

对于一个优秀的党卫军队员对东方人的态度，帝国党卫军总监又作了这样的规定：

“党卫军队员对同胞应该诚实、有礼貌、讲信用和友好，但对其它国家的人则不应如此。比如，一个俄国人或一个捷克人的遭遇如何与他是不相干的。如果这些民族中有属于优秀血统的人，我们就要将他们掳来，必要时还可以将他们的儿童掳掠到德国来由我们抚养。至于这些民族是怎样生活的，是富裕，还是贫困，我全不管。只有从我们的文化发展需要奴隶这一点出发，我们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1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战壕时是否累死，用不着顾及，我所关心的只是她们为德国挖的反坦克战壕完成了没有。我们德国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正确对待动物的人，我们也同样能正确地处理我们同这些人类畜生的关系。但是，为这些人着想，为他们提供任何优惠待遇，就是对我们种族的犯罪，因为这会危及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假如有人对我说，‘我不能用这些女人和孩子挖战壕，因为这是不人道的，这会使他们死去’，我就要对他说：‘那你就是杀害你自己种族同胞的杀人犯，因为假如战壕不能按时完工，要送命的就是德国士兵，德国母亲的儿子，也就是我们的种族同胞。’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关心的事情，我们也正是为此而工作，而战斗的。除此之外，任何其它事情都与我们不相关。我希望党卫军队员对不是日耳曼人的外国人，尤其是俄国人，要这样处置。”

在波罗的海沿岸各个古老国家，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犹太族的男人、女人、儿童和共产党人以及游击队员，同样都是纳粹的首要消灭目标，其次是“低等的亚洲人”、“茨冈人、克兰特查泰斯人（讲土耳其语，后迁入克里米亚的地中海居民。他们之所以被列入被消灭者之列，是因为波兰的一党卫军长官说克兰特查泰斯人是犹太血统）等，处决在按部、认真地进行着，可以说，每个人都在“认真”的履行职责。

第三节 杀人成了党卫队员的主要工作

5 月底，海德里希通知一百二十名特别行动队和特遣队队长集中，将他们送到易北河畔维登堡的普雷奇边防警察学校，接受对种族敌人进行灭绝战役的训练。海德里希逐步拧紧世界观改造教育的螺丝：德国中央保安局派来的教官越来越明确和从严训练他们进行种族屠杀，6 月中旬，海德里希将三千特别行动队队员集合在穆尔德河畔小城迪本附近。保安警察兼保安处长摆出大元帅的架势，站在他的排成四方形队伍的死神队面前，准备作一次激昂有力的训话，其内容不外乎含糊其词，只说要执行一项空前未有的艰巨任务。

稍后，他在边防警校校园内的巴罗克式普雷奇旧宅邸里召见各特别行动队队长，这时他明话直说了。旗队长瓦尔特·布卢默博士战后还回忆了海德里希当时讲的话：“东方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后备军，因此根据领袖的看法必须将其消灭”。奥仑道夫事后几年也还记得：海德里希给他们传达了一项领袖命令，命令中把“共产党干部和积极分子、犹太人、吉卜赛人、破坏分子和情报人员，原则上都定为有他们存在就会危害部队安全的分子，因此必须毫不犹豫地一律处死”。

谁也没有反对，个个唯命是从。特别行动队队员顺从地乘车开赴待命出发的地区。1941 年 6 月 23 日，阿道夫·希特勒点燃苏联战火的第二天，海德里希的死神们倾巢出动，从事惨绝人寰的冒险勾当：三千人争相逐猎苏联的五百万犹太人。

苏联犹太人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毫无准备。只有少数犹太人意识到德国反犹主义死神来临的威胁。有些城市——例如在乌克兰的犹太人社团误以为希特勒的士兵和 1918 年德皇的军不多，把纳粹德国人当成解放者来欢迎。“犹太人显然不了解我们对他们的态度，”特别队队长施勒特尔在 1941 年 7 月 21 日从白俄罗斯报告说，正因为这样，他们受到了海德里希的最后解决者们更残酷的打击。

特别行动队紧跟先头部队向前挺进，以能充分发挥出其不意的效果。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集中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犹太人居住的苏联城市。往往一个城市正在围攻，特别行动队的首批先头部队即已动手杀人了。德国军队的进攻和德国中央保安局行刑队的渗透，在不少情况下起了相同的重要作用。例如考那斯、耶尔加法、里加和雷维尔，这些城市都是由特别行动队配合军队攻占的，三卡车特别行动队 C 的队员，在第一批坦克掩护下侵占了日托米尔，4a 特近队在基辅陷落的当天（1941 年 9 月 19 日）同时占领了这个城市。

特别行动队部队几乎每到一个城市，那里的犹太居民就眼睁睁地被死神扼住咽喉，每日每时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为完成规定的惨无人道的指标，在海德里希的部下看来，怎么残忍也算不上卑劣，使用任何手段也不算狡猾，怎么野蛮也不过份。报告像雪片飞来，每一份报告都用冰霜生产者和病虫害消灭者的语言，表达最后解决者的狂热激情。

特别行动队 D 第一百五十三号情况报告：“各分队的工作

面，首先是将小片地区变成无犹太人区。自上次报告以来，又枪毙了三千一百七十六名犹太人、八十五名游击队员、十二名

抢劫犯、一百二十二名共产党干部。累计共计七万九千二百七

十六人。”特别行动队C第十七号情况报告：“奉德国中央保安局命令，在白俄罗斯所有列入计划的城市进行了消灭党政机关干部的行动。对犹太人也同样按命令采取了行动。”C队报告：“为消灭这种情况（疫病威胁），4a特别队已枪毙一千一百零七

名成年犹太人，乌克兰民团已枪毙六百六十一名青年犹太人。这样，截至1941年9月6日止，4a特别队共消灭犹太人一万一千三百二十八名。

杀、杀、杀！第六特队：“余下的三万名中已枪毙了近一万名。”特别行动队D：“自上次报告以来，又枪毙了二千零十名。”第八特遣队：“……消灭一百三十名犹太人。”4a特遣队先头部队：“……已捕杀五百三十七名犹太人（男、女和青少年）。”特别行动队的恐怖呼喊声席卷各地，势如燎原。德国军队愈是深入苏联内地，犹太人也愈是胆战心惊地逃离德军逼近的城市。犹太人终于警觉起来了，最后解决日见困难。一个特遣队不无烦恼地报告说：“其他地方传来的枪杀消息给行动队造成很大困难。逃亡的犹太人和俄国人以及德国士兵的随意谈论逐渐透露了对付犹太人的行动。”

尽管如此，杀人者还是绞尽脑汁，大批抓捕牺牲品。一份报告的笔者沾沾自喜道：“城里的犹太人奉令到指定的营房报到，以便清查人数和听候安置。前来报到的共约三万四千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命令他们交出他们的贵重物品和衣物之后，通通被杀死，前后共花去好几天时间。”在基辅——按特别行动C记载——“墙头张贴出布告，命令犹太居民易地安置。虽然起初估计只有五、六千人报到，但结果来了三万名犹太人。由于采用了异常巧妙的组织方法，竟使他们在处决之前还以为是被易地安置。”

大规模屠杀者的冷酷无情的官方语言对苏联犹太人惨遭杀戮、血流成河竟丝毫没有厌恶和羞耻之感。可是，即使胆战心惊的旁观者的证词，也难以说清楚其恐怖情景：成千上万以至几十万人走向惨死道路、集体屠杀的万人坑、裸体的妇女们怀抱着的婴儿成队行进、坑边的枪杀惨不忍睹。

第五百二十八步兵团团长勒斯勒少校在1941年7月底的某天，突然在日托米尔驻地被密集的枪声惊起。他向出事地点走去，到了一段铁路路基旁，看到了“一幅凄惨的景象，使得这个思想上毫无准备而走近的人大吃一惊，毛发直竖”。在勒斯勒的跟前，出现一个大坑，坑中躺着无数被枪杀的犹太人尸体，男女老小都有；闻声赶来的士兵和居民都目瞪口呆地凝视着坑里。勒斯勒说：“在坑里死尸堆中，有一个大白胡子老人，他的左胳膊上还挽着一根小拐杖。因为这老人还在呻吟，没有咽气，我要一个警察给他补一枪。这个警察一听笑着说：‘我已经叫这家伙的肚皮挨了七下子，他自个儿会死的！’”

有一个苏联村庄的犹太人听到屠杀队临近的消息，全都躲了起来。屠杀队进村时，党卫队员只看到有个抱婴儿的妇女站在道旁。这位妇女不肯说出犹太人躲藏的地方，一个党卫队员当即从她手里夺过婴儿，倒提着婴儿的小腿，将小脑袋朝门上砸去。一名党卫队员回忆说：“这响声好似爆了一只轮胎。这种响声使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位妇女变得神经失常，说出了犹太人的藏身地点。在里加，一名党卫队员看到两个犹太人扛根梁木；他不动声色地摸出手枪，砰的一枪打倒了一个犹太人。理由是：“干这种活一个人就够了！”在清剿拉脱维亚犹太人区时，一个党卫队领袖也用了类似的手法。有病的犹太人躺在担架上被抬过来，这个党卫队领袖走到前面，拔出手枪，挨着担架把犹太人一个个击毙。

特别行动队的无情魔火使苏联的犹太人队伍日益稀疏，截至1941年末至1942年初的冬季为止，特别行动队报告消灭犹太人的数字为：A队二十四万九千四百二十人，B队四万五千四百六十七人，C队九万五千人，D队九万二千人。

第一批特别行动队过去之后，接踵而至的是由党卫队领导的另一批屠犹刽子手。在此期间，火线后方成立了德国人组成的民政机构，由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为阿尔弗雷德·艾森堡）领导，该部管辖“奥斯特兰”和“乌克兰”两个德国专区，德国专区又划成若干专区。在民政机构中，党卫队全国领袖也占有要职；1941年7月17日的一项领袖命令提到，希姆莱奉命负责“东方新占领区的警察保安”事务，并授权“在他的任务范围内向德国专员们……作出指示”。在此以前，希姆莱已任命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他的驻俄国代表：北方区（里加）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地区总队长汉斯·普吕茨曼，中央区（明斯克）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地区总队长埃里希

·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南方区（基辅）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为副总指挥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1942年年中起，又增派旅队长格雷特·科尔泽曼为高加索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

希姆莱的这些首席代表，手下都各有一个风纪警察团和一定数量的武装党卫队，他们和特别行动队长们一样，接受相同的灭绝任务。从上次屠杀队魔掌逃脱出来的人，现在又成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灭绝部队的目标，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们存心要在屠犹方面比特别行动队干得更加出色。他们借助于吸收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乌克兰的经过拙劣训练的自愿效力分子（简称“自效分子”）而加强了部队，企图用来进一步扩大消灭数字。突出的例子是党卫队兼警察的高级领袖耶克尔恩，他在1941年8月一个月内，就报告共计杀害四万四千一百二十五人，主要是犹太人。

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的部队在东方战役最初几个月内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已无法作出准确的统计数字了。但有案可查的是，当特别行动队和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部队在年底停止活动，和直到次年春天补充新的兵力时，被害的犹太人已达五十万，其中三十万左右记在特别行动队的帐户上。

尽管“成绩”如此辉煌，党卫队屠犹刽子手们还是明显地露出了厌倦迹象。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也吃了苦头：指挥官舒尔茨在9月被调职；队长拉施中途休假，从此一去不返；奈比在11月暗示他的副手维尔纳（“阿图尔，要是你吃不消，我可以替你解围”）要回老家，因为像吉斯维乌斯证实的那样，他“已经消瘦得不像人样，神经极度衰弱，郁郁不乐”——他的司机、刑事高级文书克恩看到屠杀犹太人的惨状使用手枪自杀了。

几个月过后，连希姆莱在东方的干劲最足的干部也被屠犹恶梦弄垮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冯·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患了精神分裂症和肠绞痛，被送进霍亨利申党卫队战地医院，他夜里大声呼叫，神经错乱，语无伦次，被自己罪孽的恶梦缠身。“他特别被由他亲手布置的枪杀犹太人和在东方的其他经历所造成的景象所折磨，”党卫队医生格拉维茨博士向他的最高领导报告说。当医生问为何感到害怕时，巴赫—齐列夫斯基向医生吼叫道：“我想我完了。您难道不知道在俄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在那里，整个犹太民族……要被斩尽杀绝。”可是，当病人间及全国领袖，在东方对犹太人的这套作法是否可以收场时，希姆莱生气了。希姆莱道：“这是领袖的命令。”

犹太人是布尔什维主义的传播者……要是您不停止过问犹太人问题，那么会叫您知道厉害的！”

当然，就连这个执行领袖命令的狂热分子也已知道，除了极少数死心塌地的虐待狂和杀人狂以外，特别行动队的队员们几乎同巴赫或旅队长埃贝哈德·赫尔夫没有什么两样的想法，这个赫尔夫曾写信给党卫队中央人事处处长说，他想“离开东方，因为我坦白地说，我已经受够了”。

这时，在各特别行动队中已形成一支干到底的死神队，连党卫队也相形见绌。死神队无限崇尚急功近利、铁石心肠和帮派义气，自己承认崇奉仅次于集中营看守部队那种毫无灵魂的机器人式的冷酷无情。在这里，汇集着一群野蛮成性、只图功名的干将，希姆莱把这些人誉为党卫队的理想典范：一个佩戴骷髅标志的集团，舍弃市民的周围世界及其道德标准，听任领导自由驱使，听凭一个集团的摆布，因为它一手给党卫队员确定了社会和伦理的标准。好几年来，特别行动队队员被灌输产生优越感的教育；使他们权迷心窍和自诩为人类的精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高人一等，高居于一般党员之上，也高居于道德标准之上，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有权拿人作为生物实验的对象。

奥仑道夫在他的特别行动队 D 培养了一种可怕的被歪曲了的尚武精神，把处决作为执行军法。它的后面隐藏着精心设计的一招：不让特别行动队员个别和受害者接触，特别行动队员是集体中的一员，这个集体只是奉上级的命令在一起行事，从而使大家不产生个人犯罪的感觉。任何时候都不许一个人单独枪杀犹太人，奥仑道夫经常设法使受害者直到最后一分钟都保持镇静，因为决定被处死的人群中发生任何一点骚动，都有引起刽子手们向受害者疯狂地扫射和不顾一切而乱发子弹的危险，这个冒牌军人奥仑道夫对此比大批犹太人集体逃跑还要担心。这种担心并非出于人道，但也使奥仑道夫不敢使用毒气车。他认为，毒气车对他手下的人造成“过于沉重的心理负担”：处死过后必须把恶形怪状、屎尿横流的尸体从毒气车里拉出来——这样，行刑者还得亲眼目睹自己所干的勾当，而这种一刹那的真实情况，正是奥仑道夫竭力不让行刑者看到的。

特别行动队 C 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拖，采用另一种办法：他本队的每个队员必须成为集体犯罪的一员，恐怖活动人人有份，可以约束特别行动队的精诚团结。集体制造的流血，应该变成将大家捏在一起的粘合剂。这位双重博士命令全体特别行动队员都必须参与行刑处决；每个人都得“克服自我”。这个队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像某目击者叙述——受到“最可怕的恶梦”的折磨。但是目的却达到了：集体犯罪，人人有份。

为了使刽子手们干活时心情比较轻松，任何心理学上的办法都被使用上了，修饰词句也起了它的妙用，在刽子手们的词汇中，没有“屠杀”这两个字，而是一大堆形形色色毫无恶意和欺人自欺的用语：从“特别行动”、“特别处理”、“剔除”，直到“执行任务”、“清理”和“外迁”。不断的宣传灌输，在苏联尤其如此，其目的也不外乎使最后解决执行者们消除一种感觉。即犹太人同样是人。在宣传用语中，犹太人变成了害群之马，变成了苍蝇蚊子。

第四节遗臭万年的罪证

在所有被法西斯占领的国家里，都实行杀害人质的野蛮办法。法国的奥拉多尔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利迪策事件是法西斯杀害人质的遗臭万年的罪证。

法西斯强盗除了对数百万欧洲人的直接屠杀外，还通过掠夺，通过饥饿的办法间接屠杀了数以千百万计的人民。

德国康采恩的代理人紧跟德军之后，也进驻一度被占领的地区。以七策康采恩为首，他们对苏联进行了难以想象的大规模掠夺。为此目的，希特勒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东方农产品供销中央贸易有限公司”。从纽伦堡对主要战犯审讯的材料中看出，到1944年3月31日，这个公司的营业总额是五十六亿马克。这一“营业”总额中包括掠夺的九百二十万吨谷物和九百二十六万吨其他农产品。

这还不是官方有组织的掠夺的全部数字。另一个名叫“东方采办有限公司”的机构从苏联的工业企业中盗走机器，交给德国康采恩。苏联的工业和农业共丧失了二十三万九千台电动机和十七万五千台工作母机。这些电动机和工作母机，有的被德国法西斯所破坏，有的则被盗往德国。

据苏联官方材料，法西斯占领军造成的破坏是：三万一千八百五十个工业企业、九万八千个集体农庄、一千八百七十六个国营农场、二千八百九十多个机器拖拉机站、六万五千公里铁轨、四千一百个火车站、四万所医院、十二万七千个专科学校、大学和公共图书馆。

苏联的国民经济与苏联城乡居民蒙受的财产损失共值六千七百九十亿卢布。

1943年9月7日，希姆莱向乌克兰地区的党卫军与警察头目发出的一项命令，证实了这种骇人听闻的破坏是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的。命令说：“必须做到：从乌克兰地区撤退时，不留下一个人、一头牲畜、一仓粮食、一节铁轨；没有一间不倒塌的房子，没有一个能在几年内就恢复生产的矿井，没有一口无毒的井。给敌人留下的必须是真正的一片焦土，一片废墟。”

罪犯是哪些人？人们可在1947年7月27日至1948年4月9日的整个开庭期间，从被告席上找到他们。被审讯的24名党卫军军官中，有6名将军（奥仑道夫、约斯特、瑙曼、拉施、施洛茨、西克斯），5名上校（布洛贝尔、布卢默、桑德贝格尔、塞贝格、斯泰姆尔），6名中校（皮布尔斯泰恩、勃劳纳、哈恩施、诺斯克、奥托、斯泰姆尔），4名少校和3名下级军官。其中军阶最高、最年轻（他受审时40岁，在指挥清洗时刚34至36岁）、也最聪明的是奥托·奥仑道夫。在法庭上，在充当了共同被告的顾问和代言人。

在法庭上，奥托·奥仑道夫试图为他及其同伙的罪行辩护。他说：

我不知道针对犹太人的灭绝计划，但我知道共产主义的历史，知道布尔什维克进行国内战争、对芬兰和波兰的战争、占领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时所采取的手段。我还知道俄国废除了许多国际条约。国内的敌对阶级要从内部清除，同样，敌对民族则应从外部消灭。在我看来，德国当时正处于正当自卫的紧急时刻，我们不可能对局势了解判断得那么正确。

奥仑道夫、法官和诸检察官之间的对话，很快就陷入了僵持状态，难以持续下去。下边简短的节录便可以说明这一点：

检察官海阿特：奥仑道夫先生，那些犹太人和茨冈人的孩子后来怎样了？

奥仑道夫：依照命令，和他们的父母一起被处决了。

海阿特：那请你向法庭解释一下，一个孩子对德军的安全构成了什么威胁？

奥仑道夫：我来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要执行命令。命令说：所有的犹太人，包括他们的孩子，都是对安全的威胁。

奥仑道夫继续讲述着他的罪行，毫无悔恨的表示，而是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于这种态度，如不联系党卫军分子的政治和思想观念，是难以理解的。这个杀人治国论者在精神和理智上确实和常人不一样：

奥仑道夫：对犹太人，我们通常是以“重新安置”为借口，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先有人对集中营的人名和登记册上的人名进行核实，然后用卡车把指定的人拉到行刑场。在辛菲罗波尔和尼古拉耶夫，部队决定将刑场设在离城有一定距离的郊外。执刑通常是军事性的。牺牲者或站着或跪着，尸体就地埋掉，为的是不留痕迹。受害者的个人财产被没收，股票要交财政部或帝国银行。1942年春天，希姆莱命令用“毒气汽车”杀害妇女和儿童。每辆小车可乘15人，大车30人，10分钟就可使人致死。第一次用这种汽车执刑时，我确信车上的人会顺利死掉，便很放心地离开了……

这一以平淡的声调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使法庭的人大为震惊，被告席上的奥仑道夫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下面是美国检察官威尔东同他的对话：

威尔东：在一迭卷宗中，我发现了如下一份迭交柏林的报告。报告说：“特遣队继续在犹太人和共产党分子活动的地区进行清洗。尤其是在尼古拉耶夫和赫尔松这类城市，犹太人已清除，没来得及逃走的官员也得到了应得的处治。从9月16日至30日，有22,467名犹太人和共产党分子被处决；8月份则处决了35,782人，”当你向柏林报告说，在一个城市里犹太人已清除时，这是指什么呢？

奥仑道夫：这就是说在这个城市里再也没有犹太人了。

威尔东：那些原来的犹太居民到哪儿去了呢？

奥仑道夫：他们被处决了。

威尔东：是否可以说，你所说的“应得的处治”就是被杀掉？

奥仑道夫：是的，当然是这样！

威尔东：你当时是否认为，对元首的命令要坚决服从，而不管你本人是否同意那样作？

奥仑道夫：是！

威尔东：也不管在你看来那样作是人道还是不人道？

奥仑道夫：是！

威尔东：你当时是否认为，即便是死，也应该执行命令。

奥仑道夫：即便是我死吗？当然！

检察官海阿特：作为军人，你应该有些道德意识，对接到的命令作出理智的判断。可事实上，你没有这样作，即使在今天，你仍未表现出这种道德上的判断力。

奥仑道夫：是！

这简短的对话，把一切都表露无遗了。

还是在纽伦堡法庭上，在审讯高级战犯（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等）时，曾在东方与游击队作战的党卫军将军埃利希·冯·戴姆·巴赫—齐列夫斯基供认：

这场斗争大大超过了纯军事性质的需要。它常常只不过是掩盖有计划的种族灭绝行动的借口。假如德国对东方地区的占领再延续几年，按照希特勒等领袖们的计划，这种灭绝行动将导致约3, 000万人死亡。

还是在此法庭上，豪辛格的供词可以充分证实这种说法。他说：

我始终认为，这种对平民的非人道处治及对游击队所采取的种种令人憎恶的敌对作法，只不过是一种借口。政界和军界的领袖们认为这是逐步减少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因为他们认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太多了）的极好时机。

对此，难道还需要多说什么吗？与此相比，历史上有关这类“功勋”的任何记载都显得微不足道了。

第七章烽火阴谋

他的“各个击破”策略的故伎重演

秘密警察的“罐头货”

希特勒命令停止一切活动

第一节为德国争夺“生存空间”

1939年8月中旬,英国和法国同苏联在莫斯科谈判,双方陷于停顿状态。当英法军事代表团乘船于8月11日抵达苏联首都后,他们不与苏联代表讨论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用什么武力来对付纳粹侵略,他们避而不谈缔结军事条约的实质问题,只就抽象的无关紧要的所谓“原则问题”消磨时间。苏联代表伏罗希洛夫说,你们来这里“不是为了作抽象的宣言,而是要制定一项全面的军事条约。”这位苏联元帅提出了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有没有什么条约规定波兰该采取什么行动?一旦战争爆发的话,英国拿得出多少军队来援助法国军队?比利时会怎么办?他所得到的答复都是含糊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法国代表杜芒克说,他对波兰的计划一无所知。英国代表德拉克斯吞吞吐吐地说,目前英国有五个正规师和一个机械化师。苏联说,战争一开始,它能派出一百三十六个步兵师、五千门大炮、一万辆坦克和五千架飞机来对付从西面来的侵略者。

在8月14日一次关键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元帅强调指出,根本的问题是,波兰是否愿意允许苏联军队进入它的领土去迎击德人入侵的问题,如果不愿意的话,盟国又怎么能阻止德国军队迅速席卷波兰呢?他具体问道:“英国和法国的参谋总部是否认为苏军可以越过波兰,特别是越过维尔那山峡和加利西亚去同德军接触?”这是问题的核心。最后,如坐针毡的英法代表认为,伏罗希洛夫提出了他们所没有资格处理的政治问题。

在8月21日的会议上,伏罗希洛夫再次重申,苏联代表团的愿望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同意组织三国武装部队的军事合作,苏联同德国并无共同边界,只有苏联军队在有权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的条件下,它才能给英、法、罗以援助,如果不允许苏联军队进入波兰和罗马尼亚的领土,他们就无法同英法军队合作。苏联军事代表团无法设想英国和法国的政府和总参谋部,在派出代表团到苏联来的时候,怎么会在这这样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不给他们以指示?这只能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有同苏联进行认真而有效的合作的愿望。

杜芒克和德拉克斯要求本国政府指示回答苏联关于波兰的问题,等了三天都没有回音。在8月17日,杜芒克曾给巴黎打电报说:“苏联是想订军事条约的。它不想要我们给它一张没有具体保证的废纸。伏罗希洛夫宣布,只要他所说的那个关键性问题解决以后,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杜芒克要求巴黎设法使华沙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却遭到英法和华沙统治集团的粗暴拒绝。

这时,英法也背着苏联同德国进行秘密谈判。既然苏联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反希特勒的统一战线没有成功,那么苏联的急迫任务就是百倍警惕西方国家的“祸水东引”政策。在大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苏联巧妙地利用帝国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在1939年8月23日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这一条约的签订,粉碎了英法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对苏联的包围,使苏联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加强战备,进一步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苏德条约加深了轴心国之间的矛盾,使德、意、日一致投入战争成为不可能。条约签订后,日本朝野谴责德国破坏了《反共产国际协定》,表示抗议,平沼内阁被迫辞职;意大利独裁者认为德国藐视意大利,从而感到受了

侮辱；佛朗哥则发表声明，要在欧战中保持中立。而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也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标志着若干年来英法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彻底失败”。

希特勒所以突然签约，宣布停止反苏，互不侵犯，只不过是一个骗人的幌子。基本的原因是，希特勒看到英法态度转趋强硬，认为同西方战争不可避免。为了避免在新的世界大战中重犯第一次大战时德军两线作战的错误，希特勒决定先不去碰苏联这块硬骨头，而去首先打垮软弱并且没有做战争准备的英法两国。这是他的“各个击破”策略的故伎重演。

1939年8月22日星期二这一天，德国武装部队三军总司令、参谋长和指挥将领们来到伯格霍夫，聆听希特勒亲口宣布一个可怕的决定：决心进行战争。

“我把你们召来，”希特勒说道，“是为了让你们了解政治局势的轮廓，以使你们对我据以作出我的无可更改的决定的各项因素能有深刻的了解。”将领们从希特勒长达几个钟头的独自中获悉，形势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德国有利：英国“受到极大的威胁”，法国的地位“同样在恶化”，苏俄愿意和德国签订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说：“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

午后不久，先生们离开一会儿工夫，去吃了点东西，接着又聚在一起。希特勒的战争狂热一分钟比一分钟厉害，他的目光越发直瞪瞪的和越发凶狠。他叫喊道：“心要狠，手要辣。八千万人民一定要得到他们应得的权利。”突然他又平静下来，从容地宣布，他准备就在明天决定对波兰开战的进攻日期。仗总是要打起来的，不管怎么个打法。希特勒说：“我将在宣传上提出发动战争的理由，人家信不信无所谓。事后是会有人问胜利者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重要的不在于是否有理，而在于胜利。”

将领们散会离去时，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已经有人奉命在准备提供希特勒所宣布的“宣传上……发动战争的理由”了。希特勒挑选了海因里希·希姆莱从事这项使命。这次行动，把党卫队头子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和泪永远联在一起。

接着，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召集三军司令长官会议，来听他讲进行战争的计划 and 预测。他说，“伟大的戏剧，现在已经接近高潮了。”他肯定英国和法国不会打仗，英国没有一个真正有胆略的领袖。他在慕尼黑领教过的人物都不是能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人物。英国要打仗是为了什么？谁肯为了一个盟国而找死？谈到英国和法国在军事上的作为，他说，它们硬攻西壁是不大可能的。向北经过比利时和荷兰包抄不可能迅速取胜。这些办法都帮不了波兰人的忙。种种因素都表明，英国和法国不会参加战争，没有什么东西逼它们非打不可。因此波兰很可能单独作战。但是希特勒解释说，仍然必须把它“在一两个星期内”打败，好让全世界都看到波兰已完全垮台，这样就不会再设法搭救它了。全部思想来自希特勒的统帅部最高长官凯特尔，他对进攻波兰会引起大战的看法嗤之一笑。他重复希特勒的话说，英国太老朽了，法国太腐败了，美国太不关心了，它们都不会为波兰打仗的。

这样，当1939年8月下半月开始的时候，德国的军事首脑们就全力准备消灭波兰的计划，同时也准备万一西方盟国出乎预料而出兵干涉时保卫德国西部。原定在9月份第一周开始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纽伦堡纳粹党代表大会，

在 8 月 15 日悄悄地取消了。有二十五万人被征召入伍，到西线的军队中去。对铁路提前发出了动员令。陆军司令部已计划迁移到柏林东面的佐森。同一天，海军方面报告，袖珍战斗舰“斯比伯爵”号和“德意志”号及二十一艘潜水艇已准备好开赴大西洋防区。

第二节 “战争把戏”必须出血

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隐约感到了希特勒的盘算，在1939年8月17日，他已在自己的日记中记下了有些令人费解的话：“卡纳里斯……第1局，希姆莱—海德里希上萨尔斯堡，150套波兰军服和附件……上西里西亚。”翻译成明确的语言那就是：哈尔德听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谈到，在希特勒于上萨尔斯堡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独裁者跟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这对党卫队难兄难弟讨论了一项行动计划，指示给上西里西亚提供一百五十套用来作为化装道具用的波兰军服。这是上演一出最终使五千五百万人失去生命的悲剧的序幕。

这是莱因哈德·海德里希想出来的主意。早在1938年苏台德危机中，保安处长就曾建议德国必须通过虚构边境事件，作为口实进军捷克斯洛伐克。只是由于西方国家慑于希特勒的恫吓而投降和慕尼黑会议，才没有实现海德里希的计划。当前的同波兰的摊牌使海德里希跃跃欲试，又把他的老计划重新提了出来。8月初，他已知道怎样使世界相信，德国是由于波兰挑衅而进行战争的。

海德里希的计划是：在德国进攻的前一天夜里，用保安处掌握的部队穿上波兰游击队员和士兵的制服，沿德波两国边界虚构发生侵犯边界事件。伪装的波兰人的任务是几分钟内攻占格莱维茨的德国电台，随后对着麦克风用波兰话发出一通攻击德国的叫嚣；在克罗伊堡北面的边界林区域市皮琴进攻当地的森林管理所；以及捣毁格莱维茨和拉蒂波尔之间边界地段的德国霍赫林登海关。

保安处的这出战争把戏规定需要流血，同时必须在现场留下死人——这是海德里希计划中最令人担心的部分，因为应该让世界报刊的记者们深信不疑。海德里希说：“对于外国新闻界和德国宣传工作，都需要有证明波兰人进攻的真凭实据。”可是往哪儿去找死人呢？这位玩世不恭的保安处长对此也想出了办法：指定由集中营提供“牺牲者”，即提供囚徒，为了X日这一天第三帝国理更崇高的荣誉，将他们事先在集中营里注射毒药针剂，活活弄死，并加以收拾打扮，供上西里西亚战场使用。秘密警察的野蛮语言管这些人叫“罐头货”。

8月初，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将计划呈报希特勒，希特勒立即予以批准。随后保安总处就拧开发报机，向驻格莱维茨—博伊滕—奥佩尔恩地区的党卫队第二十三和第四十五两旗队发出命令，选派会讲波兰话的人来柏林威廉街102号接受一项秘密任务。几乎与此同时，党卫队区队长赫伯特·梅尔霍恩博士接到指示，来见保安警察兼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向他交了底，责成他在霍赫林登地区对这一行动进行准备。接着，下一个谒见者也在一阵皮靴的咯咯声中跨进了海德里希处长办公室。这人就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阿尔弗雷德·瑞约克斯，他从保安处开张起就是海德里希的伙计，这次的任务是指挥对格莱维茨电台采取行动。

瑞约克斯一听就领悟了处长的意思，处长告诉他说，一定要使“造成未来事件的责任一眼就能看出不在我方”。海德里希指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带上六个人去格莱维茨潜伏下来，就近侦察地形并待命行动。行动的暗号是：“祖母去世了。”海德里希严格叮嘱瑞约克斯说：“第一，对于这件事情您不得同格莱维茨的任何德国机关单位进行联系。第二，你们一行中谁也不得

随身携带任何看得出是党卫队成员、保安处、警察或（看得出是）德国国籍的证件。”

这是8月10日的事情，璩约克斯在自己部属中挑了五个人，配上一名用来发表准备好的煽动性演说的译员，带领他们乘车去格莱维茨。他们分住在两家旅馆里，璩约克斯下榻“上西里西亚之家”。然后他去侦察电台周围的地形。电台设在城外塔尔诺维茨公路旁，外面围着一道两米高的铁丝网，电台和相连的两幢楼房均不见有人警卫。

1944年10月19日，璩约克斯投奔了美国人，一年以后在纽伦堡作了一批画押口供，其中之一就是希特勒为了使进攻波兰能有所借口而制造的“事件”经过，他作了如下的交待：

1939年8月10日或者这一天前后，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亲自下令，让我伪装进攻波兰边境附近近的格莱维茨电台，而且要装作这支进攻部队像是波兰人组成的那样。海德里希说：“对外国报界和德国宣传来说，都需要有足以证明是波兰人进行这次进攻的真凭实据。”

给我的命令是攻占广播电台，占领时间要长到足以让一名归我指挥的能说波兰话的德国人广播完一篇波兰语的演说。海德里希告诉我说，这篇演说应当讲到德国人同波兰人之间开战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到格莱维茨去，在那里等候了十四天。在8月25日至31日之间，我去见了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他当时正在附近的奥普林。缪勒当着我的面同一个叫做梅尔霍恩的人讨论了制造另一个边境事件的计划，要把事情做得看起来是波兰士兵进攻德国军队那样。缪勒说，他有十二名到十三名死囚，要让他们穿上波军制服，把他们弄死后放在出事地点，以此表明他们是在进攻时被打死的。为了这个目的，海德里希部下的医生要给他们打毒药针，然后再用枪打，在他们身上造成伤口。事件发生之后，要把报界人士和其他人士带到现场去。

缪勒告诉我，他从海德里希处得到一个命令，要给我这样一个死囚来布置格莱维茨的事件。他在提到这批死囚时所用的代号是“罐头货”。

在此期间，海德里希召集其他关键性人物最后商定了各项细节，保安处处长一一分配角色：国外保安处长党卫队旅队长海因兹·约斯特负责置办行动需用的波兰军服；党卫队区队长、两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奥托·拉施指挥攻打皮琴森林管理所；党卫队区队长梅尔霍恩博士负责把霍赫林登一带地区的武装部队撤走，并协调进攻者和防守者双方假戏真做；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特弗里德·赫尔维格率领他手下的化装成波兰攻击部队的一伙人，由南面（从波兰方向）冲向霍赫林登；党卫队旗队长汉斯·特鲁姆勒博士负责指挥霍赫林登的边防警察和“防守者”；秘密警察处长、党卫队区队长海因里希·缪勒，则将从集中营拉来的“罐头货”分别送到各处战场。

为了给进攻波兰而犹豫不定的纳粹将领们打气，希特勒更声嘶竭力发表他的战争演说，他说：

“从根本上说，一切都决定于我，决定于我的存在，原因就在于我的政治才能。除此而外，也在于这个事实：很可能再也没有一个人能享有我所享有的德国全体人民的信任了。从今以后，很可能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有比我更大的权力了。我的存在因此就具有极大的价值。但是，任何时候我都可能被一个罪犯或一个疯子干掉。

“第二个人的因素是意大利领袖。他的存在也是决定性的。要是他有个

三长两短的话，意大利对这个联盟的忠诚就不再靠得住了。意大利的王室基本上是反对那位领袖的。”

这位恶魔一直这样唠叨了好几个钟头。他认为现在入侵波兰，对德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损失，只能得到好处。他说：

“除了个人的因素而外，政治形势也是对我们有利的；在地中海，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争雄；在远东，存在着紧张局面。

“英国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法国的地位也在恶化。人口出生率在下降……南斯拉夫内部潜伏着崩溃的种子……罗马尼亚比以前更弱了……在凯末尔死了以后，统治土耳其的是一批眼光短浅、动摇不定、软弱无能的人物。

“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两三年后就不会存在了。谁也不知道我会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要再拖延个四五年就不保险了。”

这些是纳粹领袖的疯狂的推理。他认为现在必须冒只能由铁的决心来制胜的风险，决不容许软弱退缩。希特勒提醒他们，他已经用“政治上的恐吓”建立了一个大德意志，现在必须要“考验军事机器”了。“在西线的大决战以前，军队必须进行一场真刀真枪的战斗。”波兰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在希特勒踌躇满志他说完他入侵波兰的所谓有利条件后，又把话题转到德国和苏联的关系上。他说，“敌人还有一个希望，希望我们征服波兰以后，俄国会与我们为敌。敌人没有估计到我有这样大的决心。”他告诉将领们，在与苏联签订商务条约之后，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又已经谈妥，后天两国就要签字了。他说：“我已经完成了政治上的准备，底下的路要由军人来走了。”希特勒要求全体将士要有铁一般的决心，在任何情况面前都不容退缩。打垮波兰是第一件要做到的事。目标是消灭它的有生力量，而不是为了达到一条规定好的界线。即使西方爆发战争的话，打垮波兰仍然是首要目标。由于季节的理由，必须速战速决。

不少纳粹将士，虽然相信希特勒入侵波兰的时机是有利的，但是一个国家无端地入侵另一个国家，无论如何从道义上是讲不通的。为此，希特勒大肆宣扬他的强盗逻辑，他说：“我将提出发动战争的宣传上的理由——不必管它讲得通，讲不通。胜利者在事后是没有人问他当初说的是不是实话的。在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时，是非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紧要的是胜利。”希特勒越讲越激动，唾沫星子满天飞，他咆哮着：“不要发慈悲，要心如铁石，不要怜悯！谁若是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的话，谁就懂得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

“元首”这时的情绪已到了条顿式*盛怒的程度，在大发了一通尼采式的训诫以后，对马上要进行的战役发出了几点命令。最根本的是速度。他对德国军人有“不可动摇的信任”，如果发生任何危机的话，只可能是因为司令官丧了胆。第一个目标要从东南方楔入维斯杜拉河地区，同时从北方楔入那累夫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地区。他说，军事行动决不能受他在打败波兰之后可能对波兰所作的处置的影响。最后他再次强调，“要速战速决”，“心要狠，手要毒！”

与此同时，纳粹的宣传机器，在戈培尔的巧妙操纵下，为侵略战争大造反革命舆论，肆意欺骗德国人民。德国报纸、电台、通讯社连篇累牍地宣传：“当心波兰！”“华沙扬言要轰炸但泽”，“极端疯狂的波兰人发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到希特勒原定进攻波兰的日子，8月26日，戈培尔在报纸上发动的宣传攻势达到了顶峰，这天《柏林日报》的标题是，“波兰完全

陷于骚乱之中，日耳曼人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德国国境的边缘！”

《十二点钟报》的标题是，“这样的玩火行动太过份了，三架德国客机受到波兰人的射击，走廊地带许多日耳曼人农舍成了一片火海！”《人民观察家报》8月27日的通栏标题是，“波兰全境均处于战争狂热中！一百五十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当然，关于德国的动员只字未提。

第三节 希特勒通知收回战争命令

到8月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面铺开，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可以再次向希特勒报告了。一项领袖命令给保安处打开了武装部队的保密军服柜。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谍报局二科日志记录员于1939年8月17日写道：“领袖指示谍报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如下：给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为执行一项行动计划提供二百五十套波兰军服。”布雷斯劳第八军司令部谍报军官丁格勒上尉接到指示，将军服交给保安处代表，谍报局二科提供波兰武器和军人身分证。负责置办事宜的约斯特派人将一应什物送到伯尔瑙保安学校，由上西里西亚两个旗队选派的人员，在这里进行夜间演习和波兰军队的队列操练。

在伯尔瑙进行训练的这支部队领到了波兰军服，每人配备一支轻武器，三十发子弹；只有选派攻打林管所和海关站的党卫队队员装扮成游击队队员。“这些人规定穿绿衬衫和杂色的长裤及便上衣。发给他们戴的是鸭舌帽和礼帽，”被派往伯尔瑙受训的一级小队长约瑟夫·格尔茨梅克后来这样记述说。

8月20日，时间到了。梅尔霍恩把所有人员召集到保安学校的大礼堂，直截了当地给他们支持了执行一项绝密性的“边境任务”。然后大家乘上遮盖严实的卡车，开赴各个行动的地区。格尔茨梅克说：“开车前郑重规定我们不许在途中把脑袋伸出车外张望，不得跟人说话或相互交谈。”两天后，海德里希接到报告，从报告中保安处处长看到，可以随时开始行动了，8月23日，希特勒作出决定：定于8月26日4时30分动手进攻波兰。

海德里希无疑不会那么神色镇定的，如果他知道，就在同一时刻谍报局里的政权敌人正在复制一份希特勒8月22日向将军们讲话的记录的话。这份记录中，除了希特勒确实讲过的话外，也夹有杜撰的（虽然与事实不谋而合）这位独裁者的声明，说他将派几个连在上西里西亚发动对德国边界的佯攻。经过作了这样篡改的希特勒讲话记录稿，落到了反对派青年领袖赫尔曼·马斯的手里，他通过美国通讯社“美联社”驻柏林办事处负责人路易斯·P·洛克纳，暗中转送给英国大使馆。因此英国政府在8月25日下午，就知道了希特勒打算蓄意制造边境事件，向波兰开战。

不过这项行动计划倒是在另一点上出了纰漏。当希特勒在8月25日下午3点钟左右明确命令次日拂晓开始对波作战时，对此还一无所知。海德里希抓起电话话筒发出最后指示：瑙约克斯接到通知不许再离开旅馆，必须随时待命出击，梅尔霍恩接到的命令是将赫尔维格的部队拉往边境，秘密警察缪勒通知装运死囚的卡车起劲。

突然，发生了海德里希事先不曾预料到的事情：希特勒通知收回战争命令。临近傍晚时分，希特勒在总理府接到两个报告，使这位独裁者举棋不定。意大利驻德国大使转达了通知，说他的Duce（指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不能参与战争冒险；来自伦敦的报告则说，英国刚刚同波兰缔结了一项同盟条约。希特勒召见凯特尔大将，冲着他大声说：“立即停止一切行动。马上把（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找来，我需要时间进行磋商。”

凯特尔冲到电话机跟前——这时已是下午6点30分了——给陆军总司令通话。凯特尔说：“由于政治局势变化，已开始进行的‘白色方案’定于下午8点30分停止执行。”费了好大的力气，已经转动起来的战争机器又停了下来。海德里希也跟着刹车，他急急忙忙向上西里西亚发命令；德国保安警

察处处长命令立即停止边界行动。可是，梅尔霍恩已无法通知早已渗入波兰境内的一级突击队大队长赫尔维格了。赫尔维格的部队冲到霍赫林登海关站，开了火，立即遭到德国一方的回击；直到秘密警察缪勒赶到，才止住了战斗。

事后，梅尔霍恩和赫尔维格始终未能就谁应对这场流血事件负责辩个明白。显然赫尔维格把梅尔霍恩发出发准备行动令，误认为出发行动令了。赫尔维格以为暗号“小雄山鸡”是准备行动令，“大雄山鸡”是出发行动令。但就梅尔霍恩来说，“小雄山鸡”只是命令部队戒备，“大雄山鸡”是准备行动令，只有“阿加特”才是出发行动令。可是生性多疑的保安处长海德里希却认为，事情不只是出于对命令的误解，他开始怀疑有人存心破坏这次行动计划。

海德里希偏偏让区队长梅尔霍恩在这次行动中担负关键性任务，这的确是人们意料的。前克姆尼茨律师、保安处资格最老和最精明的同事之一的赫伯特·梅尔霍恩博士是保安总处公认的“智囊人物”；他属于那种对海德里希及其一伙无原则的肆无忌惮进行抵制的旧式知识分子。这个同海德里希作对的人，在1937年被解除保安总处“勤务督察”主管科科长职务，以后被踢到中央内政部，由内政部派往美国和日本进行考察。尽管如此，将智囊人物梅尔霍恩拉来参加保安处这次战争玩火，以便确保行动谨慎和周到，这还是符合海德里希的稳上加稳的想法的。直到海德里希听说，梅尔霍恩认为整个行动计划是一桩“历史性罪行”，以及8月25日夜里闹出的乱子有使保安处处长的声誉扫地之虞时，海德里希才同梅尔霍恩一刀两断。秘密警察缪勒接替了这个萨克森人的职务；梅尔霍恩被迫交出保安处的菱形徽章，此后永远不准再进保安总处的大门，这个最能使海德里希害怕的党卫队区队长以后再也没有升迁。赫尔维格也不得不下台，他的任务由已经扮演过一阵“防守者”角色的旗队长特鲁姆勒接替。

第四节党卫队打出二战第一枪

希特勒刚于8月31日重新和最后确定进攻时间(9月1日4点45分),海德里希就再次命令他在德波边界上的秘密军作好戒备。下午4时许,璠约克斯抓起话筒,里面传出一声响亮而急促的嗓音:“请回电。”再没有说别的话。璠约克斯叫接柏林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的海德里希副官室。又听见那个响亮的嗓音讲了几个字:“祖母去世了。”璠约克斯听得清楚,立即通知手下人集合,和他们约定7点45分乘车去电台并把它占领。这时缪勒也下令启动停在奥佩恩一所别墅前面的卡车,因为他得赶快将死人送到各处战场上。他给璠约克斯准备了一个罐头货,至迟在8点20分以前必须将它摆在格莱维茨电台的大门口。

璠约克斯带领手下的人在塔尔诺维茨公路上急行军,直奔电台大楼。8时许,邮政信箱工人福伊齐克发现五个人走进电台的机房,上楼梯冲向播音室。福伊齐克正想问这几个生人有何贵干,就在一支枪口前愣住了。其他电台工作人员也受到了璠约克斯的款待:“举起手来!”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打了一个手势,他手下的人就大叫大嚷起来。璠约克斯记述道:“我们在播音室里用手枪射击。我们朝天花板开了几枪示威,制造一点声势,吓吓他们。”

电台人员被捆绑起来,塞进了地下室。璠约克斯说:“接下来我们手忙脚乱设法使广播中断。”这些不速之客有好一会束手无策,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中断正在播送的节目,以便把他们的波兰话的煽动性演说播送到太空中去。一会儿,他们终于发现了电台领导通常在遇到雷雨时用来通知广播受到干扰的所谓雷雨麦克风。璠约克斯掏出波兰语讲稿宣读,几分钟后,成千上万的德国听众,就听到了一阵清清楚楚是波兰人发出的千百万嘈嘈的叫器,最后被几声枪声所打断。整个演出历时四分钟,然后璠约克斯带领手下人员撤走。当这个党卫队队员走上公路时,电台门口直挺挺地躺着一个集中营囚徒。这个死尸是璠约克斯小队的两名队员从秘密警察处长缪勒手里领到的。璠约克斯看了死尸一眼,一挥手招呼大家离去。

像在格莱维茨一样,另外两处地方也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计划向德国进行了佯攻。当约瑟夫·格尔茨梅克从霍赫霖登附近被他的同伴们捣毁的海关跌跌撞撞走出来时,黑暗中有什么东西使他眼睛发花。格尔茨梅克说:“我弯腰一瞧,发现地上有好几个人一动不动地躺着,都是穿波兰军服……光着头。我蹲下去,因为我以为是我们自己的同伴。当我打算把其中的一个扶起来时,我发现他早已硬挺挺的了。”

不过党卫队全国领袖没有被几个死会的集中营囚徒所绊倒。他给他的领袖提供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需要的东西:波兰挑衅事件。就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士兵和坦克冲进波兰长驱直入的时候,第三帝国的报纸忙着上演一幕愤怒交响乐,向世界公众报道所谓发生在大德意志国家边境上的骇人听闻的事件。1939年9月1日,《人民观察家报》用头版刊登“波兰暴徒越境进犯德国”。报道说:格莱维茨的罪行“明明白白是波兰游击队全面进犯德国领土的信号”。另一家报纸报道:“在边界地区执勤的保安警察分队奋力迎击入侵者。激烈战斗仍在进行中。”

第三帝国的首领们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个题目。希特勒在9月1日打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会演说中声称,前一天夜里发生了十四起边境事件,其中三起极为严重。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告诉法国大使说,波兰军队从三个

地区入侵德国领土。连对希特勒的作战方针持有自己看法的赫尔曼·戈林，也“稍事犹豫后”告诉瑞典的和谈斡旋者比尔格·达勒鲁斯：“战争之所以爆发，原因是波兰人进攻了格莱维茨电台”。

报纸和权贵们一致发出的悲愤的哀鸣声，还促使秘密警察缪勒再次去现场上演了一幕滑稽戏，当然这一次他所扮演的角色不同了。中央刑事警察处处长缪勒及刑事警察同行、中央刑事警察处处长阿图尔·奈比，率领一个刑事调查组出场，对波兰入侵的真相进行刑事调查，并写出报告。刑事警察处处长奈比甚至叫人在中央刑事警察处里，搞了一座电动的边境事件示意模型，给来自各中立国家的客人们观看。按一下按钮，模型里安装的小灯泡就闪闪发亮，同时响起阵阵模拟的机枪声。保安处长海德里希站在一旁观看这出把戏，一面嘴里自言自语说：“嗯，嗯，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

1939年9月1日破晓，也就是在“白色方案”的第一号指令中规定的拂晓四点四十五分，德国军队大举越过波兰国境，分北、南、西三路进逼华沙。天空中，德国的机群吼叫着飞向自己的目标：波兰的部队、军火库、桥梁、铁路以及不设防的城市。几分钟之后，这些飞机就要使波兰人不分军民第一次尝到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来自空中的突然死亡和毁灭的滋味。在此后六年间，欧亚两洲千百万男女老幼将经常处于这种恐怖之下。

这一天，在柏林是一个灰暗的、有些闷热的早晨，尽管无线电和晨报号外相继传来重要的新闻，但街上的老百姓却对此非常冷淡。人们不禁想起，这种灰溜溜的冷漠情景，同1914年德国投入战争时的情景，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那时候是一片狂热。麇集街头的人群表现出如醉如狂的热情，向出征的军队投掷鲜花，向德皇兼最高统帅威廉二世疯狂地欢呼。

党卫队保安处在德波边境上演的这出战争把戏表明，党卫队正力争使自己成为第三帝国推行扩张政策的重要角色。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党卫队队员们开枪射击，铺平了通向外交冒险的道路。黑色集团的这次行动也是一个信号，说明希特勒德国开始走向放任大胆的掠夺政策的新地平线；格莱维茨无疑只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有朝一日也要决定德国外交政策方针的长途中一个站而已。谁像希姆莱那样满脑子充斥着德意志日耳曼主宰民族的世界使命感，谁就必然要以打破限制主宰民族向世界扩张的界线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这也同时意味着，党卫队有朝一日必须成为德意志强权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支柱。

不过，希姆莱只能小心行事。他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第三帝国领导体系内互相争夺的实力集团丛林中那种为所欲为的地步。无疑他拥有很大的权力，他控制着仅次于武装部队的最强大的国家权力机器——警察，他手中掌握了二十五万八千四百五十六名党卫队队员，他指挥着四个团的拥有武装的特别机动部队，他还负责监督德国的唯一政治情报机关，尽管如此，这些权力还不足以有领袖、独裁者容许他的最高级部属们可以自由活动的范围之内左右政治方针。党卫队只能在领袖授权的问题上，发挥其拉大旗作虎皮的作用，而在代表其自身利益的问题上，它就相形见绌了。

第八章死亡工厂

黑衫队的最高精神修道院

希姆莱的名言：“忠诚是我的荣誉”

与其说是作试验，不如说是一种杀人手段

第一节 神秘的“遗传研究基金会”

1946年8月8日，星期四，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讯高级战争罪犯的第198天。上午开庭时，应庭长要求，一位证人走向栅栏。庭长问他：

“他叫什么名字？”

“沃尔弗莱姆·西佛斯。”

“请你跟着我把这一段誓词重复一遍：‘我在全智全能的上帝面前起誓，我保证讲真话，决不隐瞒，也不捏造。’”

这位证人宣誓时，他的眼睛闪出奇异的光芒，他脸上的肌肉好象是凝固了。此时他看到的似乎是另一个世界，而不是眼前正在进行一系列诉讼的审判大厅。战后50年来，国际政治风云跌宕起伏，因而历史学界对这些诉讼的评价也多有变化，或对被告变得有利，或变得无利。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自然，在法庭上注视着证人的旁听者看来，证人对“上帝”一词的理解是与美国庭长的理解不尽相同的。可谁又了解沃尔弗莱姆·西佛斯？谁又知道此人干了些什么，在想些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检察长埃尔文·琼斯少校问道：

“你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自1935年起任遗传研究所的秘书长，是不是？”

“是。”

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译员将Ahnenerbe译成“祖先遗传和人种的研究”。正确的译法应为“种族遗传研究基金会”。事实上，这两种译法几乎都没有揭示出这一机构的真实活动情况。西佛斯作为证人出席的3次审讯（1946年8月8日和9日）也没有提供任何具体情况。这几次审讯涉及的主要问题是集中在集中营进行的医学试验，几乎没有涉及到“种族遗传基金会”的问题。

8月9日，律师佩尔科曼试图把法庭的注意力引到这一奇怪的机构上来。他问西佛斯：

“证人，成立种族遗传基金会的目的何在？请你简要回答。是为了进行医学试验，还是进行其它方面的研究？”

“仅仅是为了进行科学试验，就如基金会的章程所指出的那样。”西佛斯回答。

“有人说遗传研究基金会组织了50项课题的研究，可是事实？”

“遗传研究基金会大约有50个不同的研究所，它承担或委托其他研究机构承担了100多项重要课题的研究。”

“在遗传研究基金会的人员及为基金会承担科研任务的所外人员中，党卫军分子占多大比例？”

“半数左右。”

“其它人可是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

“不，他们没有必要入党。”

“遗传研究基金会的合作者中，可有不搞政治的？”

“是有那么一些人，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被国家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所拒绝。”

“我这里有你日记的原本。给你看的是日记的摘要，从330页中摘选了3页，根据这份资料的原本，是否可以说，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仅是涉及到

遗传研究基金会工作的很小一部分？”

“是这样。我可以证实这一点。只有通过我的全部日记，才可以搞清楚遗传研究基金会的工作范围，也才能知道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可以说和这些工作毫不相关。”

“你能说得详细些吗？”

“遗传研究基金会的活动……”

庭长打断西佛斯的发言说：“等一下！我们没有时间听与在集中营进行的医学试验无关的遗传研究基金会的其它事情。”

有关遗传研究基金会的真实活动，对高级战争罪犯的审问并没有提供除此之外的任何其它。后来对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审讯（这次审讯把西佛斯送上绞刑架）也只是得到有关遗传研究基金会大量罪恶事实的一些梗概，因为西佛斯不肯“合作”。当听到对他的罪行指控时，他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他知道自己下场如何，对死处之漠然，因而不肯交待、揭发问题。在对西佛斯审判时，人们对弗雷德里克·希尔谢教授（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朋友）、地缘政治学教授卡尔·毫绍费、恩斯特·荣格、马丁·布伯及一犹太哲学家的发言寄予很大希望。希尔谢是西佛斯的好友，是遗传研究基金会负责研究秘传理论和遗传对人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研究室的出色的合作者。需指出，弗雷德里克·希尔谢没有在任何法庭上被起诉。审讯西佛斯时，他的表现有些异常：他转移话题，妄图以此掩人耳目，蒙混过关。他故意说些荒诞的种族主义疯话，但对遗传研究所的活动秘密避而不谈。然而，当希尔谢经盟军同意送西佛斯走向绞刑架时，人们发现他和囚犯在绞刑架下诵念一秘密宗教的经文。关于这一秘密宗教，西佛斯无论在被讯问时还是在他自己受审时都从未说过，希尔谢也没谈过。

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日记能告诉我们更多的事实吗？有人发现纽伦堡的法官保存着两份材料：一是 PS—3546， GB—551 文件，此件只记录了一些摘要情况；二是这本日记的原件。日记有 800 多页，但缺第 3、4、5 页，很可能是被西佛斯本人撕去了。在这 800 页日记、特别是其中被撕去的 3 页中，有可能记载着遗传研究基金会的核心机密。总之，人们对此知道的甚少。人们所知道的这一点有限的事实，如忘记了遗传研究基金会的创建者正是党卫军头子希姆莱的话，也就失去了任何意义。

如果对党卫军、集中营、盖世太保、党卫军保安处和东方各行刑特遣队的总头目居然会建立遗传研究基金会这一庞大的科学研究机构感到奇怪，那就是对希姆莱的奇特个性的主要方面之一缺乏了解。

希姆莱的哲学素养甚差，他对罗森堡、京特、豪斯霍费尔、赫斯或西佛斯的天体演化论、宇宙学的理论几乎是一窍不通。但他对中世纪日耳曼人的情况却十分熟悉。他阅读了所有记述这一时期德国历史的著作，他所崇拜的这一时期的大人物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国王阿图尔（公元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那些国王：如亨利一世（公元 876—936）、腓特烈一世（红胡子，1122—1190）和霍恩斯托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1194—1250）。希特勒同希姆莱一样，对腓特烈一世（红胡子）十分钦佩，比如他把侵略苏联的计划称之为“巴巴罗沙”（意即红胡子）行动就是一例。

希姆莱是阿图尔骑士文学的爱好者。他身边总是放着 13 世纪德国作家沃尔弗勒姆·德施巴赫的 3 本小说：《帕齐瓦尔》（Parzival）、《威尔哈尔姆》（Willehalm）和《蒂图雷尔》（Titurel）。沃尔弗勒姆·德施巴赫是

法国克雷蒂安·德·特罗埃斯和罗伯特·德·博隆创作的“格拉尔杯”的后期小说家。如同特罗埃斯等人一样，他肯定他说，那只纯绿宝石的高脚酒杯就是耶稣在逾越节和他的使徒们喝酒用的那只酒杯，约瑟夫·阿里玛蒂往酒杯里放了耶稣基督蒙难时流出的血。但沃尔弗勒姆·德施巴赫又宣称，他得知“格拉尔”杯的一桩秘密，并声称是安吉文·盖约特告诉他的，而后者又是从西班牙托莱多的一个阿拉伯巫师那里听到的。据沃尔弗勒姆·德施巴赫说，谁能得到格拉尔，谁就会有无可抵御的神力，并成为一个人无敌于天下的人。利用这一源自宇宙的神灵力量，被授于宗教教义的人便能随心所欲地整治他的敌人。这一切皆取决于他对上帝信仰的真诚，取决于他传播宗教教义的能力，而且他的感情、意念应该持久、专一，心无邪念。如此说来，就不能单纯地把格拉尔理解为一个酒杯，它还是高级人性的起源，超俗的良知的原型。这样，“寻觅”格拉尔就不只是神秘的、不可思议的，也是有形的了。这需要追根溯源，需到伟大祖先的故乡去寻觅原委。希姆莱对这些说教简直是着了迷，他试图把这些中世纪的神话变成20世纪的“现实”。他听卡尔·豪斯霍费尔教授的说，“阿图尔皇帝曾在西方、在大洋那边的一个烟雾缭绕、有着一个全苹果园的国家战胜了北极人，夺得了这具酒杯”。阿图尔国王的王宫就建在图勒岛上那既似人间又象冥世的另一个世界。

希姆莱试图在被授予宗教教义的古图尔国王和北欧英雄西格弗里德（据北欧民间传说，他为了使自己的身体刀枪不入，曾用尼伯龙根宝藏的守护神，巨龙法弗纳的血洗过身）之间确立某种联系。20世纪的龙，对希姆莱说来，不就是“犹太人的财阀和共产主义分子的可怕联盟”吗？

有一天，希姆莱曾叫嚷：“洗吧！永远用魔鬼的血洗身子吧！你会变得纯净，并为保证实现世界平衡所必不可少的种族平衡作出贡献。这样，你就是在继续推进骑士们的事业。”

希姆莱在几次演说中，都提到中世纪被授予宗教教义的古恩斯托芬家族的奇怪人物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二世是日耳曼人的皇帝，罗马和西西里的国王，是普埃箕特区靠近安德里亚的那座令人不可思议的卡斯塔尔山城堡的建造者。他领导了第6次十字军东征，试图创立一种统一的宗教——基督教主体教会合一运动。他一生与教皇作斗争，因而在他死前5年，即1245年，被里昂的宗教评议会开除出教会并罢免神职。

在诸历史人物中，最使海因里希·希姆莱仰慕的莫过于亨利一世了。党卫军领袖甚至认为他自己就是这位日耳曼皇帝的再生转世。亨利一世在历史上被称为“统一者”、“城市的保卫者”、“匈牙利人的战胜者”。他还有一个绰号，叫“捕鸟者亨利”，因为他非常爱鸟（他亲自捉鸟，并放到笼子里喂养）。希姆莱仿效这位10世纪的老“祖宗”，资助一个护鸟协会，帮助他们把在巴伐利亚州和博登湖畔收集到的不能南归的候鸟用火车运往意大利……据他的私人按摩师克斯顿讲，当希姆莱午休时，经常谈起亨利一世。党卫军领袖渐渐养成了一种习惯，当他说什么时，开头总是说：“在此情况下，亨利王就会……”这种对亨利的崇敬之情可追溯到党卫军领袖的早期生活。

1936年6月17日，海因里希·希姆莱被任命为德国警察总监。1936年7月2日，他在奎德林堡城堡的教堂里（亨利的皇陵就在教堂附近）举行隆重庆祝仪式，一是庆贺他荣任要职，二是纪念亨利一世逝世1000周年。在希姆莱看来，这第二件事极有意义。他作了长篇纪念发言，称颂亨利一世是“世

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德国人之一”，是一位“谨慎、灵活而又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实际上是借这些话吹嘘他自己）；他还以溢美之词介绍了这位日耳曼皇帝、“斯拉夫人历史上的强大敌人”的政治策略。他借机抨击了教会在德国历史发展的影响。他说：“亨利一世不容许教会干预国家事务，他始终认为，德国人民的力量在于他的种族的纯净性。”

在希姆莱对中世纪的认识中，他显然极重视条顿骑士团的作用。优秀血统的卫士—党卫军，也即他的黑衫队，在他看来就是中世纪条顿骑士团的再现。后人所说的条顿骑士在 1198 年首先是一个慈善团体后来经教皇英诺森三世同意，遂成为一种军事团体。正像圣殿骑士团或圣约翰骑士团（即后来的马耳他骑士团）一样，条顿骑士团起初是向各民族开放的，但是不久，由于创立者是一些德国商人和骑士，条顿骑士团便只在日耳曼贵族中招募骑士了。该骑士团仿效圣殿骑士团的作法，制定了一套规章，把他们的活动中心定在靠近维斯杜拉河河口的马林贝格，并在这儿建起了骑士团大头目的城堡。希姆莱爱向人们谈论那使条顿骑士引以为荣的无私的精神及他们的组织管理才能和政治上的灵活性。他指出，骑士团在 13 世纪之所以来到普鲁士，一是为进行反对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二是为保证日耳曼人向东方的必要推进。骑士团大公赫曼·冯·萨尔察在 1226 年让人向他出让了库姆地区以及对随后被他征服的利沃尼、波美拉尼亚、立陶宛和但泽地区的统治权力。在 14 和 15 世纪，骑士团开始衰落。1525 年，骑士领袖阿尔伯特·德·布兰特皈依路德教，条顿骑士团也就最终解体了。

作为黑衫队头子的希姆莱也想为他的黑衫队搞到一个城堡。一天，他在风景秀丽的德国西部，靠近帕德博恩城的韦斯特法里发现了一个城堡的遗址。该城原是匈奴人建造的。在 17 世纪归一个叫韦韦尔·冯·布伦的骑士所有。因此叫韦韦尔城堡。这里的景色把党卫军领袖迷住了。又高又厚的围墙和那高高的城堡主塔尤使他满意。

自 1934 年起，希姆莱就着手对韦韦尔城堡进行重建，他欲使之变为黑衫队的最高精神修道院。为此，他大兴土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 2000 名囚犯一直在这儿施工。在城堡附近的尼德尔哈根，为这些服劳役的囚犯和他们的后继者很快建起了一处营房，建筑师巴尔特尔斯为工程总指挥。全工程耗资 1100 万德国马克，有 4000 个集中营囚犯为之丧命……

为完成这一宏伟工程，党卫军总监在人力和物力方面毫不吝啬。城堡门窗框是蓝色大理石制的。大楼楼梯的锻铁栏杆饰以 3 至 10 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艺术图案。墙上挂着壁毯。所有的护壁板和图书室的书架（有精装藏书 12000 册）全是用的上等橡木。一些纳粹艺术家向希姆莱赠送了用以装饰韦韦尔城堡的大理石历史人物雕像：有亨利一世、狮子亨利萨克森公爵、艾伯莱希特王（熊）、腓特烈（红胡子）、霍恩斯托芬王朝的腓特烈二世等人。当然，还有阿道夫·希特勒的雕像。城堡的每一个房间的布置都具有独特的风格，并以历史名人的名字命名。希姆莱的房间自然是取亨利一世的名字。城堡被当作是一所修道院进行管理，仿照对耶稣会士的管理办法制定了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借以对那些有幸被希姆莱恩准到此休假疗养的党卫军领导人进行管束。

在拱顶、长方形的餐厅里，党卫军领袖的餐桌上摆着 13 套餐具。希姆莱效仿阿图尔皇帝宠幸其 12 名最勇敢的骑士的作法，只同在他看来功绩最大的 12 名上将同桌就餐。会议大厅长 35 米，宽 15 米。开会时，身着黑色制服的

“骑士”们和党卫军领袖坐在靠背很高的皮制大沙发上，中间摆着一张又笨又重的橡木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些银质小盘，每个小盘上刻有一名“教士”的名字；凡开会前，都进行一阵精神默祷，就像基徒们在教学里作祈祷那样。

在大厅的下面，是一个尖拱顶的大地下室，墙壁的厚度达2米。这里是黑衫队诸“圣徒”们的至圣所——党卫军祭仪处。在骷髅标志下，有一个黑色大理石讲台，讲台上有两个用白色大理石磨成的古代北欧字母“S”。在底部有一个像水井样的开口，里边有两个进入深处的花岗石石梯。这个洞穴的底部形状就像是一个银制的贝壳，靠铁制火炬架上的树脂火炬照明。这里是焚烧死亡的黑衫队骑士的盾形徽章的地方。死亡“骑士”的尸体原则上要葬于祭台下面。

有人发现了一大堆有关党卫军军官在韦韦尔城堡佩带的徽章的卷宗。我翻阅了一下。徽章的图样奇形怪状，使人看了觉得好笑。历为大多数“骑士”出身于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家庭，他们没有资格佩带高级骑士的徽章，因而直到1944年，希姆莱才让人给他造出徽章。徽章上：一只第三帝国的鹰，双翅伸展；一个饰有橡树叶的骷髅；希姆莱的名字和一句格言：“忠诚是我的荣誉”。名字和格言是用古代北欧字母和哥特文刻成的。

希姆莱试图以这种中世纪隐晦的浪漫主义使党卫军和一般的纳粹分子有所区别。他对基督教越来越反感，无时不在想用日耳曼异教徒的习俗、观念代替他原先的宗教信仰。他曾规定，党卫军队员的婚礼需预先征得他的同意才可举行。他试图用祖先的婚礼仪式来改变和代替现行的结婚风俗。他指示：党卫军队员的婚礼不准由神父主持，而应由党卫军某单位的头头主持；在夫妇双方互换戒指后，党卫军征婚人向他们馈赠面包和食盐。这一规定事实上根本没有行通。

下边是1931年12月31日（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前一年多）发布的有关党卫军队员婚姻条例。

党卫军命令，“A”，第65号

帝国党卫军总监

慕尼黑 1931年12月31日

一、党卫军是一个具有北欧优等民族特征的德国人的联盟，其成员是按照特殊的要求经过严格挑选的。

二、根据世界国家社会主义学说，意识到我们民族的未来取决于优秀种族的选择和遗传继承，特制定成年未婚党卫军队员《婚姻批准规定》，自1934年1月1日起执行。

三、《规定》以建立具有良好的生理遗传和北欧德国种族优秀特征的家庭为目的。

四、党卫军队员的结婚申请的批准与否，只能以是否有利于我们优等种族血统的遗传或健康遗传为据。

五、凡是准备要结婚的党卫军队员必须预先征得帝国党卫军总监的批准。

六、对未经许可而擅自结婚的党卫军队员，要开除出党卫军，并解除其职务。

七、由党卫军种族处负责对结婚申请者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审查。

八、种族处要建立党卫军家庭户口簿，对已获准结婚或已被正式接受入队的党卫军队员的家庭成员情况进行登记。

九、帝国党卫军总监、种族处处长及隶属于该处的工作人员要保守职业秘密并以自己的荣誉担保。

十、党卫军确信，此命令的发布标志着我们向前迈出一大步。我们不必理睬那引起

嘲笑、讽刺和误解。未来是属于我们的。

帝国党卫军，总监

H·希姆莱

有孩子的党卫军队员要遵照希姆莱所想象的仪式给孩子施洗礼，然后，如果家长愿意，才可以按照他们所信仰的宗教的仪式给这孩子作第二次洗礼。

党卫军队员的孩子的洗礼仪式是在党卫军某驻地的一间叫“魏因毫姆”（祝圣厅）的正中进行的。祭台上覆盖着一面字旗，摆放着一束束鲜花和一幅元首的肖像。墙上挂着一面黑旗，旗上有两个白色的古代北欧字母体的 S。在黑旗与祭台之间，站立着三个身穿礼服、头戴军帽、持械的党卫军队员。中间的那位举着一面队旗，旗杆顶端有一只鹰，旗上写有德国国歌中的一句话：“觉醒吧，德意志！”屋子墙角处燃着火炬。一黑衫队军官站在婴儿旁边（婴儿被放在饰有字祭台的脚底旁的一块坐垫上）。他首先读那类似于宗教信仰的声明：

我们相信宇宙中的上帝。我们知道，我们种族的使命是在德国的土地上培育一代代朝气蓬勃的青年。我们相信优秀种族的人民，相信上帝给我们派来的元首。

希姆莱的参谋长卡尔·沃尔夫的第一个男孩（该男孩已有两个姐姐）在一周岁生日的前一天取名托里斯曼，于 1937 年 7 月 4 日，在格姆恩·特格恩西，由党卫军为他进行了一次最为隆重的洗礼。

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孩子的 4 个教父（其中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出席了洗礼仪式。教父们先后祝词。

第一个发言的教父送给孩子一块象征忠诚的蓝色饰带。他说：“愿这块蓝色的忠诚饰带伴他一生。一个以作为德国人而感荣耀的人应该忠诚！用这块蓝色饰带象征性地连接一个人由出生到结婚、由生至死的全过程。愿这孩子成为家庭的和民族的一分子。愿他作一个好孩子，作一个正直诚实的德国人。”

第二个教父送给他一只酒杯，说：“戈特（异教徒对上帝的称呼）是一切生命之源。戈特赐予你知识，赋予你使命，教你确定人生的目标，使你学会认识发现万物的本领，愿来自这只酒杯的每一口酒都表明你是受戈特保护和忠于戈特的。”

第三个教父送给他一把小匙，说：“让这把小匙喂养你，直到你长大成人。你母亲以此表明她对你的爱。但如果你违犯戈特的律法，她就要惩治你，不给你饮食。”

第四个教父给他一只家族的戒指，说：“这只戒指是沃尔夫家的，也是党卫军的。我的孩子，当你成为一个年青人并无愧于党卫军和你的家族时，你就把它戴上。”

希姆莱亲自给孩子命名，他说：“遵照你父母的愿望及党卫军对我的托付，我给你取名叫托里斯曼·海因里希·卡尔·莱因哈德。你们，这孩子的父母和教父，要按照戈特的旨意把这孩子培养好，使他成为一勇敢的真正的德国人。而你，我亲爱的孩子，愿你无愧于托里斯曼这个好听的名字，以使你在成年之后，在整个一生中永远保持这个好名字。让我们的戈特去保佑成全他吧！”

当这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希姆莱曾派人给孩子的党卫军父母送去了一个

平底大口杯、一把银制小匙及与之相连的一块饰带、一块蓝绸小桌布。这些都是党卫军在阿拉赫城工厂的产品。在第四个孩子出生时，他寄去一封祝贺信和一个银制的条顿式的枝形烛台。烛台上刻有这样一句话：“你只是骑士团永恒链条中的一个链环。”这个条顿式枝形烛台还有另一种含义，人们叫它冬至蜡烛台，因为希姆莱一般是在圣诞节前向朋友们馈赠礼品，希姆莱送来的另一件令人难以理解的礼品是，一只上面有一个骷髅图案的银戒指。这种戒指是专为早期的党卫军队员制作的，后来凡是在党卫军任职3年以上的军官都能得到一只。

在送给奥拉宁堡—萨克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坎德尔的一本路德威格·威索尔写的《战士的精神》一书的衬页上，希姆莱写道：“上帝对人世间的统治是至高无上的，是人类意志的体现。以我们为主人的德国正在诞生……前线的士兵，正以他们的英勇无畏给我们开辟通向帝国的道路。努力而又忠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是我们的使命……天国的一天等于世间的一千年，我们要充满信心为这一事业的实现而奋斗！”

希姆莱对宇宙种族的狂妄想法使他建立了黑衫队并为之确立了千年的任务。为满足他的伪科学实验癖，他在1935年又创立了遗传研究基金会。基金会，听起来并无奇特之处，然而这一普普通通的名称却掩盖着纳粹分子神秘而又可怕的罪恶活动。从1942年起，该机构直接划归党卫军领袖的特别参谋部领导。

希姆莱是基金会的当然主席。基金会的秘书长自始至终由党卫军上校沃尔弗勒姆·西佛斯担任，基金会的科学部主任是德国科学院院士、慕尼黑大学校长、党卫军准将瓦尔特·伍斯特。一个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的强有力的参谋班子协助他们工作。

设在柏林普科莱大街16号的是该基金会的各个研究所，基金会在物资和经济上负责资助它们。基金会的会址设在柏林威廉大街28号。这是第三帝国性质最奇特的机构之一，也是党卫军的最秘密的机构。正如前文所说，要了解它的全部活动是极为困难的，这不只因为有关这方面的文件现存不多（大部分文件在盟军到达之前被销毁了），而且还因为第三帝国覆灭后活下来的基金会的人员不肯承认他们是这一机构的成员。即使他们中有人被揭露，这些被揭露者也是守口如瓶，不肯交待揭发问题。

1937年1月的某天，希姆莱在发表演说时，提到了遗传研究基金会。他仅在这一次讲话时公开提到过这个基金会。但这次讲话时他也是极力掩饰，不过他的话还是透露了某些情况：

“我们也有一个种族处，与旨在揭露打击敌人的保安处不同，它的任务是从正面进行意识形态教育方面的建设性研究。种族处负责处理党卫军人员的婚姻事宜……它还负责科学和古代史方面的研究。

“我们在阿尔特克里斯滕堡发现了一个占地30阿彭特的堡垒，从政治上看，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因为我们的国外敌人一直在说东普鲁士是斯拉夫领土，也就是说是属于他们的，从科学和意识形态方面来说，我们的任务就是客观如实地研究这些问题。我刚才作为例子提到的有在阿尔特克里斯滕堡的发现表明，这儿曾有7种人居住过。最初是古代的骑士团，后来的是普鲁士人，最后来此走居的那5种人中有哥特人和古代日耳曼人。我们之所以对这些问题怀有兴趣，因为这对于我们进行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斗争极有意义。

“我希望在每个有党卫军部队驻防的地区，都设立一个文化中心，从事

对德国历史及其强盛情况的研究。我希望文化中心要正规化，要使它与我们这个具有伟大文化遗产的民族的地位相称，就如在凡尔登附近的埃克斯特恩斯坦人或萨克森海因人所作的那样。在那里曾有 4500 名萨克森人被杀。在那儿，我们用 4500 块来自 4500 个萨克森村庄的史前时代的漂砾重建了一些房子。为何要这样作呢？很简单：我们想借此向我们的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证明，我们这个民族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不是野蛮的、落后的、不开化的、需要从外族进行文化输入的野蛮民族。我们希望我们的人民能以他们的历史而感到自豪，我们要告诉他们，德国历史比有两千年历史的罗马还要悠远，因为最古老的、在五千年前制造的犁是在德国发现的。最古老的文字也是由日耳曼人发明的，这只要看看到处可见的碑文就可证实这一点。我们意欲向每个德国人（不管他是生活在德国的东部还是西部）证实，这里地下的文物和我们已发现的文物都是他们的祖先创造的。我们现在可以向西方证明，阿明并不是一个野蛮的乌合之众的部落首领，但凭借日耳曼人建筑的当时唯一的防御工事把瓦鲁斯领导的罗马军队打得大败。这就是我们注意研究史前的科学和文化的意义所在。”

根据这一原则，遗传研究基金会甚至向中国的西藏派遣了一支考察队。考察队由人种学家、党卫军上校谢弗博士领导，其任务是根据纳粹人种理论，考证印度—日耳曼人是现在北欧人的祖先。他们的考察报告大部分已丢失，所剩部分的摘要被缩微摄影后保存在华盛顿国家档案馆里。但愿能在某一天重新找到报告的全文。我们读到的残存部分，其内容还是很学术价值的。

1933 年建立、1935 年划归党卫军领导的遗传研究基金会，其宗旨似乎并无神秘之处：“研究印度—日耳曼—北欧人种的生存空间、精神、行动和遗传特征，并以有趣的方式向人们通告这一研究的结果。”

由此看来，在沃尔弗勒姆·西佛斯的协助下，由维斯特教授领导的遗传研究基金会和其它研究机构一样，就其实质说来不过是一个负有特殊宣传使命的科学社团，然而其目的本身却使它置于党卫军世界的中心地位。

遗传研究基金会很快就成了“人种研究中心”。它有 50 个分支研究机构、15 个研究分会。在它的骨干力量中，有许多是大学教师，其中教授就有 30 多人。

研究的经费补贴由国家和该基金会会员（每个德国人都可以是遗传研究基金会的成员）分摊。国家通过德国科学研究理事会资助遗传研究基金会。

德国科学研究理事会是根据希特勒的旨意于 1942 年 6 月 7 日成立的。会长是戈林，由 21 名主任委员组成的委员会协助他领导。这 21 名主任委员除专职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外，其科都是纳粹政府的重要人物，如希姆莱、卡尔·勃兰特、康蒂等。医学部由沙尔勃鲁赫教授领导，它在各大学有 214 名男性和 179 名女性研究人员，在各研究所有 81 名男性和 141 名女性研究人员，不包括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和私人工业部门研究所的人员。德国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结构、作用及活动情况在此不必涉及，因为这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

希姆莱亲自确定遗传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方向（研究印度—日耳曼人—北欧分支的生存空间、精神、死亡和遗传的种种问题），即研究日耳曼雅利安人的生存空间、国家社会主义哲学观念、祖先的精神、种族、艺术及科学的遗产。

由此看来，遗传研究基金会的宗旨是进行科学研究，其研究的范围十分

广泛。它承担了对一切引起严肃课题（如蔷薇十字会的复活、爱尔兰大爪的符号表示、《圣经》、吠陀、希帕莱神秘哲学、北欧人的人体和结构等）和一些古怪离奇的事情（如哥特塔的神秘含义、为什么英国人玩板球而美国人玩棒球、艾东的高形帽的产生和含义等）的研究。某些研究部门则从事对德一些秘密事件和绝密项目的研究。在这些保密研究机构中，人们只知道有一个是从事“死光”研究，另一个是从事对古代语言、宇宙学、考古学、瑜伽和禅宗的研究。

第二节 杀人试验

遗传研究基金会虽从事极重要的秘密或半秘密性质的活动，但其本身并非仅是一个存有宗教幻想、温和无害的、由诸部门组成的集合体。战争期间，它的规模扩大了，成了进行军事科学研究的中心。遗传研究基金会和武装党卫军卫生保健学院合伙，成了党卫军一个用人进行罪恶性试验，聚各种“疯子”和杀人魔王的恐怖部门之一。

希姆莱对创办一个绝对服人于他的、为纳粹国家社会主义种族政治服务的医学团体煞是热心。这个希波克拉底的信徒，中世纪植物学家和医生的崇拜者，主张恢复自然医学，回复顺势疗法，回复其祖父母秘传的草药疗法，并提倡科学的烹调以防止各种疾病。这个过去的养鸡者懂得一些饮食常识，他常向他的医生克斯顿说“不良的饮食习惯使一些农夫深爱甚害”。如果说在战争期间，恶劣的条件使人们不能体验这些医学健身之道的效验，却使希姆莱满足了他那极使人不安的对实验的癖好。他对那些甘冒生命危险以自身作实验的医生很是敬佩。他常说：“坚持作试验吧！这终究会使你有所收获的。”“试验”于是成了党卫军医生的任务之一。

特农和赫尔曼在他们合撰的《党卫军医学史》中称党卫军的医生为“国家社会主义生物学士兵”，他们大部分都在武装党卫军各正规部队中供职，负责部队的医疗。他们中，只有200名（在每300名医生中约有一名德国医生）被分派在各集中营，归党卫军上校厄诺·洛林博士（集中营的主任医生，1945年自杀）调遣使用。

在集中营，他们的服务对象不是囚犯（囚犯由身为囚犯的医生护理），而是党卫军的工作人员。他们负责集中营的卫生保健，还承担其它一些被称之为“非医学性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前奥斯威辛集中营指挥所称的“研究”。

这些“研究”直接置于希姆莱的严密控制之下。在柏林，负责全部工作的是帝国卫生部专员卡尔·勃兰特博士和党卫军卫生处主任医师卡尔·格布哈特教授。协助这两人工作的是遗传研究基金会的秘书长沃尔弗勒姆·西佛斯和武装党卫军柏林卫生研究所所长乔基姆·莫鲁考弗斯博士（他们均被纽伦堡国际法庭判处绞刑）。

在集中营内直接负责医学试验的是总理办公室二部主任维克多·布拉喀（被盟军绞死），党卫军少将、德国红十字协会主席欧内斯特·格劳维茨博士（自杀）及医师公会主任伦纳德·康蒂博士。在这3人指挥下直接从事实验的有拉希尔、舒曼、克劳贝克、艾塞尔、丁格、门格勒、豪文等。这些实验者并不都是集中营的主任医师，他们大都是来自其它部门的党卫军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党卫军上校卡尔·勃兰特博士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认，希特勒在1935年作过一次喉部手术，尔后他就想到要进行这方面的试验。他当时声称，“利用罪犯作试验解决医学问题，是合理合法的。”

党卫军上尉、空军留守部队军医西格蒙·拉希尔博士似乎是第一个要求将这一狂想付诸实施的人。

1941年5月15日，他在给希姆莱的信中写道：

“我非常遗憾地指出，有关人体的任何试验都未进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无人愿作。因此，我郑重地提出，你能否向我们提供两三个职业罪

犯供我们作试验用？……不消说，试验对象可能会在试验中死去。我将协助进行试验。由于英国战斗机对我们袭击是在高空进行，这对于试验飞行高度对飞行员的影响是绝对必须的。”

8天后，拉希尔的要求被获准。达豪集中营被选作进行拉希尔试验的场所。1942年2月22日，第一个试验品进入低压室。低压室是预先被拆卸运到集中营来的。

这类试验一直持续到1942年5月，试验了近2百名随意选来的各民族的囚犯，其中80人死于低压室，因为拉希尔故意长时间将他们保持在高空（约高14公里）压力状态，从而导致空气栓塞（这一点，他知道得很清楚）。其它即使侥幸活下来的人，身体也受到严重摧残。

拉希尔的试验使他的受害者遭受了可怕的真空摧残。巴霍莱格博士参加了试验，他在作证时并非情愿地讲述了他亲眼目睹的试验情形。被指定当作豚鼠试验的囚犯身穿带格的囚服，进入一个巨大的玻璃罩内。他戴一个氧气面具，上半身被吊在金属支架上的降落伞套具紧紧系住。空气泵渐渐抽着玻璃罩里的空气。当上尉军医从气压表上看到已达到模拟的飞行高度时，便命令试验对象将氧气面具去掉。一旦玻璃罩里的人摘下面具，一幕目不忍睹的惨剧便发生了：受害者立刻感受到压力对他的折磨，似乎觉得头要炸裂；他两眼翻白，鼻孔扩大，张大嘴巴；他呼吸急促，用手指抓自己的胸部，似乎是想要把他的两肺抓出来……这时，拉希尔的权力对受害者说来是至高无上的，他可以把这种“游戏”继续下去，将“豚鼠”致死，或宽容一下，将试验中断，让他的试验对象过几天后再受一次罪。

事实上，正如巴霍莱格博士所证明的那样：“这种修绝人寰的试验确实是常常以把人致死而告终，以致后来在许多情况下，这间低压室与其说是作试验用，倒不如说是一种用来杀人的手段。”

这就不是为试验高空飞行对飞行员的影响所作的试验。可通常的飞行也不容忽视。有许多飞行员落海后虽被救上来，但终因长时间的浸水而死去。这使拉希尔着手研究救护的方法。

从1942年8月至1943年5月，上尉军医进行过一系列的试验。他把赤身的试验对象置于至少是零下25度的严寒下或冰水中，试验寒冷对人体的影响，经过20分钟的冷冻，那些最幸运者也要昏死过去。两个苏联军官创造了持续时间最长的纪录。他们被浸水后冰冻5小时后还活着。他们恳求将他们用枪打死，而不要让他们再受这种酷刑虐待。

拉希尔让人把已经冻僵（体温下降到25度）失去知觉的“豚鼠”拖出水，用动物的体温对他们进行回暖。他让一些裸体的女人用身子紧贴在冻僵的男人身上。然而白费力气，大多数情况下都已为时过晚，不幸者死了。这使上尉军医大为懊丧，他原来还指望他们能起死回生呢！拉希尔最终还是找到了“灵丹妙药”，他采用了1880年俄国医生莱珀津斯基用过的方法，把冻僵了男人放在一盆40度的热水中回暖。

拉希尔的另一个竞争者是一个叫贝尔鲍克的人，他从同样残酷的试验中看到了自己发迹的希望。这种试验是了解那些被迫喝了过量盐水的人的生理反应。试验分几组进行。第一组只用海水来处理，其它两组各自试验一种脱盐的方法。试验结果实在令人可怕：一些受害者空腹饿了几天后，被人强行向肚子里灌盐水。他们马上嚎叫起来，嘴上泛起白沫，另一些人的皮肤则突然皱缩，就象老人的皮肤那样。很快，这些试验对象就失去了知觉，只有死

神才可以把他们从这种痛苦的惨状中解脱出来。

随着帝国侵略的不断升级，被征服国家的居民便沦为德意志帝国殖民统治下的贱民。纳粹医生们很快便想到应对集中营的男女做绝育试验。这样可保留囚犯的全部劳动能力，又使他们不能生育。为此，波科尔尼博士向希姆莱写信说：

“如果我们能通过研究很快找到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使男女服用后绝育的药品，我们便掌握了一种新的、极为有效的武器。让目前囚禁在德国的 300 万布尔维克进行绝育，使之既能作工，又不致毓，这一设想展示了远大的前景。麦多斯博士发现，一种杯芋植物液，通过口服或注射后，经过一定时间能使动物长时间绝育，对于雄性效果尤佳。”

此外，另一个医生维克多·布雷克博士，建议用 X 射线进行绝育。为此，他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瞒着绝育对象，让他们走近一个小窗口；在那里，有人向他们提几个问题，或让他们填一张表格，时间是两三分钟。与此同时，暗藏在窗户里边的人按动电钮，用两个并行安装的灯泡对绝育对象进行 X 光照射。用一台两个灯泡的设备在 10 小时内可使 150 至 200 人绝育。庆幸的是，可能是当时没有足够的时间使这种方法工业化，因而没有造成想象中的那样大的危害，但仍使几百人身受其害，患放射性皮炎或皮肤程度不同地被烧伤。

在奥斯威辛，豪斯特·舒曼博士用 X 射线作过某些试验。经此“治疗”的人，其生殖器官变黑并溃烂。他们走路尚且不能，就更不能作工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最后被枪杀。其它一些人则被阉割了睾丸，这样作只是为了控制射线“治疗”的效果。受害妇女的痛苦状态惨不忍睹，她们不断呕吐，皮肤出现大片烧伤；姑娘们痛得在楼道打滚。舒曼写信给希姆莱说：“试验劳而无功，得不到预期的效果”。这种绝育办法于是被废弃了。

这时，党卫军少将，禀性凶狠残酷的矮子（身高仅 1.54 米）克劳贝格博士又发明了一种使妇女不作手术的绝育办法：向子宫颈内注射一种福尔马林的混合液，可使输卵管阻塞。几周后，克劳贝格又给妇女注射一种药剂，检查是否达到了预期的效果。1943 年 6 月 7 日，他写信给希姆莱说：“这一天为时不远了。到那时，我可以说：只要给一个医生配备一台相应的设备和 10 来个助手，他就可以在一天内使几百个（虽不说上千个）妇女绝育。”

第三节 刽子手博士

在党卫军上尉、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主任医生约瑟夫·门格勒看来，人就象狗一样，有种类之分。一天，他来到奥斯威辛的儿童禁闭室，发现许多孩子身体瘦小，和他们的年龄不相称。他让孩子们紧靠门框站着，在门框上用刀刻下每个年龄组应达到的身高标记。当有的孩子的头达不到适合他年龄的高度时，他使用马鞭抽打孩子，在孩子身上留下鞭印。1000多个达不到“规格”的孩子后来被他杀掉了。

门格勒的“专业”是研究孪生儿。孪生儿一来到集中营便成为他搜寻的目标，他们的母亲不明真相，希望他们的孩子得到较好的待遇，便糊里糊涂地把他们的孩子交给这个党卫军恶棍。门格勒异想天开，他给这些孩子注射疼痛难忍的针剂，想以此把这些孩子的黑色或栗色眼珠变成蓝色的。他给这些孩子作腰椎穿刺手术、输血，再给他们注射酚、苯和空气，经他这样活活折磨至死的孩子有数千个。

门格勒想借一项伟大的发明一举成名：使孪生的理论原则变成现实。奥斯威辛集中营的一位匈牙利籍的犹太医生（他还是法医）米克洛斯·尼斯兹里曾作为助门格勒进行试验。他在作证时说：“这些孪生儿被杀死，被解剖，以研究人种增殖奥秘。在研究优等统治种族人种增殖方面所取得的每一点进展都被认为是很神圣的事。如果将来能使怀孕的纯雅利安种的母亲尽可能生出双胞胎的话……多么荒诞的念头！”但在当时，他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因为一旦被告发，他就会马上被处死。他每天剪着、割着、洗着那些被认为是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器官和内脏，这些碎块经过特殊包装（包装箱上写着“战备物资，急！”）后被邮寄到柏林——达尔姆的人类研究所。

有几次大屠杀是以预防传染病为借口而进行的。一天，尼斯兹里博士目睹了对1千个捷克人尸体（从颈背部被枪杀）的火化。这些人被囚禁在集中营已有两年，自认为是无事了。但党卫军不放过集中营里的任何人。门格勒签署了集体死亡证书：“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捷克人区已因严重流行斑疹伤寒而被清除。”

另一天，在一押送犹太人囚犯的车队里，门格勒发现一个和其儿子在一起的矮子，儿子的一只脚畸形，这位主任医生由此断定，这是犹太人种严重返化的表现。他让人从背后开枪结束了这父子二人的性命，并命令尼斯兹里博士：“这两具尸体不能火化，要作特别处理，然后把他们的骨俗送到柏林人类学博物馆去。”这种命令真是荒谬之极。在有人聚集的地方，矮子不是到处都存在吗？但法医不敢违令，他把尸体各放在一口大锅里用水煮。一些饿得发昏的波兰泥瓦匠正好从旁路过。他们被从锅里发散的肉香吸引，走过来，把煮熟的犹太人及其儿子的肉抢食掉了。

门格勒变着法儿用残酷的手段戕害他的试验对象。波兰犹太人西蒙·维森塔尔战时曾在12个集中营呆过，战后参与了对战犯的追捕。他提到了如下几个事例：

“……战后，我碰到一个犹太青年，他的左臂象是一个五颜六色的棋盘。当初，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在几平方厘米的皮肤下注射了某种药剂。几天内他疼痛难忍，这块皮肤变成了深蓝色。医生把这块皮取下来，又在他胳膊的另一处注射了另一种药剂。这次痛得更厉害，皮肤变成了暗黄色。这类试验连续了几个月。当他痛得厉害而有时抱怨医生时，医生却对他说他应该感

到幸运：‘只要我们还在你身上作试验，你就还活着！’”

维森塔尔接着说：“我碰到被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作试验品的另一个年轻人。他们通过几次手术，成功地使这个青年人变成了一个女人（当时他已13岁）。战后，联邦德国一家医院给他作过一次复杂的手术，使其恢复了男性，但医生们无法使他失常的心理恢复平衡。他开始纵酒，开始犯罪，最后被捕。对于了解他的过去的人说来，这没有什么奇怪。他身高1.8米，外表看起来很健康，但他的精神崩溃了。据医生说，他的精神失常是永远也不可能治愈了。”

为完善被选择的人种的素质，增强对传染病的免疫力，集中营医生在“下等人”身上试验了各种各样的抗鼠疫、抗斑疹伤寒、抗疟疾、抗黄疽病的（他们预先使囚犯们感染上这些病）的疫苗。持久的战争又促使纳粹的医生研制对付烧伤、伤口感染、毒弹、毒气、水污染或水中毒的药品。

莱奥纳多·康蒂博士签署命令，要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设立一个隶属于武装党卫军卫生研究所的研究斑疹伤寒和病毒的机构，于是便出现了第46所。党卫军上尉丁格博士被任命为该所的所长。

1942年1月5日，第46所开始试验抗斑疹伤寒疫苗。该试验一直持续到1945年，大约有1000名囚犯被用作“病毒库”进行试验。从科学的角度看，毫无收获。

纳粹的外科医生则以他们的手术刀残害人命。他们把人的一条好端端的腿锯掉，再反接上。从科学的角度看，这又有什么价值呢？集中营的门诊部，尤其是在党卫军格布哈特教授控制下的腊文斯勃鲁克门诊部里，有一间特别的“圣迹区”。在这里，一些被截去肢体的人和一些被用来进行接骨、补肉、补器官的人为邻，和一些其伤口永不痊愈形成一种长久性的微生物培养基的人住在一起。

自1942年夏至1943年秋，格布哈特博士的“作坊”十分忙碌，一些被称作“兔崽”的波兰姑娘不断被送来作试验用。一位证人迷说了她们受到的残酷折磨：

“……作过手术的人要在病房里呆好长时间。最初几天，她们处于昏迷状态，后因伤口剧痛才恢复知觉。在长达数月内，她们是党卫军医生们的收藏品。他们党来观察并拨弄着那甚至露出骨头的被感染的伤口，全然不顾她们的痛苦。她们中有6人手术后死去。后来的一天，尽管手术后她们的伤口还未缝合，便被人送到那称作“暗无天日”的32号结果了性命。”

在奥拉宁堡—萨克森谊森，鲍莫科泰博士一手拿手术刀，一手拿装甲醛的药瓶，把收集到的阴茎割成碎块。

在纳因加默，埃斯梅教授把结核菌注入到儿童的肺中或给他们注射大剂量的磺胺，以研究这种药对人体的影响。

在奥斯威辛，党卫军上尉科尼格博士为了作手术练习，随意对囚犯截肢。一个囚犯的一个手指患轻度的瘰疬就被他截掉；一个囚犯的一条腿因患蜂窝组织炎就被他锯掉。他不断地变换手术方法，对囚犯进行任意摧残。党卫军中校西劳博士则专门对6个月或7个月的早产婴儿进行研究。他把婴儿（不管是死是活）一概扔进火葬炉。

在布痕瓦尔德，纳粹医生依照亚马逊河印第安人的作法，对囚犯的头作“整形”试验。党卫军中校艾塞尔博士从集中营的路上随意拉人进行活体解剖，然后向其注射毒药，将其杀死。

斯特拉斯堡大学的解剖学教授、党卫军少校希尔特博士同样以“人道主义”为名，在西佛斯的支持下，收集一些犹太人的颅骨和骨骼供他随意研究“退化人种的令人压恶的但却是特有的标志”（他给希姆莱的信中的用语）。

于是，几十个“犹太人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颅被密封在白铁盒子里从东方前线运到斯特拉斯堡。

也还是因此缘故，在1943年6月—8月间，奥斯威辛集中营里的195个犹太囚犯被押送到靠近斯特拉斯堡的纳特兹维莱集中营来。他们先是被氰化物毒死，然后一个个被抬到希尔特博士的解剖台上。

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被告卡尔·勃兰特，这位前帝国的卫生专员，不承认在集中营进行的试验是罪恶，反而认为是合法的。他诡辩说，因为这些试验不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进行的，而是为着德国的生存，至少是为着德国士兵的生存而必须进行的。纳粹分子干尽了惨无人道的罪恶勾当，竟然标榜自己是人道的。

1942年10月24日，希姆莱写信给拉希尔说：“我认为，那些即便是现在还以进行这种人体试验感到懊悔，宁可让我们英勇的德国士兵死亡，也不愿采用这些试验结果的人，是地地道道的叛徒。”

希姆莱，尤其是那些拿男人、女人和儿童为对象进行荒唐“试验”的纳粹医生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疯狂的变态心理，这种恶魔般可怕的残害，就连善于虚构的小说家也是不敢想象的。

第九章 铁血党卫军

令人胆战心惊的现实
一个好管闲事的家伙
这是一种屠夫的精神状态
坚不可摧的战斗

第一节 秘密军队

在一个统一国家，同时存在两支规模不相上下的军队是罕有所闻的。在希特勒的德国，武装党卫队却和国防军一起出现在战场上，事实上他们是两支完全不同性质的部队。

武装党卫队的编年史发端于纳粹接管政权的头几个月，那时党卫队正打算建立武装部队。当年，在普通党卫队的区队和地区总队中就形成了装备轻武器的战斗小组，以使冲锋队大军对党卫队畏眼，并对虽已被击败、但还相当活跃的民主派敌人使用暴力。

一般情况是，每个党卫队区队拥有一百名左右武装党卫队员，组成一支所谓本部警卫队。这个名称本身说明，它首先是地方党卫队头目用来炫耀门面的一项军事装饰品（它往往并不受希姆莱的节制），并无其他目的，遇上本部警卫进行集训，它就自称是特遣队，并扮演辅助警察的角色，这主要是想由邦警察的预算款项中给它关恼。如果特遣队有了好几个连队，那就换一个新名称“政治预备队”。它已经具有了完全军事形式的结构；政治预备队由小组、小队、突击队（相当连）和突击大队（相当营）组成。

这样，最终就在全国用政治预备队编织成一张粗网眼的罗网，武装起来的党卫队人员以政治预备队面目准备实行国内政治恐怖。在沃尔特丁根、阿罗尔森埃尔万根和莱斯尼希，在符腾堡和萨克森，政治预备队排演了 1934 年 6 月 30 日的德国国内战争。这场战争持续了好几个小时，成为令人胆战心惊的现实。

普通党卫队中这批政治打手的最杰出的单位，是由阿道夫·希特勒创建的一支部队。他指示建立一支本部警卫来保卫他个人的安全，希特勒委托一个诡计多端和性格骠悍的上巴伐利亚人担任这支卫队的领导：党卫队地区总队长约瑟夫（“塞普”）·狄特里希。狄特里希生于 1892 年。干过形形色色的行当，先后做过农民、工人、仆役、里兵、警察、烟草厂的监工、税务员和加油站职员，他被人看作是生性诙谐的巴伐利亚粗汉。洋溢在希特勒的梅塞德斯牌轿车坦克的这种诙谐，伴同着这位首脑周游全德发表巡回演说，被称为“司机越轨”。希特勒将他这个多面手的私人警卫员派作各种用场：1928 年人党的狄特里希充当了慕尼黑纳粹经营的弗朗茨·埃耶出版社的发行人，负责创建南巴伐利亚的党卫队，1931 年进入总理府，被任命为纳粹总理的私人卫队长。

1933 年 3 月 17 日，根据指示，他从希特勒的前慕尼黑私人警卫中挑选一百二十名一色彪形大汉，建立“柏林党卫队本部警卫”，这支卫队最早驻扎在亚历山大兵营，附近就是弗里德里希大街的环城铁路车站。塞普·狄特里希创建了纳粹军事史上作用最为重大的部队的胚胎细胞；领袖警卫旗队。最初，它的发展狂程与其他政治预备队的道路几乎并无两样：在本部警卫的基础上增强为两个连，外加一个党卫队特遣队。1933 年初秋，以“柏林警卫营”的名义迁入柏林利希特菲尔德前卫官总校的营房，不久又充实了三个经过特博格练兵场训练的连队。

军事训练工作由波茨坦第九步兵团负责，因为前卫队长狄特里希的水平一直远远不能符合现代战争的要求。他的同修们后来也花费过一些力气，来给持怀疑论者证实这位武装党卫队最早一个大将的军事功绩。他们通常不得不对这样一种设想感到满意，即这个过去的坦克兵具有天然的军人禀赋，他

仍然以一种罕见的匹夫之勇和一种粗野的、根本不把希姆莱的命令放在心上的蛮劲，成为自己部队里深孚众望的人物。然而他连一个团也几乎指挥不了。原党卫队副总指挥威廉·比特里希回忆道：“我曾经试图叫塞普·狄特里希就一张地图作一个半小时的报告，谈谈地形。结果，报告做得根本不象话，他对什么都是一窍不通的。”

希特勒对他的卫士长的这种缺陷泰然处之，不当一回事。这支新的部队并不是军事作战部队，而是主要作为第三帝国的警卫队和以壮声势的卫队来考虑的。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它因此不久也就担负起对希特勒的保卫工作。后来，警卫队负责德国新总理府的内勤警卫。在希特勒办公室前，站着穿黑制服、束白色武装带、戴白手套、内着白衬衫的双岗警卫，它象征着一个新的开端：形成了一支和国防军并列的第二武装力量。

1933年9月，在纽伦堡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希特勒还给这个警卫营命名了名，从此它可自称“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EAH）。两个月后，慕尼黑啤酒馆暴动十周年纪念日，警卫旗队向给他们命名的主子宣誓永远忠贞不贰。但是几乎谁也没有注意到，一场军事政治和宪法的革命已塑造出一个袖珍侏儒：警卫旗队员们向阿道夫·希特勒总理宣誓效忠，然而德国总统乃是武装部队的唯一最高统帅；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肯定说过，德国总理可以拥有一支私人部队。尽管当时的警卫旗队中不过是几百个人，但是希特勒的这种架势暴露了几分两面性，后来这种两面性还跟武装党卫队联在一起：希特勒建立了一支为他个人达到政治目的服务的部队，今天他把它作为一支军事部队，而明天就可以用它来作为实行政治恐怖的工具——必要时可用来对付传统的武器携带者——国防军。

第二节 希姆莱的统帅梦

1934年6月30日那个血腥周末给对持此怀疑态度者以启迪，警卫旗队的两个连奉命开赴巴伐利亚，袭击在维西浴场集会的冲锋队领袖，并将他们加以逮捕。狄特里希率领的特遣队在慕尼黑施塔德尔海姆监狱的院子里处决了六名杰出的冲锋队领袖，同时，警卫旗队的其他行动队在柏林追捕纳粹的敌对者，将他们押到“阿道夫·希特勒”党卫队警卫旗队驻地利希特菲德营房的院子里加以枪杀。政治预备队也参加血腥的搜捕行动。党卫队第三政治预备队（萨克森）屠杀了九名失去宠信的党员，西德和南德的另一一些政治预备队拘押了涉嫌的冲锋队领袖。

政治预备队的出动轰动一时，使得希姆莱野心萌动，决定建立一支庞大的武装部队。希特勒表示了同意，并且允许党卫队全国领袖从没收冲锋队的军火库里，调拨足够的武器，以便能够建立一支部队——尽管这样做已经引起国防军的将军们开始对黑色集团这个军事竞争者喃喃抱怨。希特勒当然谨慎行事，以免引起国防军领导部门抨击。他批准建立三个党卫队武装团，但同时出于对国防军的考虑，禁止它们合并成一个配备工兵和炮兵的完整师。

希特勒和陆军总司令部随后发出一些指示，还规定这支未来的“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的最紧急的任务在于确保政权的内部完全，特别机动部队仍然是党卫队的一部分，从而也仍然是党的一部分。它只是在国防军进行备战活动时投入军事行动，至于具体投入军事行动，当做到动员日的那一天，“根据当时的内政情况，以及这三个党卫队的团具有的作战能力来决定。这是1934年9月24日国防部长（当时往往自称军事部长）的一项命令中的提法，这项命令还再次强调：“为执行领袖赋予党卫队以内政方面的特殊任务”，党卫队得有“一支永久性的武装的特别机动部队”。

这就清楚他说明了，特别机动部队应以政权的国家警察部队为己任。希姆莱只要将警卫旗队和政治预备队联合成一支唯一的部队，他就掌握了未来党卫队的军队干部。然而党卫队全国领袖很快就认识到，仅仅靠普通党卫队作后备兵源，是不可能建设一支新型部队的。他需要进行战争的工艺家、军事专家；光靠塞普·狄特里希那种类型的粗汉性格是无法成为一支精锐部队的。

可是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其为难的情况：希姆莱需要有经验的职业军人，但这些职业军人是很难献身于一支其地位仅仅跟警察有所不同的部队的，这个党卫队头子必须掩盖建特别机动部队的真实目的，必须给这支部队安排较之希特勒和国防军在命令中给它下达的任务更为常规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为什么资格最老的武装党卫队领袖今天仍然真实地相信，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在一支正常的军事部队里服役。

一支新型警卫部队的虚假图象诱使一些早先的军官加入特别机动部队的行列。党卫队法官保罗·沙尔费甚至获得了国防军的一个货真价实的将军头衔：冲锋队在奥登瓦尔德进行军事演习时，他重逢他的老战友、当时身穿冲锋队旗队长制服的保罗·豪塞尔。沙尔费问豪塞尔是否有意加入党卫队。豪塞尔就同意了。

跟脖子短粗、身材矮小的巴伐利亚人狄特里希相比，再也很难想象有比高个子、瘦骨嶙峋的勃兰登堡人豪塞尔更显明对照的另一类型的人了。豪塞尔出身普鲁士士官团，是一个军官和经过正规训练的总参谋人员的儿子，生

于 1880 年，仪表堂堂，处处显示出普鲁士军官风度，他举止潇洒，富有教养，谈吐尖刻俏皮，这使得他在等级森严的国防军中树立了一些敌人。他的军事经历表明他努力向上和具有扎实的实际知识：受过步兵训练，经过军事学院学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东、西两线的陆军总参谋部任职，任过第二军区司令部参谋长，第十步兵团团长，马格德堡步兵司令，最后于 1932 年 1 月退役，时为中将衔。这位非常保守的赋闲将军知道，参与德意志民族党的前线战士组织“铜盔团”活动，是愉快的消闲工作。参加“钢盔团”后，他立即擢升为柏林—勃兰登堡地区领袖——这个职位是“退役的国防将军最适合不过的了”（豪塞尔语）。在“钢盔团”被迫并入冲锋队时，他乐意地接受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授予的冲锋队预备队旗队长头衔，他也同样高兴地穿上了希姆莱发给他的冲锋队预备队旗队长制服。

党卫队首领估计到，这位前国防军将军有着冷静头脑，这是希姆莱在着手改编武装党卫队时所需要的。希姆莱在 1934 年 12 月 14 日发出指示，将政治预备队改编成营。并与领袖警卫旗队合并成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在这次改编中，考虑让旗队长豪塞尔担负一项关键性的任务，党卫队战士缺什么，豪塞尔就应灌输什么给他们——纪律、服从、操练、敢于拼杀，简而言之，即军事知识。

1935 年初，这位新教练能手在不伦瑞克公爵府邸开办了一所党卫队士官学校，这儿是培育有朝一日担任党卫队部队营、团级干部接班人的学习场所。这是第二所这一类型的领袖学校；1934 年 10 月 1 日，原国防军军官保罗·莱托已在特尔茨浴场士官学校开始进行第一期课程。豪塞尔迅即认识到，他只有以国防军的素质和精神为蓝本进行训练，才有可能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我当时认为”，他今天这样说，“党卫队必须建立一支首先以国防训练教程为基础建立进来的部队，因为这种教程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豪塞尔在不伦瑞克施教的内容扎实的手艺，完全吸引住了那些早年的警官、国防军服役期满的中士和热情的青年军人，可以使他们成为未来党卫队军队领袖和副领袖干部。这批干部被派到分布在各地的营，这些营逐渐发展成团：慕尼黑的三个突击大队组成了党卫队第一团（“德国”团），配备了并采用备有马匹的步兵团编制；在汉堡，同样也由三个突击大队组成党卫队第二团（“日耳曼尼亚”团）；在柏林，由领袖警卫旗队扩充为一个摩托化步兵团，而 1934 年起，在维也纳建立了第四个步兵团，即党卫队第三步兵团（领袖”团）。1936 年盛夏，这支特别机支部队的建立已清楚地具有规模，以致希姆莱将他的这位将军也正式安排进党卫队自己的这支小型部队的领导岗位：1936 年 10 月 1 日，党卫队旅队长豪塞尔被提升为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

这个动听的头衔掩盖了一个事实，即豪塞尔还不大可能成为自己家中的主人。豪塞尔正式隶属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领导，给自己建立了一个类似司令部的部门，负责监督部队的装备和教练工作，可是党卫队的各路政治和军事头目开始却并不愿意自动地承认豪塞尔的权威。普通党卫队的地区总队长们，实在不想交出由自己建立起来的对这些武装部队（当时为政治预备队）的监督权。因为希姆莱在 1936 年 9 月 17 日发布的一项命令中也曾指出，监督“只是包括教练要求的范围”，不触及“党卫队地区总范围内的特别机动部队以外的地区职权”。小心谨慎的豪塞尔只是在希姆莱的帮助下，才逐渐能向党卫队地区总队发号施令。

但是，他刚刚排除了背后的倾轧，又遇到了自己部队里冒出来的一个愤愤不满的敌手：领袖警卫旗队长狄特里希没有兴趣接受普鲁士人豪塞尔的监督。甚至希姆莱也不敢大声叫狄特里希遵守。他早就防了一手，在给特别机动部队的命令中写下

由自己保留对警卫旗进行监督的权利，督察员仅仅“可以证明全国领袖悄悄地放弃了打算他不想以希姆莱的命令去触动狄特里希领导的警卫队。

“亲爱的塞普，这当然又是一件不可的事情”，希姆莱在一封信里激动地写道：“你的领袖们如此亲切地对我个人表示尊重，否则党卫队警卫旗就成了一桩叫人难办的事情，它可以随

自己的心意想干什么和不想干什么，根本不必考虑来自上面的任何命令了。”跟国防军的士兵经常进行殴斗，对这支“娱乐部队”的同伴们高声辱骂，未经国防军同意擅自征集有兵役义务的人——警卫旗队叫人恼火的事情没完没了。党卫队技术管理局首脑担心他说：“要是警卫旗队违背一切规章、命令和诺言，继续这样擅自行动，我看将会发生很大困难。”希姆莱再次劝告塞普：“我最后一次实实在在地请你不要再干这些事情。我不可能向国防军承认，我对督促警卫旗队遵守对整个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具有约束力的规章和命令无能为力。我也不可能容忍警卫旗队一再任意胡闹。”

首席教官豪塞尔暂时也不得不对狄特里希的不满让步，虽然这些“柏油士兵”——这是特别机动部队管他们那些自命不凡的领袖同志们的叫法——缺少基本的军事训练，那些似乎从不间断的检阅和封锁交通的任务，使领袖警卫旗队无法学习战斗训练的基础知识。直到狄特里希自己发觉，没有一个士兵看得起警卫旗队，他才态度软了下来，让督察员豪塞尔施加更多影响。1938年，他同意警卫旗队与特别机动部队互换营、连长，豪塞尔的学生们逐渐地把军事带进了警卫旗队。

尽管如此，早行的将军豪塞尔仍然不能单独确定特别机动部队的军事概念。不久，原先的军人和军人的纳粹主义的卤莽汉就钻进了特别机动部队，这些人根本不像豪塞尔那样致力效法国防军的榜样。新来的人反而传播一种信念，即特别机动部队的使命是要成为德国的革命的核心部队，被选定用来取代所谓僵化了的国防军。他们给特别机动部队注入一种活力的一种警卫军的傲慢的中坚意识；在这支警卫军里，成长中的一代希特勒青年的盲从信仰，和持有独特见解的前线军官的军事改革提纲，凝缩成一种自视被遴选为精华的姿态。

第三节 锐器

军事改革派的头目是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和原国防军军官菲立克斯·施坦因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一次事件使他变成了反对保守的陆军总司令部的叛逆者。在 1918 年的突破战役中，他是缺乏机动性能的大部队遭到覆灭和一支新型作战部队诞生出现的见证人。这支诞生的新型部队是一支突击部队，一支机动的战斗部队。

为了摆脱大部队和大部队相持不下、消耗实力的那种瘫痪性的胶着状态，德国前线军官们想了一个主意，把他们的优秀士兵从战壕里抽出来，组成突击部队。这些所谓突击营起到的作用，仿佛是束着大部队柔软腹部的钢条：防御的核心力量，进攻的尖刀。这些战斗部队进行了近战训练，配备了火焰喷射器、机枪、手枪、手榴弹、铁锹，并且很早就掌握了后来被称为战斗协作的技术：以最小型的部队进行协同作战。趴在机枪后面的当年才二十岁的施坦因纳少尉任机枪狙击营的连长，他是东普鲁士人，也是一个萨尔斯堡流亡者家庭的后裔。他认为已经看见了军事历史的一个新时代。他以为，未来既不属于优劣混杂的大批人马，也不属于传统的单独作战的战士，而唯独属于精干的战斗小组。

这位少尉的看法错了。国防军后来接班的将军们，跟后任党卫队旅长的豪塞尔看法一样，因为他认为，突击营是在紧急情况下解决问题的一种办法，就一支正规军范围而言，它始终只能是例外的现象。这个出生东普鲁士的军事改革家 1927 年起就成为上尉，1932 年起任科尼斯堡第一步兵团连长，跟国防军的教条主义者一直处于愈来愈强烈的对立状态。将军们计划在下次战争中仍然用一支义务兵役制的国民军进行作战，施坦因纳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军事精华的概念。施坦因纳的想法大致是，总体战要求的在部分必须能进行防御性作战的行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高度精锐部队快速作战的战斗实体”，即最现代化的核心部队，他们能够“在闪击战中把敌人分割开来，然后将其失去联系的部分逐个歼灭”。

一条合乎逻辑的道路将精华论的理论家施坦因纳引向豪塞尔的特别行动部队，军事改革家菲立克斯·施坦因纳感到，这支部队今后就是一直梦寐以求的那种核心部队。他奉命对特别机动部队“德国”团的改革提出设想，没有几个月就成为国防军传统军人豪塞尔的思想对立面。施坦因纳当然首先将其改革限于一个营。他中断了占主导地位的在营房院子里进行机械性的操练，将训练重点改为在广泛的水平上开展竞技比赛，把士兵培训成熟悉地形的“狙击手、猎手和竞技选手”，即英国军事著作家利德尔·哈特推崇其为现代步兵的那种典型。

施坦因纳认为，在使队员和领袖之间的差别拉平，以促进他的士兵中的同志友谊，这种友谊是消除严酷的操练和进行战斗带来的疲劳辛苦的因素。领袖、副领袖和队员必须相互进行军事技术比赛——这同样是一种打消级别差异概念的办法。再说选拔领袖制度也有利促进部队的内部团结。党卫队士官学校彻底与国防军的体制决裂，即只要完成基本的训练成绩合格，就提前承认其候补军官的资格。未来的士官必须在进入军事学校之前先在部队服役两年，不考虑文化教养和出身的特权——1938 年以前，有百分之四十的士官不是高中毕业。施坦因纳和其他党卫队指挥官一再表明，他们背弃国防军的准则：党卫队营地的栅门和房门必须彻底打开，部队管理部门的领袖在他们

的专业学校毕业之前，必须进行一次军事训练，并且如同美国历史学家乔治·H·斯坦作的评述一样：日益增进了“军官、军士和士兵之间精诚团结和相互尊敬的感情，这种感情在陆军中一般是陌生的。”

施坦因纳在作战训练上也是走的新路子。他认为，军事基本单位不是班（如国防军那样），而是突击队——施坦因纳计划把整个团分成若干突击队，足以迅捷地缠住敌人，进行近战，同时又仍然保持着团的编制。以高度灵活和速射武器更替国防军通常用的卡宾枪，首先是配备冲锋枪、手榴弹和工兵爆炸药。同时作战服装采用新型的伪装军服更换制服。集团神秘论者希姆莱满腹狐疑地注意着他手下建立起一支军事健儿部队，一种“具有运动员姿态、轻松而又灵活的士兵类型，然而却又具有高水平的行军能力和战斗力”，后来，施坦因纳作了这样概括的表达。国防军甚至也为此大吃一惊：让一支部队在二十分钟内急行军走完三公里路程——这是我们从来还没见到过的事情。

武装党卫队，这支军事与政治结合的怪胎，终于在希姆莱一伙的催促下，公然产生并站立在德国的军事舞台上。

第四节 “劣等民族”也穿上了党卫军军服

施坦因纳之所以多年在特别机动部队里享有明垦地位，是因为他跟同僚豪塞尔、比特里希、弗里德曼·格茨、格奥尔格

·克普勒和赫伯特·吉勒一样，同属选择了投奔党卫队部队为数寥寥的职业军人。建设特别机动部队的精神愉快掩盖了这支新部队缺乏足够数量的有经验的军官，缺乏一个在世代相沿的军人勤务中久经考验、训练有素的士兵阶层。在国防军中，军官团成员的四十九出身于军人家庭，而在特别机动部队至多只占百分之五。国防军军官农民出身的不到百分之二，相反特别机动部队的领袖则百分之十来自农村。特别机动部队从来就不可能从资产阶级和大城市居民中为自己招募人员，它始终是一支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军队，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下萨克森、弗兰肯和萨尔，几乎每三个农民子弟中就有一个加入特别机动部队或后来的武装党卫队。

1939年8月19日，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向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处传达一项希特勒命令：“党卫队特别机动部队所属各部立即划归陆军总司令领导。陆军总司令根据我的指示对其进行指挥调遣。”在整个出征作战中，特别机动部队队员始终抱着幻想，满以为自己就是正规的军人了。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员豪塞尔同意去当陆军少将维尔纳肯普夫师部的联络官，从此再也没回柏林党卫队主管处局。充当督察员那种软弱无能的日子已被遗忘，现在保罗·豪塞尔可以再干他一直想干的事情了：一位指挥部队的将军。

施坦因纳的步兵团“德国”团、一个炮兵团和特别机动部队的另一些单位也编进肯普夫的混合坦克师。同样，领袖警卫旗队的摩托步兵团和特别机动部队的“日耳曼尼亚”团并入向波兰进军的攻击部队。施坦因纳的部队在第三军团进攻姆拉瓦和莫德林时表现得骤悍善战，而领袖警卫旗队则参加了波兰中部的布祖拉战役，“日耳曼尼亚”团配合第十四军团向伦堡挺进。

尽管如此，党卫队部队的投入战斗并不能使评头品足的军人感到满意。与陆军部队相比，特别机动部队的伤亡要严重得多：很快就暴露出，特别机动部队的士兵没有经过师一级的战斗训练，它的军官不能胜任武装部队司令提出的复杂要求。虽然它的领袖们可以提出异议，说什么陆军在波兰战役中很少给特别机动部队以重武器支持，给养也很差，但党卫队军人们对自己部队的成绩也不满意。出路只有一条：特别机动部队必须改编为师的编制，必须有重武器和保证自己的给养。但是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把这条路给堵死了。因为他们已经发誓要尽可能不让希姆莱的部队扩大。

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对特别机动部队的兵员数量实际上作了规定：每年限定了征召的控制数字，按照这一数字征召在地方各军区(WBK)登记的适龄德国公民，参加各兵种部队；地方军区司令部批准之前，不得应征进入一支部队。这些规定也运用于特别机动部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无法不给党卫队野战部队补充兵员，但武装部队领导有权规定一个最高限额，使特别机动部队勉强保持原有人数，不能扩大。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对于这种可能住进行了充分的利用。

这时，一个干练的施瓦本人找上门来，为特别机动部队领袖们效力，他诡计多端，颇有胆识，有办法使特别机动部队摆脱武装部队的束缚。随着党卫队旅队长戈特洛勃·伯格格的出场，就有了一个武装党卫队的真正创始人。但是尽管如此，在千载帝国寿终正寝以来，他那大千世界里的将军们还是把

他当成麻风病患者一样看待。“伯格吗？他与武装党卫队毫无关系”，若立克斯·施坦因纳在死前不久还否认，而党卫队前副总指挥比特里希听到伯格的名字时还浑身发抖。他说：“一个牛皮大王，一个爱出风头，好管闲事的家伙。”

伯格从1938年任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补充处处长起，为党卫队招募新兵就是他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他由于跟希姆莱具有同样野心，一定要把特别机动部队扩建成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他曾反复考虑过，怎样扩充武装党卫队部队的问题，现在，当特别机动部队的扩充计划在波兰战役结束后遭到武装部队的反对、濒临失败危险的时候，伯格懂得采取对策。党卫队全国领袖兼德国警察总监的三支嫡系部队下属武装部队调遣指挥：看守集中营的髑髅队员，及其为战事考虑的加强部队（所谓警察加强部队，也叫加强髑髅旗队）和风纪警察的一部分人员。希特勒的两道命令使伯格有可能扩充武装党卫队，而不再遭到武装部队的阻挠：1938年8月17日的命令规定，特别机动部队在战时由部分髑髅队来进行补充；另一项1939年5月18日的命令宣布，同意希姆莱征召五万名普通党卫队队员用为“加强髑髅旗队员”。

伯格给他的全国领袖算了一笔帐，他能立即使拥有武装的党卫队兵力翻一番，建立起两个作战师，更有甚者，如果希特勒同意将风纪警察部队和髑髅队并入特别机动部队，那么希姆莱在短期内就能拥有三到四个师。希特勒批准了伯格的计划，因为这项计划在形式上同对党卫队较为敏感的武装部队所规定的补充兵员的最高限额并不抵触。伯格和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处可以着手建立一支全新的军队了，它也就获得了一个新的名称：武装党卫队。

但是，伯格的军事谋略却把特别机动部队和党卫队集中营最残暴的部队结合起来，即使在一些特别机动部队领袖中，也有些人感到这支部队对于任何一个军人来说都是一种挑战，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西奥多·艾克的髑髅队是存心不按军人要求训练成的部队。它们与特别机动部队源出同一系统，两者的前身都是政治预备队；分开以后，它们犹如翻了脸的弟兄，彼此对立。特别机动部队想要成为一支军事部队，而髑髅队员们则怀有反军队的激烈情绪，在一些酒店里发泄怒气。

性格暴躁的阿尔萨斯人艾克，是处死冲锋队首领罗姆的刽子手和官僚化集中营暴政的创造者，他有一个固执的想法，即必须把他的部队训练成为一支同特别机动部队相对立的部队。作为旧陆军部队的前军需官使他对职业军官深抱反感，他也感到特别机动部队就是掌握在这些职业军官的手中。他在陆军中被解除职务，随后在自己选择的警察生涯中也遭到失败，在党内爱发牢骚而声名狼藉，这个集中营刽子手愤懑不平，不能自解，并且把这种情绪传给他的队员，这样一种教育法对他来说轻而易举，毫不费力，因为构成这支棍棒军队的主力是头脑简单的乡村卤莽汉和忿忿不平的失业者，至于对艾克“爸爸”反犹太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反职业军人的激烈言论，他们是不会有所反对的。

他们的深褐色制服大概就是要清楚地表明，在穿黑色制服的集团中，这支部队有权要求拥有特殊地位。希姆莱在外表上给予他的集中营的最高看守一种接近自治的地位：艾克是集中营督察员兼党卫队看守部队司令，只听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艾克在每座集中营都设置了看守部队，还首先建立了不受普通党卫队约束的突击大队。从1936年3月29日起，艾克的部队正

式称为“骷髅队”，已经拥有三千五百人。1937年4月，艾克将五个突击大队编成三个骷髅旗队，“上巴伐利亚骷髅旗队”驻扎在达豪，“勃兰登堡骷髅旗队”驻守在奥兰宁堡，以及“图林根骷髅旗队”驻在魏玛的布痕瓦尔德。1938年增建了第四个“德意志东部边区骷髅旗队”，驻屯林茨。

艾克满腹狐疑地警惕着，不让一个职业军官打进他的部队和动摇他对骷髅队的统治权；他一再警告部下当心不要听信“可笑的模仿军队编制的试图”。1937年，他向集中营看守队训话说：“你们既不属于陆军，也不属于警察，更不属于特别机动部队管辖。党卫队骷髅队各单位自己明确属于普通党卫队，因而可以既不需要军官，也不需要军上来进行领导。从现在起，我将开始让一些相当于军官的党卫队队长，相当于军士的小队副，相当于步兵的党卫队员调到普通党卫队中去。”

这支棍棒部队是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中成长起来的，现在它却要与特别机动部队合并了。党卫队军人们急于一心扩充实力，不去考虑更多的问题，正像希姆莱让风纪警察大批涌进党卫队时不去考虑他们思想上缺乏可靠性一样。希姆莱说：“他们不是纳粹党员，不是党卫队员，不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人员……而是如同建筑工程队招工一样把他们吸收进来的。”

尽管武装党卫队变得同样是一支五花八门得出奇的部队——伯格和和他的一些筹备人还是编了一个又一个师。党卫队军队渐渐具有了规模：1939年9月底，党卫队旅队长兼警察少将卡尔·普菲费尔—维尔登布鲁赫以风纪警察人员和陆军特种部队战士编成了一个党卫队警察师。10月10日，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豪塞尔将特别机动部队的“德国”团、“日耳曼尼亚”团、“领袖”团合并编成一个特别机动部队摩托化师（后来叫“帝国”师）。11月1日起，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艾克抽调他派驻各处集中营的骷髅队旗队，加上部分警察加强部队建立了“骷髅”师。领袖警卫旗队暂时仍为摩托化步兵团建制，直到1942年才改为师。

伯格一举成功地建立了一支引人瞩目的党卫队武装部队。特别机动部队参加波兰战役时，兵力为一万八千人，现在希姆莱已经统率着十多万名武装的党卫队队员了。同时，伯格建立了“武装党卫队补充处”，因为现在关键的一着在于，伯格是否能为党卫队野战部队和骷髅旗队获得充足的后备力量。伯格在十六个党卫队地区总队设立了补充处办公室，形成一张大网，并且开始限武装部队进行谈判；他要说服最高统帅部同意扩大党卫队后备部队，伯格指望有一天用这些后备部队进一步扩大武装党卫队。

可是武装部队起初不承认骷髅旗队是军事部队（原先只规定它担任警察任务）；最高统帅部只同意拨给一定数量的适龄新兵，作为弥补转入特别机动部队的骷髅旗队和警察部队的人数，准许伯格为武装党卫队野战部队招募当年二十岁的青年入伍。最高统帅部允许武装党卫队招募新兵，但对能否将武装党卫队招募的新兵用于党卫队勤务，保留亲自作出决定的权力。这样武装部队就给伯格设置了新的障碍。尽管伯格报告武装部队有大批应征者愿意加入武装党卫队服役——但各地军区司令部通常只批准人数的三分之一。

伯格越是固执地逼迫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就越是坚决不同意党卫队兵源补充的扩张计划。1940年3月8日，最高统帅部否决了此后将要承认为武装党卫队的单位：领袖警卫旗队、三个师、骷髅旗队、补充部队和士官学校。连希特勒也赞成他的将军们的否决意见。对他来说，武装党卫队始终是

民族社会主义精萃人物的一支军事化的警察部队，它的任务是时刻准备保卫政权。

由于希特勒估计能速战速决，很快取得胜利，加之他不想以一支第二武装力量的恐惧形象吓坏了传统的军人们，因此直到1942年6月，他反对武装党卫队进一步大肆扩张的计划，他不让成立党卫队集团军，他规定，武装党卫队的兵力只能为和平时期陆军兵力的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他三令五申地强调，武装党卫队不应该是一支纯军事部队。1940年8月6日，他在一项秘密命令中说明，他阿道夫·希特勒是怎样理解“武装党卫队的必要性”的：大德意志国家版图的扩展，“有必要保持一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对内代表并贯彻国家权威的国家警察部队”。

领袖大本营的批复已经说得足够清楚，但伯格仍然不放弃他的补充计划。在这期间，他已身居一项要职：从1940年6月1日起，他负责领导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从而成为扩充武装党卫队的关键性人物，在西线战役打响后，武装党卫队领导机关被分成两个主管部门。8月15日，希姆莱将特别机动部队督察处改为作战指挥机关，即成立该机关的命令中指出的“武装党卫作战指挥部”，而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则负责世界观教育、招募新兵，以及特别是武装党卫队的兵源补充的工作。

伯格考虑采用新办法，使他得以扩充自己的人马。武装部队不同意他为武装党卫队进一步增加补充部队，他必须寻找一个使最高统帅部的将军们无法插手的领域，去招募新兵。这个领域被他找到了。在德国国境之外，即巴尔干地区住着几十万德意志族人，他们虽然是外国公民，但却受到了希特勒的占领性进军和大德意志宣传的诱惑性召唤的鼓舞，蠢蠢欲动。应该将这批德意志族人吸收到武装党卫队的行列里来。在这儿，没有任何一个武装部队的将军可以阻止为希姆莱的外籍军团培训一支庞大的后备军。

伯格从自己家里做起，他有一个女婿名叫安德烈亚斯·施密特，在罗马尼亚统率德意志族人部队。施密特是个极端纳粹分子，典型的未成熟的小伙子，醉心于希特勒崇拜的狂热信徒，他向岳父许下诺言，答应给武装党卫队打开罗马尼亚籍德意志族人的大门。1940年春，施密特和伯格的代表从罗马尼亚私下运走了一千名德意志族人，虽然罗马尼亚当局注意了不让任何有兵役义务的本国公民投效外籍军团。在罗马尼亚取得的成果使伯格大受鼓舞，他在1940年8月向希姆莱建议，在取得外国政府协助或不要外国政府协助的情况下，吸收东南欧一百五十万德意志族人中适龄服役壮丁加入武装党卫队。

只要是为了把德意志族人弄进武装党卫队里来的话，那伯格的想象简直是无穷无尽的。党卫队的志愿人员被伪装成流动工人，他们藏在德意志野战医院人员的队伍中，或是夹在横越东南欧的党卫队各师的辎重部队里蒙混过关。后来，伯格的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与外国政府签订协定，允许德意志族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志愿报名加入武装党卫队，并正式离开他们的侨居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并不总是履行协定；于是伯格的代理人依旧通过暗中渠道将志愿人员悄悄地送进武装党卫队。

“志愿”这两个字，在戈特洛勃·伯格王国里包含的概念是十分闪烁不定的，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只要宣传上的诱惑性召唤在哪里失灵，纳粹主义民族领袖的棍棒分队就会赶到哪里去帮忙。伯格报告说：“如果把一支德意志族人部队勉强带得不错的话，那么所有的志愿人员就会报名参加，

而那些没有志愿报名的人的房子就会被砸烂！”在战争的后几年中，强迫完全取代了志愿。德国强迫巴尔干半岛各国接受协议，规定所有德国血统的适龄男子都应按照德国的法令加入德国军队履行服兵役的义务，首先是加入武装党卫队。伯格使用这种手段，不费气力地将德意志族人强制驱入武装党卫队。1943年年底，德意志族人已占武装党卫队官兵总数的四分之一，到战争结束时，有来自欧洲各地的三十一万德意志族人在党卫队部队中服役。

在这期间，伯格遇上了一个新的、更加妙不可言的征募新兵源地：在党卫队中人们称之为日耳曼民族的国家。德国开战初期的胜利和闪电战的胜利，使得北欧和西欧的青年着了魔，在他们的心目中，不出几个星期，一个世界，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世界就崩溃了。在某些思想单纯的人看来，这些行进在奥斯陆、布鲁塞尔和海牙街道上的征服者，似乎是代表一个新世纪的趾高气扬的青年使者。

在比利时、荷兰和挪威的一些青年中产生了赶浪头的愿望，渴望不要错过同这个新时代结合的机会。当然他们并非一直是相信武装党卫队神话的碧眼理想主义者。渴望冒险的心情驱使着他们指望飞黄腾达以及往后作为武装农民遏制数百万斯拉夫“劣等民族”。只有少数人追随这些政治思想。在武装党卫队作战的十二万五千西欧人中，也许约有三分之一属于各种亲纳粹的和民族主义的党派，这些党派用他们极其鲜明的言词对新的德国主子表达了依附和顺从。

不论受什么动机的驱使，他们涌进了党卫队旅队长伯格1940年年中在西欧和北欧德国占领各国设立的招兵办公室——根本没有想到，如此众多不同民族的成员，渗透进来，将会对党卫队和对他们同阿道夫·希特勒的关系会招致什么样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后果，伯格只看到志愿报名的数字而感到心满意足。1940年年底，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在阿尔萨斯的森海姆办了一个训练营，对来自欧洲各国的党卫队志愿人员进行世界观和军事训练。1941年春，成立了第一支庞大的外籍军人部队，由佛来芒、荷兰、丹麦和挪威志愿人员以及担任主要职务与负责指挥的德国人组成的党卫队“维京”师。

不久日耳曼族人的武装党卫队变成了一支欧洲部队，因为一直有新的民族成员渗入部队，冲淡了部队的纳粹意识形态。伯格甚至在东方为武装党卫队招募新兵，土耳其帽和哥萨克帽给海因里希·希姆莱这支一度是世界观清一色的虔诚信徒的部队中带来一种十分罕见的特色。这位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小心翼翼地不去触动全国领袖反斯拉夫人的心理，因为全国领袖开始认为，让东方“劣等民族”穿上武装党卫队的制服，这是对日耳曼民族的可耻背叛；不过伯格懂得说服希姆莱承认几乎所有东欧人都可当作俘获的日耳曼人：首先是波罗的海各民族，随后是乌克兰人，最后也包括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直至巴尔干的伊斯兰教教徒。最终有二十万名这些民族的成员在武装党卫队服役。

伯格的新兵花名册一年比一年厚，武装党卫队部队一年比一年更急剧膨胀起来：1940年中为十万人，1941年底为二十二万人，1942年底为三十二万人，1943年为五十四万人，1944年底达到九十一万人。戈特洛勃·伯格将一支新兵大军输送给武装党卫队指挥，它终于使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的军官们有可能脱掉不讨人喜欢的国家警察部队制服。武装党卫队整队集合，准备在战争史上作出一次不寻常的胜利进军。

第五节 死亡进军

还在 1940 年西线战役中，武装党卫队即已表明，可与陆军的精锐师相比拟。党卫队行动快速犹如脱兔，冲过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一股狂热的劲儿，几乎所向披靡，毫不考虑自己的伤亡，盲目地一心只顾猛打猛冲，这股冲劲使希姆莱的军队与武装部队的的所有其他部队迥然不同，领袖警卫旗队的党卫队二级突击队中队长克拉斯获得了战役的第一枚铁十字勋章。而这并不是没有象征意义的：党卫队部队总是充当攻击部队的尖刀，担任德国入侵的先头部队。特别是塞普·狄特里希的领袖警卫旗队，显出一种在武装部队中罕见的对敌人和领袖毫不在乎的神情。

在敦刻尔克地区追击英军部队时，警卫旗队奉命冒着英军最顽强的抵抗抢渡阿运河，强占瓦当城。可是 1940 年 5 月 24 日下午，接到了领袖大本营发出的一项截然相反的命令，不要渡过运河。狄特里希无视领袖大本营发出的一项截然相反的命令：几个小时以后，他已站在运河的彼岸。在战役稍后的一个阶段中，狄特里希的工兵团强行军追击溃逃的英军。领袖警卫旗队担任冯·克莱施特大将的坦克部队的先头部队，深入法国南部，狙击法国部队，不让其在卢瓦尔河构筑防线。这个团向南方突击，孤军深入，一直进逼到圣大田，把德国军队的主力远远抛在后面。党卫队的其他部队也同样获得了辉煌成果。“领袖”团突破了格莱伯防线。特别机动部队师一直冲到西班牙边境，而骷髅师则强行渡过塞纳河，经过战斗夺下了卢瓦尔河桥头堡。

陆军将领们既是敬眼又是惊恐，注视着党卫队特种部队的战斗狂热，有些因循守旧者认为，这是新型士兵性格的征兆，这种士兵性格完全蔑视作战应讲究足智多谋的理性论。如同社会学家维尔纳·皮希待所说，许多人认为党卫队部队“不是作为一种前线上兵性格的新模式，而是为完成领袖交托的一切任务的帮派集团”。坦克部队将军埃里希·霍甫纳用一句简单的话表达了保守军人的反感。当下级骷髅部队司令艾克向他报告说，一项具体攻击命令已执行，执行中人的伤亡无关紧要，这位老骑兵霍甫纳听了火冒三丈。他呵责艾克：“这是一种屠夫的精神状态！”

陆军军官们指责武装党卫队的大小领袖，说他们显然从来没有学过怎样慎重使用忠于他们的部下。有些——当然不是全部——党卫队领袖在战场上将自己在士官学校里死记的一套付诸实践：消灭敌人和视死如归是部队的最高准则。党卫队部队也终于遭受了陆军从未见过的损失。早在西线作战中法国战役打响前的间歇时刻，几个党卫队师的领袖行列已明显出现凋零状况，部队不得不把还在士官学校讲堂里听课的学员拉来当军官。

尽管党卫队部队暴露了这些弱点，武装部队领导还是感到，它是一个祸害。武装部队等于在战场上遇到了一个争宠的劲敌，它的那股干劲不能不给领袖大本营的独裁者留下深刻印象。希特勒终于在 1940 年 7 月 19 日的国会讲话中，公开宣布动用“英勇的武装党卫队的师和旗队”。独裁者的称赞，本身获得的战果，特别是军方争宠者采取克制态度，所有这些都增强了部队的傲慢姿态与集团精神，它以传统的近卫军对普通士兵睥睨一切的态度置周围的军队于不顾。随着一个个战役，武装党卫队明显地以民族的军事精锐自居。尽管武装党卫队士兵也经过了训练，特别是要作为民族社会主义而战的信仰坚定和不屈不挠的战士——但他们在精神状态方面与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或后来的法国伞兵几乎并无不同：他们个个都被一种刚毅和坚强的神话蒙住

了眼睛，他们个个都激动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高贵阶级少数派中的成员，是一个具有自己准则和自己忠诚的特殊集体的成员。

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和后来的总指挥汉斯·于特纳，严格注意使武装党卫队符合武装部队的军事准则和要求。党卫队部队对其过去的那种警察性质的任何怀旧，都遭到他越来越激烈地压制。西奥多·艾克谅必感觉到了这一点，他那假革命的反军国主义不再适合军事卫队的计划了。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日益严厉地要求骷髅师师长，必须更严格地服从1940年夏季建立的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的命令。艾克向副总指挥沃尔夫诉苦说，柏林有人发动“对我进行围剿”，“从我离开家乡后，有些人士即已打算千方百计地破坏党卫队全国领袖多年来对我给予的信任。”

事实上，参谋长于特纳主张，为了有利武装党卫队的军事声望，当务之急是解除这个半瓶醋的前军需所掌握的师指挥权。积聚的炸药太多了，骷髅师的人员在西线率先制造了战犯罪行（1940年5月26日，在法国西北部进行战斗时，第二团的一个连长下令枪杀了一百名英国战俘），原先集中营看守队的残暴行为，在该师的一些单位盛行一时，艾克叫人将达豪和奥兰宁堡集中营的武器偷偷弄到他的师里来，以及擅自从未被占领的法国地区购买载重卡车，因为武装部队不同意将他这个靠马匹驮运辎重的师摩托化。1940年8月，艾克强迫自己师已内定退役的士兵书面具结，保证决不诉说该师的内部情况，这时于特纳狠狠地把这个感到忧心忡忡的莽汉训斥了一顿，叫他注意纪律。武装党卫队指挥部命令艾克，立即撤销书面具结的规定。此外，于特纳指示党卫队军法官审讯向艾克秘密提供武器的人员并没收该师暗中搞来的备用车辆。同时，他还威胁艾克，如再发生违反命令的事，他将向有关的党卫队兼警察法庭对艾克的武器商人提出起诉。

这位地区总队长对此大为恼怒，因为他一向在原则上只接受党卫队全国领袖的命令，因此如果说他答应限于特纳合作，那于特纳倒应该看作是一种光荣。艾克说：“（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文件中对一位党卫队的高级领袖、一个师的师长使用这种语调，即使在顽固不化的军人中也不是常见的”。于特纳没有退让。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审讯了这个师的原先成员，对有关艾克的领导作风作了全面的纪录。这位师长写信给于特纳，再次反驳“由您的指挥部关于舞文弄墨的机构和恶毒的同僚们胡言乱语进行的”攻击。艾克大发雷霆地吼道：“一个在同敌人作战中死去二十三名领袖和损失三百七十名勇敢的副领袖和队员的党卫队野战师，如果说现在有人来调查这个党卫队野战师的情况，其目的就在于掌握陷害正直的党卫队领袖和队员的材料，那么这完全起着涣散军心的作用。”

连希姆莱有时也参加反艾克的讨伐。在一次师部命令中，“大家都发笑”（希姆莱语）地看到，艾克因为一些小事处分他的一些团长，并将高级领袖患性病的情况公之于众。他勃然大怒地说：“亲爱的艾克，我在看到这种东西的时候，对您的理智表示怀疑。我在这个时候感到怀疑，您是否真正有能力领导一个师。”然而尽管如此，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名义上的总指挥希姆莱（他担任此职务到1943年初），还是不同意参谋长于特纳把这个过去看管集中营的主子从师司令部撵走。艾克忍受了一番斥责，保住了师长的位子。

在此期间，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继续抓党卫队部队扩充军事力量。1941年春季，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已经拥有四个师和一个旅，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转向东方，党卫队部队首先被调到巴尔干战场。武装党卫队部队再度

担任德国入侵军的尖刀部队。领袖警卫旗队在塞尔维亚南部打开了通往阿尔巴尼亚的缺口，冲过色撒利，夺取了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的通道。而党卫队“帝国”师也在南塞尔维亚中部向前挺进，突袭拿下贝尔格莱德，席卷巴奇卡。

但是，党卫队部队刚刚驻扎下来休息，领袖大本营的电传打字机就嘀嘀嗒嗒地给党卫队部队发来了新的命令。阿道夫·希特勒作出了入侵苏联的决定。希姆莱的军队现在共有十六万人，这支军队移到德国统治地区的东部边界，在那里待命准备投入第三帝国进行的最后一次灾难性的冒险行动。领袖警卫旗队和日耳曼人组成的“维京”师参加南方集团军，“帝国”师安排进中央集团军，同时骷髅师和警察师划归北方集团军部队。然而不等武装党卫队在1941年6月22日3点15分进入它将要经受到最严峻考验的战场，不等这支党卫队大军开始写下它的真正战史，部队就被笼罩在一个阴影之中，从而使武装党卫队永远无法摆脱。海因里希·希姆莱发布了一项命令，这道命令把武装党卫队的所有部队跟黑色集团最阴暗的角落，即集中营，轻率地连结在一起。

1941年4月22日，希姆莱确定了他心目中对武装党卫队的概念。在此以前，他一直屈从于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解释，武装党卫队只是指作战部队、武装部队的补充部队、骷髅旗队和不伦瑞克、特尔茨浴场、克拉根福特等三所士官学校，但是眼下的希姆莱已经掌握了四个师，在东线战争前夕，自以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可以任意扩大武装党卫队的概念了，他在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的一项命令中列出了一百七十九个党卫队单位和机构，说明这些全都是武装党卫队的组成部分——其中也包括集中营及其管理处和骷髅看守突击大队，也就是说，包括在1939年艾克的骷髅部队解除集中营的勤务以后，由没有参加作战的普通党卫队队员、德国军官联合会总会和冲锋队的成员组成起来的那些单位。

从这时起，集中营的看守人员也被看作是武装党卫队的成员。他们的军人身分证和制服跟武装党卫队一样，而武装党卫队的这些在前线作战的部队并不属于集中营帝国的恐怖系统。但尽管如此，刽子手同士兵在某些方面还是有共同之处，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负责看守突击大队的装备和军事训练，从一个集中营调到另一个集中营，都必须通过武装党卫队指挥部。更严重的是——集中营领导机构的集中营督察处在划归经营管理处之前，短时间内（从1940年秋到1942年春）曾经正式属于武装党卫队作战指挥部领导。

武装党卫队的士兵对这种不合理的要求提出抗议吗？他们急于起来反对将一支军事部队跟惩罚营和灭绝营的那些刽子手一视同仁吗？他们一声不吭地接受了希姆莱的命令。他们顺从，他们沉默。他们像1939一样保持缄默。当时，特别机动部队同艾克的六千五百名看守集中营暴戾恣肆的士兵合并，这些士兵把经过多年训练的那些惨无人道的野蛮虐待俘虏的毒素带进了武装党卫队。当后来骷髅部队加强旗队的五万名士兵——他们同样在集中营里接受过训练，并且是在欧洲各德占区实行政治恐怖的骨干——加入武装党卫队并成为新建立的党卫队师的干部的时候，他们仍然保持缄默。当随着战争的进行，从恐怖和大规模屠杀的地狱出现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形象被引进武装党卫队的时候，例如一级突击队中队长博特曼及其灭绝行动队在库尔姆霍夫用毒气车杀害了三十万犹太人，从奥斯维辛灭绝营来了二千五百名士兵，从萨克森豪森集中营来了一千五百名士兵，他们也还是保持缄默。

武装党卫队领袖们可能考虑到，部队的纪律和品德足以使自己与黑色集团政治上的黑暗世界保持距离，因而感到可以放心。可是他们永远也无法做到真正保持距离：武装党卫队必须将一些单位（约一千五百名队员）拨给进行暗杀的特别行动队。它们的一些补充部队参加了希姆莱集团的惨绝人寰的行动，如镇压华沙犹太人居住区的起义，部队也不得不接受伯格亲信奥斯卡·迪尔勒汪格尔博士的由歹徒、职业罪犯和经军事法庭判刑的人拼凑成的刑事警察队，使它获得了武装党卫队一个单位的合法身分。

虽然如此，党卫队的军人们还是相信，能够保持他们自己这块招牌的清白。他们的这种设想甚至获得希姆莱的支持，因为他装出一副姿态，似乎表示愿意考虑让武装党卫队的作战部队跟恐怖机器分开。1941年4月初，希姆莱建立了一种武装党卫队内的武装党卫队，一支愿意供他本人搞政治斗争派用场的私人部队。这支部队同抵达前线即归陆军统率的武装党卫队作战部队相反，这支特别部队只归希姆莱管辖，诚然他可以让陆军支配这支部队，但是也可以随时向陆军收回这支部队。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开始不承认骷髅旗队为武装党卫队的单位，它构成了希姆莱这支私人军队的主力。希姆莱将旗队的大部分编成步兵旅和骑兵旅，他们只归全国领袖指挥。他挑选了党卫队旅队长克诺布劳赫给自己当总参谋长，克诺布劳赫在1941年5月建立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司令部”，并命令他的部队出动，在前线的后方打击游击队和犹太人。

第六节苏联将军认为：党卫队的战斗力超过德国陆军

当然，上了年纪的希姆莱想当统帅的美梦同年轻的希姆莱的梦想一样，也很快就成了泡影，德国入侵苏联后，东线战役需要投入越来越多的作战部队。希姆莱的私人部队被拆散成一个团又一个团，1942年年中，所有单位已全部编入野战军。但尽管如此，党卫队全国领袖司令部的建立，还是使希姆莱跟武装党卫队的职业领袖之间关系越发疏远了。党卫队各师愈是深入几乎无边无际的苏联国土，党卫队军人们就愈是明显地背离他们全国领袖的命令和幻想。

一个新的世界包围着党卫队士兵，严酷无情地将黑色集团的世界观口号推到十万八千里以外去了。本着对自己领袖和最后胜利的信念，党卫队部队穿过苏联的草原、沼泽和森林，在人类过失和神经错乱的恐怖一章中扮演了英雄和牺牲品的角色。党卫队士兵的名字接连不断地载入战争史的图表。不论在南线，还是在中路，或是在北线——不论哪里遇到敌人出乎意料的抵抗，不论哪里的敌人发起的反扑使德方攻击面出现裂口，党卫队部队总是奉命奔向哪里。

党卫队各师又是作为德国军队的进攻尖刀冲在前面。领袖警卫旗队在第聂伯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堡，在彼列科普附近突破克里米亚前面的苏联防卫阵地，迅猛攻占了塔甘罗格和罗斯托夫。“维京”师追击敌军直抵亚速海，“帝国”师则在鲍罗季诺南部突破莫斯科的防卫阵地，达到离苏联首都只有几公里的地方。而当苏联人在1941年年底发动第一次强大反攻时，武装党卫队又成为军人顽强性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缩影。在苏联坦克和步兵群的斯大林管风琴式的猛烈炮火下党卫队士兵得到锤炼，享有德国东线陆军的消防队的声誉。

强大的苏联武装部队从莫斯科西面进行突破后，于1942年1月挺进到中央集团军的背后，第九军团司令莫德尔将一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主加姆所率党卫队“领袖”团调到尔热夫附近的伏尔加河曲地区。该团的任务是阻击冲上来的苏联人，守住与西面陆军保持联系的单薄的防线，坚持到莫德尔在南方集中足够灵敏量的部队，以便给苏军以歼灭性打击。党卫队队员们冒着零下五十二度的严寒，日日夜夜不倦地阻击着苏军。2月18日，莫德尔击溃了苏军。当库姆和他的团换防撤下来后，他碰到了军团司令莫德尔。莫德尔说：“我知道，您的团必定遭到不少损失，库姆，可是我现在还缺少不了你们。您这个团还有多少兵力？”库姆向窗外指指，说道，“我的团就在外面！”那儿站着三十五个人，两千人就剩下这点残余的人数。

甚至西奥多·艾克现在也表现得能够适应军人的精神状态，他从佩戴党卫队副总指挥的领章以来，这个早先的集中营看守人员仿佛变了样。他整天呆在他的司令部里，剪取形势图的战术标记，用这些标记在地上摆弄，模拟一个师如何行军——他是偷偷地干的，以免他的总参谋部里首席参谋部军官对艾克突然爱上了军事有所觉察。当1942年2月8日苏联部队在伊尔门湖东南杰米扬斯克包围了骷髅师和另外五个陆军师时，他们发现，在德国的师一级将领中，艾克是一个考虑周密而又十分顽强的对手。陆军元帅布施曾这样说过，特别要归功于“副总指挥艾克的有力指挥”，使得在杰米扬斯克被围困的部队能坚持几个月之久。随后，党卫队士兵又再次显示了他们主动进攻的精神，他们配合陆军部队强行打开包围圈，解救了陷入苏联军队重围的杰

米扬斯克要塞防守部队。

杰米扬斯克、尔热夫、米乌斯的狙击战、拉多加湖、沃尔霍夫——这些地名中的每一个名字都标志着一支部队的高度作战能力，它立时在敌我双方享有神话般的声望，既叫人迷信得望而生畏，又使人充满嫉妒而赞叹不已。朋友和敌人一致认为：武装党卫队士兵们的士气，是任何其他部队无法达到或是超过

的。

苏联第二十六集团军司令阿特门科少将在 1941 年秋被俘时说，党卫队“维京”师的战斗力超过了过去所有的师；当陆军部队接替了“维京”师的防务时，苏联方面的人都舒了一口气。德协第八军团司令韦勒也作了类似的评论。他煞费苦心试图用诗一般的语言赞扬说，属于他指挥的党卫队部队好似“陆军中的一块磐石”，以“坚不可摧的战斗力”抗击敌人。第三装甲军军长写·马肯森将军在给希姆莱的一封信中，热烈颂扬领袖警卫旗队的“内部纪律，它那生龙活虎的勇敢精神、乐观的事业心、临危不惧的坚定性”。马肯森说：“一支真正的精锐部队。”

并非所有的陆军军官都乐意支持这样的全面崇拜。有些职业军人看到武装党卫队不起眼的地位日益重要，并且获得国家领导的偏爱，不禁产生了竞争和嫉妒的心情。对这支佩戴党卫队标志的部队具有反感已是一种公开的秘密。武装党卫队领袖们猜想，陆军的目的在于把武装党卫队投入作战中最危险的焦点，以“战火消耗”这个讨厌的竞争对手。

“在这样的战斗中，党卫队就会被削弱得一蹶不振，”艾克咒骂道。希姆莱后来从“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身上也看出这种企图，即“干掉这支讨厌的部队，并为后来可能出现的一种发展扫清道路”。例如，党卫队区队长、骷髅师团长西蒙证实，主管的第二集团军司令部故意扣押领袖大本营关于调走“骷髅”师中丹麦志愿军和主力的第二步兵团的命令，以便无需派陆军部队接防。艾克咕哝他说道，现在是“将我们的士兵从不怀好意的妒忌的帮会利爪下解救出来”的关键时刻了。

当然，许多军官之所以持冷静的保留态度，不能只用复杂的嫉妒心理来解释清楚的。军人们感到，这支新部队不论对战场上的敌人，还是对听任摆布的俘虏和无辜的百姓都发泄一种非军人的疯狂性。武装党卫队部队破坏军事道德准则的情况屡见不鲜，尽管战争极其残酷无情，但因袭传统的军人还是应该尽力遵守这些准则。如同武装党卫队作战勇敢的传闻不胫而走一样，武装党卫队的有些单位虐待战俘和平民的野蛮行径也迅即四处传开。

对部队陌生的、来自政治狂热主义罪恶渊蔽的分子的渗入部队，例如原骷髅部队员，或是同集中营进行交换的人员，把斗争狂热和军纪松弛带进部队，很容易使武装党卫队以形形色色惨无人道的方式进行战争。罪行一再给部队的荣誉投上阴影：在入侵苏联后的两个星期，“维京”师的士兵枪杀了加里西亚的六百名犹太人，作为对苏联人的报复。1943 年夏季，“欧根亲王”师的士兵消灭了塞尔维亚小镇科索蒂卡的居民，因为“据称”该地的教室里有人向部队打枪（第二特别行动队在一次报告中如此说）。1944 年春，党卫队警察师有一次突然遭到炮火袭击，该师一支部队随即毁灭了希腊北部小镇克利索拉。1944 年 6 月，党卫队“帝国”师的一个连，在搜寻落到法国游击队手里的一名党卫队队长时，毁灭了法国南部的小镇奥拉多尔絮格兰，并杀害了该镇的全部居民。两个月后，党卫队装甲师“希特勒青年团”师，在

诺曼底的防御战中杀害了六十四名加拿大和英国战俘。

不论有什么理由来解释这样的暴行，但值得注意和说明问题的却是，武装部队几未发生过类似罪行。由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普通武装部队局（AM）汇总的有关武装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违法行为的报告，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区别所在。普通武装部队局于 1943 年 8 月 2 日指出，在“本次报告所述期间”共“收到一百五十一一起有关案件。其中十九起案件的作案者为陆军，五十三起的作案者属于武装党卫队，另外七十九起案件的作案者无法查明属于哪个单位。强奸案数字很大。经 D·F·P·（秘密宪兵队）和有些经巡逻队人员传讯有关当事人和证人后，十八起案件证明完全属实。十二起案件的作案者为武装党卫队成员，其余六起案件未能查明系由哪个部队的成员作案。”

武装党卫队的士兵在乌克兰的一些地区暴戾恣睢，迫使乌克兰人离开村庄，纷纷投奔苏联军队。普通武装部队局的纪录写道：“牵走牲畜，殴打居民，强奸妇女和姑娘，使当地和周围一带的乌克兰居民惶惶不安。”1943 年 5 月 30 日，两名苏联农学家请求驻大罗戈斯扬卡的驻军司令“下令武装党卫队士兵，不要再殴打居民，不要再抢劫东西，不要再到村庄去找麻烦。”

第七节希特勒打赢战争的最后希望

整体素质下降，人员缺乏训练，武装党卫队越是进行扩大和通过征募士兵吃进一个师又一个师，这个问题就越发严重。因为，在此期间，党卫队战斗部队的战果和大德意志独裁者的战运日益不佳，促使阿道夫·希特勒拆掉加给武装党卫队的一切条条框框。武装党卫队年复一年地变成这位暴君的最后希望，希特勒产生了一种垂死挣扎的信念，认为唯有党卫队这支几乎不可战胜的部队才能使他免遭厄运。

早在1942年春，希特勒就同意建立一个新的党卫队师（“欧根亲王”师）；不久，又将骑兵旅组成“弗洛里安·盖尔”师；从秋天起，希特勒就不再对武装党卫队加以任何约束了。接着相继成立了装甲师“霍恩施陶芬”师（第一次有百分之七十的成员由招来的人员组成）、“弗龙施贝尔格”师、一个取名“北欧”师的新的日耳曼人师、“希特勒青年团”师和一个波斯尼亚师——武装党卫队一再地扩大队伍。它也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放松了在武器方面对它的控制。最高统帅部原来总是注意，使武装部队比武装党卫队优先获得现代化武器。现在，希特勒把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从进攻性火炮到步兵坦克，他都将最新装配调拨给武装党卫队。

部队终于成功地清除了导致他们人员和物资严重损失的瘤疾：缺少坦克。“给我们搞坦克来，没有坦克，这支威武雄壮的部队就会完蛋，”1941年年底，前罗马尼亚将军，当时担任“维京”师团长的西本市格尔人阿图尔·弗勤普斯向菲立克斯·施坦因纳告急。同武装部队的长期抵制进行斗争，武装党卫队的三个最早的师（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师、“帝国”师、“骷髅”师）逐渐更换配备成为坦克部队，组成了在保罗·豪塞尔指挥下的、为人们所承认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以后又组成其他装甲军。1943年3月，副总指挥豪塞尔率领他的装甲部队越过乌克兰战场向前挺进，实现了希特勒的最大胆的希望。该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击退了苏联的强大攻势，又在1943年夏季，德军最后一次在俄国土地上展开的强大进攻中，充当南线进攻部队的尖刀。

一年后，武装党卫队各师已成为德国东线的核心部队。美国历史学家斯坦判断道：“党卫队部队”两度“阻止了一种新的斯大林格勒局面的出现”，它们在切尔卡瑟和卡缅涅茨一波多尔斯基打破了苏联人布下的致命包围圈。1944年1月，苏联部队在一个包围圈中围困了两个德国军，此后一个月，在另一个包围圈中包围了一个完整的德国装甲军团。身陷重围的“维京”师配合陆军部队突击了切尔卡瑟的包围圈，（在此期间开往法国，后又重新调回来的、豪塞尔军打破了卡缅涅茨一波多尔斯基的包围。美国人斯坦在武装党卫队编年史中写道：“党卫队部队战斗的结果有时获得辉煌胜利，有时取得微不足道的战果，或是完全没有取得战绩。但是不论每次具体作战行动胜负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遏制住了敌方的挺进。”

可是，武装党卫队在军事上的胜利却掩盖不了部队早已“烧得焦头烂额”，“维京”师师长施坦因纳这样说。投入战斗的坦克装备为时太晚。1943年，武装党卫队第一流各师的三分之一人员已长眠在苏联地下。武装党卫队不得不蒙受沉重的损失，这种损失要是加在任何别的部队头上，肯定早已一蹶不振。仅在1941年6月22日至11月19日之间，它就损失了一千二百三十九名各级领袖和三万五千三百七十六名队员，其中死亡一万三千零三十六名。“维京”师在切尔卡瑟突围时丢失全部坦克、全部装备和一半人员；以

髑髅师为例，该师师长艾克于 1943 年 2 月在哈尔科夫地区阵亡，可以看出损失对武装党卫队的士气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该队在 1941 年 11 月 15 日确认：“战斗迄今所受的损失，已消耗作战队的主要领袖和副领袖这些骨干力量将近（达到）百分之六十，副领袖这一层严重缺乏，产生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其结果是：“一支训练有素的、有经验的副领袖和组长均已丧失殆尽的连队，是不可能展开进攻的。叫它担任防守是靠不住的，因为它缺少主心骨，现在，师里有的连长已经站在自己的阵地前面不知如何判断情况了。”

希特勒对武装党卫队寄予了厚望，但是他们也无法挽救希特勒帝国江河日下的形势了。

第十章卫队谋叛

英国寄希望党卫队在德国搞政变
党卫队部队一团按一团地血染战场
军人的暴动使希姆莱和施伦堡目瞪口呆
戈培尔命令把审判细节拍摄下来

第一节 保安处长决定强行绑架希特勒

施伦堡准备推行计划，采取激烈手段搞掉希特勒。这位保安处处长首先在西班牙同美国军方人士进行了接触，同他们讨论了一个奇妙的方案，马德里《人民报》在1958年给它起名为“KN作战计划”（绑架）：将希特勒强行绑架，交给盟国。西班牙报刊声称，党卫队领导机关和美国军方之间“就执行绑架计划密切保持默契。具体的技术和组织措施已经确定，拟就的一项组织工作，包括要在马德里、里斯本和靠近地中海的巴伦西亚等地设立据点”。但是这个行动计划始终只是停留在讨论阶段。通过驻马德里的警务随员保罗·文策尔同盟国进行了会谈，他企图把天主教会也拉进来，协助绑架希特勒。教会不愿惹人不满意：孔位多·西蒙森教士是梵蒂冈领导阶层的心腹，他和伊比利亚半岛以及南美洲的一些同事前来供警务随员调遣，有的奔走，有的出钱。但这个计划多在1944年5月就已束之高阁。文策尔的主要信使是一个法国人，名叫勒泰利埃，他从文策尔的保险柜里窃取了同KN作战的秘密文件，将其卖给某盟国情报机关；保安处无疑认识到，由于希特勒的保卫工作非常严密，从技术上说绑架计划是无法实现的。

但是，施伦堡在西班牙的会谈使盟国人士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唯有希姆莱和党卫队才能推翻希特勒的体系。现在，连英国方面也对所谓希姆莱解决问题表示有兴趣。党卫队旅队长克位年富斯在1944年4月3日记述道：“据悉在英国人士中，党卫队全国领袖和党卫队经常是种种谣言和猜测的对象”，保安处驻里斯本的一名密使（姓名不详）报告道：英国人今后只寄希望于依靠党卫队而不再是依靠武装部队在德国搞政变。

这个密使写道：“另一方面，自从去年以来，这些（英国）人士越来越注意党卫队，最近尤其注意武装党卫队。想在了解领袖和党卫队以及武装党卫队之间已经暗中存在或者甚至激烈的对立状况的意见，部分可以想象，部分……，显然也是以英国的意见为基础。”这个密使听英国人士报告说，特别是武装党卫队将领们对希特勒将愈益持批判态度，“这种趋势，其原因在于对战局的判断”。1944年1月初，里斯本已经“传闻，‘武装党卫队将领们，其中有一位在秋末被授予橡树叶骑士勋章的将军’，已同英国人进行了谈判。”

报告人看来没有料到，他的报告实际上是个预言，因为在西线作战的党卫队部队领袖们三个月后组成了第一个正式的、准备一致拒绝听命于希特勒的小组。对于他们来说，决定性的一点也正是驻里斯本保安处人员谈到的党卫队将军们所抱的那种指导思想，对战局的判断。

人们希望借此创造条件，有助于同西方国家的对话。但是恰好此刻密谋分子和希姆莱干了一仗，打破了他们的计划。

1943年，形势进一步逆转，希特勒内外交困，犹如一个狂徒站在面临深谷的悬崖上。这一年，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苏德战场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座机里，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到了这时，密谋分子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采取经常改变日程的手法，他们的计划也必须随之改变。他们看到，希特勒肯定会出现的场合是每天最高统帅部和陆军部司令部的将军们的军事会议。必须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杀掉他。他们选中了一个经常出入这种会议的名叫冯·施道芬

堡的年轻军官。从此以后，他不但担负起用现在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亲手杀害希特勒的任务，并且扫新的生命和光辉、希望和热情注入密谋集团。施道芬堡虽说是一位低级军官，只因为他机智勇敢，深入虎穴，甘愿捐躯，谋杀元凶魁犯，故英名历久不磨，广泛流传。

冯·施道芬堡是个机智多谋的军官，1907年，他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的世家。他的母亲是乌克斯库尔——吉伦勃兰德女伯爵。他曾祖父是拿破仑战争中的军事英雄格奈斯瑙，后者同夏恩霍尔斯特一起创建了普鲁士陆军参谋总部。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信仰罗马天主教，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官僚贵族家庭。

1936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他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1939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

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看来是到苏联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党卫队在苏联的暴行，打开了施道芬堡的眼界，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苏联遇到了决心杀掉希特勒的两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冯·特莱斯科夫将军和施伦堡。据后者说，他们后来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道芬堡是他们的人。施道芬堡于是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样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缺乏进取。在举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青年军官来帮忙。施道芬很快就找到了他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

第二节陆军元帅隆美尔主张逮捕希特勒

在这个当儿，一九四四年初，一个十分活跃的陆军元帅对密谋份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那时他新任西线 B 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开初，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后来隆美尔明确表示要承担挽救德国的责任，并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这样才取得了密谋分子的信任。

1944年6月6日开始的战役，也促使武装党卫队领袖们对希特勒及对德国真实处境的最后幻想趋于破灭。在诺曼底，党卫队部队一团接一团地血染战场——成了领袖的牺牲品。这个领袖呆在狼穴，沉缅在幽灵梦幻中，退却、敌人的物质优势、德国士兵元气丧尽，这一切都不能使他从睡梦中惊醒。党卫队的警卫部队面临全军覆灭危险，因为武装党卫队的主力驻在西线，六个师包括领袖警卫旗队，分别组成塞普·狄特里希的第一党卫队装甲军和保罗·豪塞尔的第二党卫队装甲军。希望自己的部队免遭覆灭的思想，也使党卫队将领们愿意支持反希特勒分子的事业。如果不是 B 集团军司令、陆军元帅埃爾溫·隆美尔这样一个军人给他们作出样板的话，他们本来还会犹豫不决的。隆美尔像武装党卫队将领们一样，对希特勒的信仰一落千丈。在 1944 年年年初，隆美尔还听不进抵抗运动派的理由，但从 5 月份起，他已经明白，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

时间紧迫。隆美尔估计，德国在诺曼底的防线还可以支持三个星期，然后就必然是美国部队的突进和法国陷落。沉痛的认识使他 B 集团军参谋部反对军官早在入侵前就制定的一项计划，在隆美尔的参谋长汉斯·斯派达尔中将博士主持下，拟定了一个“动员日程表”，内容包括主动放弃西部占领地区，将德国军队撤回国境内，并将占领机构移交给盟军。最重要的一点是“逮捕阿道夫·希特勒，将他交给德国法庭审判”。

7月初，隆美尔决定将计划付诸实现。7月9日，他委托西线军人反对派的主要策划者，施陶芬贝格的表兄弟凯撒·冯·霍法克中校博士，以他隆美尔的名义起草一封致盟军的信件，通告：“德国西线军队将自动停止敌对行为，并撤回德国。可是，作为 B 集团军后盾的六个武装党卫队师将会抱什么态度呢？隆美尔想要行动就必须万无一失。他不倦地深入到前沿阵地，听取负责将领和高级指挥官的意见。他们一个个声明赞成脱离希特勒。武装党卫队的将领们也不例外。就连党的老战士塞普·狄特里希也不得不面对现实；斯派达尔作证说，狄特里希已经“表示对最高领导的愤怒，要求‘一旦战线崩溃时自行采取措施’”。这时已接任第七军团司令的党工队副总指挥豪塞尔，同意抨击希特勒及其癫狂的坚持打到底的战略。

接替豪塞尔指挥第二党卫队武甲军的副总指挥威廉·比特里希发表的意见最为尖锐。1944年7月15日深夜至16日黎明前，他刚刚回到自己的指挥所就接待了来访的隆美尔元帅。这位武装党卫队内以其言词犀利令人畏惧的副总指挥开门见山他说：“元帅先生，我不仅了解诺曼底的形势，我也知道东线的情况多么糟糕！那边再也谈不上有计划地进行指挥了。那边的情况

完全是剜肉补疮。”比特里希气愤地说：“上面没有认识到危险性，因为不了解情况。因而也不能正确估计形势。我自己每天都看到年轻人白白地死去，原因是上面的领导稀里糊涂。因此，今后我再也不执行糊涂的命令了，而是根据形势需要行动。”隆美尔抓住这一机会讲话，他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党卫队领袖。隆美尔说：“我也知道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现在已跟对方进行联系，让我表示能有计划地放弃法国被占领区，撤退到西壁工事以内。”这位党卫队人物没有多加犹豫，就表示同意合作，一道反对阿道夫·希特勒。“无帅先生”，他说：“如果说了算数的话，那么我和第二党卫队装甲军支持您和服从您的指挥。我的每个指挥官都跟我的想法一样。”

但是，武装党卫队领导同西线陆军之间的反希特勒联盟成立得很快，垮得也很快。7月17日，隆美尔在诺曼底德方前线行车途中，遭到一架飞得很低的英国飞机袭击，受到重伤——西线军方反对派失去了领导人物。三天以后，去总参谋部任补充军总司令参谋长的克劳斯·沈克·冯·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的行动，破坏了党卫队将领们同西线陆军反对派将领之间的合作。谋刺希特勒的行动破坏了隆美尔的党卫队将领就西线陆军造反达成的共同遵守条件：不得杀害希特勒。

第三节勃兰特上校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希特勒一命

当决定命运的一九四四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密谋分子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伙伴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行动计划。这个计划总的代号是“伐尔克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伐尔克里”是北欧一日耳曼神话中一群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原来他把“伐尔克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伐尔克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分子的一个绝好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

计划虽然安排好了，但有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并不等待密谋分子。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而且军事形势发展也很快，这一切都迫使密谋分子必须及早动手。

快到6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们可以直接地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军司令或其他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苏联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来执行这一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要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或腊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个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而在这方面双方配合默契是不容易的。

7月11日和15日，施道芬堡先后两次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希特勒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人员的供应问题，这两次都因某种原因而没有动手。7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元首”报告关于编组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即7月20日的下午一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会议上提出报告。施道芬堡想，这次不要再错过机会。在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希望爆炸能够成功。

希特勒的大本营，是个警卫森严的地方。它隐藏在东普鲁士腊登堡附近的一处密密的丛林里，这是童话里中妖魔和巫婆出没的地方，大本营的代号

取得非常贴切，即臭名远扬的“狼穴”。

希特勒及其军事参谋班子设在森林的中央，方圆几英里内绝无人迹。这里是军事要地，岗哨林立，进入“狼穴”要经过多道岗卡。大本营是由一些舒适的临时营房组成，有一些是用大石块组成，里面铺上木板，装饰简朴但很运用。通讯设备全部是现代化的。从阳光明媚、辽阔的乡间原野进入这个阴暗的森林营地，人们顿时觉得有股压抑感。希特勒房间的电灯必须整天开着，他本人很少外出，大概即便是大小的微光对他来说也太耀眼了。他的随从也不大走出这阴暗的森林。

1944年7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六点刚过，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到伦格斯道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一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这颗炸弹同去年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它最多只要十分钟。

在机场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故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七点钟，飞机起飞，十二点钟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

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施道芬堡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仑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约妥，他随时准备好将爆炸的消息及时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尔基贝尔然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大本营同外界隔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讯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争取过来是十分幸运的。

施道芬堡首先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同他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然后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行。现在是中午十二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坐火车到达，“元首”的每日汇报会，从下午一点提到十二点半举行。凯特尔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

结束。

离十二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堡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在会客室里，施道芬堡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三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十分钟之内就会爆炸。

当凯特尔和施道芬堡走进希特勒的房间里，会已经开始了。“元首”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和豪辛格的助手海因孽·勃兰特上校。

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队的其他十八名军官站在桌子周围。希特勒在摆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

豪辛格正在作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德军在苏联中线被突破的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危险处境。凯特尔插进去报告冯·施道芬堡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只手、一只眼的还蒙上了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要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道芬堡的。

施道芬堡于是站到桌子旁边，在科尔登和勃兰特的中间，离希特勒右边几英尺远。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那个坚实的橡木底座的里面一边。它离希特勒的腿约六英尺远。时间现在是十二点三十六分，离爆炸还有五分钟。豪辛格继续讲，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

没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这时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许除了勃兰特上校之外。这位军官正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了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堡的那只鼓鼓的皮包碍事，先用脚想踢到旁边去，最后还是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的底座了。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

当豪辛格沮丧地讲到“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这句话还没有说完，就在这一瞬间——十二点四十二分，“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施道芬堡在外亲眼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会议室像中了一个五五毫米的炮弹，烟火大作，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施道芬堡兴奋的心里，毫无疑问地认为，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菲尔基贝尔会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路线，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堡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地走出腊斯登堡大本营。这时检查哨的卫兵已经封锁了所有的出口。他的汽车刚到第一道哨就被卡住了。他机警地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简短他说了几句，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这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施道芬堡就这样连闯三道岗卡。当他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等候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使腾空而去。

这时，在腊斯登堡“狼穴”，正慌着一团。希特勒虽然没有死，但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灼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毁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凯特尔没有受伤，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

第四节 历史奇闻：谋杀希特勒的炸弹，曾由党卫队头子送人“狼穴”

领袖大本营里发生行刺事件使前线的党卫队首领们大吃一惊，其程度并不亚于党卫队的政治领导。军人的暴动使希姆莱和施伦堡目瞪口呆——过了好几个小时，他们才采取对策，对早已失败的政变进行残酷镇压。党卫队领袖们在几个月以前还曾同抵抗分子进行过谈判，掌握了反纳粹派许多秘密，现在他们竟然不知所措，这使历史学家们感到困惑不解。分明知道七月二十日运动的人，怎么对施陶芬贝格的行动感到如此突然呢？某些理论学家满足于肤浅的解释，说党卫队领导感到突然只不过是装模作样——实际上希姆莱和他的亲信只是有意观望，以便施陶芬贝格的行动成功时，能同反叛分子合伙。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当然只是凭空猜测，他们拿不出具体证据。

相反，党卫队领导机关的档案使我们有理认为，不论党卫队全国领袖私人本部还是德国中央保安局，都从来没有对施陶芬贝格为中心的这一派密谋分子产生过怀疑。七月二十日运动共有三派：一派是保守的公务人员和多半属于退休养老的军人（贝克——戈台勒派）；另一派是基督教保守派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政治家（克莱骚集团）；第三派是从1943年秋开始才积极活动的以施陶芬贝格伯爵为中心的年轻军官。这三派中，秘密警察只知道前两派。对于贝克—戈台勒一派的成员，秘密警察的档案里记有详细名单。像贝克、戈台勒、兰格本和奥斯特这些姓名，秘密警察缪勒可以倒背如流。早在1943年，希姆莱就警告谍报局局长目光纳里斯，说他现在知道谁是敌视政权的反对派在陆军中的后台，他将“及时地制止贝克和戈台勒之流作祟。”自从为首分子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和其他成员在1944年初被捕以后，克莱骚集团对于秘密警察也不再是秘密了。

德国中央保安局对施陶芬贝格这一派军官之所以还不了解，因为这一派军官在武装部队的掩护下活动，而秘密警察的密探们是钻不进武装部队的。党卫队全国领袖根本没有想到怀疑冯·施陶芬贝格上校。1944年6月中旬，他在领袖大本营一次访问时，还帮助这位行动不便的总参谋部军官脱大衣，替这位未来的凶手拿公文皮包，这只皮包很重，里面装着施陶芬贝格打算有一天用采杀害希特勒的炸弹。在希姆莱眼中——他们俩直到1944年6月初才认识——伯爵是个能干的参谋部军官，值得提拔的对象。7月中旬，古德里安大将告诉全国领袖说，总参谋部必须最终起用熟悉前线情况的军官，让施陶芬贝格当总参谋长，希姆莱当即同意向希特勒推荐施陶芬贝格。

海因里希·希姆莱确实一点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伯爵的计划。希姆莱的司机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卢卡斯在下午1点钟左右半冲进党卫队全国领袖战地指挥所的专列卧车，大声告诉每一节车厢里的人：“有人行刺领袖！有人行刺领袖！”就是在这时，希姆莱也没有怀疑是施陶芬贝格干的，12时42分，希特勒的会客室里正在进行汇报会议，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爆炸了，凶手在爆炸前一会儿匆忙离开会场。爆炸后不久，施陶芬贝格还被领袖大本营外面的一层岗哨拦住，不信任地再一次不让他通过，但是一个电话打开了大门，这个密谋分子头子可以发动政变了。

但是希姆莱还是丝毫没有觉察。就是当他在几分钟后来到了离他驻地不远的领袖大本营向脱险的希特勒祝贺时，他那综合性判断力也是集中到一条错误的线索上：他怀疑派在大本营施工的托特组织工程队，在地下室的地板下面安装了炸弹。过了一些时间以后，希姆莱才注意到地下室里一个电话值班

中士所谈的情况：冯·施陶贝格上校急速离走。他当时就感到奇怪。但是希姆莱疏忽没有下令，把这个被推测的凶手在柏林着陆时就加以逮捕。

卡尔登勃鲁姆终于接到领袖大本营一个人打来的电话，建议他务必到柏林本德勒街最高统帅都去找冯·施陶芬贝格了解一下，询问伯爵先生为什么那么急急忙忙离开了狼穴。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对这个建议没有听出话中有话。他派区队长庇弗雷行博士只身进入戒备森严的密谋分子巢穴，结果不得不使这位区队长暂时失去自由施陶芬贝格拒绝接见这个并无恶意的来访者，叫人将他关在一间房间里。

这个插曲多少说明，党卫队阵营陷入了不知所措的境地。多年以来，纳粹党的党卫队一直时刻警惕镇压一切政变活动，多年以来，保安警察和保安处一直在同所谓的国家敌人作斗争，而现在只有几个钟点，就在短短的时间内戳穿了关于无所不能的党卫队时刻戒备、待命出击的神话。7月20日下午，柏林党卫队领导眼见自己趋于瘫痪状态，对于陶芬贝格报警的陆军部队之请，协助包围柏林政府区的时候，领袖警卫旗队的几个连队都小心翼翼地龟缩在利希特菲尔德的营房里。没有任何一支武装党卫队或风纪警察的部队赶来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支援德国中央保安局，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先生们望了眼站在窗子前面看着一营营应密谋分子暗号“伐尔克里”召来的几营武装部队从街上走过。不过各省和德国占领区的党卫队和警察部队则更加惊惶失措。

下午6时30分，第十七军区（维也纳）参谋长海因里希·科德勒上校接到本德勒街电报，指示他逮捕奥地利的所有党和警察的重要人物，理由是：“一个由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的党的头目们组成的伤天害理的集团，企图利用眼前的形势（行刺希特勒）向正在艰苦战斗的前线将士从背后插上一刀，同时力图攫取权力以达到营私的目的。”随后不久，政变分子们又用无线电发来一道新的命令：立即解除所有纳粹党区领袖、邦长、部长、省长、警察局长、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秘密警察局长和党卫队机关领导人的职务，将他们特别严密地加以隔离监禁。”此外，“如发现武装党卫队部队领导人有不服从的嫌疑或不称职者，应予以监护拘留，改派陆军军官充任。对不服从命令的武装党卫队部队，必须断然解除其武装。”

科德勒看了柏林发来的这些命令，在思想上不是没有压力的。因为他必须承担全部责任——他的司令官将军外出旅行去了，将军的副手也不在家。但是靠着几分奸诈并使出几分维也纳的风度，他说服了党卫队和警察机关的当权者顺从大势所趋。他请当权的头头们在晚上8点来司令官将军的办公室进行一次紧急商谈，将到会的人全部禁闭起来，同时始终对他们以军人相待。应该来的都来了：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监，武装党卫队驻军司令。

这些先生善于应变，不慌不忙。副总指挥克韦尔纳和警察局戈茨曼立即表示听从新政权的调遣。当科德勒上校向克韦尔纳恳切说，他只是按柏林本德勒的命令办事，副总指挥先生尽可能亲自看看发来的电报时，克韦尔几乎有些生气了，手一摆说道：“有您给我讲了，我还有什么不相信的！一句话，警察当权者没有制造任何麻烦。这些被扣押的人关在房间里，间呀聊天以消磨时间，即使当天晚上9点30分左右最后一次同柏林电话联系证实政变失败时，党卫队领袖们也就没有翻脸。

军人们向自己的阶下囚道歉，指出这是令人不快的命令而引起的，并恭维了一番，将党卫队头头们送了回去。科德勒后来回忆说：“就是事过之后，

也没有一个在场的人抱冤，或现在表示自己并无过错而被冤枉扣押。”

驻在被占领的巴黎的党卫队和警察机构也受到了政变分子以类似方式的袭击。大约在科德勒上校维也纳送走拘留者的同一时刻，第一保安团的突击队在冯·克勒韦尔中校的领导下武装起来，对巴黎保安警察机关（秘密警察和保安处）采取断然行动。巴黎城防副司令、老党员和血旗勋章获得者布雷默尔少校将亲自负责逮捕驻法最高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卡尔布雷希特·奥伯格和保安警察头子、旗队长赫尔穆特·克诺亨。几分钟之内，全部更迭了巴黎的政权。夜里 11 点钟，奥伯格和克诺亨已经被关在“大陆”饭店的一个房间里，桌上摆着白兰地酒，无线电播里送着音乐。一千二百名保安警察则被关在弗雷纳武装部队监狱里和旧东线要塞的掩体中。

巴黎警备区的军官们正在“位斐尔”饭店里庆祝战胜黑色集团，突然无线电播送了希特勒的广播演说和西线总司令古恩特·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命令，政变的一切希望化为泡影。克鲁格曾经一度同反对派有过密切接触，但后来又重为希特勒所笼络。他在获悉巴黎保安警察被捕后，解除了驻法德军司令、反纳粹将军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的职务，并命令立即释放奥伯格的人。

7 月 21 日凌晨 1 点 30 分，巴黎城防司令汉斯·冯·博伊内堡—伦格斯费尔德男爵中将出发前去释放党卫队领袖。在这期间，奥伯格和克诺亨待在旅馆的房间里也听到了希特勒的演说。当将军向两个党卫队领袖说明他们已重获自由时，奥伯格跳起来叫道：“博伊内堡！你们这是干的什么卑鄙勾当？”将军请两位先生到“位斐尔”饭店去找冯·施图尔纳格要他对一切作出解释。奥伯格激动地大步走进“位斐尔”饭店的酒吧间，正打算痛斥从座位上立起身来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当时也在场的奥托·阿贝茨大使赶了过来。阿贝茨劝阻说：“不管出了什么事情，根子在柏林；现在在法国这里的诺曼第战役打得正紧张，德国人必须互相团结一致。”

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柏格还在牢骚，但怒气已渐渐消退。这天夜里，出现了军事历史学家威廉·里特·冯·施拉姆称之为 1944 年 7 月 20 日的人类奇迹的事情：党卫队和武装部队之间结成了一条秘密战线，反对建立中央保安局的野蛮的搜捕者。“能挽救的应尽量挽救，应该建立一条反对德国中央保安局的联合战线”，施拉姆写道。对于外界，特别是对于希姆莱，保安警察头子克诺亨想出了一个说法：逮捕保安警察——人们这样说——只是一种演习，是事先由党卫队地区总队长奥柏格同冯·施图尔纳将军商定的。

奥柏格和军方人士出面保护大祸临头的巴黎政变分子，使德国中央保安局在几个钟点之内无法对他们下手。就是在希姆莱的第一批命令到达后，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也试图设法挽救；他选派了头脑精明的军人充当负责审查军官表现的调查委员。他征求参与密谋活动的西线总司令的参谋长布鲁门特里将军的意见，从而一开始就使审查对象限在一定范围之内。当施图尔纳格尔——克鲁格陆军元帅在向领袖大本营的报告中点明，他是最重要的政变分子之一——奉命去柏林汇报，并在行车途中自杀时，奥柏格追上了他，向他表示一定保护他的家属，不受到任何株连。虽然地区总队长没有能够阻止在法国的政变领导人——霍法克、芬克上校特勒、冯·林斯托夫上校、恩斯特·勒希林博士和枢密顾问克·克罗伊特——落入秘密警察的魔掌，但多数密谋者和同谋者由于奥柏格的态度而没有踏上去阿尔布希特亲王大街的死亡之路。里特·冯·施拉姆作证说：“7 月 20 日对巴黎保安机关采取突然

行动的领导人全部幸免于难。负责的军官们没有吃任何苦头。”

武装党卫队领导人也参加了营救大祸临头的政变分子。党卫队将军们救了三名未来联邦国防军的领导人；通过塞普·狄特里希在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活动释放了斯派达尔；党卫队副总指挥洛姆巴备从秘密警察手里救出了总参谋部上校基尔曼斯埃格柏林；豪辛格少将由于党卫队担保而获得了自由。

当隆美尔过去的伙伴、党卫队副总指挥比特里希在无线电中听到，自己原来在东线战役的老司令、七月二十日事件参加者埃里希·霍普纳大将已被绞死时，他激动地从坐椅上跳了起来，愤怒他说：“这是德国军队的末日！一名军官由于谋反而被绞死，这种做法在德国历史上还从未有过——过去是依军法枪决。”比特里希的参谋长是一个由陆军调到武装党卫队的军官。他小声提醒比特里希说：“将军先生，我不得不请您不要在公开场合这样说话。”副总指挥做了一个手势说道：“不关您的事。”党卫队副总指挥的失言传到了希姆莱的耳朵里，他马上命令威廉·比特里希立即交出指挥权。但是比特里希的上级第五装甲军团司令埃贝尔巴赫将军提出前线形势紧张，不同意解除副总指挥的职务，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武装党卫队在前线属于陆军及其领导人节制，因此希姆莱在他自己的部队里的权威也是有限度的。希姆莱并不肯就此罢体，一定要强行搞掉这位太不听话的党卫队将军。在几个星期后的阿姆战役中，他看到一个新的机会。希姆莱派自己青年时期的朋友、党卫队兼警察医生卡尔·格布哈特·克里尼克上校和武装党卫队中将去见比特里希，命令副总指挥向党卫队全国领袖报到。陆军再次抵制希姆莱的惩处下属的权力。新上任的西线总司令莫德尔陆军元帅声明反对任何解除比特里希职务的做法，并且在撤出法国后，也继续坚决站在比特里希一边。希姆莱打算搞掉不听话的党卫队将军，但始终没有得逞。

但是，在希姆莱消灭1944年7月20日事件的密谋分子和知情者的战役中，对比特里希斗争的失败，当然只不过是少数失败情况之一。这个党卫队头子无情地迫害所谓的叛徒和他们的家属——德国军事史上最残酷的嗜血司法开始了。

7月20日，保健医生克尔滕已经绝望地看出，希姆莱重又摇身一变，狂热拥护领袖——就是希姆莱不久前还曾打算借助抵抗分子解除其权力的那个领袖。他再不想让人说他摇摆不定了，他大声对克尔滕说：“现在是我动手的时候了，我要彻底地收拾掉这批反革命坏蛋，我已经下令逮捕叛徒了。”当克尔滕表示怀疑救独裁者对德国是否有利时，希姆莱生气他说：“克尔滕，您这是什么话？您真这样想吗？您不应该这样想，更不应该这样说。无意已经预示我们，领袖大难不死。领袖活着，任何人对他都无法加害，天意叫他不离开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将战争胜利地进行到底吧！”

随后，他抱着满脑子虚伪的宗教狂，一头钻进了领袖大本营，并开足秘密警察这部死亡机器的马力，疯狂地镇压密谋分子。他看着时间对他有利，他时刻不离开他心目中那个上帝的化身，而且抑制内心的狂喜，不露声色地将一份命令送给希特勒过目，旨在使他海因里希·希姆莱成为德国的第二号实力人物。

希特勒在7月20日下午听到叛乱运动正在扩大的报告非常气愤，这时希姆莱将一份任命党卫队全国领袖为补充军总司令的文件给他过目。希特勒签了字。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能保证帮助他消灭密谋分子，不管什么文件他都会签字。希特勒叫喊道：“您要枪毙每一个抵抗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事

关民族的命运，您不能心慈手软。”希姆莱霍地敲响鞋跟立正，大声说：“我的领袖，您可以完全相信我！”主子的这条忠实警犬急急忙忙地冲了出去。希姆莱乘飞机去柏林，下午4时30分在首都降落。不过希特勒派来的这个镇压异端的裁判官审慎，他先让密谋分子所在单位同事们出面消灭密谋分子。但是刚一接获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电话通知——宣布密谋分子发出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希姆莱就放手大干了，开始对政变进行报复性的恐怖活动。

第五节死亡机器下的幽灵

在腊斯登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希特勒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这些来自希特勒的指示，都由卑鄙恶毒的纳粹狂人、“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严格地执行了。

“人民法庭”第一次审讯于8月7日、8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月20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斯将军，还有一些同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根·克劳辛、柏纳第斯、彼德·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作为一个警告，杀一做百，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当陆军元帅穿着破烂的衣服，旧外衣和旧衬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上衣没领子，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用手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的那个元帅，看上去像个精神颓丧的老头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8月8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极刑。希特勒曾经下令，“他们全都像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成西监狱，这八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具小房间，屋里天花板上挂着八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服上衣，绑起来，用钢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的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裸裸地现出临死时的修象。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1945年2月3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勃伦道夫奇迹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幸存的极少几个密谋分子之一。最后美国军队在提罗耳把他从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弗洛姆将军，虽然在决定命运的7月20日晚上见风使舵地反戈一击，还是没有逃脱一死。第二天，希姆莱接替弗洛姆的国防军总司令职务，下令逮捕了他。他于1945年2月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审，并被判处死。也许是作为对他协助挽救纳粹政权有功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他没有像被在7

月20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用肉钩子吊死，而是在1945年3月19日由行刑队枪毙。

被革职的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密谋分子有过许多帮助，但是并没有直接参加7月20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测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况多年不明。人们只晓得，在谋害希特勒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被逮捕了。但是凯特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有一个目击者丹麦人伦丁上校说，1945年4月

9日，他看见卡纳斯光着身子，从牢房里被拖到绞刑架上。

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杀了。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是密谋集团在东线军官中的灵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宙施勃

伦道夫决别时说了如下一些话：

“现在，大家都会来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个小时之内，我将要在一颗无愧的良心，为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所做一切进行辩护。”

那天早晨，特莱斯科夫乘车到第二十八步兵师的阵地，悄悄地到前沿无人地带，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五天之后，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在西线的陆军高级将领中，有两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将军自杀。在巴黎，当驻法军事总监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逮捕了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全部人马时，起义开头进行得很好。现在一切都要看新任西线总司令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动向了。特莱斯科夫在苏联战线时，曾对他做了两年的工作，想努力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虽然克鲁格忽热忽冷，但最后总算同意，或者说，密谋分子认为，等希特勒一死，他将支持政变。

7月20日晚上，在拉罗歇——基扬的B集团军总部，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晚餐会。克鲁格想同他的一些主要顾问们讨论一下关于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当这些军官们齐进晚餐的时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觉得，这位素来谨慎的陆军元帅，眼看就要下决心和政变分子同命运了。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贝克和他通了电话，恳求他支持政变，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着就接到了以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名义签署日报第一号通令，给克鲁格留下了根深的印象。

当他获悉政变失败后还很惋惜他说，如果计划成功，他就要马上与艾森豪威尔豪尔接触，要求停战。这时，他命令施图尔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卫队保安人员。然后，他又劝图尔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起来。”

但是，施图尔纳将军拒绝选择这样的出路。在巴黎的位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柏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队和保安队与曾经被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握手言欢。施图尔纳格尔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又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他在第一次大战时，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的心尔登停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著名的战场，但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施图纳洛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听法赖斯庭长的辱骂。8月30日，他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绞死了。

冯·克鲁格元帅最后虽拒绝参加起义，这一决定性的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斯

派达尔在评论到这位迟疑不决的元帅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和勇气把信念付诸实践的人。”8月17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来接替克鲁格任西线总司令。克鲁格事先并不知道自已已被革职，只是到莫德尔突然出现后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鲁格，要他报告今后在德国的行踪。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已被怀疑与8月20日的政变有关。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然后就驱车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毒自杀了。这位元帅就这样悲怯地结束了他的一生。

接着就轮到德国军队的偶像隆美尔陆军元帅。

当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双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尔登医院手术台的时候，他喃喃地而无意识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后来冯·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认了隆美尔曾经参与7月20日阴谋。霍法克引证隆美尔元帅曾经对他说过的一句话：“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这句话以后十分震惊，他因此作出决定：他所宠信的也是德国军队中最受欢迎的这位将军必须死去。

隆美尔当时住在医院里。7月17日下午，在诺曼底前线，他的头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炒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盟军的俘虏，他先从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一歇尔呈，在8日8日那天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住宅里。他以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到赫林根去看望他。第二天，9月7日，斯派达尔就被捕了。这时隆美尔是第一个警告，说明不祥的下场等待着他。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斯派达尔谈话中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7月20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队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十五岁的儿子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一同在附近森林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收到霍法克招出的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活，这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让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于是在1944年10月14日，希特勒大本营有两位将军——一个是威廉·布格道夫，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个是与他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职务问题。”

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三人到隆美尔的书房去。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到，“我听见和父亲上楼走进母亲的房里的声音。”他接着说：

“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十五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

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三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准备停当了。在十五分钟内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有非洲团皮夹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个将军上了军。车行一、两英里后在森林旁边的路上停了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一分钟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十五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堵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的头骨受伤的结果。布格道夫禁止解剖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西线新任总司令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 7 月 17 日受伤不治身死，对“我国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并给隆美尔夫人发了唁电。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字旗的隆美尔尸体面前说：“他的心是属于元首的。”

迄今为止，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试图推翻希特勒的政变里，一个被绞死，两个被逼

自杀。它不得不眼看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还有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除出去。军官团的成员，在严重时刻，胆小怕事，鼠目寸光。他们为了保持个人所谓的“荣誉”，贪生怕死，不能团结一致。在那个奥地利流氓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完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一个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参谋总部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的历史，可以说就此结束了”。到了 1944 年夏天，它却被贬低到成为一群摇尾乞怜的、吓破了胆的人的可怜的团体。对于希特勒不全再有任何反抗，连批评也不再有

了，完全同流合污了。他们把盲目服从世间的统治者看作是日耳曼族的最高道德。苏联红军的反攻和诺曼底前线的炮声，并

没有使一些政治上麻木不仁的德国军官们猛醒，他们继续为希特勒殉葬、卖命。

第十一章帝国残阳

希姆莱——德国的独裁者

华沙起义威胁着德军防线

党卫军无法改变整个德军失败的局势

希姆莱没有觉察到鲍曼递给他的是一把刀口向上的刀子

第一节希姆莱苦撑残局

在希特勒帝国日渐破碎的时候，海因里希·希姆莱完全沉湎于武士道式天降大任于己的梦幻世界，7月20日叛乱事件失败后，他是最大的受益者，占据了几乎是无与伦比的实力地位。有些人认为，似乎他只是等阿道夫·希特勒一死就能最终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列举他所担任的职务就一清二楚，希姆莱那双精心修饰过指甲的手已攫取了多少权力。他是第三帝国内仅次于党的最重要组织——党卫队的主宰。他驾驭着警察机构和情报机构，他执掌中央内政部。他作为加强德意志民族中央长官监督着政府的种族政策。他监视德国同所谓日耳曼各国纳粹运动的关系。他统帅着——虽然只是名义上——三十八个师的武装党卫队。他作为陆军装备的主管和补充军总司令指挥着国内武装部队。他的一名副总指挥（戈特洛勃·伯格勒）掌管着武装部队的战俘营。

拥有如此庞大的权势，使得某些同时代的人惜误地认为，在希特勒日暮穷途的阴影下，只有依靠这个党卫队头子才能把分崩离析的政权捏在一起。1944年底，从斯德哥尔摩到旧金山的各国报纸用醒目的通栏标题宣称：“希姆莱——德国的独裁者”；而没有在国内身历其境见到民族社会主义最后阶段那种令人胆战心惊的荒诞现实的人也许后来还会相信，“希特勒德国”的最后几个月是由党卫队兵营中发出的号令进行统治的。“就这样，在末日来临前的十个月，党卫队缔造者把德国掌握在手掌之中。1944年至1945年之际已经再没有任何一个经济机构、国家机关和党的部门能采取行动同党卫队相抗衡了”，远在纽约生活的编年史家卡尔·O·佩特尔十年之后还作出这样的设想。“集团明显地和部分不明显地接管了权力。其他一切机构都变成了工具。1944年的德国，处在两双眼睛的虎视眈眈之下：阿道夫·希特勒和海因里希·希姆莱。”

至少有一个人当时相信所谓的党卫队万能论，这个人就是集团的首领。他以为，这样一个时刻已经到来，此刻，他可以使民族社会主义德国摆脱一切“叛逆”和一切怀疑，摆脱在希姆莱的哈哈镜里原来一直阻碍德国取得最后胜利的阴暗势力。1944年8月，他极度兴奋地预告道：“我们现在是在进行神圣的全民战争。”

希姆莱使用威胁、巡回特别军事法庭和全民拿起武器的刺耳鼓动宣传，竭尽全力推进动员工作。他将保安处写的一篇研究文章《苏联保卫列宁格勒的卓有成效措施》，作为德国保卫本土战争的教材，发给陆军的将军们。“我赋予你们以全权，”他向一个师的军官们大声说：“将每一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抓起来，如果有必要就捆起来扔进大卡车。你们把师里最为凶狠、干练和优秀的军官派出去，立即将这帮子人抓起来，谁反抗就枪毙！”

希姆莱这样做，是把他那疯狂坚持到底的战略动员措施，与其常年对保守军人的积怨联系在一起。7月20日事件后，希特勒命令他新建十五个师。希姆莱感到，这是创建一支新的武装部队千载难逢的机会：“一支民族社会主义的人民军”。希姆莱从工厂厂房和学校课堂里拼凑人员有意识地建立一支与陆军截然不同的新部队。他让那些信仰虔诚而缺乏扎实基本训练的青年纳粹分子担任军官，褐色政治委员的权力、民族社会主义领导军官（NSFO）的权力加强了。部队采用的番号也在于显示希姆莱的“革命军”的特点，它们自称“人民特种步兵师”和“人民炮兵军”。

“党和武装部队之间的内在结合，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人民观察家报》欢呼地写道。希姆莱要护卫他的人民军，不让旧军官有任何染指。任何一个“人民军军官”均不得调到其他部队去，这支新部队始终由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执掌裁决权。希姆莱说：“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军是一定能打赢这场战争的军队。”

同时，他将密探和情报人员派进其他补充部队，这些人必须将如何稍有偏离坚持作战到底的方针的情况向希姆莱作出报告。还在1944年8月3日，希姆莱就在波森预先通知纳粹党各区领袖，他将毫不姑息地处决最后胜利的任何怀疑论者。他也知道必须作出恰当的估计。“此后将有较少或较多的这样一部分的人”，这个宗教裁判长自鸣得意地描绘道：“百分之五、百分之十、百分之十五，不能这么说，他们全都是真正的猪猡，都属于这个（反政权军官）集团的人。他们将被揪出来，或者迟早要受到法庭审判，如果他们采取敌对行动的话。”党卫队保安处的暗探在侦察武装部队的一切部门，探听失败主义的言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必须编造名册，定期审查当地武装部队驻军将领政治上是否可靠，以及是否激励部队坚持战斗直到“最后胜利”。

西部大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指挥古腾贝格尔记录的不可靠的军官有：“上校法因德，迪伦人，服役观点半心半意，必须撤换……，中校比尔曼，克雷费尔德人，六十岁，责任心不强，缺乏果断力，立即需要撤换……，上校克勒，诺伊斯人，无政治色彩，没有果断力，必须立即撤换。”西南大区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副总指挥霍夫曼注意到：“中校格拉夫，施勒特施塔特人，政治上不可靠，急需撤换……，中校冯·霍恩斯泰因，拉斯塔特人，撤换条件已经成熟（据说其祖母是犹太人）。”同样，部队里的军官也由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巨眼紧紧盯住。保安处的亲信——多半是普通党卫队的士兵和军士——用详尽的报告记录了“作战指挥的毫无计划，最重要的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被闲置未用……，关键性的部门严重不负责任”，保安处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道。

“关于现时驻施魏青根附近的多森瓦尔德营地的第二百零五装甲部队的情况，特别是关于二十九岁的指挥官希尔施贝格尔不称职的情况”，保安处曼海姆外勤总站于1944年11月14日向施特拉斯堡保安处头头报告道，“最好能争取司令部两名尉官表态，即：一、格鲁舍普夫中尉；二、特别是指挥官的副官布鲁斯曼中尉。两人均系党卫队员。”任何情况也逃脱不了该装甲部队中保安处亲信的注意。关于民族社会主义领导军官：“纳粹党军官在今天还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许多人根本对此缺乏必要的支持。目前军官和军士，甚至普通士兵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军官的私人生活：“对于他们来说，至今看得最重要的还是在军官俱乐部里胡闹。法国使他们更加沉湎于声色。相反甚至不搞政治培训。”对纳粹军官的态度：“军官帮始终认为，一名军士进入军官集团的重要标准是从社会角度考虑。至今首先拒不接纳名副其实的民族社会主义者。”

德国中央保安局第三处A2组汇集了暗探的报告。这些报告说明，武装部队法庭对于所谓对防务力量的破坏分子所作出的判决是多么符合希姆莱粗野的抵抗到底的尺度。但是，当德国中央保安局调阅军事法庭审理意见不一致的档案时，陆军拒不合作。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于1944年10月17日在给希姆莱的信中说：“因此我建议，就陆军军法领域来说，首先将

陆军军事法庭的全部档案和判决移送德国中央保安局，并允许保安处各区主管部门审阅自己区内的师军事法庭的档案。”但是希姆莱感到，对武装部队的庄严职权进行这样的干预，未免过于胆大妄为了——连武装部最高统帅部队长官凯特尔之流在军事上唯唯诺诺的人物，也还在捍卫长期以来已被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武装部队特权。希姆莱在卡尔登鲁纳来信的边上歪歪斜斜地写了批语，“不行，不聪明。”

此外他认为，时间反正是有利于他的。希特勒象一个快要没顶的人死死抱住一个想法，只有依靠愿意拼死打到底的党卫队才能使他避免面临的灾难，只有忠实的希姆莱才会完成武装部队将军们辱命败北的业绩。德国的生存空间急剧收缩。1944年夏季攻势后，苏联人已挺进到维斯杜拉河，直捣东普鲁士。9月，英美军队已出现在原德国西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相信党卫队旧有的恐怖魔术的思想支撑着这位独裁者，使他没有倒下。

希姆莱起初没有辜负希特勒对他的期望。这位党卫队首领以其固有的组织才能在9、10两个月内征集了五十万名新兵，匆忙而又马虎地训练了一下，就将他们投入前线作战。在这以前，他已将计划用于镇压因内动乱的补充军的六个旅调上战场。他制定了保卫德国的逐屋战斗到底的疯狂作战方案，苦心经营着一种为狂热的纳粹游击队所设计、取名“狼人”的组织，并梦想在南德阿尔卑斯山建立据点，成为不可征服的纳粹中坚分子的避难所。“任何一个逃兵……都不能逃脱应有的惩罚。除此以外，这种可耻行径将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9月10日，希姆莱命令贴出这样的布告，随后他的特别军事法庭以血腥方式将全国领袖恶毒阴险的预告付诸实现。东线和西线的战斗愈是濒临绝望，希姆莱特别行动队的死神碾磨就转动得愈是残酷。特别军事法庭的受害者被成排地吊在树上，数目日益增多，他们胸前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我是逃兵”，或“我被吊在这儿，是因为未获允许擅离部队”。

不论希特勒的哪条战线受到威胁，党卫队全国领袖就派出他的古罗马式的步兵队去哪里进行反击。独裁者三次得到了他的党卫队的支援，党卫队三次对敌对者进行了镇压。

第二节 歹徒部队

1944年8月1日，波兰起义领袖塔德舒·博尔-科莫罗夫斯基将军在苏联军队接近的鼓舞下，号召手下三万五千名游击队员在华沙的大街小巷打击德国人；这时苏联军队已抵达维斯瓦河的广阔前沿。苏军侦察队已出现在河对岸的华沙市郊普拉加。华沙起义威胁着德军防线——割断了与华沙东面作战的第九军团的联系。陆军参谋总长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建议希特勒，将尚处于陆军军事行动区域之外的华沙划归武装部队管辖，由陆军来镇压起义。希特勒不同意这一建议，而将此项任务委托给主管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

希姆莱派他的歹徒部队头子、党卫队副总指挥埃里希·冯

·德姆·巴赫-齐列夫斯基到华沙前线，叫他以惯用的残暴手段镇压波兰人的叛乱。巴赫-齐列夫斯基动员了党卫队最臭名昭著的部队：除党卫队地区总队长海因茨·赖内法特的十二个警察连外，他还派出了党卫队区队长奥斯卡·迪莱汪格尔博士率领由偷猎野兽者和囚犯组成的团，以及战俘拼凑成的白俄罗斯党卫队旅队长布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的部队。关于迪莱汪格尔和卡明斯基这两个旅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情况一直传到了领袖大本营。“我当时听到的情况”，古德里安在回忆录中写道：“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不禁感到有必要当天晚上就得向希特勒作出报告，要求将这两个旅调离东线。”甚至希姆莱的首席代表、地区总队长菲格莱因也证实说：“是的，我的领袖，这些人是地地道道的流氓！”

希特勒在陆军参谋总长的极力要求下不得不作出让步，当然在事先不会不给巴赫-齐列夫斯基以机会，将进行抢劫掳掠的匪兵头子卡明斯基作为“一名并非无可指摘的人证”（古德里安语）执行枪决。这项行动只不过使独裁者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看法：“这个巴赫-齐列夫斯基是最干练的人之一。”

华沙起义者的余烬尚未完全熄灭，希特勒一道命令又将党卫队调往德军东线后方的一处新的危急地区。8月29日，斯洛伐克的政治家和军人在苏联的鼓励下举行起义，斯洛伐克的部分军队参与行动。这次起义切断了从加里西亚溃退德军的道路。但在起义尚未扩及全国、从而将迟疑不决的普赖斯堡政府冲垮以前，党卫队又一次插手干预了。保安处逮捕了一些起义领袖，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党卫队军校人员则编成一个装甲团，出动讨伐斯洛伐克的起义者。

军校学员占领了起义中心诺伊佐尔，同时党卫队第十八装甲步兵混合师“霍尔斯特·威塞尔”师和新编成的“加里西亚”师从东面进逼；后来武装部队和迪莱汪格尔团也都参加了行动。希姆莱还从柏林调来了最忠实的信徒、党卫队中央技术管理局局长戈特洛勃·伯格接任驻斯洛伐克武装部队司令，掌握了指挥权，伯格只花了四个星期，依靠党卫队一级突击队大队长约瑟夫·维蒂斯卡博士的特别行动队H，在前线的后方再次建立了在大德意志统治下墓地一般的平静局面。如同美国历史学家希尔贝格所述，斯洛伐克“从一个傀儡政权变成了一个阴影”，党卫队事实上与武装部队一起成了这个卫星国的主宰。

当伯格回来汇报执行斯洛伐克的使命情况时，已有一名大个子党卫队领袖在领袖大本营等待希特勒的又一项指示了。独裁者在狼穴召见最富传奇性的党卫队员、党卫队二级突击队大队长奥托·斯科尔兹内，命令他指挥保

安处进行最后一次国际性的破坏活动。

斯科尔兹内是维也纳人，1908年加入空军，后来参加了“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经历过一段技术军官生涯后，进入保安处国外处，负责指挥颠覆破坏活动。对于指靠上演特务工作的闹剧来扭转战局的那些德国人来说，他是颇具象征性的人物。他那具有近乎神话般的声誉源于1943年9月12日，那是一个星期天，斯科尔兹内率领德国伞兵，把本尼托·墨索里尼从持有冲锋枪的看守人员掌中营救出来，当时墨索里尼被巴多格里奥政府监禁在意大利最荒凉的地区大萨索山一家山顶旅馆里。斯科尔兹内向墨索里尼报告道：“是领袖派我来的！”一年以后，这一次希特勒也是特意派这个党卫队伞兵部队司令去见一个同盟者，当然这一次的任务性质截然不同：上一次是营救一位卫星国的首脑，现在是要去逮捕一个人，消除隐患。

“我们现在已获得密报”，希特勒向这个党卫队员指示道：“匈牙利摄政者霍尔蒂海军上将企图与敌人勾结，使匈牙利单独媾和，您，斯科尔兹内作好准备，一旦这个摄政者不信守自己作出的盟约义务，就占领布格贝格（霍尔蒂的驻地）。”

斯科尔兹内乔装打扮，穿上一套便服，带上化名沃尔夫博士的假证件去匈牙利。途中，他突然为这次行动想到了一个代号：由于他忘了命令他的伞兵部队的军士们携带反坦克手雷，于是他给这次军事行动取名为“反坦克手雷行动”。当斯科尔兹内向驻匈牙利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党卫队副总指挥奥托·温克尔曼博士报到时，他获悉，匈牙利的情况已急转直下，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1944年8月30日，霍尔蒂已起用盖佐·拉卡托什中将组阁，更替了匈牙利的亲德政府，这个内阁显然要使匈牙利退出战争。不到一个月后，匈牙利宪兵总监福劳戈中将赴莫斯科，与苏联人就停火举行谈判。

但是在福劳戈与苏联人签署草约之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温克尔曼已获悉行将停火的消息。从任命拉卡托什政府（温克尔曼说：“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背叛的警告信号。”）以来，这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就作了一些准备，一旦匈牙利倒戈，就立即以一个纳粹体制来取代霍尔蒂政权。从8月底起，匈牙利纳粹领袖费伦茨·什扎拉希已准备登场，保安处已印好三百万份新纳粹政府号召书的传单，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埃里希·克思迈尔率领一个分队待命行动，准备突袭占领布达佩斯电台。

温克尔曼无意久等，而是要抢在匈牙利人前面。温克尔曼说：“鉴于叛变已近在眼前，另一方面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允许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于是，我在星期五，即1944年10月6日，……来澄清局势。”温克尔曼作出决定：“尽快速捕霍尔蒂周围的人员。”温克尔曼为保安警察驻匈牙利司令、党卫队区队长汉斯·洛施克和斯科尔兹内拟定了一项作战方案。10月10日清晨，他们首次出击了。

当霍尔蒂最重要的部队亲信、驻布达佩斯匈牙利第一军团司令鲍考伊中将在5点钟左右去霍尔蒂住所“丽特兹”饭店谒见霍尔蒂时，格施克手下的暗探逮住了鲍考伊，将他劫持到一个偏僻的地方。霍尔蒂随即任命奥格泰莱基中将作为鲍考伊的继任人——他也毫无痕迹地失踪了。同样德国人打算静悄悄地抓走摄政者霍尔蒂的儿子米克洛什（“尼茨克伊”）。米克洛什因为涉嫌要跟南斯拉夫游击队司令铁托的代表谈判停火，保安处很久以来就对他暗中监视。布达佩斯保安处本部于是拟定了一项计划，完全符合特工人员的做法。他们打算在小霍尔蒂与铁托的使者进行谈判时当场抓住并把他劫

走，从而迫使其父亲霍尔蒂允诺继续站在德国一边，任命一个亲德政府。这次绑架计划的代号叫“米老鼠行动”——这是由于没有听清楚小霍尔蒂的绰号，将“尼茨克伊”误为“米基”，从而使驻布达佩斯保安处的爱开玩笑的家伙们兴致勃勃地虚构了“米老鼠”这个假名。

两名保安处人员化装成铁托军队的军官，很快就跟尼古劳斯·霍尔蒂接上了头。原商定在10月13日进行一次秘密会晤，然而一位在布达佩斯也颇有名气的保安处头头过早地突然露面，使尼茨克伊产生满腹狐疑——他取消了这次会晤。但小霍尔蒂被劝说进行一次新的会见，时间定在10月15日，地点为布达佩斯埃什屈广场匈牙利多瑙河港口公司经理费利克斯·博尔内迈什扎的办公室，这位经理系霍尔蒂的好友。尼古劳斯·霍尔蒂给自己采取了保卫措施，他带了五名匈牙利国防军军官，让他们监视着这座楼房的入口，此外，还有匈牙利国防军的一个警卫连在附近几条街道布岗放哨。

但是，德国人也作好了准备工作。前一天，保安处的一支行动队住进了一座比多瑙河港口公司高出一层楼的供膳公寓，斯科尔兹内还在旁边的一条街上布置了他的一个连，人员全部潜伏在遮盖严实的载重卡车里。计划于10点10分劫持霍尔蒂。斯科尔兹内这一次又化装成老百姓，于几分钟前驾驶一辆汽车，停在摄政者的儿子刚进去的这座大楼前面。大楼人口处停着霍尔蒂乘坐的轿车，在其后面是一辆越野车，里面坐着三名匈牙利军官——外边的人看不出来。

这时，两名保安处人员向大楼走去。他们俩打算进入大楼时，三名匈牙利国防军军官发觉情况不对头，当即向保安处人员开枪射击，一名被击中倒地，当场毙命，就在这一刹那间，匈牙利士兵的步枪和冲锋枪枪管都从窗口伸了出来，朝着斯科尔兹内的车辆开火。二级突击队大队长拔出手枪，指挥他的连队冲过来，斯科尔兹内的士兵占据了对面的广场，他们的火力迫使往前冲过来的匈牙利士兵退进邻近的房屋。在外围一带行进的匈牙利国防军士兵几乎没有听到报警的信号，这时侵入大楼的保安处人员已挟着戴上手铐的霍尔蒂和他的朋友博尔内迈什扎奔了出来。这两名俘虏被塞进载重卡车，几分钟后，一架飞机载着他们飞走，航向：毛特豪森集中营。

“反坦克手雷行动”就在这时拉开了序幕：12点，德国公使费森迈尔博士——他也是一名党卫队领袖——来见霍尔蒂海军上将，要求摄政者立即表态：支持或是反对德国。不过党卫队旅队长费森迈尔自己感到担任这个敲诈勒索的角色并不愉快；他早先就批评过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温克尔曼的粗野方法——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卡尔登勃鲁纳一度曾在党卫队内指控费森迈尔犯有“失败主义”。如同温克尔曼气愤地指出的那样，费森迈尔没有“按照商定的做法，即使用最严厉的言词告诉这位老人，倘使他有一丁点儿背叛行为，就要枪毙他的儿子”。这位摇摆不定的公使沉默寡言，从而使行动计划受到损害：下午2点，布达佩斯电台广播宣布，匈牙利与苏联签订了停战协定。

但是在此期间，温克尔曼早已控制了布达佩斯。在四十辆德国坦克轧轧的履带声威胁下，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克恩迈尔占领了布达佩斯广播电台，播送了新的纳粹政权的公告；此外，德国军队占据了城市的一切要害场所。这时，斯科尔兹内也动手给霍尔蒂政权以最后的致命一击，他向党卫队第二十二骑兵团发出行动警报，命令他们封锁所有通向霍尔蒂的要塞即布格贝格的道路。然后斯科尔兹内给他的伞兵进行了分工，定于10月16日凌晨发起决

定性的攻击，6 时整，斯科尔兹内率领他的士兵空降登上山顶，短时间内就控制了局面。斯科尔兹内说：“我们没有发一枪就登上了布格贝格，整个战斗不到半个钟点即告结束。”实际上，这是白忙了一场，因为在临近 4 点钟的时候，费森迈尔已向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温克尔曼报告，霍尔蒂愿意下台，把他的权力交给纳粹领袖什扎拉希。匈牙利不得不继续为希特勒流血。

党卫队再一次证明，它一直还能以巨大牺牲换取急剧的表面胜利，来支持梦想坚持打到底的希特勒。党卫队临近覆灭前取得的成就愈是引人瞩目，海因里希·希姆莱这颗明星就在那个阴暗得出奇的宫廷里愈加明亮地熠熠发光，这个宫廷号称为领油大本营，可是却一直酷似阿拉伯苏丹进行阴谋活动的巢穴。

因此，1944 年 10 月，也可以看作是希姆莱权力达到顶峰的一个月，独裁者没有忘记感谢他的近卫军在波兰、在斯洛伐克和在匈牙利取得的成绩：党卫队头子获得了特权，于 1944 年 11 月 8 日代表希特勒在慕尼黑发表传统的啤酒馆暴动纪念演说。希姆莱感到如醉如痴，神魂颠倒，尽情享受着他获得的权力，被成为领袖看来无人可以取代的第一助手的幸福感弄得飘飘然。英国历史学家特吕弗-罗珀嘲笑说，德国的没落把希姆莱“靠向上帝了”：这个人在几个月以前还曾考虑过，为了取缔和叫希特勒靠边站，现在又懂得毫不迟疑地为他的上帝要求别人付出惨重的流血牺牲。

第三节 党卫军血战诺曼底

1944年，德国军队不但在东线苏联军队的进攻下节节败退，在西线，盟军也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在西海岸登陆，开辟第二战场。

早在1943年12月的前半月，隆美尔元帅率领三名军事专家组成的小型参谋团。视察了丹麦的防御情况，确切他说就是防御中存在的问题。从来无人说明为什么他从丹麦开始视察。他从视察中获得了很有益的经验，但他来不及在12月20日以前开始视察法国，关键是时间太紧，在法国视察得到的印象与丹麦的相同，只是范围更大。主要的印象有以下几点：

陆军部队几乎无足够的兵力构成强有力的防御，空军和海军也非常弱。除了重要港口，其余地区没有统一的防御计划，就是在主要港口，也并非必要的防御措施部得以付诸实施。三军在许多防御细节问题上都没有进行密切的协同，有关炮兵在海岸防御中的使用原则亦未能达成协议。陆军希望岸防炮配置在海岸的后方进行间接瞄准射击；而海军则要求把它们配置在岸边上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由于缺乏运输汽车，步兵无机动力。陆上和海上都未敷设足够的地雷和水雷。几乎每个指挥官都有

自己的主张，但又并不完全憎楚如何保卫各自的防区。

到1943年深秋，西线已驻有四十九个德国陆军师：这些师的特征、人员、装备和战斗力都大不相同，有些步兵师从一九四一年以来一直驻在法国，负责为东线或甫线部队训练补充兵员。这些部队有一批由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和军士组成的骨干，但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负过伤，不完全适合服现役。这些部队所补充的兵员又是非老即幼。1943年，德国陆军部队人员的平均年龄达三十一岁五个月，比同年美国陆军的平均年龄大六岁。实际上，一个师的平均年龄竟达三十七岁。士兵的健康状况无人关心；在一个守备师里，士兵普遍患有各种疾病，胃病最多。

为了兼顾训练和防守海滩两项任务，驻法国的守备师均驻在沿海地区。这些师并非都能按正常编制下辖三个团，每团辖三个营。有些师只辖两个团加一个营，另外有些师虽辖三个团，但其中有两个团只各辖两个营。有些营由哥萨克人和鞑靼人组成。这类营绝大部分驻在布列塔尼半岛；纪龙德河以南驻了一些印度兵。英吉利海峡群岛由第三一九加强步兵师、部分坦克部队、一个防空旅和一个海军岸防炮兵连防守，总共有四万兵力。

在纵深的内陆地区，常有若干受创师在休整；还有一些师在整编。驻在这个地区的装甲师的数量，随东线战况的变化而增减。1944年3月，在法国只剩下一个满员的机动装甲师，即第二十一“装甲师。而从那时起到6月初，西线德军的实力又迅速增长，达五十八个师，其中有十八个装甲师（包括党卫军第十七装甲步兵师）。

1944年6月6日，盟军由4266艘登陆舰艇，702艘护航战舰所组成的强大登陆部队出现在诺曼底海面。在天空上，5000多架战斗机、轰炸机摧毁了德军已弱不禁风的空军力量，并对地面德军的战略目标进行了轰炸，1.3万名伞兵在德军后方降落，凌晨两点，首批盟军士兵登陆成功，当天即有8.7万人从海上杀上了陆地。

德军的部署存在着明显的弱点，德军的预备队部署得太远。因此，在盟军实施登陆的头三天内，只有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以及“利尔”装甲师，与来自塞纳河右岸的第三四六步兵师一起赶到了战场。

盟军登陆部队的兵力迅速增长，到5月10日，他们已据有一个防守良好的、连成一体的登陆场，它的纵深足以保护登陆海滩不受德军炮火的袭击，并可为战斗机修建简易跑道。6月11日，美军部队占领了卡朗坦，打通了“奥马哈”和“犹地”之间的主要通道。由于增援部队的行动十分迟缓，德军无法制止这种局面的发展。德装甲部队于6月7日和8日发起的反击仅取得有限的进展，付出的代价却很大，总的来看，德军已难以在内陆保持一条完整的防线。沿海地区仍在坚守的支撑点也没有希望得到援救。

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和第十二装甲师在最初的几天顽强抗击着盟军的进攻，虽然他们的战斗力是一流的，但是在盟军强大的打击下损失惨重，党卫军以他们不同寻常的顽固奋力支撑着，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德军失败的局势，截止6月18日，62万盟军部队从诺罗底登陆，并向内地节节推进，纳粹德国的灭亡已势不可免。

正当美国人切断了科唐但半岛，开始向北部的瑟堡推进时。英吉利海峡突然刮起了东北风，根据气象家的经验在那个季节这是完全反常的现象。这次大风从6月19日一直刮到23日，八百艘舰船被吹上了岸（其中绝大部分是登陆艇），并毁坏了“奥马哈”海滩的人造港（建在“哥尔德”海滩的另一个人造港多少得到卡尔瓦多斯礁脉的保护，仍完整无损，并一直使用到冬季），最严重的是使卸载工作连续中断了四天。

当时，德国人没有利阑这次自然灾害，一方面因为他们对盟军所遭受的挫折还不清楚，另一方面因为他们的增援部队调上来的速度仍很缓慢。驻在诺曼底西南约一百英里的布列塔尼半岛上的第七十七步兵师的一支团战斗队，乘火车走了三天才走了三十英里，还损失了大批人员和物资。后来又步行了三至五天才到达作战地区。第二六五师的各个团战斗队沿公路步行，在五天内到达了离他们一百八十英里的前线，但他们的辎重用火车载运，走了七天才前进了一百英里，后来也不得不改由公路运输。

至此，最高统帅部一直未曾动用第十五集团军所属各师，但在6月20日，它命令该集团军集结六个装甲师向贝叶方向发动一次反攻，企图分割盟军登陆场；同时企图夺取奥恩河东岸的英军阵地。从交通运输情况来看，这些计划未免太乐观了。当时这六个师既不能迅速地集结（党卫军第一、第九和第十装甲师尚未到达诺曼底地区，“利尔”装甲师和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虽已在前线，但必须有步兵师接防，但这些步兵师尚未调来），也不可能得到充足的弹药供应（约需一万四千吨弹药）。德军计划于6月28日，由第五装甲集团军司令冯·施韦彭布格带一个新的参谋机构接管从德龙河（圣洛与考蒙之间）至奥恩河东部沿海的防御正面，其所辖兵力有第四十七、党卫军第一和第二装甲军，以及第八十六步兵军，后者是从驻在法国西南部的第一集团军调来的。第七集团军则防守德龙河以西地区，其兵力有第二伞兵军、第八十四军的残余部队和可能抵达的增援部队。

英军于6月25和26日发动进攻，计划绕过卡昂向南挺进，从而打乱了德军换防和集结装甲部队的计划。6月29日早晨，美军发动了一次局部进攻，牵制住了党卫军第二装甲师战斗队，结果，那天下午，冯·施韦彭布格能用于发动进攻的兵力只有党卫军第二装甲军（下辖党卫军第九和第十装甲师）。获得攻击奥恩河上的桥头堡的微小胜利之后，当天晚上党卫军第二装甲军的部队就停滞不前了。6月28日，多尔曼中将患心脏病死去，由党卫军豪泽尔中将接替他的职务。

6月29日，在贝希特斯加登召开了会议，没有作出任何决议，会议之后，最高统帅部命令取消一切进攻，固守所有防区。豪泽尔和冯·施韦彭布格向B集团军群建议撤离卡昂这个被包围的孤立地区，而在该城以南组织一道较短的防线，它不仅易于防守，而且在盟军舰炮射程之外。因为那时已没有什么障碍来阻拦盟军大型炮舰占据近岸阵位，所以它们能驶抵比预料的更靠近岸边的位置。它们喜欢从沉在浅水中的老式法国战舰背后射击，这艘法国沉船已被当作“阿罗门奇”人造港的防波堤使用。那时盟军已拣到并研究了一些德军飞机误投在陆上的水压水雷。这种水雷无法在水中排除，但它不能损伤航速非常缓慢的舰船。当然，对盟军舰船来说，被迫以很慢的速度行驶确实是件令人恼火的事，但总比被炸毁要好。

美军已于7月18日攻占圣洛，但恶劣的天气迫使他们推迟了好几天才发动从登陆场向内陆推进的最后一次进攻，这次进攻于7月25日开始，首先进行大规模空中攻击，几乎全歼德军防御部队，这里的防御配系的纵深比卡昂城地区的浅得多。起初布雷德利的部队缓慢而扎实地推进；后来攻势越来越猛。侦察机、战斗轰炸机、装甲兵和步兵之间密切配合协同作战。由于使用了带有铲除树篱工具的坦克，美军获得了德军所不具备的在乡村机动的能力。7月28日，他们占领了康坦斯，切断了第七集团军部分部队与外界的联系；7月30日，占领了阿弗朗什；次日，他们又突进至布列塔尼半岛。英军停止进攻后，冯

克卢格将第二和第一一六装甲师从奥思河调到了维尔河，但他们到得太迟了，德军第三航空队将它的为数不多的轰炸机部队统统集中起来轰炸阿弗朗什的一座桥，企图切断美军挺进可利用的唯一主要通道，但是徒劳。美第八军军长巴顿上将在三天内就指挥七个师通过了这个瓶颈状的狭窄通道，而后成扇形涌入布列塔尼半岛，8月4日占领雷恩，并在同一天抵达比斯开湾的瓦恩，这样就切断了布列塔尼半岛。向布哇斯特方向挺进的一个美军师，由于要肃清被盟军包围在迪南这个孤立地区的德军部队而不是绕过它，结果耽搁了一天时间。虽然只是一天时间，但是，当这个师于8月7日抵达布雷斯特这个重要港口时，德军早已将分散在沿海地区的部队都集结到这个城市，他们组织了充足的兵力打退了盟军的第一次进攻并一直守到9月18日。结果，盟军未能按计划于D日后三十五天使用这个港口。最早在8至9月份敷设的，从英国怀特岛至瑟堡的输油管，从英国怀特岛至瑟堡的海底输油管帮助盟军克服了部份后勤补给困难，这些困难是因缺少港口，铁路与公路被破坏，以及盟军机械化步兵部队的大量需求而造成的。后来，从英国至瑟堡又敷设了四条输油管，从英国至布洛涅敷设了十六条输油管。

美军其他几个师先向法国东南方向出击，然后挥师东进，8月1日逼近勒芒地区。由于具备地面机动优势和空中优势，美军对遭到连续打击的德军已形成有利的包围态势。冯·克卢格和他的陆军指挥官计划退到一条更短的防线上（大致从塞纳河经荣纳省至瑞士前线），并利用剩余的机动部队实施有力的后卫战来迟滞盟军的挺进。从军事观点看，这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好措施。可是，自上次谋杀事件发生以来，他们已无法再接近希特勒，希特勒拒绝考虑这个计划，并严格命令他们将各个装甲师集中起来对莫尔坦至阿弗朗什一线发动进攻，分割向内陆推进的美军部队。希特勒答应派几百架战半机去支援，但8月7日发动反攻时却一架飞机的踪影也不见。那天凌晨，在

浓雾的掩护下，党卫军第二装甲师进展顺利，攻占了莫尔坦并向阿弗朗什挺进了约一半路程，第一一六、第二、和“利尔”装甲师的残余部队也随后跟进。其他几个师担负掩护德军楔形地区的翼侧的任务。几小时后，天气转晴，德军遭到空袭，停止挺进。党卫军第二装甲师在美军的强大压力之下只好慢慢地边打边撤，四十八小时之后，退至原来的阵地，然而，此时美军和英军已分别从南、北两面发动进攻。希特勒命令重新实施突击，并禁止任何撤退行动；结果，经过十天的殊死战斗，第五装甲集团军和第七集团军的残部几乎全被盟军包围在法卢兹的“口袋”中。冯·克卢格元帅未经希特勒许可，下令撤退，党卫军第二装甲师和其它装甲部队从盟军的包围圈中打开一条狭窄的通道，使相当一部分人员得以突围。冯·克卢格元帅因不听希特勒的命令而被撤职，他在返回德国的途中畏罪自杀。

8月18日，盟军渡过塞纳河，8月25日解放了巴黎，盟军直逼德国本土。

被希特勒认为可创造奇迹的党卫军再也没能让希特勒获得一次胜果。在1944年下半年希特勒对盟军的最后一次反攻——阿登战役中，党卫军第六装甲集团军又充当先锋，然而也在取得一些微小的战果后，全面失败。

第四节希姆莱亲自上阵

在这时，希姆莱的地位受到了马丁·鲍曼的挑战。

当时，党卫队中最野蛮残暴的埃里希·科赫，已从乌克兰波撵回老家东普鲁士。科赫作为纳粹党东普鲁士区的德国防卫长官自诩为该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不受武装部队和党卫队掣肘，因为他不把这两个部门放在眼里。他不征询莱因哈特大将领导的集团军的意见，擅自派人挖掘防御阵地，建立一支以残废者、老人、未成年的少年组成的私人部队，名为“人民冲锋队”。他还征用东普鲁士为陆军从事生产的军火工厂，拒绝任何人给他的人民冲锋队在军事上出主意。东普鲁士防卫长官科赫甚至同领袖大本营讨价还价，获得了希姆莱为自己及其部下所要求拥有的职权。这位纳粹党区领袖可以支配军官和士兵，并且派人搜捕开小差的官兵。

科赫的这种由半瓶醋加上妄自尊大取得的胜利，启发了希特勒和鲍曼，决定不遗余力地使德国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古德里安曾经建议，在东部建立一支归陆军领导的地方冲锋队，希特勒将这一建议改为按照科赫的样板，搞一支由党直接控制的人民冲锋队。人民冲锋队的首领是马丁·鲍曼。9月26日，鲍曼指示纳粹党各区领袖，立即准备着手建立人民冲锋队。三个星期后，在莱比锡各民族大会战（1813年10月18日）纪念日这一天，由希特勒发布一项公告，人民冲锋队正式成立，但纳粹政权这一最后的疯狂挣扎的行动同时也削弱了希姆莱的权力，因为补充军总司令只授权监督人民冲锋队的组织、训练和装备事宜，而征召新兵和政治领导则由鲍曼负责。

此外，鲍曼还懂得怂恿希姆莱的另一对头约瑟夫·戈培尔，来反对党卫队头子。在7月20日以前，中央宣传部长还指望：“希姆莱抓军队，我抓民兵作战！这样结合起来，能对我们的作战以新的促进”；但是在行刺希特勒事件以后，戈培尔看出鲍曼的实力更强大了，于是站到了鲍曼一边。鲍曼因此执意任命宣传首脑为负责总体战兵方调配的中央全权代表。12月，戈培尔奉命负责检查武装部队的兵力，以向领袖大本营提出调动部队的建议——这是再一次明显地侵犯补充军总司令希姆莱的职权。

不过，尽管如此，鲍曼仍然畏惧希姆莱的权力，只要党卫队头子依然出入领袖大本营，并对全国党务书记官在暗中出点子展开斗争的话，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把希姆莱从独裁者的贴身圈子中排除出去。鲍曼想了一个主意。他知道，这个早先的见习士官希姆莱私心渴望有一天担任作战部队的统帅；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个兰次胡特的文科中学生一直对所谓前线经历未能如愿以偿，他梦想过统帅生涯。马丁·鲍曼设法满足了他这个愿望——从而导致了希姆莱的没落。

11月底，英美军队进入阿尔萨斯，迫使德国第十九军团退缩到莱茵河左岸的一个桥头堡。形势需要在河的右岸配置一支截击部队，以便一旦第十九军团进一步撤过莱茵河时收容其残部，并阻击敌人的进攻，领袖大本营决定，在卡尔斯鲁厄和瑞士边境之间的地区新成立一个集团军。这时，鲍曼建议，任命希姆莱担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

希特勒和鲍曼提出希姆莱为这支解围部队的指挥入选，很合胆战心惊的军人们的胃口：希姆莱是唯一能给新建集团军配备兵力的补充军总司令，再说身兼警察总监的希姆莱在第一线担任阻击任务也最合适不过了。

12月初，希姆莱被任命。这位喜形于色的“上莱茵总司令”没有觉察，

鲍曼递给他的是一把刀口向上打开的刀子。现在，希姆莱终于可以实现青年时代的梦想了。现在，希姆莱元帅将要给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一个伟大转折了。起初，他还想以他的勤勉和组织才能蒙骗一些士兵。他在短期内建立了一条阻击线，动员他的补充部队加入上莱茵集团军，并很快就掌握了一支由他的补充军人员、人民冲锋队队员、边境海关防卫人员、高炮兵助手和东方步兵营拼凑起来的五花八门得出奇罕见的武装力量。而且尽管迷信得不敢走出设在黑森林的战地指挥所，他还是准备跟敌军激战一场，不过，他目前仅满足于对内部敌人取得的一些微小的胜利。他以所谓无能为理由，解除军司令和团司令的职务，拒绝集团军在任何一点上服从负责整个西线总司令的领导。

他已经坐在自己大本营里在纸上进行着西部的决战，但却没有觉察到，他在党卫队和国家内的统治业已分崩离折。党卫队全国领袖隐身在黑森林中，这使某些党卫队领袖们感到振奋，他们跑到显然比希姆莱更有权势的对手鲍曼那里去寻求自身的运道。投靠对手的倒戈者不乏其人，其中具有影响的党卫队员，例如希姆莱派驻领袖大本营的私人代表、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赫尔曼·菲格莱因，他与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蕾特结了婚；还有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副总指挥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

德国中央保安局局长的倒戈不是没有讽刺意义的，在海德里希死去后，希姆莱于1943年1月将党卫队第二梯队领袖人物的林茨律师卡尔登勃鲁纳召到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以阻止再出现一个海德里希。当时几乎谁也不认识这个瘦长个子、满脸疤痕、连续不断抽烟的卡尔登勃鲁纳。同事们要问起他的经历，得到的回答是，他先前负责党卫队多瑙河地区总队的领导工作。他的飞黄腾达完全是夤缘时会，1938年以前，奥地利的准法西斯警方制服了他的一个个前任。此外，希姆莱注意到让卡尔登勃鲁纳的权力小于前任海德里希。党卫队头子事先已把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人事权和经济问题主管权拿了过来，将其交给党卫队内部的两个竞争者，即党卫队的人事处和经济管理总处。

卡尔登勃鲁纳到职视察时，发现这个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各处处长竟比新主人具有更高的权威。他被他那些各自为政的各处处长“常常抛在一边，许多事情只是在事后才了解”，卡尔登勃鲁纳有一次向他早年的同学斯科尔兹内诉苦说。这个解救墨索里尼的人记述道：“我感到，这个人似乎……并不完全心情舒畅。”不过，德国中央保安局新局长率直得有些过分的奥地利式的魅力，并不能掩饰卡尔登勃鲁纳迫不及待地要夺回他前任的权力。1944年，他已被公认为黑色集团的第二号最有权势的人物，甚至希姆莱有时也对卡尔登勃鲁纳的一双粗糙、不加修饰的手感到畏惧，这双手曾经使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吓得心惊肉跳。

但是，与鲍曼的结盟确保卡尔登勃鲁纳拥有海德里希从享受过的特权。德国中央保安局的主人成了领袖大本营的常客直接听取希特勒的命令，不用再经过希姆莱转手。过去从未过的事情是：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有职有权，似乎他执行德国中央保安局的政策只对他的领袖负责。

希姆莱的忠实部下理解卡尔登勃鲁纳的倒戈意味着什么。他们提醒全国领袖注意鲍曼集团的阴谋，并力国使希莱抛弃他的统帅美梦。1944年12月21日，戈特洛勃·伯格在致希姆莱的信中写道：“我请求您，尽可能在短期内结束上莱茵总司令的活动，重返领袖大本营，我的这项请求不仅仅是

鉴于某些方面在竭尽全力推波助澜地制造谣言——党卫队全国领袖已失宠，武装部队凯特尔已赢得了胜利——而是因为发现，党卫队全国领袖不在大本营，我们的政治工作……已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失。”在武装党卫队宣传队的“库特·埃格斯”旗队中，忠于希姆莱的人也都感到不安。旗队长冈特·达阿尔克文派他的军官草拟了一份致希姆莱的条陈，要求党卫队必须结束“鲍曼垄断”的局面。

然而迷恋统帅威风的希姆莱对接连的报警呼吁置若罔闻。他对自己的王储地位感到十分可靠。他坚信，自己有权当希特勒的继任人——直到后来，他才认识到，1945年5月2日深夜至3日凌晨，他将这一认识使用不同的表达方式写信告诉了党卫队副总指挥贝斯特：鲍曼和最高统帅部是使用了伎俩制服他的，他们交给他军事指挥权，只不过是為了让他失败。1944年底，他还不愿相信这一点，那时，他感到当统帅是有前途的。1945年1月初，正当他有机会显示其作战素质时，他是多么醉心于表现自己啊！

在一次规模有限的反攻当中，某友邻集团军部队的两个快速师成功地在阿桥格诺突破了法国的马奇诺防线，挺进到阿尔萨斯的北部。这个战果激励希姆莱制定了一项好大喜功的计划：他在领袖大本营提出建议，将这两个师划归他指挥，让他率领这些部队去收复斯特拉斯堡。他坚决要求他的第十九军团还要在阿尔萨斯中部保持一个桥头堡，只要拨给他这两个师加强他在阿格诺地区的力量，攻克斯特拉斯堡是不困难的，领袖大本营不顾西线总司令的反对意见，批准了这位统帅的方案，高级将领希姆莱火速发出了命令。

阿格诺的两个师沿着莱茵河动作迟缓地向南运动，在它们还未来得及进入新阵地之前，盟军在北阿尔萨斯受挫后稳住阵脚。尽管这样，美国军队仍然遭到希姆莱猝不及防的攻击，希姆莱的部队已进逼到距离斯特拉斯堡不过几公里的地方，致使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打算放弃城市，并将他右翼的部队撤至佛日山后面。但斯特拉斯堡市长弗雷表示抗议，于是盟军据城市固守。德军攻势已急，1月20日，盟军开始反攻，扫掉了希姆莱部队去莱茵河西岸的所有桥头堡，并在一个月后将最后一个德国士兵撵到了莱茵河东岸。

就在希姆莱这位统帅预兆行将败北的时候，鲍曼又为他的对手安排了一个作战指挥任务。这个任务必然使党卫队头子更深地卷入这个日趋败亡政权的军事灾难，并成为疑神疑鬼的独裁者不得不发泄怒气的对象。希姆莱接受了一支新的影子部队，这一次是上东线：维斯杜拉集团军。

1945年1月12日，苏联人展开了不久以前还被希姆莱一笑置之的攻势，事实证明这是世界军事史上最强大的一次攻势。三百万红军向着七十五万装备低劣的德国士兵压将过来，在短短几天内就摧毁了几乎整个德军的防御线。苏联元帅切尔那亚科夫斯基和罗科索夫斯基的集团军直指柯尼斯堡和但泽，而苏军中路攻击部队的朱可夫元帅占领了德国专区瓦尔特兰，科涅夫则挺进到萨冈，德方防御者惊慌失措：行列长长的溃逃士兵、被强奸的妇女的悲号声以及特别军事法庭发出自杀性的愤怒喊叫，在这一片混乱声中，东普鲁士直到海岸的狭长地带已全部丢失，北方集团军遭到了沉重打击。

苏联攻击部队在德军北方和中央集团军之间进行突破，将东北方面防线撕开了一个大缺口。翼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地区任凭苏联军队驰骋。七零八落的战斗部队、补充部队和人民冲锋队没有统一的指挥，几无任何防御可言。因此，参谋总长古德里安于1月23日建议，在波美拉尼亚配备一个新的

集团军司令部，由它负责迅速把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现有的部队集中起来，并建立一条防线。这支“维斯杜拉集团军”可由陆军元帅冯·魏克斯男爵指挥，由于巴尔干战场的缩小，他的司令部早已空闲无事。

希特勒表示同意，但是独裁者对古德里安为这支新集团军推荐的统帅候选人“感到厌恶”。他知道有一个较为合适的人：希姆莱。唯有党卫队头子可以考虑担任这个地区的保卫工作。古德里安不同意这种看法。“我对这一明显的失策感到惊讶”，参谋总长记述道，“我竭力进行争辩，以扭转对于不幸的东线采取这种胡闹的做法，一切都是徒然。希特勒断言，希姆莱在上莱茵地区干得非常出色。他手里有补充军，因此可以直戳了当地动用他的兵源。”当古德里安试图至少给这个外行战略家配备几个有经验的总参谋部的军官时，独裁者也不同意给以这种支援。希姆莱挑选了一名果断的、但不熟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武装党卫队装甲部队将军担任自己的参谋长，即旅队长海因兹·拉麦丁，并且给自己身边配备了另外一些党卫队领袖，直到后来，他才接纳陆军军官担任幕僚。

不过，这个于1月24日在多伊奇—克罗内设立起战地指挥所的人物，当时在上莱茵还大做其荒唐的统帅之梦时所具有的妄自尊大的信心现已不复存在。他来到东线并非没有忧虑；恐惧感紧紧抓住了他。他畏惧独裁者喜怒无常的性格和报复狂。希姆莱很清楚，不把多年经营的赌注统统押上去，他是一定要再次吃败仗的。他必须分秒必争，立即和时刻取得战绩，他既是惶惶不安，又有莫名其妙的怒火，急匆匆地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他把最后一批补充军部队调来，派出党卫队和警察行动队去搜寻还能作战的士兵，拼凑新的武装党卫队部队，不过这些师只拥有旅的兵力，还把经过考验的党卫队将军如副总指挥施坦因纳调到他的集团军里来，他缺少有作战能力的部队，他就以“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的空洞口号、英勇善战的大话，在老百姓的面前装成实力雄厚的样子，对于这种虚假实力就连希姆莱自己也不会相信。“我们担负的任务”，他对本集团军的将领和师长训话说：“是我们祖先对付阿瓦伦人、蒙古人以及在东南部对付土耳其人和鞑靼人曾经上百次完成过的。当年唯一可靠的盟友也是自己的力量和勇敢的心。”他通过党的机关报《波美拉尼亚报》宣布：“对现有兵源和武器的挖掘和利用，以及将后方的全部力量投入战斗，正在出现奇迹般成绩。南波美拉尼亚居民已认识到当务之急，前线屹立不动，并将不断增强实力。”

希姆莱尽管自吹自擂得很热闹，但也无法掩盖他正在走向一场灾难。这个迷信的冒牌统帅是第三帝国统治者中最相信星相和听信占卜家的预言的人，他眼见自己晦星高照。希姆莱刚想派出党卫队第十集团军在奥得河—瓦尔塔河河曲地区阻挡住苏军向奥得河的挺进，尚未付之行动即已宣告失败，1月29日，朱可夫的部队出现在奥得河阵地旧有的坦克工事前，并且迅速占领了阵地。希姆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试图发动反攻来挽回奥得河的失利，他把自己最精锐的党卫队部队调到施奈德米尔地区，从侧翼进攻朱可夫的部队——这次毫无希望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遭到失败。德国人被迫继续后退，希姆莱统帅连续败北，再也没有把握得到领袖的恩宠，便托病规避。他日益频繁地造访青年时代的朋友、这时在霍恩吕兴负责党卫队一所军医院的卡尔·格布哈特；而在战地指挥所里，总司令希姆莱也只在几个小时里面才接见部属，到了晚上十点钟，对于他来说战争已完全停止——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打扰这位贪睡的高贵人物。

希姆莱自动偃旗息鼓，使参谋总长古德里安有了借口，拼凑维斯杜拉集团军的余力进行一次决战。他计划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出其不意地向苏联部队进行突击，将其击溃在瓦尔塔河以北，肃清波美拉尼亚境内的苏联人，从而确保与西普鲁士的联系。为实现此项目标，古德里安想派瓦尔特·温克将军去希姆莱司令部担任作战指挥。大概古德里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实际上排除身为作战指挥官的希姆莱，2月13日，参谋总长在总理府向希特勒报告了这项计划，可是独裁者立即看穿了古德里安自私的打算。当独裁者跟参谋总长就党卫队头子的军事素质进行争论时，希姆莱神色尴尬、面容苍白地坐在一旁倾听。争辩者嗓门越来越高，言词越来越尖锐。

古德里安：“温克将军一定得去全国领袖司令部负责指挥，否则就无法保证这次进攻的胜利。”

希特勒：“全国领袖足有能力指挥这次进攻。”

古德里安：“全国领袖缺乏经验，没有一个合适的司令部，不能独自指挥这次进攻，为此温克将军是断不可少的。”

希特勒：“我不许您在我面前责备全国领袖不能承担他的任务。”

古德里安：“我不得不坚持温克将军去集团军司令部担任指挥，以便恰当地领导这次作战行动。”

争论双方拉开嗓门对吵了两个小时，互不相让。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踱来踱去，突然在党卫队头子的面前站住。希特勒说：“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天夜里就上您的司令部去，指挥这次进攻。”他向古德里安瞅了一眼，然后微笑道：“请吧，您继续报告下去。总参谋部今天已打胜了一仗。”

希姆莱权力的末日开始到来了。古德里安的计划虽然遭到失败——四天后，温克遭遇车祸，进攻失利，但参谋总长坚持不懈地设法使东部陆军摆脱希姆莱的控制。他两次向希特勒提出要求撤换维斯杜拉集团军总司令，独裁者两次不予同意。这时古德里安绝望之余想了一个计划：他亲自出马去劝说希姆莱辞职。但是，当他找到指挥所——这时已迁至普伦茨劳——要求通报见集团军总司令时，古德里安获悉，希姆莱患了“重感冒”，已躺在他的朋友格布哈特的医院里好几个星期了。拉麦丁旅长问大将：“您能把我们从我们总司令的掌握下解救出来吗？”

古德里安能够做到这点。3月18日，他出现在希姆莱的面前，当希姆莱认出来访者的时候，他咳嗽着，害羞地缩进鸭绒被里去。但是古德里安婉言对党卫队头子劝慰一番，并向他断言，大家完全理解，全国领袖担任了不少重要领导职务，不必再为一个集团军司令官的琐碎工作操劳，特别是他的健康状况又这么不好，这位吃了败仗的统帅一面听他讲话，一面再次大吃一惊。他喃喃自语道，领袖会怎么说呢，充满期待地望着参谋长。古德里安表示给予帮助：要是全国领袖没有顾虑，那么他古德里安可以主动请求卸去全国领袖的集团军指挥职务。1945年3月20日，这件事情终于实现。希特勒几乎漫不经心地同意了这项提议，委派第一装甲军团司令戈特哈德·海因里希大将接替党卫队全国领袖对维斯杜拉集团军的领导工作。希姆莱的统帅之梦破灭了。

几乎谁也没有料到，1945年3月20日这一天竟显露了：海因里希·希姆莱向其毕生崇拜的偶像告别，背离这个身穿党卫队外衣的神秘主义者为之奉献最残忍的鲜血祭品的上帝，同任何作者都无法如此程度编造的弥天大谎者告别了。从1945年3月20日这一天起，希姆莱打算挽救他认为还可挽救

的东西，他自己的生命，集团，一种阴暗的、飞黄腾达的幻想。当然，要说他不遁入一个新的梦幻世界的话，那他就不成其为海因里希·希姆莱了，因为他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是促成和平、领导摆脱希特勒的战后德国的合适人选。

3月22日，海因里希大将在任命后来到普伦茨劳司令部向他的前任报到。希姆莱神色尴尬地让他过目移交给他的家底，但是当这位军人请求全国领袖作一次“一般政治性讲话”时，希姆莱又恢复了原先的信心，他的神态判若两人。权势显赫的党卫队的主子缓缓转过身子，挽住海因里希的胳膊，审慎地把他带到自己的司令办公室一角的沙发上。希姆莱低声说：“现在我们跟西方敌对者进行谈判的时候了，我已为此采取了行动，我的联系人已接上了头。”

第五节希特勒遗嘱：开除希姆莱出党

1945年4月，德国柏林。

希特勒是在上年11月20日由于苏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从此，他除了短期外出指挥那场冒险的阿登战役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柏林。如今总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厅已被盟军炸成废墟了，他就在下面五十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和摇摇欲坠的第三帝国。

自从7月20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党内老伙伴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都欺骗我”，3月里他向一位女秘书这样发火道，“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人？”

也许人们会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还在大谈继承人问题，未免不够实际，但在纳粹疯人国里，人们却不这么想，不但“元首”为这个问题大伤脑筋，而且那些主要继承候选人，也为这个问题着了迷。

虽然苏军已经打到了柏林，西方盟军进入了德国本土，可怕的末日已迫在眉睫，但是希特勒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顽固地盼望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如此。

4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元首”喜爱的一本书，这就是卡莱尔著的《腓特烈大帝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2月15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将要放弃战争，贩毒自尽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读的：

“英勇的国王！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开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二月十二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写的书的鼓舞之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室”的档案里，调了两张顶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4月6日对败退中的士兵们发出了动听的呼吁：

“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质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

4月12日，当这位宣传部长深夜从奥得河前线回到柏林的时候，皇家空军把这座都城的市中心又炸成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饭店的废墟在焚烧中。在宣传部大楼的石阶上，一位秘书迎接戈培尔并告诉他一件紧急消息：“罗斯福，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广场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戈培尔面色忽然开朗，精神一振。

“把最好的香槟酒拿出来！”戈培尔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希特勒在马路对面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他拿起电话机。

“我的元首”，戈培尔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4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月13日，转折点

到了！”

纳粹头目们欣喜若狂，他们认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的刹那间，把第三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千真万确的迹象！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

4月15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她做他的情妇已有十二年了。希特勒对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非常喜爱，但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这位纳粹领袖在战争年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和没完没了的打扮，为了那远离的情人而憔悴。

她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父母是巴伐利亚人。纵然希特勒是国家元首，她的双亲当初坚决反对她与他的暧昧关系。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慕尼黑开设的照像馆工作，霍夫曼将她介绍给希特勒。这件事是在吉莉·拉包尔自杀以后一、二年发生的。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曾经是他一生中热恋的对象，爱娃·勃劳恩看来也常常被她的爱人逼得要发狂，虽然她的情况与吉莉·拉包尔有所不同。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离之苦，他们在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要想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暧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忠实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希特勒死在一道，她同戈培尔夫妇一样，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里。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位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但是很显然，希特勒对她的影响却是全面的，深刻的。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也是迅速崩溃的各个战线进一步遭受灾难的一天。所有纳粹头目戈林、戈培尔、希姆莱和里宾特洛甫都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和约德尔等。他们向“元首”祝贺生日。

尽管情况不妙，“元首”并非特别沮丧。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将军们比他更了解情况，都劝他离开柏林到南方去。他们解释说，一两天苏军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后逃生之路切断了。希特勒迟疑不决。最后在将军们的敦促之下，同意建立南方和北方两个分开的司令部，当天夜里，大批人员撤离柏林。希特勒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戈林和希姆莱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他的豪华公馆运出的金银财宝。这两个纳粹头目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的领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但是希特勒却没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给党卫队将军菲里克斯·施坦因纳，叫他向柏林南郊的苏军发动全面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中的地面部队全部投入战斗。“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道，“都要在五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要投入战斗。”

发布命令的当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纳反攻的消息。这是多么脱离现实的奢想。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做。这次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位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当他最后被迫正视现实时，风暴就大作了。

4月22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开始一直到下午三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甚至连施坦因纳的影子也找不到，更不要说他的部队了。

希特勒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他尖声叫道，每一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的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威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阅文件，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捡出来交给副官带到上面花园中去烧掉。

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残余军队。他自己要与柏林共存亡。至于说到“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

早在1941年6月29日，希特勒就发布命令，规定戈林为他的继承人。现在，当戈林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小心翼翼地给“元首”打了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鉴于您已决定冒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在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十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的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佑您，使您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

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希望通过瑞典与西方盟军最高统帅部联系，表示德国愿意向英美投降，而对苏军继续抵抗。“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昵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但是，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23日夜，苏军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然而他仍要表明，只要他通过地下室的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平定“叛国阴谋”，即使是他的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希特勒看到戈林的电报，怒不可遏，他大骂戈林，说他腐化、吸毒、已经完蛋了。然后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4月28日是地下避弹室十分难熬的一天。苏军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从东面、北面以及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中。当希特勒从无线电中听到，英国广播公司说希姆莱正与美方洽谈投降的消息时，像疯子似地大发雷霆。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

室一时鸦雀无声。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他对周围的人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在他的掌握之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责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她妹夫的性命。

“可怜的阿道夫”，爱娃对希特勒的一位女侍从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希特勒在盟军进攻柏林的隆隆枪声中，和他的情妇爱娃举行了婚礼。并立下遗嘱，遗嘱说：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 并剥夺 1941 年 6 月 29 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在开除了“卖国者”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组成入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赛斯-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

交待了这些之后，时间是 4 月 29 日，星期日，早晨四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了字。随后他又迅速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说，“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并希望他们的遗体在总理府立即火化。

两天后，希特勒和爱娃双双自杀。

邓尼茨领导的支离破碎的政府，也在 5 月初向盟军投降。

1945 年 5 月 8 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 1939 年 9 月 1 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了解放后的和平欢乐。胜利的礼炮，和平的烟火，映红了柏林城，照亮了整个欧洲大地。在这五年八个月零七天中，在一百个战场上，在一千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有千百万的男女被屠杀；更多的人在纳粹毒气室里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苏联和波兰的死人坑的边沿上被杀害，这一切都是希特勒的征服野心所造成的结果。

第六节 一代恶魔服毒自尽

当海军元帅邓尼茨的残缺帝国也土崩瓦解时，希姆莱知道，他已是一个什么都输光了的人。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看出这个强自镇定（希姆莱说：“纪律，我的先生们，纪律”）的党卫队头子心里盘算着什么。伯爵劝告希姆莱，“原来的党卫队全国领袖可不能改名换姓和贴上假胡须给别人抓住！除此，您别无其他道路可走。这样您就必须对您的队员承担责任。”

但是，希姆莱想到的唯一办法，恰恰是伯爵警告他不可以做的那个办法。1945年5月10日，希姆莱戴上一只眼罩，穿上一套野战秘密警察的制服，揣着一张名叫海因里希·青格尔的身份证，这个人面部特征酷似希姆莱，是经人民法庭判处死刑的犯人。随后，党卫队领袖就开始潜逃，企图逃脱历史的惩罚。5月10日，希姆莱离开弗伦斯堡，向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东海岸的马恩进发。他们走了10天。随后，希姆莱和他的随从继续赶路。他们有时在火车站寄宿，有时则露宿旷野。希姆莱当时考虑的是如何通过和盟军谈判保住他的地位、是他留在德国南方的他的两个家（妻子与情妇）的命运。

E 党卫军的这支小部队来到易北河口时，不得不把他们的汽车丢弃。这时还有谁留在希姆身边呢，有勃兰特教授和卡尔·格布哈特教授，党卫军上校维尔纳·格罗特曼，奥托·奥仑道夫，党卫军少校马彻，再就是党卫军分队长约瑟夫·基尔梅尔。他们全都摘下领口上的徽章，化装成交通警。

这7个人付了500德国马克的船钱，混在逃难的人群中，没被人认出，渡过了易北河的小港湾。他们开始步行。5月21日，在走了约150公里后，他们来到不来梅港。在这儿，他们被英国人设的关卡拦住。一卫兵发现他们的身份证做得极好、极新，图章过多，便产生了怀疑，遂将他们扣押。他们被监禁在菲林布斯台尔的兵营里。

5月23日14时，一辆汽车将这7个行迹可疑的人运到威悉河畔靠近尼恩堡的科尔哈根031号兵营。16时，有人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塞尔维斯特上尉。这7人中的3人要求与上尉对话。上尉接见了他们。3人中最矮小的一个取下他的黑色蒙眼布条，戴上眼镜，碰了一下脚后跟，说：“我是海因里希·希姆莱。我有紧急的事情要与蒙哥马利元帅谈！”

塞尔维斯特上尉将情况报告了他的上级。在等待答复的时候，他拿给希姆莱一套英国军服，但希姆莱拒不接受，因为他害怕穿着这身衣服被拍照。希姆莱被命令把衣服脱得精光，穿上英国人送给他的一件衬衣、衬裤、短统袜。有人对希姆莱的衣服进行认真仔细的检查，从他上衣的衬里里发现了一瓶毒药，此外没有发现任何其他毒物。

一个还可能有另一瓶毒药的念头困扰着上尉，使他两眼直盯着他。他后来说道：“我派人找来一些家制面包、夹干酪面包片。还有茶给希姆莱吃喝，借以观察他会从嘴里取出什么东西。他吃饭时，我一直在监着他，但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外。他装得很是规矩、老实，使我觉得他似乎已被征服了。他打算交待问题，有时还显得近乎活跃，一开始，他像是病了，但吃过东西、洗过澡之后（不允许他刮胡子），就完全恢复了活力。在我监视下的8小时内，他总是一再打听有关他的同伙的消息，对他们的命运显得很是关心忧虑。我难以想象，他就是战前及战争期间新闻界所说的那个极端骄横残酷的人。”

这位彬彬有礼的“教员”难道又恢复了他的本性？

到了晚上，蒙哥马利元帅情报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墨菲上校来了。他

决定用汽车将希姆莱带到离 031 号兵营约 15 公里远的第二军团总部，并由情报部门的官员押送。来到讯问中心后，希姆莱被交付给上士埃德温·奥斯丁看管。在旁边的办公室里，墨菲听 031 号兵营的军官汇报情况。他突然问：

“我想你们是对他搜查过了。在他身上可有毒药？”

“是的”，塞尔维斯特上尉回答，“在他上衣里子里，有一小瓶毒药。此外，再无发现。不管怎样，他都不可能自杀。”

“我希望是这样。”墨菲说：“可你们想过要在他嘴里仔细搜查一下吗？没有吧？那好了，马上检查他的嘴。他放在口袋里的毒药很可能是为转移人们的注意力用的。”

有人当即把希姆莱带来，命令他张开嘴。刹那间，惨剧发生了。目睹当时情形的乔·吉·海德凯和约翰尼斯·利布说：“只不过一秒钟的工夫，他（希姆莱）的身子就僵直了。他的眼睛缩小，上下颌拌动着。过了片刻，他就重重地栽倒在地上，医生立即跪下，用力把他的牙齿掰开，把手指伸进去欲将氰化钾胶翼的残物从牙龈上取出来，上校墨菲大声嚷着。另一个医生跑过来，给已失去知觉的俘虏灌大剂量的呕吐剂，随后又给他洗胃……”

然而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折腾了 12 分钟后，医生们只得认输：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死了。如同赫尔曼·戈林后来在纽伦堡所作的那样，他宁可服毒，也不愿死于战胜者的麻绳之下。

两天后，这位令人毛骨悚然的党卫军总头子葬于吕纳堡郊外的荒野里。他的尸体用英国军毯裹着，外包一层金属网，再用电线捆起来。上士奥斯丁，服役前是个清洁工，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给希姆莱挖了墓穴（以后没有任何文字泄露这一秘密）。战后，尽管有人为找到这块地方愿付出巨款，可奥斯丁始终拒绝泄露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的墓地位置。

据说希姆莱出逃时，他的“奔驰”汽车拉着的那个巨大的希姆莱人事档案铁皮箱被隐藏在普伦 14 湖地区的玛朗特古堡和卡尔科斯特之间的某个地方，可后来人们一直未能找到。14 湖湖底的泥沙将永远不会向世间显示这个箱子。黑衫队和盖世太保头子的秘密之物现在想必已腐烂了。它们那对人说来常常是凶险莫测的影响再也不复存在了。

希特勒、希姆莱、党卫队作为人类罪恶的一部分，永远地被钉在了耻辱柱上。

尾声历史不会沉默

时为 1945 年 5 月 23 日，海因里希·希姆莱死了，党卫队的历史宣告结束。在众神末日的熊熊烈火的烟雾中，黑色集团树倒猢狲散，一个时代的最恐怖的工具和缩影消失了，在党卫队镜中图像里显示出来的这个时代说明，醉心于权力、国家万能、个人崇拜和不加判断的虔诚能把人们驱向哪里。

只有少数党卫队的领袖效法他们集团首领的榜样，结束了他们自己的生命。屠杀犹太人的刽子手格洛博斯尼克服毒自杀；党卫队最高医生格拉维茨拉响两颗手榴弹将自己和家小炸得血肉横飞；施滕内斯的告密者康蒂在纽伦堡监狱中自杀；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弗里德里在希一威廉·克吕格尔在东部地区自戕；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弗里德里在希姆莱指挥所不远的地方自尽。盟国军事法庭和欧洲人民法庭抓住希姆莱的一些重要助手，加以惩处。被处决的一些党卫队领袖有：奥斯维辛集中营长官霍斯；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弗里德里希·耶克尔恩和劳特尔；中央主管处局头子卡尔登勃鲁纳、波尔和达吕格；特别行动队长奥仑道夫和瑙曼；名誉领袖格赖泽尔、福斯特尔和赛斯—英夸特。不过大部分的党卫队领袖得到宽大得出奇的处理。三十名党卫队兼警察高级领袖中活下来的有十六人；十二名中央主管处局头子活下来的为八人；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六名部门负责人中活下来的为三人；在苏联执行过任务的八名特别行动队中活下来的为三人。这些活下来的人绝大多数被判处徒刑，但后来得到赦免和释放。党卫队地狱里的几个最凶狠残暴的家伙逃脱了，首先是艾希曼，不过他在 1960 年被以色列特工人员缉捕归案，两年后在耶路撒冷被处以死刑，他的一些重要帮凶仍消声匿迹，计有：阿洛伊斯·布龙纳、京特、丹内克尔、勒特克——同样还有秘密警察盖世太保头子缪勒和集中营督察员格吕克斯。

但大部分党卫队员进了俘虏营，等待他们的命运是，对他们既不能判处严刑，也不能轻易开释。在盟国俘虏营的木头营房里和集合点名的操场上，从此展开了无休止的辩论：失望者和失败者的辩论，顽固不化者和死抱住昨天不放者的辩论，感到羞愧者和精神崩溃者的辩论。罪过和赎罪折磨着他们，并且提出一个尖锐深刻的问题，即具有热情和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怎么会变成丧心病狂的强权工具，怎么会变成一种反常的忠诚和荣誉概念的奴仆，这种概念使党卫队的每个成员都成为在道义上驯服执行领袖意志的人员。

无疑，他们可以自己掂量，并以一种集体犯罪的论点来减轻自己的罪责。因为在一百万党卫队员中也许有五万名参加了残暴的罪行。但是有些提出问题的人不满足于这样的解答，他们进一步探究：不，他们身上有过某种东西，这种东西使得他们对野蛮行径，对于披上爱国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外衣的、小资产阶级狂热的权力狂缺乏免疫力。党卫队编年史就像一部电影，再次一幕一幕地在他们眼前映过。他们讲述被毁掉的一代人的历史，这一代人在反对资产阶级的对文化恶习的黑色厌世主义中成长起来，受到一个许诺给他们提供原始人团体的经历和冒险集团的引诱，而去为一个所谓天才的人和一种思想效力。

他们加入了佩戴党卫队标志的集团，因为这个集团满足了德国人的两种古老的渴望；参加一个军事团体，可望得到荣誉、保障以及尚武的光采，并且成为一种秘密中坚、万能的秘密集会的一部分。的确，就许多德国人来说，他们对政治和政府的想象，除了视为神秘力量、秘密团体和灰衣主教的统治

外，别无其他。黑色集团满足了这种白日梦想，谁加入了党卫队，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为民族的主人，成为肩负民族社会主义国家重担的、菁萃贵人的教派成员。

他们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相信人们对他们进行的说教：民族共同体；为祖国效力；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而他们根本没有发觉，这个菁萃贵人的集团一步步地堕落为棍棒卫队的水平，除了充当走卒为一个丧心病狂和反复无常的独裁者及其集团效劳外，没有任何其他目的。1934年6月30日屠杀冲锋队的这一天，产生了党卫队内部的不幸。从这时起它开始步入深渊的行程，急剧地毁灭一切：自由、正直、人性和最终也毁灭了黑色信徒追随者们一直挂在嘴上的“帝国”。

“慕尼黑协定后，当我们的军队开进保护领地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都说过不去吗？”前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埃里希·克恩迈尔在一次俘虏营的讨论中高声喊叫道。“我们当年，哪怕只是心底里，表示过不同意吗？没有，一千个没有。我们为权力梦所陶醉：统治全世界。它使人们冲昏头脑，陶醉于权力。”权迷心窍的狂人行动破坏了一切界限和准则，特别是当所谓新德国的年青活跃的使者们不仅被独裁者的魔术所支配，而且还受到古老德意志的迷信在他们中间散发影响时，这种情况就更加严重。他们认为，一个政府不可能干坏事，即使干了坏事，那么公私之间的区分还始终使公民可以不被国家的任何苛求所玷污。

因此，党卫队的血腥历史也属于这个古老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时代，党卫队的活动和行径表明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万能的过分膨胀。德国人，“这些过来人”是否已经理解这个教训？历史学家不能作出回答。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缠住不放，以致毫无疑问，党卫队的编年史将作为惊心动魄的权力狂的文献继续伴随着德国人——只要德国有前途，它将起着告诫和约束的有效作用。

在经过那么多的惨行之后，历史会教给后人思考，上天赋予人类殷红的血，决不会白白地在人类历史上循环往复，无休止地流。

历史本身不会再开口说话，但却并不会沉默。

